人与岁月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

韩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美）韩秀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7997-1

Ⅰ.…… Ⅱ.韩… Ⅲ.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Ⅳ.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3436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责任校对：陈 莎

责任印制：李 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4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7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7997-1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多年来，朋友们一再敦促我，快一点把一切都写下来吧！我一次又一次拿起笔，一次又一次停下来。原因是每当那些至今尚活着的画面移近的时候，总会感到莫可名状的苦痛。回首往事竟会这样痛彻心肺，我吃不消了。

若干年前，我有了一个挚友。尽管曾经语言不通，他却由我的学生变成我的朋友，终于可以无话不谈，可以托付终身。他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他对我的深切同情，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我觉得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向他倾诉我的一切。于是在华盛顿，在康州，在纽约，在我们旅居国外的日子里，我们谈着。回忆不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苦事，多年来聚集在心头的话终于倾诉出来了。

人们在忙，忙耕耘，忙收获。他是一个在事业上精益求精的人，为了工作，常常不计日夜。我们只能在工作间隙寻找我们共同的自由活动时间。更有甚者，因为忙，长长的话头，若干次被打断。匆匆之中，我就常被这些未能马上谈清的问题所困扰。心里有话，不吐不快。就这样，早就该写而未能痛下决心动笔的东西，陆陆续续地写了下来。

这些东西唯一的一点点价值就是它们的真实。这是些切身的经验。多年来，我始终认为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而一个伟大的、在人类发展史上占相当地位的民族所遭受的浩劫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也是笔墨

难以书尽的。我只希望我能写出一点点对中华民族的爱，和对生活在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民族人民的无限眷恋。

回到我动笔的初衷：这些文字只是一段生活的纪念，仅以此献给我最心爱的朋友。

目　录

一　你是谁？ …… 1
二　青年工作辅导员 …… 7
三　《琴泉》…… 16
四　歧路 …… 25
五　乡土味儿及其他 …… 34
六　文化人与文化工作 …… 43
七　别有天地 …… 52
八　不识庐山真面目 …… 61
九　回家 …… 71
十　鬼域（上）…… 82
十一　鬼域（中）…… 93
十二　鬼域（下）…… 104
十三　新西行漫记（上）…… 115
十四　新西行漫记（下）…… 129
十五　刘马蒲的由来及其他 …… 142
十六　“造神运动”中的冤魂 …… 154
十七　两代人 …… 161

十八　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 …… 174
十九　燃烧的爱情 …… 186
二十　逃亡者 …… 195
二十一　暗流 …… 208
二十二　该来的迟早躲不掉 …… 219
二十三　火 …… 231
二十四　告别荒原 …… 241
二十五　学徒工 …… 256
二十六　北池子到日坛 …… 269
二十七　大墙内外（上）…… 281
二十八　大墙内外（下）…… 291
二十九　春寒 …… 301

一　你是谁？

我是念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我父亲的照片。他身穿美军制服，高高大大的，有一个高高的额头和一个又挺又直的鼻子，而眼睛，看我的，就知道他的。我想，如果让我把父亲那一套全部披挂上，大概跟他的青年时代没有什么两样。

我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里看过我一眼。之后，母亲和他离异，又过了一两年就带我回中国了。从我母亲那里，我只听到了这些。但是因为血缘关系吧，我却总在追寻这份亲情，心目中的父亲永远是那么高大，我在心灵中编织着父亲的影子。

我清楚地记得，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有一天我把一个白色的文具盒带到幼儿园去了。那个盒子可漂亮了，上边还有金色的外国字。王阿姨说："这个盒子不好，小秀，阿姨给你换一个。"我乖乖地把盒子交给阿姨。一会儿，阿姨拿来了一个新的，上面有小兔子和大萝卜。我高高兴兴回了家，赶快向外婆献宝。外婆什么也没说，拉上我就回幼儿园了。只听见外婆跟阿姨说："那个盒子是孩子爸爸的，是个纪念品。"阿姨也一言不发又把盒子还给外婆了。回家以后，外婆说："是外婆不好，不该让你带出去的。""这是我爸爸的？""等你长大了，外婆告诉你。现在你玩儿去吧。明天去幼儿园带那个新文具盒啊。"我答应着。可是我不懂为什么爸爸的

东西就不可以带出去，更不懂为什么从那以后阿姨就不太喜欢我了。虽然我最乖，手指甲洗得最干净，每天小口袋里都有小手帕；可是阿姨还是不常跟我说话，也不常跟我笑，也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她常问别的小朋友："星期天，你爸爸妈妈带你去哪儿玩儿了？"可是从来不问我。我想我家里的事她准是什么都知道，所以不用再问我了。

我母亲很忙，不常在家，家里就我和外婆两个人。慢慢地我长大了一点儿，就常常磨外婆讲故事。除了整本的《三国》、《聊斋》、《西游记》之外，我还知道外婆运气好。虽然她的娘家是个有一百多人的大家庭，可是她有一个开明的父亲，自小她能在家读书写字。更有运气的是虽然是听父母之命结的旧式婚姻，外公却是一位难得的好人。他去日本念书的时候居然把外婆也带了去。一九二九年他们回国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放了脚，念过经济学，满脑子民主政治的新女性了。可是，外婆总说她是"半新半旧的"。我问她：

"您怎么会是半新半旧的呢？"

"我赞成女子念书、做事，可是我也赞成许多旧道德。"她笑眯眯地回答。我知道，外婆三十几岁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外婆一个人带着我母亲，想必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外婆的爱护下度过的。当然在幼儿园和小学里，小小不言的麻烦是断不了的，但每次都在外婆的安慰声中平安地过去了。

有一件小事，非常可笑，至今我还记得。

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哭哭啼啼地回家，外婆正在厨房里忙着。她停下手里的活儿问我："怎么了？""同学骂我。""为什么？""我比他们高，头发是卷的。"外婆的表情我没看清楚，只记得她没说什么。"外婆，我也要直头发。""好，我们小秀也有直头发。"外婆用梳子沾了水，在我头上梳起来，又在我面前放了一个镜子。"看，现在直了吧？"我笑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暖烘烘的太阳又把头发晒干了，又一个圈儿一个圈儿地卷了起来，我大哭。

等我哭够了，外婆一字一句地说："你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记住，不一样不是不好。你要做好孩子吗？"我使劲儿点头。"好，听外婆话，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我似懂非懂地只点头，牢牢记在心里。

这年外婆给我买了《丑小鸭》作生日礼物。这是我第一次念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给了我信心。我在学业上更用功了。

外婆的话灵不灵呢？当时真的不错，我念书念得好，年年操行是甲等，对人有礼貌。对家里的朋友、母亲的同事、学校的老师、工友，我规规矩矩。对商店的售货员、大街上摆小摊儿的、拉三轮儿的、摇煤球儿的，我也总是先叫"叔叔"、"伯伯"、"阿姨"才说话。这样一来，有时候碰到点儿倒楣事，也总有人帮着我。我还是个快乐的小傻瓜，没为自己的出身担过心。

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了业。我进入了一个离家很近，名誉极好的女子中学——从前的贝满，后来的女十二中。

一九五八年愁云惨淡的深秋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从那时起我不得不正视人生，不得不开始琢磨"我是谁？"这个问题。虽然我的少年时代刚刚开始，虽然我只有十二岁。

一进校门，被分到初一（3）班。我长得又高又大，当然坐在最后一排。正准备坐下的时候，定睛一看，同桌竟是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儿。一头栗色的卷发，两道细眉直飞鬓边，美丽的大眼睛神采飞扬。她伸出手来，"我是萧华，比你大一岁。我妈是法国人。"我笑笑："你怎么知道我比你小一岁？""我比你早来了十五分钟，全打听清楚了。"过了几分钟她又说："以后有事我帮你。我功课不好，你帮我。好吧？"我被她的直率所感动，向她笑笑。

萧华的麻烦可多了。她不但有混血儿常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且她爸爸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从前坐汽车上班的工程师现在骑自行车了。同学们背后叫她“双料反革命”。她可一点不怕。每逢有人这样说她，不被她听见则已，叫她听见了一定是拳脚相加。每次我都劝她：“何必呢？”“何必？我也是人，一点儿不比她们差，她们凭什么？”我说不过她，摊开书本，帮她复习功课。

初一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了，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让我真快乐，整天兴冲冲的。忽然有一天，听说为了巴拿马运河，美国军队打死了多少巴拿马人什么的。总之抗议示威是必定有的。而且，循老例，初中以上的学生和有工作的成年人都得参加。这次，说不定街道上的妇女都得拿上小旗子去游行，听说是全市动员呢。我想在这种集会上必定会高呼口号什么的，很可能我会变成众矢之的，那就惨了。

我下决心：明天请病假。第二天早上，外婆打电话给学校门房的王奶奶，告诉她我感冒了。王奶奶平常可疼我了，所以她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嘱咐外婆带我去看大夫什么的，我心想大概什么问题也不会有，乖乖在家呆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七点钟就去学校了。虽然每天早晨七点三刻上早自习，可我总是早去。一是为了早晨脑子好，可以多背几个俄文单词，二是早点儿去可以把我和萧华的铅笔圆规什么的都预备好。她常常忘了，都是我顺便帮她预备的。所以，通常总是我第一个到校，而且总是王奶奶来开门。这天早上奇怪了，没见着王奶奶，大门开着，看样子已经有同学来了。我什么也没想就一直往教室楼走去。我们的教室在二楼，楼梯口正对着教室的门。我上了楼，打开门，室内灯光明亮。正对面的大黑板上用白色的美术字赫然写着一条大标语：“美国佬从我们班里滚出去！”

我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心里只翻腾着两个字“卑鄙！”眼前模糊

了，我努力想抓住什么东西，心底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别倒下去，千万别！"我试着再多努一把力，两手向前伸去，可是我没有成功，眼前浮起一片黑雾，腿软了，后退了一步，从二楼上一直滚下去。开始，我还感到肩、背碰到楼梯的痛楚，几下子之后，就完全失去知觉了。

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痛，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我试着睁眼，眼前晃动着什么金色的东西。好久我才看清楚是外婆坐在床前。看见我这唯一的亲人，大滴的泪珠滚落下来。想坐起来，头却重得不能抬。外婆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在心里。"话音没落，母亲的声音在客厅响起，"哭什么哭，有什么大不了的！"砰的一声，外婆把一只汤碗重重地摔在桌上。"住口，混账东西，还不是因为你，孩子受这份洋罪！""洋罪！一点也不错，她大概要受到死了。"客厅传来她的冷笑声。外婆发了大脾气。她说的话我不全懂，但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只有外婆是真心疼我，糊里糊涂地又睡了过去。晚上外婆只告诉我，我得在家休息一个月，老中医申大夫来看过了，说是不可以上学。

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老师和同学来看过我，只有萧华每天打电话来。她告诉我："是宋凯干的，她纯粹是假积极！她爸爸是大右派，她想入团，奉了圣旨拿你开刀呢！我把她打得爬不起来了。你在家休息多久，我就得让她在床上趴多久！""你怎么样？""小意思，让他们碰了两个包。不过，有了轻伤也不好意思串门儿呀，这几天我不去看你了，等过几天我再去吧！"她一直没来。我知道她话说得轻松可伤势一定不轻。一个人打一群，再棒也够受了。外婆给她妈妈打了电话，又请申大夫去看她。申大夫给她吃了白药，还说"那姑娘钢筋铁骨，不妨事的"。我们才放下了心。

一个月里，我成了大人。外婆告诉我，我母亲一九五〇年回中国后，在一九五二年的"忠诚老实"运动里，"交代"了我父亲的"罪行"，足足写了四五十页。我问外婆："是人家逼她写的吗？""不是，人家一问她，

她就写了一大堆。”“为什么？”“……”“她写了，人家就相信她了吗？”“大概不会，现在没事，再有个政治运动，看她怎么得了？”外婆这话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而言中。

然而不管怎样讲，因为她的坦白交代，更因为当权者的铁幕政策，我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女儿得在那儿受“洋”罪了。外婆拿出了我父亲的照片、名片，我的出生证，美国护照。从此，父亲戎装笔挺的大照片就端端正正地挂在我自己的小卧室里，一直到红卫兵来抄家为止。

父亲的遗物现在都没有了，在我随身带的小夹子里只有一张他的名片了。无论当权者及其有知与无知的仆从们如何诽谤他，我作为他的女儿却始终记得他。从那时起，我对自己发誓，永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永不屈服于强权，哪怕要经受无数苦难。

就这样，我连唯命是从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心里反而轻松；虽然十二岁的快乐女孩变成了沉默的少女，没有了欢笑，却也没有怨言。我开始行动，开始用知识武装自己，读我所能找到的西方文学，到处找寻有关美国真情实况的报道。我开始学习怎样从多方面去了解被曲解的新闻内容，我从铁幕里了解世界。

初中一年级以九门功课都是五分和操行“良好”结束。操行不是优等，原因有二，病假太多及“与家庭划不清界限”。

二　青年工作辅导员

高中，我进入了一个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住在学校里，每周只回家一天。本着我的原则，埋头念书。无奈书本的内容很快就消化完了。虽然有人说女孩子多半是小学、初中功课不错，到了高中就得让位给男生了；我不相信，而且我也始终做到了名列前茅。还有许多精力怎么办呢？我参加了附中的长跑队。每到星期天下午，我实在不愿坐那拥挤不堪的校车，就从学校一直跑到西直门，到了西直门再排队等公共汽车。

逐渐地，我爱上了长跑这项运动，它不但使我朝气蓬勃，而且给了我相当的“个人”时间。我可以思索我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有相当的时候，我在长跑途中复习我的功课，默诵数学定理、俄文单词、古文、诗词。郊外清新的空气，路旁的花木每每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再加上，参加了学校长跑队，晚自习之后有了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四十五分钟，也是件好事，不必马上回到八个人占地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去。等我跑完了自己规定的长度之后，同屋的人差不多都睡了，屋里的热气和廉价肥皂味儿也差不多消散干净了，我可以悄悄登上我的铺位而不必和下铺及邻铺的人寒暄，省了无数麻烦，还落下一个“群众关系良好”的好名声。

基于以上原因，高中三年，我始终在学校长跑队坚持运动，练就了毅力和耐力。

在长跑的路上，有时也能遇到其他校队的成员，我的同班却只有一人，他叫方朔。高高的身材，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是一个运动家的体魄已基本形成。他是篮球和田径健将，最擅长跳高。衣着朴实无华，不善言词却写得一手好文字，是我们班共青团的宣传委员。据说他父亲是一位红得发紫的文学翻译家，早年即参加革命活动。他的两个姐姐都在中国驻外使馆工作，还有一个哥哥在什么厂当工人。总之人家是革命家庭的后代，我犯不上跟他罗嗦，所以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个星期六，那是高一的第二学期，正是春天，百花盛开的时节。我穿着一身天蓝的运动衣裤，白网球鞋，背着书包一步三跳地上路了。天那么蓝，路旁的树那么青。青春总是美的，我快乐了。体内积蓄的精力让我兴奋，清静的环境更令人舒畅，新网球鞋增加了我的弹跳力，我不禁忘了一切。真想大喊："活着多么好！年轻多么好！"

正跑着，路旁一大丛白玫瑰花吸引了我。我跑了几步，耐不住又回过头来。好美的花儿啊，看了半天，在浓荫高处有一朵含苞待放，我实在忍不住了，走过去，踮起脚尖，还差一寸光景，就是摘不着，在公路上折花，本不应该。算了吧！

后面伸过一只手来，从我头上摘下了那朵花。

"给你！"

"噢，是你，团宣委。"我有点儿不好意思。

"咱们是同班，叫我方朔好了。"

"我们同班不同路，还是叫你的官称好。"

"谁说不同路？每个星期六咱们不都在这条路上跑吗？"

"你为什么帮我摘花，那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吗？"

"爱美是人的天性，无产阶级也不例外。"

他脸红红地跑开了，我拿着那朵花一直跑到了终点，那是我和方朔的

第一次接触。

高二，报章上大肆宣传“蒋帮阴谋窜犯大陆”。所以我们这些不能参加民兵组织的人也都参加了军事训练的课程。天晓得，我简直爱上了射击运动。特别是卧射，我可以平端小口径步枪，在体操垫上一趴四五个小时，专心瞄准。第一次打靶，我竟以五枪四十九环的成绩名列全年级三百个学生的第一名，参加了大学本部的射击队。

之后不久，我们附中所属的大学又参加了北京市跳伞俱乐部，因为需要八个女生参加，所以附中也有了名额。我报了名，居然批准了。只有一个限制，不准进入空军基地。每次得等他们的汽车从基地开出后，我才能上车。

管它，有机会学一样东西总是好的。咬咬牙，参加了，尽管歧视是那么明显。

一天，队部通知我，星期五不必上课，上午参加全市民兵射击比赛，下午参加全市民兵定点跳伞比赛。

“我不是民兵，怎么可以参加比赛？”

“不计个人成绩，就算集体总分。你总不反对为大学本部争光吧？”

我笑笑，什么也没说。星期四晚上下了自习课，我还是照我的锻炼科目到操场上跑步去了。

夜空繁星点点，操场上蒙上了一层清辉。我做了准备活动，三五分钟全身发热了，开始跑我的计划长度。一圈又一圈，操场上的人影渐渐稀疏。

教学楼那边走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一身月白的运动服。我扫了一眼，认出是方朔。

“还没跑完？”

“还有三圈。”

“明天上、下午都有比赛。”

“我知道。”

“你何必让自己这么苦？”

“……”

“我陪你跑。”他和我并肩跑起来，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方朔，你这么做，团支部会提出非议的。”

“我做你的辅导员，帮你学团章，提高思想认识，我介绍你入团。现在，只要你和家庭划清界限，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我帮你，早一点入了团，没人敢给你不公平的待遇。”这番话似乎是经过考虑的，但说得急切，有点口吃。

“你相信唯物论吗？”

“当然。”

“那为什么你们不能用唯物论看待家庭问题呢？”

“怎么？”

“事实上我家里有三个人，但在我心里，我的家庭却有四个人。外婆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但我却是她一手带大的，这个界限是划不清的。”

“我们从来没认为你外祖母有什么问题。”

“那么关于我母亲，老实说，在政治上她只是糊涂虫，她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华丽的工具，可悲的是她并不自知。”

“别这么刻薄。”

“刻薄？我说的不是事实？……”

“算了，这些题目不是我们谈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不会走我母亲的老路，我想团支部也不必为此事费心了。”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事实上，问题不那么笼统，你们要求我加强认识的不过是那位我只

见过一面的父亲。我对他毫无了解，凭什么划清界限？这不是地道的唯心论又是什么？”

“可是你知道，通常对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军人的看法是什么。”

“那些看法里究竟有几分真实？我们什么时候都听一面倒的理论，什么时候容忍过不同的意见？怎么可能存在真正客观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他哑口无言地僵在那儿。

“方朔，你快回去吧，我不要遭人非议，明天见。”

我快步向前跑去，把他丢在那儿。他没有追上来，默默地走开了。

第二天清早，吃了早饭：一碗粥、二分钱咸菜、一个二两的馒头。到枪械室领了我的小口径步枪，坐下专心擦起来。

射击教练从旁走过：“韩秀，好好打，为集体争光啊！”我笑笑，没言语。

这支枪拉起栓来不太灵便，我索性铺开报纸，大拆大卸起来。

“韩秀，什么时候学会了擦枪？”是方朔。

“兵要精，武器也要精嘛。不过现在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谈不上得心应手。”

“昨晚上我想了好久，我还是想做你的辅导员。”

“你不怕‘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拉拢’？”

“不可能，你在各方面都是优秀的。”

“方朔，我已经把丑话都说在这儿了，你最好再谨慎考虑一番，比赛以后再说吧！”

靶场安排得不错，我的靶位也很好。入秋的北京是美的。靶场周围一片红枫，层层叠叠。我欣赏着，等着信号，安然而自信。自信付出汗水后，收获将是丰硕的。

九百四十八环！轻取总分第一。

大学本部的校旗升起来了，射击教练、大学民兵代表、学生会代表上台领奖，靶场上掌声雷动。

回头一看，方朔坐在我左后方不远的地方，手里抓着他的小口径步枪，脸色真难看。

“你不舒服？”我问。

“没有。替你冤，你倒好像挺高兴的。”

“我没有你的名利心重，我在想下午的比赛。”

“下午我陪你去。”

“算了吧，明天考物理，你还是回学校复习功课的好。”

“明天你也考试。”

“我跟你不一样，在我的精神上没有那么重的包袱，我不必患得患失。”

“可是，你总还有生气的时候吧？”

“生气？如果我常常生气，大概早就气死了。”

“那你为什么万事不落人后，就是拼上命也在所不惜，总有一个目的吧？”他的声音有点激动了。

“人在世上活一回，总得对得起自己！”

人们喧哗着，站起来离开靶场。在人流中，我从不左顾右盼，这次仍循老例，直奔校车而去。吃了学校发的水果面包，喝干了两瓶汽水，交还了步枪，奔赴另一个考场。

下午的天气更好，万里无云的蓝天上，几架银色的小飞机像快乐的小燕子飞来飞去。不远处的跳伞塔上用红白两色油漆标出高度。我曾在那儿苦练，现在看过去，竟觉得像玩具一般了。

校车在空军基地外，照例停车，我下了车。

后面，方朔在和教练说话：“今天她是主力，我跟她一块儿在外边等，照顾一下情绪。”

“对，对，对。”教练连连称是，方朔也下了车。

十五分钟，我和他站在基地外的柏油路面上。基地大门口两个泥塑木雕般的军人持枪立着，头盔在阳光下闪亮。

一望无际的空阔地带，我心情颇佳。

“干吗愁眉苦脸的？”

“我还不是为你难过。”

“以后你少说这种话，我快乐得很呢！”

“真少见！”

“少见多怪！你以为世界上的人都是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泥娃娃吗？”

他笑了，虽然很勉强。

“你瞧着，今天我跳一个最棒的给你看，谢谢你陪我在这儿罚站。”

“你的号码是几？”

“十三号，而且别忘了今天是星期五。”

“这么细微的地方，也没有放过你？”

“没关系，我从来不是一个认命的人，咱们走着瞧吧！”我哈哈大笑了。

校车开出来了。空军飞行员、空军跳伞教练都已经端坐车中。跳伞运动员们也已经穿戴整齐了。我们上了车，我的跳伞服已经挂在我的座位上。车子徐徐开进相距不远的跳伞比赛场地。借这点时间，我已披挂停当。

嗬！观众不少嘛，万头攒动，彩旗飘扬，挺热闹的。我想像着我在空中时，背上鲜红的十三号，一定是挺显眼的。

飞机起飞了，地面上的大红点迅速地缩小了。我想，今天，我不但要接近那个红点，而且，我一定要站在那个红点上。

飞出舱门后，我等了一下子才拉伞，争取了速度。而且耳边的风声告诉我，侧风经过，多么好的机会！我控制着降落的方向，向我的目的地飘落，终于成功了。

第一个冲到我面前的是方朔。“我吓死了，你为什么最后一个拉伞？”

“要是早一点，我就借不上那股小风了。现在，这不是正好吗？”我笑着，伸手拉着红白相映的绸伞。

当然，大学本部的定点跳伞成绩又是第一。挺麻烦的仪式完了之后，一股黄尘飞起，我们凯旋了。

车上，我一言不发，方朔又沉不住气了。

“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背物理定理呢。”

他笑笑，笑得很勉强。“啊，你已经开始复习了。”

“当然，生命这么短，分秒必争嘛！”

“难怪，你有那么多时间去图书馆看课外书。”

“一点儿不错，生命得自己去丰富。”

第二天考试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满分，因为我答对了一个被大家忽视了的小问题。

题目是有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在气球下面挂了吊篮，篮里有两个人和他们的行李。题目给了大量的已知条件，应有尽有，问题是这个气球所能升到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同学们马上套起公式算将起来。算了半天，答案无奇不有，居然有人说飞行高度为负数。我仔细把题目看了两遍后断定此气球超载，不可能带动吊篮离开地面，飞行高度为零。物理教员看着我的卷子，抿着嘴儿直笑。

下课后，方朔拍着脑门儿跑来：“我怎么那么笨？”

“你一点也不笨，就是思想僵化，迷信公式。”

“真的，这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了。”

“不可一概而论啊！”

“对，那又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了。”我们忘乎所以，开怀大笑。笑声

惊动了坐在屋角的团支部书记，只见她直翻白眼，本来略嫌短的额头益发短了。

“我已经跟团支部正式交换过意见，组织上认为你最近的表现不错。我正式成为你的入团介绍人，我们的谈话将在本星期天晚自习结束后在课室外走廊内进行。”方朔正色道。

“届时，我将洗耳恭听。”我也报以一脸凝重。

星期天回校，我穿了一件白色兔毛短上衣，蓝底白花裙子。我是故意的，我要看看这位团宣委的窘态。

果不其然，我们在窗前“谈话”时，他竟两眼直视窗外，就像劣等演员背诵台词一样，背着他必须向我交代的团章条文和我的“努力方向”，声音不仅干涩，而且时有停顿。

等他背得差不多了，我说：“活见鬼，你背完了吧？快回宿舍换衣服，我在操场等你。”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眼睛仍不敢在我身上停留，哪怕是一秒钟。

我离开的时候，听见团支书问他：“谈得怎么样？”

“还好。”

“别忘了提醒她，艰苦朴素是很要紧的一点，她穿得这个样子，怎么入团呢？”

“我跟她说。”方朔唯唯诺诺地答应着。

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三脚两步冲下楼梯回宿舍去也。

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并肩在操场上跑起来了。秋夜的小风、月色、树影婆娑。我感觉得到，他在调整步伐以便和我步伐一致。我们两人放开大步像两匹小鹿一圈一圈欢跑着。那时候，只有那时候我曾经企望那颗年轻的心能和我的心一起欢跳直到永远。我曾企望时间就此停住。至于那“青年工作辅导员”的尊号却早已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三　《琴泉》

我八岁的时候开始跟山野先生学琴。他们夫妇都是日本钢琴家，侨居中国多年，依靠收几个学生维持生活。山野先生曾对我母亲说："您就是不付学费，我也要教她。孩子的一双手天生是弹琴的，耳音好，音乐感丰富。我不能说她是天才，但她的天资优越，而且又那么用功，她一定有成功的希望。"两年之后，我已开始在少年宫的演奏会上登台。但我母亲说每月三十元钱的学费过于高昂。我不怪她，这笔钱虽只占她收入的七分之一。但毕竟不是小数，一个工人得用这笔钱养家活口呢。山野先生又免费教了我一年。我看着他们经济上日益窘迫，心里非常难过。况且他们已在想方设法筹措路费。只有十一岁的我，没有地方去弄钱。有一天，我终于怯怯地对山野夫人说："师母，你们再收别的学生吧，我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山野夫人抱着我直掉眼泪。我最后一次抚着那张心爱的大琴，一步三回首地走了。之后，又有一年光景，我常在山野窗外听琴，之后，他们真的走了。

我爱钢琴，我知道每个琴键下面蕴藏的无穷的力量。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音乐的脉搏。然而，我放弃了。我知道音乐比好烟、好酒、高级饭馆重要得多，然而我没有选择。放弃的不只是琴，也放弃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不属于我，但是可能给我以安慰的世界。对音乐，我一直怀着一

种虔诚的柔情深爱着，随时随地捕捉着。

直到高一，才发现了另一种琴声——古琴。那也是事有凑巧，我母亲因工作之便学起了七弦琴，进而又买了两张琴。这时却有一位家居东北的老中医的儿子，万里迢迢写信到北京的古琴研究会，表示了想学琴的愿望。几经周折来到北京就暂住我家。白天他在琴会学琴，晚上叮叮当当苦练到半夜，才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几个钟头。两个多月的工夫，他居然学会了《高山流水》、《渔樵问答》、《梅花三弄》、《平沙落雁》等几个古曲，而且他从小学会了吹箫与笛子，终于顺利地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开始真正研习古琴艺术。

他刻苦到无法形容的地步。每天从琴桌旁离开的时候，两手都被丝弦磨得鲜血淋漓。我用纱布把他的手指细心包好。第二天清晨他又都撕开，苦练起来。我对他又喊又叫："你带着纱布练不行吗？"

他总是红着脸说："感觉不对，真对不起。"

血把丝弦浸得变了色，而他真的成功了。

虽然他住进了大学，但我仍常听他的琴。他年轻，满腔的热情都倾注在琴音里。我觉得在他手下这逾千年的古乐器有了新的生命和意义。我最爱他的《酒狂》，那种醉诗的意境妙不可言。

高一语文老师让我们作一自由命题的作文。我写了《古琴的新生》。写出了我的感受。那时，老师笑说："作文不可给一百分，我就给你九十九吧！"

我用那短短的三四千字留下了我对琴声的赞美，留下了对那青年音乐家的尊敬与钦佩，留下了对音乐的一往情深。多么希望普天下的有志者都能达到他们殷切期望的目标啊！

高三，第一学期开始了。有一天，方朝兴冲冲地来找我。

"校党委建议咱们毕业班搞一个文学周刊，当然目的是帮助毕业班提

高写作水准，迎接高考；不过，咱们也就有了练笔的好地方了。编委名单已经决定了。有你！”

“开宗明义，第一期预备用些什么材料呢？”

“我已经想到了一篇。”

“什么？”

“你的《古琴的新生》。”

“已经两年了，你还记得？”

“何止记得，我还找曲先生抄了一份留着呢！”

我心里不由得涌上一股感激之情，接口问道：“你的新作呢？”

“有一篇《霜叶红于二月花》。不知能用吗？”他问。

“我可以看看吗？”

他递给我一小打装订整齐的稿纸。《霜叶红于二月花》是一篇题目大胆、文字绮丽的散文。暑假，他陪他父亲去北戴河度假。在海滨，结识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一位巧手园丁。散文赞美了劳动，礼赞了劳动者的情怀，文笔流畅。

他一直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的视线由文章的第一行移动到最末一行。他激动得脸色略有点发白。

“方朔，文笔真不坏！”

他笑笑，两只手搓着。

“你会画画儿，画张插图如何？”我又问。

“好啊，这儿还有几篇，你都看看。你来排版，我去找个帮手画插图。不过，咱们开始干活儿以前得给这个期刊起个好题目。”

“题目大概又得突出政治、又红又专。我没有那个本事，还是你考虑吧！”

“放心。这次我们得选一个相当有文学特色的题目。高三了，准备高

考是大前提，红专问题也得有所侧重了。”

“有什么麻烦，可是你兜着啊！”

“放心，我负责。”

“琴泉。”

“‘琴泉’？我的天，你怎么想到的？”

“你要把《古琴的新生》放在第一篇。我就希望继这点琴声之后，好文章能不断涌现，有个抛砖引玉的意思。不知可用否？”

“好极了，我来画一幅山水作刊头。”

期刊出来了，封面不是水声淙淙的清泉，却是气势磅礴的飞瀑。据方朔说是取古曲《高山流水》的意境，也就随他了。期刊里收了十几篇学生们的习作。虽然羽毛未丰，但字里行间却充溢着文学青年指点江山的豪气。天晓得，语文老师曲先生居然爱不释手。期刊变成了范文，不仅在本校，而且在外校广为流传，一时间非常的热闹。

我还是循老例，晚自习时间只在教室一个钟头，做完各科的作业。第二个钟头就从教室后门出去，上楼去图书馆。在教室里念书的人多半是不得不念的，而在图书馆里啃书本的却往往是真要念书的。久而久之，在那里总会碰到不少熟面孔。

现在方朔也常来了，隔着几张桌子，遥遥打个招呼，各自埋头念书。他专攻文学，我却不然。我知道凭我的政治背景，文科不可能，理科也危险，工科的可能性大概还是有的。在工科里，尖端、保密专业跟我无缘，冶金、造船还有一线希望。这两者之间，我偏爱造船，但总觉得冶金专业录取的可能性大。我开始搜集资料，研读大专基础课，预备高考。目标是清华，我希望凭自己遥遥领先的考分进入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我还抱着一线希望。

一天，图书馆关门前，方朔走过来。

“你念什么？”

“解析几何，刚体旋转。”

“你真的要念工科？而且是对女生不太适合的专业？”

“只有这种专业，我才有一点希望。”

“我记得你最喜欢的专业是新闻。”

“没有条件，就是入了团也不行。”

他沉默良久，又问：“今天还跑吗？”

“上周跑得过多，这周遵医嘱隔日一跑，所以今日暂停。”

“出去走走吧！”

几个月来，办报、谈红专问题，他虽然还是我的青年工作辅导员，但是除了例行的向团支部作汇报之外，那些莫名其妙的大道理渐渐不再说了。我们——全体学生的面前只有一个东西，高考。我们——我和方朔之间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在心里慢慢地长大，慢慢地成熟。

“最近，你在看什么？”他问。

“《大卫·科波菲尔》。你呢？”

“泰戈尔的《游思集》，美极了。”

已经是初冬了，寒风瑟瑟，满地的枯枝败叶。我们却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海阔天空地谈着。从小说到诗，到剧本，到我们共同劳动的结晶《琴泉》。

“韩秀，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们可能相爱吗？”

“方朔，你不觉得太危险？你的父母、学校、社会，谁会允许？”

“不管他们想什么。我从小长到这么大，只有你一个知己。过去，我觉得我生活得很有原则，可是现在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我精神上有一个桎梏。现在，是你帮我挣脱了它，思想上的桎梏不存在了……”

“不是不存在，是你对那种禁锢的了解还不够深刻。不只是你，我也

样……”我沉默了，隐隐觉得心头掠过一重阴影，却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声调透出一点忧郁，“我们对这个问题总会了解的，早晚就是了。”

“到那时候，我一定和你风雨同舟。”他的声音十分开朗。

“我们试一试。”

他挽着我，我们走回去。回宿舍以前，又站在阳台上谈了好一会儿。

熄灯铃响了，我才冲回宿舍。虽然预感到什么，但我还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我承认这是我第一次爱上一个人，虽然有欠缺但仍感到爱情使我视线模糊，使我不再每分钟警惕可能遭到的打击，甚至有的时候忘记了一切。

幸好，寒假即将来临。

学校舞蹈队头头找到我：“放假前的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西班牙舞，给我们领舞吧！”

“好！”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当时我什么都没想，只觉得有一个晚上不必穿上下一个筒的蓝布褂子，实在不错。

妆是我自己化的，没有油彩，只有一点粉妆和口红，已经很好了。

在小手鼓的叩击声中，我上场了。眼角扫了一下，方朔坐在后排。一个转身，他站起身走到最后，站在那儿看，一直到最后一次谢幕，他还站在那儿。在后台，方朔跑进来，“不要卸妆，等会儿我们就坐汽车回城，让我再看看你。”

就这么办，我带着一点淡妆坐在他身边。两只手紧紧地握着。五十分钟的行程，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我，换了公共汽车以后，我们索性缩到一个角落里。快过年了，车里挤得要命。他努力撑着，给我留下一个小小的空间。车里人越来越多，我感觉到他的呼吸离我那么近，两颗心欢跳着快要蹦出来了。

“我送你到家。”

在大门外，他轻轻地抱住我：“让我吻你一下，就一下……”他那么

轻轻地在我嘴上碰了一下，就跑了。

快乐的寒假，我们在冰场上、在书店里、在电影院、在积雪的街道上，没有往事的回忆，没有家庭的纷扰，什么都没有，只有心心相印，无时无刻不在挂念中，无时无刻不想看见对方，渴念着对方的倾诉，渴念着对方的关怀和爱护。我们真的相爱了，真的形影不离。晚上分手，第二天他还会带给我厚厚的一封信。天哪！如醉如痴的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

高三的下学期，所有的学生都废寝忘食地忙起来，而我们仍有余暇诉说衷情。团支部委员和积极分子们虽然时不时飞来几个白眼，而我们却一切都置之度外了。爱情使我们忘记了一切忧烦。我们照样在长跑队夺名次，照样奔跑在排球场上，照样精心照顾我们的《琴泉》。为了考工科同学的需要，我们又开创了一个壁报《知识角》。那是我的得意之作。有各种数、理、化的趣味问题，甚至有中、俄文对照的《九评》[①]片断。尽我所能，帮同学们复习，预备高考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险题，和方朔继续合作着，快乐无垠。

四月五日清明节，全校师生上山植树。在小山坡上，他挖坑，我种树。小树迎风挺立着。我们种得又快又好，不一会儿，就遥遥领先了。

“韩秀，我们永远在一起吧，等这些小树长成了大树，我们儿孙满堂的时候……”

“我的天！那是三十年规划了。”

“答应我，不嫁给别人，好不好，我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你当你的工程师，我写我的没人要的文章。”

“文章没人要可惨了，我们得喝西北风。”

哈哈大笑着，小树和我们一起笑弯了腰。

“五一”国际劳动节，因为是毕业班，免了在天安门前大跳集体舞的

① 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中共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九篇长文批判以赫鲁晓夫、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简称“九评”。

活动。我和方朔约好，在紫竹院见。那个公园虽然在西直门外，但离城不远。又清静，又可看到北京的节日夜空。我穿了一件浅红的薄毛衣，一条深蓝的裙子，匆匆赶了去。还在汽车上，我已经看到他，浅驼色的毛衣黑裤子。总算没穿他的蓝制服。跳下车，我向他奔去。

第一次，这么紧，他把我抱在怀里。他已经有一点小胡子了，年轻，朝气蓬勃，两眼闪着顽皮的光。“快，让我好好看看你，我的好姑娘。”

我们四目相视，我把头靠在他胸前，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这是我的初恋，我恋爱了！

我问他：“你敢不敢大声喊，我爱你？”

“敢！”

“喊！”

他刚张嘴，我赶快伸手捂住，两人笑成了一团。

“说真的，方朔，你能保证我们永远不分开吗？”

“当然，永远。”

“我们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那才好呢，分配了工作，咱们就结婚。《婚姻法》规定十八岁就可以结婚。”

“胡说，如果一个考上，一个没考上呢？”

“谁考上了，谁不念，两人一块儿工作。”

“要是都没考上，也都没工作呢？”

“咱们一块儿种地去，男耕女织，不也挺好？可是怎么可能？学校的佼佼者何至于无处可去？不可能啊！”

“佼佼者？你忘了那天在跳高比赛场地，我们说什么了？”

他有点儿黯然神伤。

那是一两个月以前，全校运动会。他已经蝉联两届全校跳高冠军，但是这次他没跳过他企望的高度。观众早已散了，只有我在砂坑旁的长凳上

坐着，帮他看着他的外衣书包什么的。

“每个运动员都得经过现在的时刻吗？”我问。

“差不多没有例外，体育生命是很短的。”

“政治生命和人的生命也是一样，都不是太长的。”

整个下午我陪着他，我知道他为这次比赛付出了多少汗水，我也知道他的腿伤还没完全好。可是，我支持他的顽强。我不喜欢临阵脱逃的人。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以退却。这是我的原则。我很高兴他也是这样的。

“我的运气比别的失败者好。”

“为什么？”

“因为有你。你比跳高冠军的锦旗重要得多。”

五月的夜虽然美丽，但联想起不久前的一切，十分扫兴。生活太严峻了，小小的一段回忆又把我们拉回了现实。

方朔紧紧地抱着我，泪水在眼眶里转着。

“上苍保佑，别让我们有什么不幸。”他轻轻地说着，可他哪里想到这个时候，有人已经开始行动。

我默默地抚摸着他的头发。我哪里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里，我变成了愤怒的刀剑，而他变成了他的信仰的牺牲品。他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健康的体魄在内。那，都是后话了。

四　歧路

“五一”的夜在依依惜别中结束。刚分手，我又和方朔约好，第二天去大华电影院看《心儿在歌唱》——一部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奖的苏联影片。我们虽然已经看过多次，但都想再在一起看一次。

五月二号下午两点钟，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大华。在车窗里我扫了外面一眼，真糟糕，他还没来。在大华的对面，有一个什么日用品的铺子。我走进去，在里面漫无目的地转着。心里开始有一个念头：情况不好。我努力打消这个念头，可是没有成功。没有法子，我越来越执著地确认情况大变了。四十分钟以后，我离开了那里。

回家之后，我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这个危险的时间最好不去触动什么，一动不如一静，再等一会儿……

三号下午，循老例，我得按时到校。平常我和方朔总是五点半在东单的公共汽车站见面。从五点二十到五点四十，没见到他的影子。我上车了。在西直门，我放过了一班又一班 32 路车。看表，晚自习快开始了。无奈，怀着不安的心情，我上车去学校了。车到黄庄，还是什么熟人也没见，迟到了。心里依然惴惴，怎么办呢？

在通往校园的小径上，迎面跑来一个人，是同宿舍的张琳，她在班里缄默不语，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小学教员。她跑得气喘吁吁。

“韩秀，作好思想准备，今天团支部开方朔的批判会。”

“为什么？”

“还问为什么？你们的事完了！我请了病假，没上晚自习，在宿舍窗户那儿等你，就为的是告诉你这个！我得快走了！”

“谢谢你，张琳！”

“别说了，沉住气！”

她快步走了。我放慢了步伐，想在这一百公尺的路上想出对策来。为什么？什么事情导致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严重？是方朔的家里人作怪？是老师做了家访？几个可能我都想到了，但一次都没想到方朔自己可能有什么问题。我纷乱的思绪中也闪现着无数的问号：是不是我不慎失落了什么信件、日记？我不仅不在日记中用明了的语言阐述什么，而且日记也是什么时候都带在身边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到了大楼门口了，我咬紧牙关，拉平身上的白衬衫和黑裙子，抬腿走了进去。

大楼里安安静静，晚自习开始已经有十五分钟了。我放慢了脚步。经过壁报栏的时候，又一次用爱怜的目光扫了一眼我们的《琴泉》，这是我们的周刊的一部分，每星期我们在壁报上放一两篇文章，图文并茂。这一次刊载的是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孩子们的会议》，中间有几幅插图，都是那些小淘气，可爱极了，那是方朔的手笔。

壁报面对着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户灯火通明，门却关得紧紧的。我走过去，推开课室的门。

门内的喧声戛然而止。只听得一个撕裂心肺的哭声，是方朔！

我的视线模糊了，是他！他趴在桌子上，肩膀抽动着，哭得像个伤心透顶的孩子。我进去的时候，正在发言的团支书住了口，盯着我。我却什么都没听见，也什么都没看见，只有一个直觉，他受委屈了，我得护着他。

我机械地迈动脚步，向我的座位走去。我的位子在倒数第二排，在方

朔的前面。这个时候，我的位子上坐着个人——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中纺部某高干的女儿——高冀芬，据说她是她父母在冀中平原打游击的时候生的，所以名字里有个“冀”字，至于为什么有个“芬”字，大概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思吧！

“你的座位换了，在那边。”高冀芬咧着大嘴，她的嘴真大，快到耳根了，一脸的大雀斑，一双眼睛活像两块玻璃片，闪着假天真的神气。

嗬，我的新座位不错，在角落里，最后一排，全班有四十六个位子，只有四十五个学生，想必我没有同桌了。管它，先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

到了座位跟前，打开书桌。那个时候，虽然中苏交恶，但我们学校的一应设备和许多地方一样都是苏式的。书桌也不例外，桌面也是盖子，上课时不宜开启，有限制学生做小动作的用途。现在，在我的书桌里，书籍、文具放得整整齐齐，想必有一双细心的手已经仔细地翻检过了。那个时候此类技术还需要掩饰，还没到明火执仗的地步。我盖上书桌，端坐在那儿，等着下文。

“好，现在我接着谈，”团支书继续念她的发言稿，“这次，方朔的问题性质是恶劣的，情节也是严重的。严重在哪里？”

“第一，他身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袭的时候，立场不稳，滑了下去，终于不能自拔。第二，他作为韩秀的青年工作辅导员，不但不能引导落后青年走上又红又专的康庄大道，反而堕入资产阶级的泥坑。这一点也是令人非常痛心的。”说罢，一脸痛心疾首的样子。

“我来说两句。”嗬，是高冀芬的声音，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支书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再补充一点。方朔同学的错误是明显的，可是也是可以谅解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防不胜防，我们真得提高警惕了。矛盾有主要的方面也有次要的方面。我觉得问题的主要方面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内外的严重泛滥，特别是在个别落后青年的身上表现尤其明

显。问题的责任主要还是在这方面。如果没有韩秀的伪装进步、腐蚀拉拢，方朔不会有今天的问题……”

话还没说完，我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而今天那声音是多么嘶哑，多么有气无力啊！

“我说两句，问题是我造成的，韩秀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而我对她在思想认识方面的帮助不够，责任主要在我……”

他又哭起来，泣不成声，好凄凉，好惨。我别过脸去，心里的怜悯在消失，我什么都没说。

教室里冷场片刻之后，高冀芬继续她的发言：“下面，我们再谈谈，为什么学校里会出现这些恶劣的现象？为什么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的校园里泛滥成灾？为什么传播腐朽思想的不健康的杂志、壁报会得到支持，甚至在社会上放毒？《琴泉》就是这类东西的代表。”

他们开始攻击《琴泉》了，我不能不驳。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我站起来，周围投来了不解、忿懑甚至怜悯的目光。我不顾一切，说下去：“《琴泉》的诞生根据的是校党委的意见。出版之前经过层层审核。如果我们编委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那么校党委竟然也盲目到批准毒草出笼吗？请问你的意见是针对我这样的所谓落后青年还是针对校党委的领导？”

“你无理取闹！”团支书涨红了脸大叫，“这个周刊出来之前当然得到过校党委的批准，可是谁知道你们出的东西越来越不像话。”

“好，哪篇文章不像话，哪篇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请你指出来。哪篇文章没有得到教导主任的批准，也请你指出来。”

“好啊！你提到我，我来了。文章内容我且不谈，仅“琴泉”这个题目就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了。”

我定睛一看，来者不善，那是高三年级教导主任，校党委成员周毓英。

老鼠眼睛在玻璃片后面闪着光，细细的脖颈子在宽大的蓝制服里晃荡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像小刀片儿似的轻轻地动着，声音又高又尖，我的耳膜颇难接受。

“《琴泉》是校党委通过的，而且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也是毛主席的文艺原则，主席还为‘蝶恋花’填词呢，《琴泉》有何不可？”我没有退缩。

“胡说，你竟敢诬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理论，你要怎么样？而且，在校党委以微弱多数通过《琴泉》问世的时候，我投的是反对票，可惜我不幸而言中，这个周刊确实没有出我所料……”镜片后面竟是得意之色了。

“我再一次重申，对这个刊物的性质，我要求澄清事实。”

“好，我们有机会澄清。”周毓英说完，丢了个眼色给团支书，迈着方步出去了。

课室里开始了井然有序的讨论，千篇一律的发言。八点一刻，我昂头挺胸地走了出去——我锻炼的时间到了。

那时候只是一九六四年，批判会还没有达到最完美的表现形式，所以我还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昂首阔步离开为我而设的会场，这个批判会也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了。

出了门，经过教导主任办公室的门口，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对面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清秀的脸上毫无表情，上身穿一件黑丝绒中式小夹袄，灰毛料裤子，黑平绒海圆口平底鞋、白丝袜，身材娇小。她盯着我良久没有说一句话，眼里闪着冰冷而鄙夷的光。初见她，我的第一个直觉告诉我，她是方朔的母亲，他们母子太相像了。我甚至轻轻地微笑了一下。待我看清她的目光，我收敛了笑容，目光也变成冷森森的了。

她的身后还有两个年轻女人，一式一样的灰干部服，五短身材，一脸横肉，跟面目姣好的母亲正相反，想必是他姐姐了。再一看，一个两鬓斑

白的男人正在和周毓英告别，“再见”之声不绝。想必是那位可敬的翻译家了。他转过身来，和我正好面对面。他竟两眼望空，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这种神气把我激怒了。我抢上一步，先他们出了大楼，下楼梯的时候故意踏着欢快的步子。旋转的大门在我身后无声地向里荡去。我真希望这扇沉重的大门可以把他那趾高气扬的鼻子碰扁。

在宿舍的大洗手间里，雾气腾腾之中，张琳在我耳边说：“四楼阳台见。”

我洗完了，慢慢转出去，到了阳台上，张琳已经在角落里等我。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五一晚上他父亲抄检大观园，发现了方朔的日记，就全家开斗争会，今天又杀到这儿来了。”

“无耻。”

“算了，认命吧！”

“我早就知道认命是什么意思，《琴泉》就这么完了？”

“你真疯了，不要命了？”

“此话怎么讲？”

“谁像你这么傻，到了这种地步，还管什么《琴泉》？”

“给《琴泉》催生是他们的权利，给它送终更是他们的义务，而我的责任是讨回公道。”

“你凭什么要什么公道？今天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犯了大忌。你不是找死是什么？”

“我豁出去了。”

“十七岁，你豁出去了，值吗？”停了半分钟，见我没回答，她又说下去，“本来政治条件就不好，加上跟你父亲划不清界限，现在又加上这样的事儿，你还想不想上大学？你这不是玩儿命吗？”

“好了，批判会也开过了，他们还要干什么？”

“《琴泉》一定完了，你可千万再别说什么了。”

“还有什么？”

“安分守己，千万别惹事，好歹上了大学，离开这里也就完了。”

我没回答。除了沉默，我也实在别无他法。

熄灯铃响了，张琳匆匆离去。我却在阳台上来回走着。星空灿烂，万籁俱寂。我的心从战场上回到了现实，猛然才想起心口一阵阵刀割般的刺痛，我看错了人，方朔竟是这样懦弱无能。

日子飞快地过去了，《琴泉》和别的中国的事情一样热热闹闹地开始，无声无息地不见了。再也没有人提起，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人人投入了高考前的紧张的复习。我却还是照老样子不紧不慢地做着我的事儿。

一天数学老师找到我：“韩秀，高考志愿表都填好了吗？”

“差不多了。”

“给我看看。”我递给他用铅笔填写的志愿表。

“八个志愿都是清华，你疯了！”

“怎么了？”

“你就是要标新立异！就凭你的政治条件，你敢这么填！”

“那我怎么办？”

“一定得把什么水利水电学院、林学院什么的填上，以防不测嘛！”

“林学院？您别逗了，要我去种树吗？”

“就你这么顽固不化，别说种树，让你去种地都不多。”

我知道数学老师是一片好心，也就没说什么，乖乖地照他说的填了，可是不幸而言中，四个月后我真的下乡种地了。

高考轻而易举地过去了，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高考前，大学校长曾来我们附中，亲自选了四十六个学生，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

手舞足蹈地发表他的意见，那个神态竟像他的青年时代又回来了一样兴奋。他说："你们是附中的尖子，你们都进同一个考场。我希望这个考场可以输送四十多个学生到大学本部。"他的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是，在那时已席卷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考场中的四十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在北京被安排了工作，四个革命干部子女上了大学，而我却下了乡。

接到高考招生办公室的不录取通知书时，我并没有过分惊异，我知道有这个可能。而数学老师却打抱不平了。他跑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回来之后，他白着一张脸来看我。

"我考得怎么样？"

"他们没看你的卷子。"

"没看？"

"对了，他们用订书机把你的卷子封了。"

"封了？"

"对了，上面就打了一个戳儿。"

"什么戳儿？"

"此生不宜录取。"

"银质奖章毕业生，不宜录取。好极了！他们没告诉您为什么？"

"说了，他们说你可以算是中国人，也可以算是美国人，这样的人没有可能在这里上大学，所以他们觉得不必再改你的卷子。"

"那我现在做什么？"

"等分配。你母亲只有你一个孩子，我想你一定有可能分在北京工作。"

我知道，话说到这里，不必再说什么了。许多可能的情况我都想到了，可我还是没有想到结局是这样的，他们连借口都不必找，就这样赤裸裸地说出了他们的意见。

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方朔的电话，他约我在中山公园里见面。

一月不见，他真精神，白衬衫、蓝裤子，满脸得意之色：

“我考上大学了，是第一志愿。”

我沉默。

“你有什么打算？服从国家分配吧！”

我还沉默。

周围的一切——鲜花、人群、蓝天、嬉戏的孩子、身边的这个人都离我这么远，这么远，我好寂寞啊！

“这些信都是你的，还有文章，还给你吧！”

我看都没看，接过那厚厚的一扎，顺手抛在河里。河水打着漩涡，信沉了下去，带着少女的梦。

“你的《大卫·科波菲尔》还在我那里，我真喜欢那套书，我可以留下吗？”

“随便。”我应了一声。书在这个时候又算得什么呢，尽管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再见！”我转身走了。

“再说一句话，我希望你能服从祖国需要，工作之后希望你学习进步，工作顺利……”

方朔已经在我心里死了，现在的声音是一个机器发出来的，多么可悲的现实。

路过新华书店，我踏进去，又买了一套《大卫·科波菲尔》。

五　乡土味儿及其他

我是十八年前到乡下去的，那是一个让人不易忘怀的日子——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们这来自四十个学校的四十四个高材生也就在锣鼓声中乘火车南下了，你知道，作为全国第一批“集体插队”的试点人员，我们是满载着荣誉走的，而且据说风陵渡北岸的乡亲们正在望眼欲穿地盼望着我们。

下了火车换汽车，真不坏，挺平的柏油路，路旁的电线杆子告诉我们这儿是个有电的地区。路边上尽是棉花地，在地里摘棉花的大婶子、大姑娘们衣着齐整，摘花包袱也是齐齐整整的家织白布，不见几个补丁。夹在棉花地中间的是刚耕过、预备冬播的麦田。不坏，一看就知不是吃“返销粮”的苦地方。这地方的房子也特别，一砖到顶还不说，居然是上下两层，据本地干部们说，上层均为各家仓库，贮放来年需用的粮食、烟叶、农具之类。

汽车走了半个多钟头，在路边上停下来。嗬，右边挺干净的一条小土路，小路两旁种着四排钻天杨，树叶儿哗哗地响着。小路尽头，白墙黑字，上书“林村大队”，再往南走就是村中央的大道了。农家的小院子都坐落在大道的两旁，家家门前屋后都有小块的自留地。这些地块相距甚大，有的枝繁叶茂，有的荒草丛生，问带我们来的大队林书记，那是什么缘故，他

哈哈笑着："当干部的，尽开会，没丁点闲空，哪能伺候那自留地。"我们都笑了。"再加上这两年没闹灾，那几分自留地，不大吃紧了。"停了会儿，林书记又补上这么一句。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得住一辈子！

十七岁的我看看这一切，看着脚下的黄土，并没觉得有什么懊丧，只是初次闻着土地的味儿，看着头顶的蓝天，听着挺有韵味儿的当地土话，觉得新奇有趣。

生活不都是诗，而多半时候是平淡无奇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仍然没使我那迟钝的心灵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倒是常想：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是农民，这个事实在我们有生之年是改变不了的了，在他们中间就没有特别有才智者吗？肯定是有的，而他们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俭一生，苦作一生，从不期期艾艾，从不怨天尤人。我们又有什么可怨的。然而人各有志，在我们中间大有恨天恨地的才子佳人在，依他们的想法，如果不下乡他们必是牛顿第二或是门捷列夫第二，至少也会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决不是社会的最低阶级——人民公社社员。

牢骚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而我却是自得其乐地在田边地头欣赏着地方小曲儿；在婶子、大娘的炕头儿上听着无数知疼知热的暖心话儿；而在大姑娘、小媳妇儿的纺车前、织布梭子下、绣花绷子上，我更看见了这些无知无识的妇女有着怎样善良、美好的心田。看着她们怎样一针针一线线把自己给心上人的柔情蜜意都织进去，或是给全家老小预备的各式衣物都带上一片爱意。

劳动并不可怕，不懂地方话也没给我带来太大难处。唯一让人难堪而且无法解释的是在我们这个"插队青年"的"集体户"里却充塞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冷漠。

我们这个集体户里一共有二十四个人，十二个男的，十二个女的。另外的二十个远在离我们三十华里的另外一个大队里。照北京市委某些领导干部的想法，十二个男的，十二个女的正好配成十二对，就可以真的“扎根农村”，可以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劳动者，并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后代了。

可惜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远乎又远，十几年后真的在那个地方扎下根来的大概只有一两个，而且那一两个也最终进了什么社办工厂、农业银行、县办中学之类的需要文化的地方，不再真的在队里挣工分了。

喧嚣一时的“上山下乡干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只是像一阵轻风拂过那古老、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村就像一池湖水，轻风过后很快又归于平静了。

可那时候，我们可是真的都住在集体户的“集体点儿”里。我们的这个“点儿”是这样的：一个挺大的院子坐落在村子的尽东头。一进院门，南边是我们的菜地，中间有一眼井，东边是伙房。北边两排平房共六间，前排两间是男生宿舍，余下一间为集体户办公室；后排两间是女生宿舍，余下一间则为库房，堆放工具、粮食、柴草、煤炭之类。女生屋后拉满了晒衣服绳子，时常挂满了不登大雅之堂的衣物之类。

每天收工回来，个个累得龇牙咧嘴，就是那么累也没法子让他们住嘴。你听吧，谁的工分多了，谁的工分少了，谁和大队干部有特别的关系了，谁有资格参加四清工作队了，谁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没有希望入团了……为了这些了不得的大事，人们竟也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更要命的是女宿舍里事情特别多，遇着阴天下雨的，洗完的湿衣裳都得晾在屋里，于是某人的湿衣裳上的水珠滴到另一个人的床上，或是头上，或是书本上，就又开始一场争吵，进而是谩骂以至厮打。都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大姑娘竟然也都越来越不顾廉耻，什么脏话都骂得出口，真是天晓得。

离集体户两个门口就是二队队长德胜大伯的家，德胜媳妇常来青年大院串门儿，夹着鞋底子带着走街串户得来的新闻坐在女宿舍里一坐就好几个钟头。我们刚去的时候还好，时值深秋初冬。她一手夹着孩子，一手拉开衣襟，把奶头往孩子嘴里一塞，就一边纳鞋底子，一边山南海北地扯开来了。等转过年，天暖和了，人们换了季，单衫子上了身，这位大婶子也就赤膊上阵了。光着膀子，黑色的挽裆裤上挂着根红裤带，两个奶子一直垂到腰上。她不知生养过多少孩子，现在膝下就有四个，据她说其余的“不满一周就翘辫子了”。

下工回来，躲在床旮旯中间洗一把已是十分不易的事，碰上德胜大婶子来串门儿那就倒了大楣。她会径直跑到你跟前，在你前胸后背摸上几把，还怪腔怪调地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我每次听见她的大嗓门，不等她进屋就赶紧把衣裳套上，哪怕身上还在滴水也顾不得了。

谁知同宿舍的梁宝珍竟然也“入境随俗”了，常常不穿上衣在屋子里遛来逛去跟人闲三话四。我跟邻床的李百铃打听情由，她悄悄告诉我：“听说她要跟贫农协会主席的儿子结婚啦！”

“什么？那个人不是有梅毒吗？”

“要不是有梅毒，怎么会跟宝珍结婚？”

“宝珍怎么了？”

“你忘了，宝珍她爸是反革命，五二年镇压的，她妈一直给人当保姆，就凭这成分，还能跟贫协主席的儿子结婚？”

“我的天，来了还没一年就结婚了？”

“这有什么新鲜？你看宝珍这疯样子，听说是预备好了让人闹房呢。”

“闹房？”

“唉，小秀，不是我说你，你成天除了在地里干活儿，回来就捧着一本书，赶明儿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不知道晋南的风俗，结婚是要闹房的吗？”

“怎么个闹法？”

这一问，把个伶牙俐齿的小百铃子问住了。她想了半天才含含糊糊地告诉我：“就听说闹得可厉害了，还有不少规矩哪！”

“你怎么知道的？”

“我都听德胜大婶子跟宝珍学说的。”

我闷在那儿了。念了十二年书下乡劳动倒也罢了，还变成了这些陈规陋习的奴隶岂不是见鬼！

我跑到同队的女社员秀英家，她妈正在灶间刷锅洗碗，她嫂子在她屋里哄孩子睡觉，男人们照例在外边场院里聊天儿，秀英独自一人在纺棉花，纺车儿转得正欢。

我脚步咚咚地闯进来，秀英吓了一跳。

“是你，干啥急急慌慌的？”

“啥叫闹房，有多邪乎？”

秀英不答话，又抓起摇把。我按住她的手。

“好秀英，告诉我嘛。”

“这得看哪家办事。”

“哪家办事还不同吗？”

“不同，得看他家老爷子是哪号人。”

“谁家老爷子？”

“男家呗。”

“那你嫂子呢？”

秀英一脸紧张，声音也压低了。“俺嫂子家可是好人家，从小都规矩多大的。她嫁过来的时候，俺爹还硬朗，俺哥也血气盛。俺爹说，咱家媳妇凭啥让人看，让人摸！闹房？不中！俺哥也疼媳妇，让人打成血葫芦似的也没让人扒了俺嫂的衣裳。俺嫂告诉我，她刚一出轿门，俺哥就悄声告

诉她：‘任人怎打，你也别应承，狠下心来。’这不，我嫂就不应承。办完喜事两年，这村里都没人搭理她，一直到小宝落地，她当众开怀喂奶，隔壁大叔大伯们伸手摸了她的红裤带，这村人才认了她。”

对面窗上人影晃动着，好像秀英嫂子把孩子放下了。

“我嫂过来了，快别提闹房，你一提她又得流泪，可怜见儿的。”

“那你结婚怎办呢？”

“俺那个主儿是俺爹过山买化肥的时候跟山那边订的。人家是解放军，家里兄弟三四个。听说山那边闹得不怎凶，再说人是军属，兴许不敢怎的。”

“我不怕闹房，就怕妯娌不和。”秀英又补了一句。

“你见过他？”

“没，我爹有相片儿，人挺大气的，又在部队上，想必是好的。”说着，秀英的脸红了。

我的心揪紧了。这儿是老区啊。一九四六年就解放了。解放十八年还是这么个样子？我不肯罢休，又问下去。

“那宝珍嫁过去，会闹得凶吗？”

“铁定的。宝珍她公爹年轻时拈花惹草，尽弄些个破鞋，落了一身病，生下这么个儿子还不是有病。县医院每月挂电话让他去取药，谁不知道！这样人家的儿媳妇让人扒光了、瞧个够还不是常事？”

“要是宝珍不让呢？”

“不让？众人会说，你公爹扒灰都中，让我们瞧一眼你怎么跟男人相好倒不中吗？”

“哎哟，你个大姑娘，怎说得这么不中听？”

“死丫头，你要问嘛。不告诉你不中，告诉你又不中。你要怎着？”

秀英笑骂着，举起一个梭子要打我，我们笑作一团。

“喂，说正经的，宝珍她公爹既是那号人，怎当的贫农协会主席呢？”

秀英不答话，沉默良久，“小秀，赶明儿你搬过来，咱姐俩好好聊聊。这盘根错节的事儿，几天几夜也聊不完。”

我茫然看着她。不知什么时候，大娘和秀英嫂子都进来了。她嫂子是个贞静的女人，一头黑发挽在耳后。进了屋，二话没有，坐在炕脚纳鞋底子。

“张大娘，您快坐吧。”我站起身，向大娘打招呼。

“好孩子，坐着说话儿，吃块锅盔。”大娘把一块又软又松的锅盔递到我手上，“刚出锅，趁热吃。”

我吃着，大娘搓着纳鞋底用的线绳子。“闺女，你是城里的人，你那十七岁的小脑子装不下这乡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今年五十好几了，民国也好，国民党也好，日本也好，谁来了都差不多，乡下总是乡下，谁跟谁没有点狗扯连环的关系呢？乡下人脑筋旧，哪里就换成新脑筋了？你说是不？”

一席话说得我呆头呆脑。

一个半月，一晃就过去了。“十一”宝珍结婚，我壮了壮胆在贫农协会主席家的门口张望着。他们家在道西，院门是个不起眼的小黑门脸儿，朝东。烟味、酒味、山西人吃饭的米醋味儿，夹着含混不清的笑骂声从大门冲了出来。门是开着的，只好走进去了。这不是一个规整的四合院，北房一排三间，西房只有一间半，南房是厨房、杂物间和猪圈，没有东房，墙根下是大柴垛，倒还堆放得齐整，只是没有中农户的殷实味儿。

现在北房和西房的门都大开着。宝珍公爹在北房里开了四桌流水席，他们的至亲、好友，男男女女吃着，说着笑着。宝珍公爹——一个面黄肌瘦的矮小老汉，挤眉弄眼地正和来客说着什么笑话，引出一片猥琐的笑骂声。

西房想必是宝珍他们的新房了，里边除了德胜大婶子以外都是男人，站在院子里看的才是女人们。

闹房的男人们跟德胜大婶子一样大叫着“吃仙桃啊！”宝珍不肯开怀，那些男人们——平日一脸凶相的各家长辈们——就随手抄起什么家用的东西猛砸宝珍男人的头，那个平日就一步三摇的病人现在更是一脸苦相，他噢噢叫着：“臭娘们儿，还不快解怀，看不把我打死了。”

随着他的叫声，宝珍解开了上衣，几个大婶子顺手拉掉了她的胸罩，嘴里还喊着：“要这劳什子干什么。”

宝珍男人一头扎过去，抓住宝珍的乳房又啃又咬，那些男人们在旁边又笑又叫。宝珍两眼定定地看着什么东西什么反应都没有。

“坐船呵，坐船呵！”男人们又叫了，又开始打宝珍的男人，那个新郎又喊：“快解裤带，别把我打死。”

宝珍的手在腰间摸索着、摸索着，裤子褪下来了，那些男人一拥而上，人影晃动着，恍惚间他们把两个精赤条条的人脸对脸地按在一起。我别转头，向外走去。耳边传来那些妇人们的议论。

“瞧，我那口子也在里头。”

“宝珍这次倒也痛快，这么快就让人扒光了。”

“快点少受罪嘛，反正就那点东西，看完了就完了。狗改不了吃屎，你看，我那口子那个穷急相。”

“得啦，回家烧水洗澡吧，男人闹完房回来，少不了跟你亲热亲热。”

“你还不是一样，要不是闹房，你还养得出你们小跟子！”

她们咏咏笑个不住，我快步走出去。

一出院门，我们队的田大婶子一把拉住我：“小秀，跟我回家。”

“怎么了，大婶子？”

“今天男人们都疯了，你一个大姑娘走黑路不怕？”

“还有几个知青也在那边呢。”

“他们还没出来，你先跟大婶回去，等会儿路上清静了，大婶送你回去。

听我的没错。”

进了田大婶的家。我四下打量着，嗬，真是一尘不染，小炕桌擦得锃亮。大婶子一转身，端出一盘家做的绿豆点心，“吃一块吧，看你小脸儿煞白的。”

我谢了她，默然不语地吃着。静待下文。

“说也怪啊，你们这些文化人来了，没说给咱这地方带点儿文化来，反过来，倒变得跟那无知无识的人差不多了，真真怪事。”

从前，我和田大婶子并没有多少接触，只知道她家是下中农成分，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干活儿的快手。她有个大儿子在东北的部队上，两个闺女在队上劳动，好像还有个小小子在学校念书。因为平日不大说话，所以我也真没想到她是这么心直口快的爽快人。

“别愣着啦，做点好事。”

“干啥？”

“给我写个地名，我给儿子寄双鞋。”

嗬，那白布千层底儿的直贡呢布鞋千针万线做得真密实。

“部队上不是发鞋吗？你还寄鞋干吗？”

“发的那鞋都是解放鞋，我儿子是汗脚，下了操，换双布鞋省得烂脚。”

“还是母亲疼儿子。”

“敢情！”

我把包裹外边儿的地址端端正正地写好，递还给田大婶子。

“瞧，这字儿跟人似的，多好瞧！”

“大婶子，我该回去了。”

“记得我的话，不识文不断字儿是乡下人最大的苦处，动点脑子，别就闷头干活儿，给咱乡下人带来点子文化，也不冤枉念那些书。”田大婶子用指头点着我的脑门儿数落着。

六　文化人与文化工作

那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底的事。一天，大队林书记来知青点找我谈话。那个时候我刚从我负责的那块棉花地回来。一身土，一身汗，来不及擦把脸，就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听书记有什么话说了。

书记先对我大大夸奖了一番，说我全年出满勤，干活儿从不投机耍滑，做事做人都实实在在，群众关系好，所以大家信得过我，让我管两把钥匙。一把是本大队小学的，一把是大队广播站的。

我惶恐不安地回答："就我一个人，怎么干得了？"

"没问题，广播站还有一个本地中学生，你让她干啥，她就干啥。学校方面嘛，你得多出力了。"

"现在，学校不是有两位教师吗？"

"他们有很大的问题。两人都已经结婚了，女的爱人还是解放军。可是据反映他们的关系不正常。而且，那个男的是富农出身，按四清工作队的意见，这种人不适合在教育岗位上。"

"可是，林书记，您知道我的出身也不是劳动人民啊！"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你走了上山下乡这条康庄大道就证明你是有觉悟的。就这样，明天你去接手，九月一号正式上课。"

"现在不是暑假吗？"

“这儿是农村，没有寒暑假。冬闲放年假，夏收的时候，学生可以下地帮忙，我们放‘麦假’，秋收的时候再放一个月秋假。这两天你有工夫看看学校的时间表就清楚了。”

“那，我包的棉花地呢？”

“我去告诉你们队长，从今天起就分给别人，明天你不必下地了。”

三言两语交代了工作，林书记叼着烟袋走了。

第二天，整理完内务，换上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布裤褂，我抬脚向村内小学走去。

小学坐落在村中心，村内官道东边的一条小巷子里，院内一棵花椒树，散发着清香。院内有北房两间，西房一小间，东屋一大间。

北房西边一间门框上有牌子，上书“教员休息室”，这个地方后来一度变成了孩子们的图书室。其余的北房和东房都是课室。西屋有一个大柴灶，水桶、扁担、大锅一应俱全，想必是全校师生喝水的地方了。

我走马上任的那工夫，一进校门，这一切陈设来不及细看，就呆在那儿了。院子里大大小小三排学生，足足有五六十个，背对校门，面北直立着。有一个学生在每个学生面前叩响头。现在已经走到第二排了。地面虽是土地，可是天天洒扫，再加人在上面走来走去，却也坚硬无比。这个孩子满脸尘土，眼睛已哭得红肿，不住地跪下去，叩头，站起来，换个地方再跪下去。孩子的额角已在出血，而那位男老师还在用手尽力按下去。孩子的小身体扭曲着，两只小黑手从破了的衣袖里露出来，颤抖着。

一股怒火直冲脑门，我大喝一声：“住手！”

孩子们惊愕地回过脸来。一张张木然的脸。

“你是干什么的？”那个男老师转过脸来，一双小眼睛在扫帚眉下眨巴着，腰弓着，两条长腿晃荡着，活像一只虾。

休息室门帘一挑，走出一位略有姿色的少妇来，两条大松辫子垂在腰

际，笑容可掬地开口了："你大概就是要来接任的韩老师吧？其实梁老师也有他的苦衷，田信强迟到了，要是每个学生都迟到，那学校不是要大乱了吗？"

田信强，田大婶子的小儿子？我心疼得把孩子一把拉起来。那个姓梁的怒吼了一声："解散！"谁知道刚才还毕恭毕敬站在那儿的孩子们竟像受惊的小鹿一样跑散了，几分钟工夫，一个也不见了。田信强还呆呆地站在院当中。

"告诉你，姓韩的，这个学校你现在就接，咱们后会有期。"梁说着，登上自行车跑了。

"韩老师，我家在城关，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也就先告辞了。"一甩辫子，她也走了。

院子里空了，寂静无声，院中央站着我和田信强。

"信强，告诉我，你怎么了？"

孩子的大眼睛眨巴着，泪水直流。我跑到水房，舀了一碗水，让孩子喝了慢慢说。从孩子断断续续的抽咽声里，我终于弄懂了。昨天中午该田家给老师做饭。这叫派饭，是学生家长轮流做的。老师每人给二两粮票一角五分钱的饭费，各家所做派饭一般也比平常自己吃的好得多。这几天，田信强母亲的气喘病犯了，二队地里活儿又忙，田大伯忙得顾不过来。这么着田大婶子昨天中午就给这两位老师做了一顿普通饭。两人窝了一肚子火无处发泄。今天早晨大婶子喘得更凶了，就让孩子把中午需用的柴火搬进灶间，帮她一点忙再走。信强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晚了两分钟。姓梁的定要杀一儆百，所以惩罚他叩响头。

越听越火，我把孩子带回家，正是小晌午，地里的人还没回来。几月前一尘不染的小屋零乱了。我给孩子洗净伤口叫他去换件衣裳。待他换好，看他的伤口还是鲜红鲜红的。我又拉他去大队卫生室，百铃细心地给擦了

药包好。事情办完，返回田家，时近中午了。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田大伯低着头，弯着腰进来了。黑乎乎的络腮胡子不知多久没刮了，两眼深陷，一脸愁容。我迎上去。

“田大伯！”

“小秀，是你，我听说让你在学校了。”

“是。这不，我刚才见小强受委屈了。”

田大伯抬眼看了看孩子，没说什么，叹了口气，半天吐出一句：“哼！还不是为了那顿派饭！”

我看他气黑了脸忙岔开话头：“大伯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地里活儿紧得没法儿办，可我，这是第三天不干活儿啦！”

“不干活儿？那做啥呢？”

“你真是埋头苦干什么都不知道了。四清工作队来咱们大队估产，这已经是第三天了。等他们估完了，报到县里，再往上一汇总，你瞧吧，那征购计划下来了，除了来年种籽，大概社员基本口粮都留不足。”

“田大伯，这会儿不是大跃进放卫星了，三年自然灾害也过去了。怎么还不让人松口气呢？”顿了顿，看田大伯不想开口，我又接着说，“估产这事儿，非行家里手不中，工作队的人想必没摸过锄把子，他们怎么知道产多少？你们少报一点儿不就行了吗？”

“话是不错，可是你知道宝珍她公爹跑前跑后地张罗呢，我们说这块地亩产七百斤，他偏说八百五。四清第一条是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贫协主席，谁惹得起？连林书记还让他三分呢。可是，话又说回来，社员到嘴的粮食生生让人掏出去，我这个估产组的，怎么说得下去呢？”

“谁给写？”

“咱队的会计。”

“怎么算法？”

“面积乘亩产，再一块地一块地加起来。”

“他用算盘？”

“对了，算得又慢，一五一十地，大伙儿就眼睁睁地瞧着他写啊！”

“让我去，我心算，就写结果，笔下留情不就成了。我是知青，定成分没我的事儿。再说这么干，林书记也不会说什么的。咱们瞒住宝珍她老爹就成啊！”

“中！”他一拍大腿喜上眉梢，“文化人儿，就是点子多。”

“我走了。”

“别，就这儿吃吧，信强妈说话就回来。”

“那不中，我得九月一号才吃派饭呢！再说昨天你们才派过饭，下次轮到你家是两个月后的事了，咱们别给人留下话把儿。”

“好心计，那吃罢饭一敲出工钟，你就来咱队场院。四清工作队和队干部都在那儿集合。我跟林书记说叫会计干他的去。别忘了带纸、笔啊！”

“放心，忘不了啊！”说着，我已出了门。

回到知青大院胡乱吃了点东西，只听得钟声一响，就大步流星奔场院去了。果真林书记正和四清工作队的几个干部在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话家常。好嘛，连县太爷王德合都亲自带队来了。其中还有几个斤斤计较的办事员在翻看着文件笔记什么的。旁边蹲着几位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秀英爹、德胜大伯、田大伯都在，一人一杆旱烟袋，正愁眉深锁地吞云吐雾呢。

说起来又可气又可笑，每年两次，一次是麦收前，一次是秋收前，县粮食局的大员们得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下到田头地脚，辛辛苦苦地丈量土地，估产，然后算出来本地可产多少粮食，上报省里，省里再上报中央，中央再根据这些数字下达国家征购计划。这种征购计划往往是要社员们勒紧裤带来完成的。为什么定要这样做呢？根据当权者们的想法，充满小农意识的社员们是决不肯把每一粒粮食交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的。岂不知在一

级级上报及下达的过程中，多少大小掌权人为了个人的党票、地位、社会关系、经济利益而在那里夸大数字，弄虚作假。下乡一年，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案子，我已略有耳闻。我对当权者的欺诈没有兴趣，但如果能帮社员们一点忙，我是一定要干的。所以决定开个小玩笑。

林书记一见我就笑模笑样地说："怎么样，学校的事情有眉目了？"

"没有，那两个老师撂挑子跑了。"

"不怕的，这几天你帮我们估估产。我派泥瓦工木匠们去学校整修一番。明后天大队会计替你去县教育局领回课本，你九月一号能正式开课就中了。"

王县长也插了进来："瞧大队书记大力办教育，北京姑娘，你可要好好干啊。"

"放心啦，王县长。"

这一来，那几个四清工作队干部也赶紧凑过来，谈谈笑笑。不一会儿，该到的人都到齐了。一行十几人就浩浩荡荡奔大队的秋作物地去了。

果然，正如田大伯说的，宝珍公爹可是真邪乎。别人说这块地至多打多少，他非得说至少打多少不可，而且一双小黄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说话的人，几个粮食局干部再一帮腔，他越发得意。别人也不再说什么，他报上来的数字就变成了铁板钉钉的一般。我心中暗笑，他报多我写少，而且心算加减乘除本是我的拿手戏。算完了也不报出来，往纸板上一写。那位贫协主席做梦也不敢怀疑我这个北京来的高中毕业生算得对不对呀！算得那么快，又写得那么快，几位数的大数字在笔下一挥而就。王县长和林书记大大地放了心，边走边聊，谈生产，话家常。田大伯和几个老友也聊起来哪个品种的烟叶儿壮啊，什么地方产的辣椒味儿纯什么的。那几个四清干部也跟我胡扯起北京的逸闻趣事。大家一扯一聊，空气活跃了。我呢，笔下生花边听边写优哉游哉好不快意。独独冷落了那个不可一世的老头子。

几天时间一过，四清工作队要离村了。王县长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咛要我在农村好好发挥作用。我也一再点头称是。我早就知道王县长出身很苦，他是一个没念过几本书的育种专家，凭的就是几十年的生产经验和孜孜不倦的求实精神。当上全国劳模之后才做了个并无多大实权的父母官。他怎么会不知道社员的疾苦呢？无非是上边逼得他无计可施罢了。今朝碰上我这么个小鬼在下边人不知鬼不觉地做了点小把戏，他怎么能不乐呢？

这一年上面交下来的征购数字不太高，家家都分到了足够过冬的粮食。我吃派饭必和社员们一样，他们吃啥我吃啥。这一下子真是大开绿灯，要什么有什么。学校里不仅窗明几净，又添了乒乓球台。清早孩子们到校，我就打开广播，带上他们做早操。四节课一完，孩子们排着队，一个大孩子吹着哨儿，“一、二、一”地把孩子们都送到家门口。下午两节课里必有一节是唱歌或是讲故事。放学之后值日生打扫卫生，别的孩子打乒乓、做游戏、看课外书，学校里一片欢腾。以田信强为首的几个小头头们负责学校的琐细任务：收作业啊、检查个人卫生、督促上课纪律、向我汇报互帮互学小组的情况啦，忙得不亦乐乎。

学校就我一个人，六年级分两个课室采用复式教学的方法，轮流上课。孩子们有汲取新知的时间又有做功课、预习、复习和补旧课的时间。学生都是农家的孩子，课余时间得帮父母做事，我是从不让他们带课业回家的。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是我在中国这么多年里最快乐、最无忧虑，也是得到最多尊敬的一段时间。

每天晚饭后去广播室作一番交代之后，我总在孩子们的阅览室工作到深夜，备课、批改作业，甚而给没娘或家有困难的孩子们缝缝补补。时常窗外有响动，开窗一看，一只小手高举着一个小手绢包，几颗干枣啊，孩子母亲做的什么好吃食啊。有时候门外响声大了，门开处不定哪位婶子大娘端着碗香喷喷的热面站在那儿。还有时候，有人来“找韩老师写封信”，

有人来“找韩老师给算算工分账”，甚至夫妻吵架，妯娌不和，母女有争的事也来“找韩老师给评评理儿”。那一个冬天我真的知道当地纯朴的老百姓们在怎样用他们的心感谢着我为他们和为他们的孩子所做的一丁点儿小事。人们需要你，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

过了年假，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调我到香邑中学任教。那个时候，林村小学已经初具规模了。我向两个女知青仔细交代了一切就走马上任了。

香邑是一个地主庄园，坐落在半山上，庄园主人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被镇压了。虽然换了主人，庄园巍峨的风貌依旧。因为丢不下林村的熟人们，再说乡亲们还真爱听我的普通话，就这样，我仍然住在林村。太阳还没出山，我就动身了。日影西斜我又回到村子，在广播上喊个不停。晚上我在村子里又搞了一个识字运动。说起这件事也是四清工作队发起的，他们开办了夜校，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用 ABCD 代替ㄅㄆㄇㄈ。搞了一阵，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我接下来，搞了一个“送字上门”。让林书记发动所有的识字青年包字到户。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全村的文盲人数竟占全村六岁以上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强。这怎么得了！按那个时候钦定的标准：会三百个字就算半文盲；会五百个字就算扫盲学习班毕业，摘了文盲帽子了。去办扫盲班的那段日子里，男女老少学字忙，晚上莫名其妙的各种会议减少了。反正家家有有线广播，没有开关，你不听也得听。我就利用有线广播，带着社员们复习生字，学讲普通话。林书记自己是半文盲，他也是在那次扫盲运动里“摘”的“帽子”。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拿了一辈子锄把儿，做得一手好针线，拿起轻飘飘的一支笔竟像有千斤重。许多人第一次自己写下自己的名字，都是眼泪直流的。

我问田大婶子：“你姓啥？”

“我姓田。”

“你娘家姓什么？”

“姓丁。”

“你叫什么？”

“田大婶子。”

“别逗了，那是人家叫你。你自己总得有个名字吧？”

“没有就没有。小时候叫小妮子，大了叫丁家大姑娘，嫁人了先叫田大嫂子，有了孩子叫孩子妈，叫屋里的，现在人都叫我田大婶子，等老了，叫田大娘、田老太太。可不是没有名儿吗？”

“你小时候，你妈就没叫过你吗？你想想。”

沉吟良久，田大婶子把额前的头发撩到耳后：“嗯，叫过，叫腊梅。”田大婶子的眼睛里浮出一种光彩，不太久远然而被她辛劳的生活完全淹没了的光彩。

我工工整整地在田大婶子一九六六年工分册上的姓名栏里写下了三个大字：“丁腊梅”。

田大婶子流着泪看着这三个字，颤声说：“活了四十多岁，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儿。”

在那短短的半年里，忙得精疲力竭，然而内心深处无限欣慰。只有在那半年里，我有过一点为大众效力而不必大受责难的权力。那时候，我真的知足满意了。十九岁的我觉得如果就让我在这个小地方平平安安地活下去，我就快乐无比了。那时候，愚钝的我还不解“大做大错，小做小错，不做不错”的真谛何在呢！好在，我没有太多时间享福了，那已是山雨欲来的一九六六年。

七　别有天地

一九六六年三月的一天，我正在香邑中学教代数课。下课时间未到，校工老李头就敲门进来。“韩老师，对不起，王县长差县委通信员送这封信来，通信员在门口等着呢。”

学生们静静坐着，等下文。我抽出来一看，是县委公文笺一封：

韩老师：

本县举办展览会，望来协助工作。所需时间约一两个月，县教育局将送公文至王校长处。

请速跟来人到县委招待所。　　此致

敬礼

王德合六六、三、二

除了签名以外，都是县委秘书的字迹。

香邑中学的王校长也跟了进来。他是好好先生，总是笑口常开的。他十分客气地轻轻发问：

“韩老师，县委有什么指示吗？”

我马上把信递给他：“这是王县长的信。”

他边看边点头。“老李头，快帮韩老师收拾行李，等会儿你帮忙给送到县委招待所。”

老李头得令而去。他又转过身对我说：“放心走好了，能者多劳，帮完县里的忙，打个电话回来，我们派人接你。现在就去收拾吧？课我来接。”

我还犹犹豫豫地站着没动。王校长笑着催我：“走吧，走吧，放心去吧！”

坐着县通信员的“二等车”，老李头在自行车上驮着我的行李，在我们后边送我，两辆自行车直奔县委机关而来。

一路上春风扑面，路边一片新绿。天天关在校园里的我顿觉十分舒畅。三四十里的柏油路，没多久就到了。

到了县委大院门口，跳下自行车。行李自有通信员和老李头安排，我就信步走去。

曲沃是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县。坐落在侯马市东郊的县委机关，好不气派。曾几何时这里是本地一个大乡绅的深宅大院。现在经过几番修整改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除大小头头之外，还有一百多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在各股室工作。后面的建筑群即宿舍区，排列整齐。整个大院四周全用粉墙与外界隔绝。粉墙上朱红大字大书“大学大寨，力争高产”。

我到的时候，几个大字已油漆一新，一个人站在一架铝梯子上正用红油漆给那个“力”字刷上最后的一笔。我没停，径直朝院内走去，不期然，一个声音竟在身后响起……

“你是韩老师吧，我们得在一起合作一两个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回头定睛一看，此人高高的身材，乌黑的头发，五官端正。一双眼睛闪着诚挚的光。不知何时，已站在梯子下边，正一面向我走来，一面伸出右手。虽然干的是最脏的油漆活儿，但他却“全副武装”：长围裙、长套袖，两手还戴着瓦工的帆布手套。从围裙下面看得见两条笔挺的米色西装裤线

和一双保护得很好、样子很时髦的咖啡色皮鞋。而肩上则露出一小块米色开司米，再加上雪白的衬衫领子。

真让我惊讶了。在这穷乡僻壤，这么讲究的服饰，和那么刻意保护衣服的做法是极其少见的。

我也伸出手去："韩秀。"

"久闻大名。卢兼文，本县水利局水文技术员兼本县农业学大寨展览会油漆匠。"

我看他干净利落地收拾梯子、漆桶、刷子之类，就开口问道："你刷完了？"

"刷完了。要是你不反对，戴上手套，帮我拿一下刷子好不好？"

他一手提起梯子，一手拎着桶，我帮他拿上刷子跟他一起走进去。

"嗬，卢兼文，你可真会抓官差，已经让小韩干活儿了。"迎面来了披着老蓝布夹袄的王县长。

"王县长，我还没向您报到呢。"

"老李头儿都替你弄好了。你住招待所二〇一房间。饭、菜票都在你床头柜抽屉里。现在，老李在大厨房吃饭，等一会儿我就叫他带封调令给王校长，调你来县里两个月。"

"工作是……"

"详细情形，卢兼文都清楚。五月四日青年节前后，中央农业部朱副部长来参观。那个时候你是讲解员。所以，展览会的一切筹备工作，你得参加。"

"展览厅在哪里？"

"县委俱乐部，三大间房子。"

"展品都齐备了？"

"齐备了。文字说明还没预备好，你先帮忙起草，等县委定了稿，卢

兼文就可以开始写了。”

“到那个时候，刷油漆的，大概是你哦。”卢兼文笑着插进一句。

“我无所谓，干什么都行。”

“好，好，有这个态度就好。”王县长连连点头，“韩老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就开始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吃过中饭，我走进空无一人的第一展览室。进门处有一大块红丝绒衬底的“前言”，还空无一字。

房间四周的墙壁上已有数量可观的照片，同样没有文字说明。墙边放着大条案，摆着大量的数据、资料，细致而有层次地说明该县在改良土壤、利用水利资源方面的成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卢兼文的字迹。全室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砂铸模型，做得极为精巧，是全县鸟瞰。

看样子，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

走进第二室，卢兼文正在细心地将一种玉米种子放进玻璃瓶子。他一手拿放大镜，一手用镊子选种，全神贯注，竟没有发现我进来。

“我可以帮忙？”

“哦，是你。怎么，已经来侦察情况了？”

“我想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越具体越好。”

“这个展览是老县长一生心血和全县老百姓几代人的血汗在农业技术上的结晶。重点有三个：一是土壤、水文的保护、改造和利用。第二是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特别是高产玉米、抗倒伏小麦，和为了增强棉花的抗瘘免疫能力而在品种改良方面做出的成就。第三是精耕细作，真正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方面的情况。你知道除了水利局和别的几个单位提供的部分资料以外，这一切最主要的创造者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把式。我的工作是用科学的方法把他们的经验总结出来。这一点你已经看到了。”

“你在这儿忙了多久了？”

“三个多月了。”

“孤军奋战？”

“不，还有一个小伙子，一个优秀的水文工作者，上个星期他被调到风陵渡治黄工程去勘察了。”

“你是搞水文的，怎么懂品种改良和植物保护？”

“不懂就学，边学边干。”

“我做什么？”

他沉吟了一会儿，非常清晰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知道，我们必须在大红伞的保护下，总结科学经验。所以你得把我们做好的这一切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四清运动的丰硕成果，以及学大寨运动的政治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有了这些大红伞，本县老百姓的成就才是合法的。”

他说得这一切我都懂，然而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一经说出口却让我觉得很别扭，不禁问道：

“你说得这么清楚，你为什么不做？”

“我？我老了。对这一套说说还可以，已不那么心悦诚服，写出来常常词不达意，文不对题，结果可能弄巧成拙。听说你在中学教党史、教政治，还搞广播站。这方面的熏陶比我强，所以我建议王县长请你来。”

“你建议？你我素不相识，你知道我什么？”

“最少，我知道你凭着一支笔、几张纸瞒天过海帮林村大队的社员从虎口里抢出了几万斤粮食。”

“别胡扯，这种事怎么可以乱说！”

“别着急，这里没外人，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就想找机会认识你。”

“认识我？为什么？”

“探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学会怎样保护自己。”

他站起来，走到每一个窗前，向外仔细地看着，最后踱到我身边，站住了。

“身为一个老运动员，我深深懂得一点，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危机四伏。你我之辈，弄不好死无葬身之地。你只有十九岁，不要步我的后尘。锋芒毕露迟早会出大问题。你去年帮了林村社员的忙，今年呢，明年呢，怎么办？”

我默然不语。

“现在就学，学会保护自己，再学保护别人。目前的工作就是极好的训练，给我们的科学实验加上保护色。看展览的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搞政治的觉得政治挂帅，才出了科学成果。搞技术的自会在大红伞下找到他要找的东西。而上级满意之余更会给全县百姓实际的好处，而不只是一个生产大队。你觉得怎么样？”

看我点头，他又笑着说：“你需要的东西我都给你预备下了。”

一弯腰，他从案下拿出一包材料：《毛主席语录》，《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六十条（草案）》，《人民日报》有关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大寨劳动模范陈永贵等人的先进事迹之类。

“资料够丰富了？”

“够我抄一气了。”我笑答。

“天下文章一大抄嘛，抄得妙就行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好，今天晚上，在下略备水酒一杯，为韩老师接风，阁下肯赏光否？”

“你住在哪儿啊？”

“县委大院隔壁，县水利局宿舍。”

“好吧。”

“那，你掌管这里一切要务，我去打扫卫生，五点钟准时来接你。”说完，他就走了。

我回到第一室，摊开纸笔，略加思索就大抄起来。

五点钟，我已经洋洋洒洒写了几大张。

“嗬，成绩不坏，走吧！”卢兼文快活的男中音在身后响起。

“走！”我推开纸笔，站起身来。

怪！写这些马列主义的大块东西，从来没有放不下笔的时候，而且说停就停，说写就写，竟如同背书一般，真真怪事。

转出县委大院，果然不到两分钟就到了县水利局门口。这个地方比起县委来可真是差得多了。土墙东倒西歪，里面的办公室也不知多少年没有修整过了。到了宿舍区，更糟了，小屋子一间挨一间挤得密不通风。几尺见方的小天井里横七竖八都是晒衣服绳子，我们得从大量的衣物及小孩儿尿布下面钻过去。到了院子的最后，一棵老榆树下，竟还有几寸空地，三间小屋依墙而立，想必是单身宿舍了。走到最末一间，卢兼文打开了门。

“请进！”

这间小屋至多有八平方公尺。门边一小窗，窗下一书桌，桌边两张木凳。一进门就见一张单人床，对面靠墙还有一张单人床。两床之间一个书架竟然顶天立地，足足有七排书，白木板相当厚，一看便知是自制的。两张单人床支得很高，床单一直拖到地面，想来所有的日用品都放在床下了。

桌上热菜两碗，热馒头四个，热茶两杯，都是从县委大伙房端回来的。

我说：“我得给你粮票，要不然，你吃不到月底了。”

“没问题，我爱人常支援我。”

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了桌上的一张结婚照，坐在卢兼文身边的人戴眼镜，一脸文静，照片上的时间是两年前。

“你是六四年结婚的？”

“是，也是六四年调到山西来的。”

“你爱人现在在哪儿呢？”

“合肥。从前我们都在合肥水利专科学校教书，结婚后四清运动开始，我就被调走了。”

“为什么？”

“表面原因当然是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有两重缘故，一是我有右倾帽子。”

“右倾？”我知道这可不是儿戏。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二十一岁，还在大学三年级，跟着我的右派教授说了几句多余的话，被戴上了右倾帽子，勒令退学，分配工作了。”

我吸了一口冷气，知道此人真是过来人了。“那么第二呢？”

“第二，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地主？土改的时候你多大了？”

“土改的时候我十四，可是我爷爷是地主。如果他不是地主，我父亲怎么会有钱出国念书呢？”

“你父亲是留学生？”

“对了，留美学数学，五〇年爱国爱回来了，分在北京科学院数学所。”

“数学所，那你父亲认识彭文儒彭先生吧？”

“他们在美国就认识了。我去北京探亲，也见过他。”

“你知道吗？六四年我参加高考前去科学院征求彭伯伯的意见，他建议我八个志愿都填清华。”

“他真迂得可爱。”

“彭伯伯是好人，是他第一个告诉我，如果我将来有出路，那就是美国，是他第一个帮助我认识美国的。”

“韩老师，你真的觉得你会在这里干一辈子？不，你的天地不在这里，

在大洋的彼岸。”

夜幕低垂，我们不仅吃完了那些饭菜，而且喝光了暖瓶里的全部热水，直到杯中的茶叶泛起了灰白色，我才站起身来。

回到招待所，运气真不错，最近没有什么会议，室中只我一人。在屋子里踱着，我反复咀嚼着卢兼文的话。

“彭伯伯一方面是对的，你得学习，艺不压身，你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准备一有机会就飞出去。但另外一方面是他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做梦也想不到的，那就是要尽全力保护自己，活下去，活到离开的一天。你不要以为我是夸大其辞，我自己几次当靶子摸出了经验，凭我的政治嗅觉，现在的风里已经有雨腥味儿了，大风暴不久就会来到。”

我清楚地记得他那么肯定地对我说：“韩老师，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验证我的话，在乡下教书的安乐日子很快就会保不住的，你千万不能安于现状。”

八　不识庐山真面目

从小，我就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气，大概正因为如此，外婆对我提出的问题从不作完全彻底的说明，大概是担心我一开口，嘴上没有“站岗”的吧，关于彭文儒彭伯伯的事就是如此。

彭伯伯每次来我家都是星期天，可是星期天我母亲特别忙，中午一场戏，晚上一场戏，只有下午五点钟左右可以匆匆回家吃顿晚饭。彭伯伯总是上午就来，带着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比我小两岁，他出国念书时，妻子已身怀六甲，他走后才生下这个孩子，听说他妻子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每次来家里总是带着他的儿子。

有时候，他们带点菜来，一边和外婆预备中饭，一边聊家常。彭伯伯的父亲和我外祖父家是世交，所以他和外婆有说不完的家乡话。每次来，他的脸总是苍白、疲倦。可是来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就谈笑风生了。我常常非常佩服外婆的神力，几句话就能说得彭伯伯眉开眼笑。中饭吃过，外婆得休息一会儿，彭伯伯就带着我们两个孩子上街。他问我们要什么，我总是想买一两本小书，而他儿子总要买什么玩具。回家之后，我坐在小板凳上安安静静看小书，而他儿子却一心一意拆他的玩具，拆完了还有本事全装起来。对他的技术我常常钦佩得不得了，可是彭伯伯和外婆却从没夸过他一句。

有一次，他们走了，吃过晚饭，我帮外婆擦碗，实在忍不住就问外婆：

“彭小志那么聪明，什么都会做，彭伯伯怎么不夸他？”

“夸他做什么？”

“不是每个小孩儿都那么有技术啊。”

“有技术有什么用？”

“怎么没用，将来也像他爸爸做科学家啊！”

“科学家？每天半个钟头就把工作全做完，剩下七个半钟头喝茶看报纸？”

当时，我听了外婆的话，根本没懂，只觉得彭伯伯太伟大了，那么快就可以把工作做完。而且，我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呢。下一次，他又来的时候，我建议跟他下跳棋。他从来没下过这种棋，可是还是蛮有兴趣地应战了。我是老将了，当仁不让地在棋盘上横冲直撞。第一盘他比我晚了三步。第二盘他竟和我平局。第三盘他仍兴致勃勃，我却说：“不来了，不来了。”心想这第三盘我不定输得有多惨呢。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对他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了。特别在下棋、打桥牌方面，我只有观阵的份儿了，可是心里不但真的服了气而且是钦佩异常了。

我记得是一九六三年春的一个星期天，我正伏在小书桌上念俄文，朗朗上口地读得起劲。彭伯伯带着小志进来了。外婆马上把他们拉进饭厅，让他们又是吃这，又是吃那的。我招呼了他们一下，继续我的事，还有几个单词就念完了，我正加油呢。彭伯伯走进来，看着我做完了功课，笑着问：“俄文念了几年了？”

“五年。”

“学过英文吗？”

“没，学校不让。”

“要不要我教你？”

“好啊，今天就开始。”我眼巴巴地看着他。

外婆闻声走了进来，“文儒，我想再等等吧，这孩子好学也聪明，就是环境太坏，每星期住校六天，万事都在众人眼前，别人无事，她念英文会招人非议的。”

彭伯伯笑了笑，我永远记得他笑得非常凄凉。但是在他和外婆商议后，我终于得到了另外一个机会。每个星期日，我和他们一起回西郊，科学院离北大很近，因此每个周末我可以在他们那里逗留两个多小时。

西方文明对我来说不是完全陌生的，在萧华家，在山野先生那里，在许多可能的机会中我都得到了一些知识。但在彭伯伯那里我才第一次系统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如饥似渴地认识这个新世界，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有了簇新的概念。

彭伯伯常常沉浸在热切的回忆里，而且他常说：“民主和科学是分不开的。”他的热烈的情绪是那样真诚，那样不容置疑，我常常有点纳闷。别的回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把西方说的一团漆黑就是常常口是心非地采取两面战术，在门外是慷慨激昂以过来人身份告诉众人社会主义如何优于资本主义，在门内则捏着一把印有 U.S.A 标记的水果刀指指点点，“看看，人家的钢，就是耐用。”大有“外国的月亮特别圆”的意味。更有甚者，两杯竹叶青下肚之后，脸上难免露出“悔不当初”的颜色来。唯独彭伯伯没有这些作为。而且，许多人是四八年、四九年爱国爱回去的，彭伯伯为什么一九五八年才回去呢？一九五八年在国外对大陆情形已有相当了解，他怎么还会回去呢？百思不得其解，几次问外婆也没有回答，一直到和卢兼文聊天，才知道了个大概。

一九五七年，彭伯伯在美国接到辗转而来的一封信，是他故乡地方政府的一份函件，内容是他妻子病故，幼子无人抚养。当时他受聘于美国一家私人飞机动力研究所，而且有很好的待遇。他向研究所负责人讲明原委

后，他们不仅帮他转道回国，而且还资助他许多器材资料，以备回国工作，并答应为他再度回美设法。

谁知，在北京车站接他的竟是中国军方的代表，他们带他去国防部，知道他所学的比他们所需要的先进几十年之后，打发他去航空学院。他一看他们陈旧的设备和教材就大摇其头。万般无奈，他接受了那个科学院的位置，每天用半小时完成他分内的事，然后只好喝茶、看报纸。与此同时他多方打听他妻子的死因，然而没有亲友的回答，没有医生的证明，一切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半点消息。那时美国跟中国什么关系也没有，他在第三国又没有亲友，再出国的路完全断绝了。

“他怎么会相信地方政府的一封信呢？”我问卢兼文。

“还有帮凶。”

“谁？”

“彭先生有一位同乡，也是美国留学生，一九五〇年回国的。这个同乡写信去美国证实了地方政府的话。”

“那彭伯伯回国后见到那个人了吗？”

“听我父亲说，他们见面了。那人竟说是为了他好，所以才接受政府委托，写了信。彭先生觉得此人愚忠至此，无话可说，也就不了了之了。”

“令尊知不知道那人是谁？”

“不知道。彭先生是君子，从不议论人非。”

当我知道这若明若暗的故事的时候，我已经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怎么能再去安慰那颗孤寂的心？我那时才懂得彭伯伯在世上大概只有一人可以倾心交谈，那就是我的外祖母。而这种交谈的机会也被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中断，以致无法再恢复。

人们啊！往往要在多年之后才能知道事实的真相，谎言欺骗像浓雾，像乌云遮蔽着生活。善良的人们啊！我们得付出血的代价才能试一试讨回

真实。而更可悲的是我们还得不断地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语言、行动，去加深那浓雾和乌云的色彩。

一九六六年的展览会就是我第一次煞费苦心的练习，学习在虚假中求生存、谋发展的途径。

那一次的展览会极其热闹地开幕了。随着农业部朱副部长的到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报社的记者们，外地的参观团们蜂拥而来。招待所和县城里所有的旅馆都挤得满满的。一直为展览会奔忙的王县长现在很少见了。他一头扎进了外地劳模的招待所，和他的老同行们交流生产经验去了。代替他的则是在整个筹备工作中一直未露面，忙于四清的县委书记梁辉。

此人其貌不扬，贫农出身，参军、入党、提干、转业、在地方上担任基层党委的领导工作。由公社书记升为县委书记，走的是一条农村政治工作干部的康庄大道。

在他的启发下，一般的参加这次参观活动的人一定会认为本县“不仅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个学大寨，赶先进的模范县”，而且我这个一口北京话的讲解员也变成了“扎根农村，铁心务农的知青样板”了；而且由于我会当场背诵二百多条“毛主席语录”，更成了上山下乡先进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母亲在北京不仅大演革命现代戏，而且不辞辛劳地在电台奔波，告知全国她怎样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甚至在山西巡回演出期间还到太原大作报告，引得记者们争相采访，好不热闹。

宣传历来是政府最下本钱的事。白天讲得口干舌燥，晚上还得在广播站带上两个播音员大念报纸。终于有一天我觉得力不能支倒了下来，那两个已经训练有素的播音员也就接替了我的工作，继续接待川流不息的参观

团。住进县医院的第二天，医生的检验结果就送来了。说是“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巧就巧在省报记者这一天也来医院取点药。当天他回太原就把我“因工作繁忙而病倒并病倒之后还坚持工作的忘我革命精神”写了一则小新闻，登在翌日的省报上。

我的精神不能再支持了。只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牢牢禁锢住。我多么期望在生活中我可以只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派给我的角色。然而不可能。躺在病床上，我忧郁得不能自拔。

门，轻轻地推开了，孟大夫走进来：“韩老师，水利局的两位同志来看你。”

我忙着拉拉衣襟坐起来：“请他们进来。”

脚步轻轻地走进来的是卢兼文和一位不认识的青年。他和卢兼文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卢兼文斯文、白净、一脸书生气；他却肤色黝黑，一脸风尘，衣衫不整，脸上漾着开朗的笑容，像刚刚中了头奖一样。他们放下了手里的大包小包，走到床前。

“认识一下，我是老卢的同屋，张焕，刚从风陵渡回来。”

“久闻大名，不知是不是‘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唤’？”

“不敢，是‘精神焕发’的‘焕’。”他大笑了。

卢兼文也神情凝重地笑了笑，总算这一说一笑暂时扫掉了我心上的沉重。

张焕开始有声有色地大讲这次展览会的收获：除了“上了广播、报纸”，“有了名”之外，还有许多实际的好处。比方说朱副部长答应修一个本县专用的小水库，支援水泥若干袋啦；为了保证本县粮食高产，特别划拨化肥多少吨啦；以及为了使学大寨的士气可以持续下去，特减征购计划若干啦，等等等等。我禁不住插了一句：

“什么大干加苦干，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行啦，不弄虚作假，怎么大干社会主义啊！”

“我看，你才是真该戴帽子了。”

“放心，关键时刻决出不了错。说真格的，我们这里捞点好处，真是小小不言。你知道大寨怎么上去的？”

“人家可是实打实，大干虎头山、狼窝掌干出来的。”

“头三年是苦干，一点儿也不假。之后呢？有了利用价值，行情可就看涨了。不信在下可举例说明：前年大寨大旱，报上说大寨人铁肩膀硬是把水挑上山，可是实际上抗旱主力是空军。”

“空军？别胡说了。”

“胡说？我弟弟亲自参加了，用飞机从山这边把水运到山那边。有一句谎话，天打五雷轰。”

我沉默了。卢兼文插了进来：

“行了，小张。韩老师这些天累也累够了，烦也烦够了，你就别加重她的负担了。慢慢地，她总会认出庐山真面目的。”

“算了吧，咱们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说了半天，你这句话还有点道理。”我回答。

“什么有道理呀，这回呀，可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了。”随着话声，进来的是县委书记梁辉，后面还跟着神色紧张的孟大夫。

说来也奇怪，一见梁辉的影子，我脸上的愁容竟一扫而光，满面笑容地接了话：

“梁书记来了，快请坐。”张焕和卢兼文更是忙着挪椅子、搬凳子先都招呼梁辉坐下，又都各自落了座，孟大夫转到了我背后。

“哎，韩老师啊！”梁辉跷起了二郎腿，点燃了一支烟，这才开了口，“要说这小道理呢，你刚病好，虽然孟大夫说你可以出院了，可总还应该休息一下。应该，应该。可这大道理呢，你是上了报的人，咱们县呢，也

是出了名的。展览会也快结束了，你一回香邑就又得忙个不停。县委的意见呢，你最好在招待所再住几天，把这次的工作总结写完，在县委发一个简报，然后再回香邑。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吧？”他一口气讲明白了。

我看不见孟大夫的表情，可是从卢张两人的眼神里我了解了孟大夫的无奈。

“没问题，咱们说干就干。这个总结大概要多少字呢？”

“这你看着办好啦，当然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是主线，再加上群策群力啦，模范事迹啦，总要个二三十页吧。”

“好了，您放心，什么时候要呢？”

“一个星期怎么样？赶不出来十天也成。还得刻蜡版、油印呢。”

“刻蜡版，我行。”卢兼文接上了。

“我管印。”张焕也说。

“好，好，好，群策群力，好极了，好极了。”梁辉眉开眼笑站起身来。

“噢，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刚才收到你母亲一封信，她听说你病了，寄了二十块钱来，要县委分两次给你，说是怕你生活特殊化。你有这么一个革命的妈妈，难得难得。信写得挺长，我也没细看，你慢慢看吧。回信的时候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说着把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递过来就向外走了。

“好，谢您了。”我勉强地说了一句，闭上眼睛。

“这可怎么好呢？”孟大夫的声音。

睁开眼睛，是孟大夫焦灼的眼神。卢兼文在室内踱来踱去。张焕皱着眉在看那封来信。

“孟大夫，您坐，有话慢慢说。”

“这肾炎是得静养的啊……”

“别说了，您还有别的法子吗？”

“医院存货不多。你先把十天的药带走，十天之后回了香邑，我再把药交给百铃，你还在林村住，是不是？”

“行，就这么办。您的好心我领了。您忙去吧。”

“好，那我等会儿再来。”

孟大夫走后，卢兼文一言不发地站在窗前。

“世上真是无奇不有啊！出够了风头，给了二十块钱，还来这么一大堆屁话。”张焕发作了。

“她回中国之后，把我父亲骂了个狗血淋头，保她自己过了关，谁知我还是父亲的影子，是她和国外有过关系的证明。现在好了，把我抛出去，她可以跟‘革命’挂上一点钩，总算有了一点利用价值。”我苦笑着。

“我觉得，你并不了解她。有朝一日，你还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卢兼文从窗前转过身来，顺手从张焕手里把信拿过去，“这种信不看也罢，你还是休息吧。”

一个星期之后，总结已经全部写好，我歪在招待所的床上，翻看着山西大学寄来的教科书，病后的我总觉得累，看着看着，竟有点睡意朦胧了。

门砰然一声被推开，张焕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油印的纸。

“这一回，可真是云山雾罩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毛泽东竟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头直指刘少奇。这不奇了？”

跟在他身后进来的卢兼文告诉我，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一起做展览会的收尾工作。明天都得各回各单位听传达。

那一天，我们三个人谈了很久，无非是猜测。当然不是完全不着边际，但我们万万没想到这场新的浩劫要持续十年之久，万万没想到千万人得在这场劫难中付出鲜血和生命，所不同的是，有人死得清醒，有人却抱着一

片愚忠变成冤鬼。

临走，他们两人留下一百块钱。

“我有我爱人，小张也有他的父母、兄弟。你只是孤零一人。外祖母虽疼爱你，恐怕也是爱莫能助。我看不出半年，形势定会大变。你千万保重。一有可靠消息我们会告诉你。我和小张一共凑了一百块给你。留在身边，总有用的。”卢兼文再三叮咛。我收下了那一百块钱。心里却觉得好生奇怪。竟像生离死别一般。这位“老运动员”把局势看得这般严重！

谁知，形势的变化来得更快更凶猛。

九　回家

一九六六年的盛夏，我带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回到了香邑。一切照旧，学校里传达了几次中央文件，并没掀起什么大浪来，只是王校长的腰弯得更低了，对人更和气了。不久，听说白店大队的一个北京知青的父亲在北京受了冲击，但他不仅划不清界限，而且立场不稳，居然为其父辩护，结果受到批判云云。我自己和知青们来往不多，所以耳闻甚少，每天仍是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转眼间，秋去冬来，一天，下了课走出教室，在校园的粉墙上竟然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一个人正在忙着刷糨糊把大字报贴牢。哟，这人不是从林村回了家的梁老师吗？他怎么到这里“串连”来了？

人越围越多，我也挤进去看看。“革命群众将拭目以待”是大字报的标题。内容非常隐晦，总之是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而且该校即将有“好戏”可看等等。

我从人群里挤出来，心里有点说不出的别扭。到了校门口，卢兼文正推着车走过。

“回林村吗？”

“嗯。”

“一路走吧。”

我点点头。两人沿着山路不紧不慢地走下山去。

“那个姓梁的，怎么会来的？”

“他跟梁辉沾点拐弯亲戚，早就又教书了。这次是专门来香邑报复的。韩老师，你现在情况不妙。”

“何以见得？”

“你母亲在北京被揪斗了，抄了家，东西都拿出去开了展览会。听说有你的护照、出生证之类的。你父亲的照片、书籍、地图都做了展览品。而且，今天我在县委听说你们知青点已经派人去北京‘调查’。看样子，等他们回来，你的处境会更危险。”

“还有什么？”

“白店的王菊朋经不起他们的折磨，已经送进精神病院了。”卢兼文不动声色地说着。对我，这消息却像一声闷雷，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精神病医院是比监狱更可怕的地方，是和镣铐、电床、药物麻醉联系在一起的。

“王菊朋到底为了什么？”

“他父亲是将军，刘少奇的老部下，所以人家往死里收拾他，他毕竟年轻，精神崩溃了。”

停下脚步，他神态严肃地说：“他是第一个靶子，第二个可能是你。”

“那我怎么办呢？”

“回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明天早晨我和张焕去接你，到县委办了手续马上走。”

“去哪儿？”

“我爱人的妹妹刘锦坤是一九六五年‘支边’的上海青年，她现在在新疆喀什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天高皇帝远，也许还来得及缓冲一下。”

他递过来一个信封。抽出来一看，一张纸上除了地址姓名以外，还有一张地图，标明从吐鲁番到该兵团所在地的公路线、转运站等等。一张照片也滑了出来，照片上的女孩子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两根乌溜溜的辫子，

端正而文静。

晚上，我最后一次去看了村子里的叔伯婶子们。田大婶子心直口快："要是就村里这些人，怕也不怎的，可是有那帮知青们，可就拿不准了，可有些个心狠手辣的货呢。走吧，三十六招走为上，躲过这一劫就好了。"村子里的孩子们得了消息也默默地跟着我跑前跑后，看着他们我心酸了。张大婶子和秀英连夜给我预备吃的、用的。就这么，来不及跟王校长打个招呼，来不及向香邑的孩子们告别，第二天早上，两个箱子、一个行李卷往架子车上一放，跟着卢、张二人到了县委。

几个月不见，王县长竟然老态龙钟了。"韩老师，不是俺老王不留你，实在是年月不对。今天，我还敢用个县委的章，开个证明，说你上新疆支边建设。明天县委夺了权我就盖不了这个章了。你在曲沃是集体户口，到了新疆兵团还是集体户口，有证明转关系就成了。从口里的粮棉产区到关外那草也不长的地方，落户是没有问题的。你自己多保重吧。"

到了火车站，听说风陵渡一带混乱不堪，所以我决计从晋南到大同再转车到兰州，以后再坐兰新线进疆。侯马是小站，售票员给了我一张十五天有效的联运车票。托运了行李，提着随身的小包，向两位送行的人道了别，我踏上了列车的踏脚板。

"我们的书已经按地址先行托运了。"

"你们不要了？"

"留了几本业务书，其余的你带走吧，这里我们恐怕也住不久了。"

卢兼文递过来一张粉红色的行李票，上面标着此件行李竟重八十多公斤。张焕一言不发，递过来几张全国粮票。我默默地收了。

车轮转动了，泪眼模糊，站台远去了，熟悉的景物被抛到了后边。好一会儿，我猛然觉得心里一沉：我会不会做了一件傻事呢？也许，没那么严重，我何必逃得那么快？"文革"开始以来，外婆每月仍有信来，只道

家中平安，其他一字不提，她老人家到底怎样了？

车到大同，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我得回北京一趟，是好是歹，我也得见外婆一面。

作了决定以后，心安了。在车站买了一张去北京的来回车票，找了一个离车站只有几步路的小旅馆倒头就睡了。

火车并没有准时开，足足等了三十几分钟。听人说，最近铁路干线上的情况大多如此。火车启动后在沿途小站陆陆续续上来了不少红卫兵，有外地去北京串连的，也有从北京去外地后凯旋的，个个一身草绿的军装。这种军装有不少名称，官称国防绿，军人自谦为草绿或防护绿，而不安分守己的刁民们则常常讥为“鸡屎绿”。当然此说是比较新的，当年“小米加步枪”的子弟兵和百姓们还有“鱼水关系”，而且服装无法划一，无论何种绿都不在乎。如今的红卫兵们不仅身着绿衣，而且无论男女都头顶绿帽，胳膊上都箍着个红袖标，以小字冠上某单位之“铁扫帚战斗队”、“东方红”、“五州同”、“风雷激”、“全无敌”、“擎天柱”、“长征”，甚至还有什么“战地黄花”，真是无奇不有。大字部分则是一样的，均以楷书或草书写上“红卫兵”三个字。

车到张家口停了。列车时刻表上说此站为大站，停车二十分钟。可是四十分钟过去了，还不见动静。别的乘客素来逆来顺受，倒也没说什么。那些红卫兵小将却沉不住气了，在一阵吵嚷之后采取了革命行动，竟然抓住了列车长，质问他为什么还不开车。列车长支吾着，似乎有难言之隐。红卫兵们一威胁着要“打翻在地”，他就直说了：“挂一列首长专列，所以晚了。”这一说不要紧，骂声四起，“保皇狗”、“马屁精”不绝于耳。一个粗中有细的居然又追问了一句：“坐专列的是谁？”列车长在革命铁拳下不得不如实招供：“是内蒙军分区司令员乌兰夫同志。”“同志”二字声极细微，已听不真切，似乎已不敢认同，只是含糊其词。不知是造反还没

造到乌兰夫头上，还是对他不甚了了，抑或是因为此刻列车已缓缓启动，小将们终于把满头大汗的列车长推了一把，叫他“滚蛋”。乘客们也把心放下，松了一口气，将视线移向窗外。

不知为什么，车走得极慢，小将们不时发出抱怨声。列车员们和列车长不时地沿着车厢低声下气地解释，“上坡，慢一点，对不起，对不起啊。”至于以往车上查票的制度大概早已被“铁扫帚”扫光了，一路上竟没查过一次票。

华灯初上时分，列车万般无奈地进了北京站。我在车窗内往外一看，一条猩红的大横幅正挂在站台上。上书“把铁杆保皇分子乌兰夫及党羽揪出来示众！”“乌兰夫”三个字一个头朝下，两个歪着，上面还用红笔打了大叉。横幅下早已站满了人。

车上的红卫兵们看见这个局势，大概觉得这又是一次重要的革命行动，于是挥拳、跺脚、叫喊，急不可耐地向车门口涌去。

我把车窗开了一条缝，看着“专列”的方向。乌兰夫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戎装笔挺地下了车。他似乎想找什么人解释什么。然而瞬息之间，随着一声“打倒乌兰夫，反戈一击有功！”的呐喊。警卫人员的枪口换了方向，其中只有一两个试图抵抗，迅速被缴了械；而乌兰夫本人，军大氅早已不见，军帽被摘去，领章已被撕掉，好像领扣也丢了，露出里面雪白的衬衫，两手被反绑着，押上一辆已经预备好的卡车，看样子是要游街了。在人群中乌兰夫高大的身影不见了，只看见他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抖动。

车厢里差不多走空了，我才提起小包站起身来。我脚下是千层底儿的黑棉鞋，身上是蓝布棉袄，头上一块紫的方头巾，系在下巴底下，一看就是乡下丫头进城的模样。车厢里一个老列车员一边清扫地上的果皮，一边用袖子抹泪。我抬头一看“京——包列车段”。这些机车都是属内蒙的，难怪他对老首长那么动心。我看了看他，把头巾拉低一点儿下了车，沿着

车厢向站外溜去。人潮呼喊着，向押着乌兰夫的卡车涌去。我加快了步伐。

我家住的房子少说也有一百四十多年了，是一座坐落在东城的满清王爷府。一九五〇年不知从什么人手上没收了之后交给某剧院用了。这个王府相当大，坐北朝南，蹲在两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中间。南面这条叫干面胡同，北面那条叫史家胡同，相传史可法的家庙就在那条胡同口儿，如今却变成小学了。

干面胡同那个门虽是大门，门脸儿却不大，挺高的门楼，红漆虽因年代久远已剥落了，但那门上的铜环，门口灵秀的一对石头狮子，高高的石头台阶，包了铜的高门槛儿，特别是那高高的、长长的、磨砖对缝的院墙，还在告诉世人，王爷府的威风是不容轻视的。

进了大门，通过七八进套院，才能进入正院。王府等级森严，套院内虽也是雕梁画栋，但格局却与正院大不相同，天井多数狭长或扁阔。而正院，天井却是四四方方的一大块。从东南角门进来后，四边房檐极阔，檐下都有雕刻作装饰。走廊上蓝色瓷砖铺地，天井中则是一尺见方的大方砖漫得平展展。四边房内全部为长条菲律宾木拼花地板。

我家住西厢房一溜六间。我母亲一九五〇年应政府某要人之召回国后，工资定了文艺五级，月入二百元上下，住房也就定在这里了。最北边一间是厨房，然后是母亲的卧室、客厅，我的卧室兼书房。三面墙上是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书也渐渐残破，越来越臃肿，从书脊上可看到五颜六色的包书纸。再后面一间是外婆的卧室兼库房。那是名副其实的库房，半间屋子堆满了我母亲从美国带回来的大小箱子。最后一间是一个设备齐全的洗澡房。除了两头两间另外有门可走以外，三间卧室都与客厅连通，只在客厅有一大门出入。我的屋子有两个门，一个通外婆的屋，一个通客厅。几个屋子之间除了门以外都是从地板到天花板的硬木隔扇，

没有墙的。隔扇上镶着大块的磨砂玻璃。硬木装饰清一色是竹和竹叶，连接处有大小不同的寿字，雕成球形，中间还有一颗小木珠儿。我屋里床边那些小寿字个个让我摸得光溜溜的。记得小时候，晚上关了灯我还在玩儿那些小球儿，在玻璃上发出细微的、清脆的声响，隔壁外婆的声音就响起来了："还不睡？明天还得早起呢。"我赶快答应了外婆，把手缩进被子里。在客厅透过来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细细地看着那些硬木雕成的竹叶，编织着我的美梦。

我上小学的时候，这正院子里就住我们一家，别的房子都是剧院的办公室。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在米市大街上盖起了办公大楼，这个地方才完全变成宿舍，因为等级仍然森严的关系，这个正院里，北房、南房分住着正、副院长，东厢房住着一位老演员，她比我母亲资格老，家里也只有三口人，一个儿子、她自己和她寡居的老母亲。

这个王府里前前后后的有不少的海棠树。春天一到，铺天盖地的粉红色；可唯独我们这个院子种着四棵德国白海棠。别的海棠花儿开了，这儿才绽苞儿；等别的开始谢了，这个院子的花儿可就怒放了，满树雪白，一股子沁人心脾的清香。花在枝头，一呆就是半月。于是这个院子就有了个别号"海棠院儿"。

一到星期六晚上，海棠院儿北房的麻将声彻夜地响着，北房主人及从外院来的好友们凑成牌局，通宵达旦地战斗着。其他三个屋呢，只剩下老、小在家留守，男女主人们均忙着去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跳舞，逢到上戏的日子，自有小车子在后台门口等着，下了戏就走，总得快天亮才回来。周日一直到中午，院子里还没有什么响动。

我喜欢这个院子是因为天井大。小时候，这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别的孩子们不敢上这个院子来，父母们早交代过："别上海棠院儿捣乱啊！小心你的腿！"我长大了，别的屋子里的孩子们还小，院子还是我一个人

的，地上的方砖又大又平，跳房子不必画格子，要跳橡皮筋呢，往两棵树上一拴，跳多久，跳多高都行。

除了星期六，每个晚上都静静的，正好求外婆给讲故事。就是在本院服务的那些保姆、阿姨们也在另外一个偏院里有一间保姆宿舍，她们干活儿、走路都轻悄悄的，更不兴在这个地方大呼小叫的。

这种情形差不多一直维持到一九六〇年，那时候，王府庭院的大花园已经荒芜，变成了操场，后来又申请了钱，盖了个四层的大楼。这样，散住在许多小胡同儿里的演员们、导演们、编剧们，以及职员们才住了进来。只有上海来的舒绣文阿姨因为级别高才占了二层楼的四分之一，有了个相当像样的住所。别的人则按级别，严格地算了平方及楼层数，住了下来。

不久，在我家帮忙多年的张大妈就常常悄悄地告诉外婆，别人怎么羡慕海棠院儿，怎么巴不得这儿的人都死净了，他们好提了级搬进来。听着这些话，外婆总是微微一笑，“人多嘴杂，总没有独门独户方便。”张大妈赶快接口：“敢情！”

一直到六四年我走，海棠院儿还是有着它的规模，它的气氛，它的味儿。

一九六七年元月，我从山西返回北京。下火车的时候，我脑子里的海棠院儿还是那个模样。

一出车站我愣住了，一人多高的标语牌上，红底黄字至少有两米长，一米半宽，大书“打倒刘少奇！”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听了无数的传达文件、最高指示，然而面对的时候依然感到惊异不止。一个没有政府的十亿人口的国家可能混乱到什么地步呢？

多年来，虽然后院盖了大楼，原来是用人园丁们进出的小后门早已扩展成大卡车开得进去的绿漆大门，门内安排了传达室，亲友来访一律登记，俨然是中央机关宿舍的入口处了。我还和同院儿的人一样保有我们的老习

惯，棉袄里子上的小口袋里还保有干面胡同二十号的钥匙。门锁年久失修，开起来费力，大门轴久未上油，转动起来吱吱直响；但是我还爱走那个门，原因只有一个，几个套院里只住二十几人，可是史家胡同那一边儿呢，却是逾千人的大杂院儿，众目睽睽之下，被人评头论足，总不是最愉快的。

打定主意，摸摸口袋里的钥匙，踏上24路公共汽车转进了南小街，下车不到五分钟，我就进了干面胡同。离得还远我就觉得昏暗的路灯光下，门上什么东西白乎乎的。走近一看，是交叉成十字的大封条，上面写着“××剧院革命造反兵团封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封条被风吹雨打，已经卷了边儿，字迹也不那么新鲜，但是很明显没有人敢启封。我摸了摸那个石头狮子，回身穿过小巷向史家胡同走去。街灯下绿漆大门敞开着。我一直走进去，不想打扰传达室那个面慈心和的张大爷。

“站住，什么人？”--声断喝，从传达室蹿出一个人来。

“是我，回家来了。”我回答。听着自己的声音，竟好像是空空的，心也怦怦地跳起来，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念头，想为这趟回家找个好理由。站在面前的是田叔茂，小小的个子，从前在剧院锅炉房烧开水的，现在袖子上也有了一个红袖标，“四十几岁的人，也当红卫兵吗？”我心里纳闷儿。

“回来探亲吗？有公社证明没有？”

“不是探亲，因公外出，路过北京，回来看看。”

“住满三天得上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三天以内向传达室报到。”

“知道了。”我抬腿要走。

“等等，有没有外地印发的小道消息？传单、文件？”

我把手上的包儿打开亮一亮，“没有。”

“嗯，你进去吧。”

可能是因为天黑了，也可能是因为冷，我一直走到海棠院儿，连一个人影子也没见。

虽然光线昏暗，我还是愣住了。树影婆娑的四棵海棠被平地砍断，只留下了四截树桩。四边走廊镂空的檐饰已经不见了。走廊上用小砖墙隔开了。北房和南房黑漆漆的，门上都贴了巨大的封条。

我家厨房和母亲的卧室灯火通明，而客厅里好像只有一盏小灯。走到门口才发现客厅已经和那灯火通明的两间隔开了，墙角有个小炉子和堆放齐整的蜂窝煤。我的心狂跳着。我敲敲门。

“谁？”是外婆的声音。

“外婆，是我，小秀回来了。”我急着喊。

门马上就开了，我一把抱住外婆，外婆好轻啊，像一根羽毛，我轻轻地放下她。

“这个时候，你怎么回来了？”

“山西呆不住了，我得远走高飞，走之前来看看您。”

“坐下说话。”我环顾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一把椅子，一只小碗橱，书桌上一个小台灯，发着昏暗的光，客厅和母亲卧室之间不是隔扇而是砖墙了。

“那边住了别人？”

“对了。老闻家，据说祖宗三代都是血统工人，来看守物资的。”

“什么物资？”

“北房、南房都封起来了。他们的东西有好多原封没动还在里边。”

“人呢？”

“都在南边的套院，带走的东西也不少。他们是党员，造反的也得留一条后路吧？”

“咱家抄了？”

“抄了，抄得光光的。咱们家和对门叶家一块儿抄的。连沙发都用刺刀戳了大洞找什么电台。”

“书呢？”

“他们这种东西又不念书，把两家的书堆在院里一把火烧了，那天足足烧了半下午，黑灰飞得到处都是。叶家小平说有的书是他爸爸熊佛西的，死不让烧，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冷了，颤着声儿又问了一句：“抄走的东西呢？”

“有用的，搬去开展览会了，没用的堆在你屋和我屋里。”

我回头一看，可不，封条就贴在我卧室的门上。

“我妈呢？”

“在米市大街的大楼里坐班房，写检查。”外婆冷冷一笑。

“她又写检查？”

“写，不就是把她自己，把祖宗八代都骂得狗血淋头！她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不提了。你这次打算住多久？”

“三天之内我得走，出了三天得上派出所报户口，我没有回北京的证明，可能麻烦。”

“这种日子，三天也满够了。”外婆回答。

这时我才看清，外婆手里还在结一双毛袜子。虽然颜色杂七杂八可是针针密实，袜子快收口了。“灯光这么暗，您还结袜子？”

“就让点十五支光的，还就让点一个灯，都是有通令的。”外婆笑一笑，“没有法的地方，令还挺多。你说不可笑吗？”摸摸手里的袜子，“你回来正好，省得我寄了。”

“外婆！”我终于忍不住了。在乡下的烂泥地里，在病床上腰疼得要断裂的时候，在知青们的冷眼下强忍住没有掉过一滴的泪水都倾泻出来了。我大哭了，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外婆什么也没说，只用她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跟我小时候在外边受了欺负回家的时候一样。

十　鬼域（上）

第二天清早，我在一阵叫骂声中惊醒。眼睛一睁开，自己还是蜷缩在墙角。昨晚外婆把椅子放在床边，硬让我睡在里床，她老人家一半在床上，一半在椅子上将就着。现在外床是空的，椅子已经搬开了。桌上一包价值九分钱的“握手”牌香烟。外婆安详地坐在窗前，嘴里喷出的烟味儿非常淡。

“外婆，现在我妈的工资完全停发了吗？”

“没有，每月十八块的生活费。”

“多久了？”

“四个月了。听张大妈说，再过一两个月，可能会恢复全工资。”

“她消息还那么灵通？”

“可不，我是足不出户，消息多半是她那儿来的。”

忽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我惊得坐了起来。门外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

“姓焦的，别他妈的不知好歹，就拿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唬我！老娘不吃你这套！把桃花心木的大柜子给我抬过来。要不然，老娘要你好看！你个老杂种，甭想蒙老娘！瞧瞧你那份儿德性……”

声音尖锐、刺耳，没完没了。

跟着，门外一片乱哄哄的叫嚷声，吵闹声。

外婆轻轻吐着烟圈儿，一个又一个，十分悠闲的样子。

门外，一个身影出现了，轻轻敲着。

“老太太，我是张大妈啊！”

“快进来。”外婆轻轻开开门。

张大妈，还跟我离开北京时一样，手边挽个竹篮，挺干净的蓝布大襟褂子，蓝布直筒裤子，海圆口儿黑布鞋，胖乎乎的四方脸，头发梳得光光的。

一进门就压低了嗓门咋呼起来。

“哟，这不是姑娘回来了吗？老天开眼，可让我见着你了。姑娘黑了，也瘦了。挺白净挺娇嫩的小花朵儿，怎受得下这乡下的苦哟！老太太可把你想死喽！”说着，撩起衣襟直抹眼泪儿。

“张大妈，今天你又起了个大早吧？”外婆轻声慢语地开了腔。

“可不，一见姑娘，我把什么都忘了。老太太，我给您寻着了四个鸡子儿，二两芝麻酱，三块豆腐干儿。”说完，又从篮底抽出一个小瓶儿，献宝似的送到外婆面前，“二两白干儿，老太太。”

“真不易，多少钱呢？”外婆笑眯眯的，手向口袋里摸索着。

“老太太，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我跟您家这么些年，受您多少好处！这会儿，正是我报答您的时候儿。赶明儿，姑娘她妈转运了，您再给我就得。快别提钱，快别提钱。”

我心里一阵热浪涌过。门外的吵嚷声更大了。

我伸手拉过张大妈来：“大妈，床上坐，外头吵什么呢，这么邪乎？”

“还不是焦菊隐的那个小娘们儿！”

焦菊隐是这个剧院的名导演，与前夫人早已离婚。我走前不久娶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太太，比他女儿大不了几岁。不知就里的我还在问着：

“她吵什么？”

“唉，天天吵，快半月了。每天焦老头子挨批斗，这娘们儿还不放过他，

天天大清早起来吵着分东西。”

“分东西？他们家没抄家吗？”

“抄了。把有字儿的东西都抄走了，家具还在呢。焦老头子一被揪出来，这娘们儿就吵着离婚，划清界限，再加上出身好，一下子就成了革命派，每天闹腾着往她住的房搬家具。”

“她还有房？”

“有！现在焦老头子住他从前的厨房，大书房里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那女人的卧室。房子又大，能盛不少的家具呢！”

“也怪啊！当初她为什么跟焦老先生结婚呢？”

“哎哟，我的大姑娘，那还不是瞧上了人家的钱！”

“张大妈，你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外婆和颜悦色地插嘴了。

“有，看见了姑娘我又想起来了。”张大妈神色严重地凑近了外婆，“我看见那个姓王的了，听说还有个姓梁的也来了。”

外婆神色一变：“真有其事？”

“绝对错不了，后边的田叔茂还特地请他们吃饭，让苗阿姨去做的菜。苗阿姨一回保姆宿舍就跟我嚼舌了。错不了。”

“你怎么看见姓王的？”

“昨晚上，我出大门去倒土，看见一个年轻人从田家出来，喝得酒气熏人，正和我走对面。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苗阿姨说他就是和姑娘一块儿插队的王祚胤，上北京来外调的。”

他们跟田叔茂勾上了？我心里一冷。

“姑娘，你可得防着点儿。那姓田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还没容得我再说什么，张大妈神色慌张地边说边往外挪步儿，“听说今儿早上八点半在北房门口开批判大会，我得先走了。”

她一转身，我才发现多年来被张大妈梳得光滑无比的发髻不见了。再

一看，她已脚步轻轻地出了门。外婆不仅关上门，而且别上了挂钩。

“难得的好人。这些目不识丁的阿姨们还记得多年的老主人，比那些喝过墨水的人有良心多了。”外婆感叹着。

“她现在在谁家做呢？”

“现在就革命派能请保姆。他们不用整工，多半几家合请一个，够她忙的。”

“对了，张大妈的髻不见了啊？”

“去年秋天，红卫兵在街上‘破四旧’，拿着大剪刀，剪辫子，剪发髻，剪人身上的旗袍、裙子，连高跟鞋的后跟都敲掉。张大妈一听见风声就赶快来这儿，还是我给她剪的呢。”

门外越来越热闹了。外婆问我：“要去厕所吧，赶快，别等会儿出不去了。”

我抽身下床，赶紧出了门，朝右一拐，门上有牌子“女厕”，顺手就推，正好和个大男人撞了个满怀。定睛一看，是焦老先生。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拿着抹布，正往外走呢。看样子，是刚刚收拾完厕所。

这就是那个在排演场说一不二的大导演？身上脏兮兮的蓝布制服，头发灰白零乱，眼镜断了腿，用绳子吊在耳朵上。我不禁愣住了。

“焦先生，我能进去吧？”

“不敢……不敢……是，是……都干净了，就犄角上一点点……实在，实在擦不掉……”他语无伦次。边说边侧着身子从门口挤出去。

我回头一看，他背上有个大纸牌子，写着“三名三高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焦菊隐”，名字上照样打了叉。

等我出来，他还站在门外，侧着身，躬着腰。我一出来，他就把预备好的一句话说了出来：“谢谢你，韩姑娘，谢谢你。”

天井里已聚了不少人，我向焦先生微笑了一下，赶快溜着墙根，进了

自家门。

从窗帘缝隙里望出去，北房屋檐下已站了五六十个“牛鬼蛇神”：院长、副院长及党委大部分成员、各科室政工负责人。胸前挂着大小牌子。在上面跑来跑去“主持”大会的都是田叔茂之类的“战斗队员”。天井里的“革命群众”也有五六十人的样子。

批斗会在一阵高呼口号声中开场了。接着大唱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的句子编成歌，也是不易了。”我说。

“可不，什么奇形怪状都有。”外婆接了腔。

接着，大会主席宣布今天的会议目的是追查一九五七年“新侨黑会”的幕后主使人。

“一九五七年？那不是反右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了？”

“反右？那还算是新问题。你没听说，连清宫外史、清宫秘史的老账都要翻吗？不就是照现代人的要求把谢瑶环、海瑞、武则天、曹操的历史都得重写了！”外婆慢悠悠地回答我。

“说！在‘新侨黑会’上，你都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一声断喝，好不威风！

“我，我没干什么，尽干别的了……”是院长支支吾吾的声音。

“什么别的？”

“收集情报。”声音更低了。

“情报？什么情报？”声音不仅提高了，而且紧张万分。台下群众的耳朵也支棱起来了。我不禁和外婆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这次不定又卖了谁！“是关于我爱人和文化局 ×× 局长的……”声音竟提高了一点。

“说！”这个字不但失去了威严而且有了笑意。

“我一直知道我爱人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可是一直没有证据。在新侨开会期间，我终于找到了她的把柄……”

“时间、地点、情节，详细点。”天井内一片死寂。

回答的声音不仅字正腔圆，而且有声有色，门外爆发出一片猥琐的笑声。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影子，面目清秀，五官端正，永远目不斜视地提着小包去挤上下班的公共汽车。这个在舞蹈学校做古典舞系主任的女人总是独来独往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她发福了，头上有了丝丝白发。我在高中的时候隐约听说院长和他家帮工的苗阿姨不清不楚，最后用五十斤粮票、二斤腊肉打发了苗阿姨。我还记得张大妈恨恨地说：“苗阿姨可怜，丈夫坐了监，一个女人拖五个孩子，五十斤粮票、二斤腊肉就被人家打发了。”

听说从那以后，那女人就和院长分屋住了。

现在这个女人再住到哪里去呢？

“外婆，现在李阿姨在哪儿呢？”

“在舞蹈学校隔离审查，说是三反分子。”

“三反分子？那不是五十年代的说法吗？”

“你，真变成乡下人了，那是老三反，新三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外婆哭笑不得地告诉我。

我忽然想起焦先生背上的牌子，就问外婆。

“三名、三高是什么？”

“三名是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三高是高工资、高待遇、高级知识分子补贴。”

“外婆，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街道上天天组织学习，早就听熟了。”

“对了，外婆，您从前在国民政府做过事，他们没为难您？”

外婆嘴边浮起一丝笑意：“他们叫我去，办什么‘学习班’，先写自传。我活了七十岁，自传写了半张纸：× 年 × 月生，× 年 × 月在 × 地念书，× 年 × 月结婚生子，× 年 × 月在 × 机关做事，× 年 × 月退职至今。完了。那位委员问我：‘你在国民党政府做事，一定是国民党员，写出你的组织关系。’”

听到这儿，我心凉了，“你说什么？”

“我说，在国民党政府做事一定是国民党员，那么在共产党政府做事的人也一定是共产党员了？”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外婆唇边的微笑竟变成了大笑，“我早知道他虽然削尖了脑袋往共产党里钻，可是至今还没钻进去呢。就这么，他给我写了张‘历史清楚’的单子，盖上了个章，就把我放回来了，前后不到四个钟头。”

我也高兴起来，搂着外婆的肩膀，笑得左摇右晃。

“要是都照这样，那这场运动也许要不了多久就完了。”

“完了？早着呢！那个家伙羽毛未丰，我不过是侥幸罢了。”外婆叹了口气，又摸起桌上的烟来，我替她划着了火柴。

“后头楼上的绣文死了。”

“舒绣文阿姨？怎么死的？”

“心脏病。她好福气，只见了一张大字报，倒下去就没站起来。可怜上官……”

“上官？”

“上官云珠，你不记得了？”

我怎么会不记得？她永远穿旗袍，永远那么苗条、那么文静。来北京总不忘“给妹妹买冰棍”的上官阿姨，那么漂亮的上官阿姨，死了！

“死了，手脚悬空，挂在铁链上打。熬不过，跳楼了。”

“为什么？”

“这个年头逼死人还用问为什么吗？”

晶莹如玉的上官阿姨会变成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不敢想了。

“还有谁？”我叫了。

“言慧珠都自尽了。”外婆顿了一顿，“洪深夫人跳了井又救上来，现在不知生死，可是你余公公上了吊。”

“余心清，余公公？”

外婆点点头。洪深逝世时，向余心清托孤。余、洪两家过命的关系在文人中传为佳话。而在今天，红卫兵竟诬这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乱搞两性关系”。余公公在身上挂了张“士可杀不可辱”的白纸，悬了梁。

为共产党卖过命的民主人士，竟落得如此结局！我小小的时候，余公公常接我去他家玩。他后院里一片碧绿的竹林。“高风亮节”四个字就是那时候余公公教我的。

我泪眼模糊地呆坐着。舞台上生龙活虎的舒阿姨，特别是她的虎妞，大概是再无来者了。银幕上文弱、娴静的上官阿姨，依然栩栩如生。光线明亮的客厅里，余公公、洪婆婆和客人们谈抗战，谈文学，谈洪深。我坐在角角上，一边忙着把桂圆送下肚，一边尖起耳朵把一知半解的东西都吞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外边的人声听不见了。周围又安静下来。我忽然心里一跳。

“彭伯伯呢？彭伯伯有没有消息？”

“没有。去年五月运动开始以后就没有来过。我也没法子去打听。”

“没有消息？”

“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对他，我真是有万分的歉疚。”

“为什么？”外婆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她怎么会这么说呢？

“如果不是你妈的信，他怎么会回来？怎么会自投罗网？等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太迟了。”外婆的脸在雾中显得异常疲倦、哀伤。

“我去，我到中关村去探探风。外婆，您别担心，他是科学家，还有希望。”我努力表现得非常有把握的样子，外婆看看我，笑了笑。

“我早就知道，你是有骨头的。顺便，你再到乃兹府去一趟吧。”外婆的声音，异样的平静。

脑子里嗡的一声，我呆住了。

“你舒公公跳了太平湖。他的书，除了你带走的，都成了灰。他给你的玩意儿，也只剩下这把小铜壶。”

外婆开了抽屉，把小壶拿出来，放在我手心里。

那是一九六二年春节，我在一个集会上朗诵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之后，舒公公给了我文房四宝和这把小铜壶，是往砚里添水用的。往年，这些东西都和各种版本的《骆驼祥子》、《茶馆》，以及舒公公给我的各种花瓶、老寿星、漆器小盒们放在一处。

“端砚什么的都拿走了，这把小壶不起眼，他们扔在了一边。我拾了起来，我知道，你顶敬爱你舒公公。”

眼泪无声地流着。舒公公，灰色的中式小褂儿，灰布裤子，左手拄着他的枣木拄杖，站在花前，右手提着大喷壶在浇水。每次进门，我放下书包，顺手提过壶：“我来，舒公公。”“好，你来就你来。”他笑眯眯地瞧着我，“秀儿啊！回头吃中饭，我给你说故事啊！”

“今儿个多少人来吃饭哪？”

“七八位吧！又是来要稿子的。”

“你讲个故事，他们准又得抄下来，拿去发表。”

“你要觉着没有意思，咱们就不叫他们发表。”

“我？我算老几？说话都词不达意的，我说话不算数儿！”

“就你不会拍马屁，所以你的话就算数。更何况你已经会用什么‘词不达意’了！小丫头儿长大喽！”

水沙沙地洒在花叶上。他的心血浇灌了不知多少文坛新秀，他的爱带给我多少温暖和希望。他的幽默告诉我人生多彩多姿，还有希望。

舒公公是一株老槐树，根深叶茂。在树荫下，老北京的曲子词儿、相声、大鼓、三弦儿等等北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老玩意儿”大放异彩。

但是，老槐树倒了，怎么倒的？

“在文联挨了文斗，之后在街道上挨了武斗。让他跪着烧他自个儿的书，让他举着牌子，批判他自个儿……牌子举不动了……掉下来，砸了一个红卫兵的脚……说他反了……用鞭子抽……”

朦胧中，外婆的话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不像是真的。可是泪眼模糊中，我好像看到舒公公两臂都是火泡，衣衫破碎，鞭痕累累。

“这不是真的！”我大喊。

“是真的。第二天就跳湖，太平湖，他常去打太极拳的地方。”

“家里人没拦他？”

“……”

“在湖边打太极拳的老人们也没拦他？”

“没有，听说还有他一个老朋友在附近扫街。舒先生跳了湖，他还在那儿扫他的……也罢，生不如死，更何况是骨头那么硬的他！”

“清阁阿姨呢？”我像是大梦初醒一样，猛然记起了那位多年不见，听说久病不起的阿姨。

“没有消息，我只希望舒先生的事能瞒住她，越久越好。”

清阁阿姨是多么珍视舒公公。为了这种珍视，她多年不来北京；即使来，也从不在乃兹府附近出现。她用她的整个生命和气节保护着舒公公的

成就。清阁阿姨在精神上的支柱如果崩塌，那是不能想像的。

我伸手抓起棉大衣，戴上头巾。外婆马上把一把零钱塞进我的口袋。

“早去早回，一路小心。”

“我记得。”

“万事不可鲁莽，我等你回来。”

“外婆放心。”

带上门，我走了，快步如飞。

十一　鬼域（中）

一出院门，风尖溜溜地刮着，像小刀一样割得脸生疼。我赶快拽出口袋里的口罩，戴上，把头巾拉低，沿着墙根，一步一滑地走着。前些日子下了雪，除了街中央一条是干的，路两边的积雪都变成了冰，特别是背阴那一边。街面低凹处，连路中间都是冰，正中午化成泥浆，晚上再结起来，黑黑的，灰灰的，被车轮压成一条条沟。街两边的冰堆上不时出现一个黄油油的小冰山，是屋檐下伸出的烟筒里滴下来的烟油子跟脏水一块儿冻成的。每逢这种地方，我就加快步伐，防备着头顶上滴下一滴什么东西来。

穿过灯市口。听老人说这地方两百年前是热闹得不得了的灯市，连皇上都偷跑出来看过这里的灯呢！现在，除了有一个卖灯泡的小铺子以外，整条街跟花灯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只留下个名字而已。

进了乃兹府，我脚步放慢了，左右看看。跑熟了的道儿，总可找到什么人打听打听。路口豆腐脑小铺上了板，隔壁卖炒肝儿的还开着，我三脚两步赶过去。炒肝儿铺的胖掌柜知道舒公公爱吃炒肝儿，常常送到家里去。我在舒公公那儿吃了几次上了瘾，还常常和小同学们一块儿看完了早场电影来这儿花一毛钱吃上一碟。掌柜的认得我，我赶紧地朝里迈腿。

“什么都没有了啊！要吃下午再来，五六点吧！”一个瘦瘦的、高高的小伙子，背对着我，在刷碗盏，大概是听见了脚步声，头也不抬地说了话。

“劳驾，我就跟您打听这儿原来的那位老师傅哪儿去了？”我问，“今天他休息啊？”赶快又找补了一句。

“您是他什么人哪？”他转过身来。挺年轻的小伙子，两道眉毛打了个结儿，十二分的不耐烦。

“我不是他什么人。从前，我常上这儿来吃炒肝儿，认识他，今儿路过这儿，顺便问问。”

“办‘学习班’儿呢！”

我懂那是什么意思，甭问了。回头说了句：“谢谢。”就往门外走。站在门槛上，我停住了。

一个戴眼镜儿的女人，包着块质料很好的深蓝领巾，棉袄上罩着件灰蓝条纹的的确良褂子，黑呢裤，黑大绒棉鞋上干干净净，正从小铺儿门口过。舒婆婆！我刚想喊，又站下了。她的脸上红润润的，腰板挺得很直。她快步向香桩胡同拐进去，一拐便到了一号门前，伸手掏钥匙的空儿，抬头一瞧，正好和我照了个对面儿。

“哟，是姑娘啊！挺好的吧？”

“挺好的。”隔着丈把宽的小胡同儿，我向前迈着步儿回答着。

她笑了笑，径自开了门进去，门在她身后无声地、严丝合缝地关上了。

“我常说我师父，你急什么？用得着你打抱不平吗？真是的，斗大的字儿不识一担，还给人家大作家打抱不平，不是找死吗？现在可好了，天天在学习班作检查，图的是什么？”背后的年轻人一边抹桌子，一边自言自语。

我停住了步儿，转过身来。

“这位同志，在哪单位做事啊？”

“插队的。”

“哪年？”声音又热烈，又充满了同情。

“六四年。”

“哟，我姐也插队了。六五年。”他边说边往回走，“没什么吃的了，热汤总有一碗。你先进来吧，咱们关上门儿，外头多冷。”

他伸手在门外挂了个“休息”的牌子。我们走进来，他关上了门。

我坐下来。他双手捧着一碗热汤放在我面前。他在对面坐下来。这真是一碗汤，清澈见底，浮着几丝白菜，随着热气散出一股酸辣味儿。我在碗边上焐着手，暖和多了，更何况，碗里还漂着几朵油花儿呢。我感激地笑笑，拿起了勺子。

“我姐在延安插队。信里说得可好了，又是在革命圣地啦，又是发扬革命传统啦。回来一说，一个劳动日分不到八分钱。北京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往回带。”

我看他的样儿，真心疼他姐姐，就笑着跟他聊了一会儿。

“你刚才说你师父为人打抱不平？”

“可不。丰富胡同舒家出了事，老爷子跳了湖。他急得团团转。墙倒众人推嘛，有人骂街，你就装听不见不就完了吗？不介，非要替死人打抱不平，这不麻烦了。学习班越办越邪乎，现在有人说舒家老爷子以前还把什么东西交给了他，是什么小说的稿子。这不是见鬼的话吗？我师父除了小人儿书，什么书都不看，怎么会呢？现如今街道上的人就一口咬定我师父手里有东西，整得他死去活来。唉！真是的，其实，哪儿能呢？这个年头儿，可是不能强出头！”

小伙子最多有十七八岁，说出话来老气横秋的。

我站起身来：“多少钱？”

“一碗汤，还值什么钱？插队的，够苦了。”

我笑了，谢了他，戴上口罩，又钻进北风里。

车身晃荡着，丰富胡同一号的门好像在眼前晃着。人不在了，院里的

梅花也没人照管了，没见墙头的红梅嘛。今年冬天奇冷，可能也是一个缘故。天太冷，连梅花都不开了吗？不大对吧！

我正胡思乱想着。

车子经过动物园门口。小角门上，有人排队，队挺长挺长的，拐过街口往展览馆那边蜿蜒。人们在寒风里瑟缩着，人人手里夹着或抱着一个包袱，一个个看过去，竟无一例外。正想找人问问这是干什么的，后边一个孩子的声音响了。

“二舅，他们排队买什么？”

“不买什么。”

“那干吗排队？他们都带包包，准买什么好东西。”

“讨厌，吵什么吵？烦死了。”

没声了，做舅舅的可能于心不忍，压低了声音说：“现在不叫养猫养狗了，他们得把这些小动物送到动物园去。”

“给人看？”

“嗯。”舅舅含糊不清地回答。

“哈哈！我来告诉你，这猫啊狗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他们得把这些宝贝儿送到动物园去，喂老虎。这可是一举两得，破了旧思想，又省得给老虎买吃的，真是公私两利。知道了吧？哈哈。”

哈哈声很响，持续了好一会儿。身后的两个人大气不敢出地闷坐着。我暗自庆幸没糊涂地开口问人。年轻人说得对，万事不可强出头，少说为佳。

“到站了，到站了，中关村啊！”是售票员的叫喊。

“这车不到颐和园吗？”有人瞥一眼她左臂上的红袖章，怯怯地问。

“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区间车，上车也不瞧清楚点儿！”售票员继续咋呼着。

车子停在北大南门不远的站牌前。这个进出过无数次的大门对我是那

么陌生和遥远。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大学跟我只怕是再也无缘了。这个想法不知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占住了我的心，脚下不由得沉重起来。

向左、向右转了几个弯，来到了彭伯伯的窗下，很自然地伸手去按铃，又缩了回来。雪白的抽纱窗帘不见了，窗子上挂着的是一块绿色的布，镶有粉红的花边，俗气得不堪。忽然，窗户打开了，一盆脏水直接从窗口泼了出来，跟着，出现了一张头发蓬乱、面目浮肿的脸。我赶快溜之大吉。回头一看，房子的另一面有不同颜色的窗帘。大概是分作两家居住了，共用一个卫生间。难怪！

科学院宿舍死寂，我向大门走去。一队摩托车从背后风驰电掣般冲过来，眼前只觉得掠过一片草绿色。我赶快闪在路边，小心地往前蹭着。

“笑什么笑？”一声吆喝，跟着是摩托车刹车的一片乱响。

下意识的，我再往路边靠，站在一棵大树下，往前看着。

这时我才发现，骑士们竟然都是女的，不仅个个身穿棉军装，戴军手套，腰间扎武装带，而且都剃了光头，不戴帽子，整个脑袋被风吹得红通通的。为首一个，大声吆喝着的，竟是高冀芬，大嘴快咧到了耳根，而且线条下垂，两眼露着凶光，加上没有头发，更不像一张人脸了。

被他们围在当中的是科学院的一个清洁工，花白的头发，手里拄着一把大耙子，正把路面上的枯枝败叶耙到一起。

“我没笑，我没笑……”老人双手乱摇，两腿快要跪下去了。

“没笑？你现在还在笑！我让你笑个够。”高冀芬伸手解下她的武装带，抡圆了，皮带的铜头带着呼呼的风声向老人的头上砸下去，老人倒了下去。

“快，别，别……”大门口传达室门开了，跑出来一个中年人，躬着腰，跑了过来。

“高司令，高司令，老王头的脸部神经麻痹十几年了，什么时候看着都是这个样子……他绝不敢，绝不敢笑革命小将。我说的句句是实……您，

您可以查。”中年人一边说，一边弯腰、点头，真是怕极了的样子。

我忽然觉得右边的大衣袖子被人拉了一下，听见一个低低的声音：“往右转，快跟我走。”不自主地，我就向右一拐，是方朔！

“快走，别让高冀芬看见你。”

大概是我一身乡下打扮没惹起注意。我刚离开就听到了摩托车启动的声音。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没回答。老人倒下去的影子还在我心头晃着。

“上个礼拜，北大造反兵团分三批去参观了北京文艺界举办的几个展览会，其中有你们家的。这个时候，你在北大出现，真是……”

“现在，我怎么出去？”

“现在，你随时可能遇见熟人，太危险了。到我宿舍去坐一会儿，好在冬天夜长，早早就天黑了，天黑了再走。”

“你宿舍在哪儿？”

“进东门不远就是。我们从燕东园宿舍区过去。”

在“东2”宿舍楼前站住。大楼门口传达室的小玻璃窗前站起一个人来，伸手拉门，把头探出门外。

“小方，那是谁？”

“我同学，刚从石景山来。”满口瞎话，说得挺顺。

“噢，填个表吧。”

第一次，我在一张公家的表格上写上“王玲，女，二十二岁；职业：工人；单位：石景山钢铁公司翻砂车间；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目：共青团员；所来目的：探望中学同学；所带物品：无；抵达时间：四点”。

方朔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然后撕下小联，放在兜里。

大楼走廊里一块大衣镜擦得亮晶晶。进了宿舍门，热气扑面。地上是猩红的地毯，书桌、椅子、梳妆台，一应俱全。两张单人弹簧床上铺着厚厚的毛毯，床中间一个大柜子，柜子上有一个三层的书架。

“这是什么宿舍？”

“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宿舍。”

“你怎么住在这儿？”

“每一个留学生宿舍有一个中国学生，从前，多半是学生会的政治干部，现在多半是高干子弟。”

“你也算高干子弟？”

“不，是她安排的。”方朔随手一指。我才发现在梳妆台的镜子前有一张十寸的大照片，是高龚芬，上了色。上色的人小心地勾出她的口形，小了许多，脸也就像人一点儿。我伸手啪的一声，把照片扣在桌面上。

“你还是嫉恶如仇！”方朔苦笑。

“那个留学生呢？”

“回国度假了。”

屋子里太热，我摘下头巾、口罩，脱了大衣，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方朔从暖水瓶里倒了一杯热水给我。两手捂着热茶杯，心里慢慢平静下来。

往书架上看过去，三排书背都是中文的。猛的，我的视线停住了，两本书的书皮纸是一模一样的乳白色，书背下方画着两个一模一样嫩绿的小芽。

抽出书来，果不其然，是读过不少次的《大卫·科波菲尔》，书页上留下了各种痕迹。

“抄家抄得这么厉害。这种书你还插在这儿？”

“嗨，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造反派常常出去抄的是别人的家，有

时候，还把‘禁书’拿回来呢？你看……”

他弯下腰，从柜里拿出几本书。

赫然是直排本的《金瓶梅》、《飘》、《红与黑》。装订精美。不错，四九年以后，这些书确实是“禁书”。

“你也是造反派？”

“当然，我爸爸虽然在文化界，可他已经有二十六年党龄了。再说他又不是当权派，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当然参加造反组织。”回答竟是振振有词。

“那，刚才，你又为什么让我躲开高冀芬？”

“她们，她们是东方红造反兵团的。清一色高干子弟。专搞武斗，威名远扬。你要是落在她们手里，她们大概什么刑法都会用的……我们到底是同学。”他有点黯然。

“刑法？”

“今天的北大，早就胜过了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古今中外什么残酷的刑法都已加工提炼，使之更加有效，而且加以广泛的运用。那就是兵团司令，也就是当今名人高冀芬及其属下的杰作。”言谈话语之间，方朔的情绪似乎非常复杂。

“你是哪一派的？”

“新北大。我在大学两年，别的没学会，溜门撬锁，偷拍文件，收集黑材料，学得不错，而且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甚得其法。”

“你是念中文的，毕业以后，做什么？”声音里的怜悯，我自己都听得出来。

“中文？中文跟我是没有什么大关系了，也许，结婚。”

“是她？”我朝那扣在桌上的照片点了一下头。

“嗯。”

“然后，照她的安排生活？”

“谁知道，也许做政治工作。现在，政治第一，能玩儿政治，就有了一切，否则就会丧失一切。”说着说着，他竟慷慨激昂起来，刚刚出现过的迷茫和苦闷一刹那就不见了。中学时代虽口齿不清，但聪明、灵秀的青年确实不存在了，面前的人竟是个混蛋！

我忍住气，向他打听校内的熟人。个个营垒分明；“关牛棚”、“进学习班”、参加某“革命组织”、“逍遥派”等等，各有所属。

“对科学院的情况，你熟不熟？”

“略知一二。”

“那些从国外回来的老科学家呢？”

“得看是谁。像钱学森那样的，早就被周恩来保护起来了。像钱伟长那样的死硬派，现在大概已经是靶子了。”

“钱伟长是中国的力学之父，是人类的精英！”我的火气再也按捺不住了。

“韩秀，不是我说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的老脾气是得改改了。‘科学救国’早就批得臭不可闻。你难道还不清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真是苦口婆心，似乎对我的顽固非常惋惜。

我茫然地看着杯子里的水，摇着，水到了杯子壁，又溜下去，上来，再溜下去。耳畔，方朔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千万不能顽固不化……后悔就来不及了……”

窗外暗了下来，我放下杯子，站起身来：“我得走了。”

“我送你。”

“不必了。你在会客单上签个字吧！”

他在会客单的小联上签了字，看看表，填上客人离去的时间：五点十七分。

“现在北大简直像游击区一样，等会儿天完全黑了，各种行动该开始了。而且，各种武器装备应有尽有。除了飞机以外，什么常规武器都开进了北大校园。你当心一点儿。”

“该来的总会来的。你请留步。”

穿戴整齐。经过传达室，从小窗递进了会客单，看传达认真地将小联贴在本单上，道了再见，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耳边的罗嗦关在了大门内，耳旁清静了不少。心里更觉释然。

辨认一下方向，从这里面到南门，正好有条笔直的马路，间隔不远还有路灯。有的地方路灯已不见了，只有路灯杆黑魆魆地站在那儿，想必是武斗时打碎的。也不一定，搞运动，校园里一团糟，路灯已经变成微不足道的小事，无人问津了。

路左边低凹处传来铁锹、镐头的叮当声，是在修工事、挖地道？

路右边传来一声吆喝：“站住，干什么的？”

“北国风光。”

“你怎么才回来？”

“闲言少叙，参谋长呢？”

“在里边儿。”

有口令有暗语。真像那么一回事呢！连走带跑，总算出了北大。头也不回，对直穿过马路向汽车站奔去。

依然是小灯如豆，外婆烧了一大锅水，等着给我下面呢。

“一共四个鸡子儿，我一顿就吃两个。赶明儿您吃什么呀？”我抗议了。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何况你的路又那么远。林则徐充军的地方还比你近三千里呢。”

一老一少，围着火炉，递着暖心的话儿。外婆用一块豆腐干儿，蘸着芝麻酱，吃得有滋有味。我一边吃面，一边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如实禀报。

外婆不时插进一句评论。心里的火和冰都慢慢平伏下去了。

待到一小盅白干儿下了肚，外婆把酒瓶子之类的塞进碗柜角落，这才燃上一支烟，打开了话匣子。

“抄家的时候，笑话可多了。”

“什么笑话？”

“说来真好笑。三年自然灾害，咱们‘吃’了点儿金子，可我手里还留着几条小黄鱼，心想等到你结婚，我还能给你点儿东西。知道红卫兵们快来了，我就把金子都扔进炉子里。心想，真金不怕火炼，等他们走了，灰也冷了，我再拿出来。”

“好主意！”我手舞足蹈。

“哈哈，他们比你聪明，一进屋，就奔炉子去了，端到院子里，底朝天一扣，不但拿走了金子，也毁了我的炉子，你说奇不奇？”

“他们怎么知道？有人通风报信？”

“不是。后来我才听说，他们抄家抄出经验来了，进门就端炉子。不但有人在炉子里藏金子，也有人把什么要紧的字纸匆匆塞进炉子。来不及烧完的，也就成了罪证。嗨，无奇不有就是了。”

“外婆，您好像挺轻松的。”

“为什么不轻松？金子也好，什么也好，身外之物而已，丢了就丢了。不少人连命都丢了。我们祖孙两人还能在这儿热乎乎地吃面，真是万幸了。”

“外婆，明天一早儿，我就走了。”

“我知道，过了这一劫再回来，只要我还活着，总会给你平安信的。”

屋子很小，可也尽够了。我觉得从未有过的舒适和安宁。

十二　鬼域（下）

从西郊回来之后，和外婆在灯下，在黑暗中聊到半夜，桌上的小钟指到两点半，院内忽然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外婆和我都一下子坐了起来。外婆还没找到鞋子，敲门声响了，当时我虽然毫无经验，但下意识的，一把将外婆拉回床上，让她躺好，一边跳下床，开灯应门。

门一开，是田叔茂打头阵，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后面还跟着不少人，有男有女，足足二十来个，多半是生面孔。

“查户口！”田叔茂神气活现。

“外婆，咱家的户口本儿呢？”我向床上的外婆转过身去。

“抽屉里。”外婆十分从容，靠着枕头，半躺半卧。好像查户口是家常便饭。

一个民警伸出手，拿起我家只有薄薄两页的户口本，看了一眼，从胸前衣袋抽出一支笔，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来，开口问我。

“叫什么名字？”

“韩秀。”

“跟户主什么关系？”

“祖孙。”

“外祖母跟外孙女，她们家没有男的。”田叔茂在旁边补充着，嘿嘿笑着。

“家庭出身？”民警继续问。

“职员。”

“旧职员，伪职员。”田叔茂又补充。

“本人成分？”

“学生。”

“职业？”

“插队青年。”

“插队的？”

“对了。”

“哪年哪？”民警抬起头问我。

“六四年，北京市第一批集体插队的。”

“你母亲就你一个孩子，怎么也插队了？”他皱着眉头。

“不知道。”我回答。同时我发现插队的事实使民警脸上的表情柔和了，而且田叔茂大大地不自在起来。另外一个民警对里屋门上的封条瞥了一眼，开了口：

“你回北京，怎么不来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呢？”

“田叔茂说的，住三天以上报临时户口，不住三天以上的，在传达室申报一下就可以了。”

手里拿着小本子的民警狠狠瞪了田叔茂一眼。又问：“她在你们传达室登记了没有？”

“登记了。”

“她回来几天了？”

不等田叔茂搭腔，我递上了火车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一早就走。这是火车票。”

“嗯，明天一定要离开，要不然可是你自己的麻烦。”民警把车票还给

我，转身走出去。

一堆人乱哄哄地挤了出去，我心里突突直跳。心想火车票居然封了他们的嘴。他们竟没有问我要公社证明！谢天谢地。

我呆呆地看着地板上肮脏的脚印，忘了该做什么，靠着桌子站在那儿，觉得好累。

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门框上低一下头，走了进来。

此人熊腰虎背，头发略有一点灰白，两只眼睛里闪着笑意，径直走了进来。

“我姓戴，本单位造反派的负责人。”他拉过椅子，一屁股坐了下来。我听见身后的响动，外婆点着了火，喷出了一口烟。

“你母亲在学习班表现得不错，交代得还算彻底。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你母亲希望第一批离开学习班，工资可以照领，也可以回家住。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本来就是她唯一的出路。”

我只是呆呆地听着。

“你和她不一样，十七岁就参加革命了。努力改造自己，我们也有耳闻。可是十七年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你也不能否认吧？”

我还是一声不响，但脑子开始动了。

“特别是，我们认为，你在新中国长大，一定对美帝国主义侵华史有一定的了解。解放前，美国兵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压死中国人，照样逍遥法外。可就在那时候，你母亲就跟着那么一个美国人跑了，还生下了你，你想想看，这种行为不是民族败类、历史罪人的行径，是什么呢？”

他口沫横飞的样子，竟像在法庭上宣判我有原罪一样！一股怒火在我心里翻腾。身后传来外婆的咳嗽声。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把火气强压下去。

“你回去之后，要好好认识自己的这一段历史，和这段历史彻底划清

界限。现在有你在山西的领导和同志在北京，我们会和他们不断保持联络，希望你能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重新做人！”

看我依然一言不发，他站起身来。

“明天你母亲不能回来送你，我的话你好好想想。顽固不化是没有好结果的。时间不早了，我走了。”

关上门，挂上门钩，转过身来，靠在门上，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猛然间，我发现外婆脸上铁青，正一口一口地喷着烟。

“外婆，你认识这个人？”

“何止认识？他的骨头烧成灰，我也会认出这条狼！”

外婆慈蔼的脸上竟充满了怨恨。我从未在外婆安详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

“外婆！他是……”

“他叫戴敬德，其他的，我现在不想谈。”外婆缓了一口气，拍拍我的手背。

“看起来，远走高飞是对的。越远越好。要不然，依你的性子，拼掉了性命也是大大的划不来。”

“外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您。”

“放心，我总会好好活着，看这般东西的下场。你要好自为之，二十岁的女孩子，千万自重、自爱，别让我为你担心。”

“外婆，我记得了。”

第二天清早，外婆从口袋里摸出五元二角五分钱，放在我手心里。

“外婆，您把最后一分钱都给了我，您怎么办？”

“拿着，我总有法子。姓戴的不是说了吗？你还不放心？”外婆唇边浮起一丝苦笑。

手里一个小包，包里有那双千针万线的袜子。袜子里紧紧裹着那只小

铜壶。我走了。贴身的口袋里加上了那一卷钱，钱上还带着外婆的体温。

“好孩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记得！”

耳边还响着外婆的叮咛，我上路了。

后来，那是一连串见怪不怪的日子。

三天不见的北京站又有了新的气象。满墙都是大字报、小字报。满地纸片，加上旅客的鞋底带进来的泥、水，污七八糟。候车室横七竖八堆满了人，空气污浊不堪。我目不斜视地找到了京包线的站台，照例检票上车。北京毕竟是起始站，车门口还有一个检票的女乘务员，胸前别着“三八列车组”的证章。我排着队，移动到她面前，把车票递过去。

“吐鲁番。”我报了地名。

她随口唱一句“吐鲁番”，并没伸手接我的票，这时我才发现我前后的人手里都没拿着票，只是唱一句地名而已。心想，这上车不检票大概也是铁道部被夺权以后实行的新政策吧！

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一看，座位上竟躺着一个军人，一人占了三人的座儿，正在吃着一个苹果，一边吃一边把苹果皮吐在地板上，还骂骂咧咧的：“酸得掉牙，他娘的。”

“同志，对不起，我的座号是九十七号。”我还点了一下窗口那个位置，意思是只要他坐起来，我能在窗口那儿坐下就成了，绝没找麻烦的表示。

他坐起来，把军帽拉拉正，看看椅背上的号码，又莫名其妙地看看我，站了起来，向通道对面的人喊：“喂！老冬瓜，这坐车还有号儿吗？不是逮哪儿坐哪儿？”

应声的人把手里的扑克牌甩出去一张，头也不回地答道：“人家有号儿，你就挪窝儿吧。”又甩出去一张：“嚷什么嚷！”

我左右看看，通道左边是两个位子的座位，每四个位子成一组，靠窗一张小桌，打牌正合适。右边是三个位子的座位，六个人对面坐着。左右

两边，到处是草绿色。

伸手掸去了椅子上的苹果皮，挨着车窗坐下来，不想一抬头，和那“老冬瓜”的视线碰个正着。那个“老冬瓜”一点儿也不老，军帽挂在衣钩上，风纪扣敞开着，跷着二郎腿，正潇洒地和其他三个军人打着“百分儿”。

我把头转向窗外，还有不少人在上车。

车身剧烈地晃了一下，我回过头来。对面刚才还空着的位子上坐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的青年。中等身材，眉目清秀，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刚出头的样子，一双手手指又细又长，正在剥一个橘子。小桌只有一尺见方的大小，他的一张包装纸却占了大半张桌子，他一边把纸往怀里拉着，一边忙着道歉：“对不起，我把桌子都占了。”

“没什么。”包装纸上印着“温州 ×× 食品公司”的字号，听他的口音有很浓的南方味儿，心想他大概是温州人。

他的邻座和我的一样，都是军人，正伸着头，帮通道那边的“战友”们“参谋”着，他们是真的“参谋”，不仅出谋划策，而且紧张得满脸通红，看来非常的称职。通道那边的“老冬瓜”在我斜对面依然潇洒地甩着牌，过了一会儿，他手里出现了一根过滤嘴的香烟。马上，他身边的人划着了火柴。他悠闲地用左嘴角叼住烟卷，从右嘴角边喷出烟雾。在烟雾中眯起眼睛，愉快地听着边上人发出的“真香！”的啧啧之声。

车身晃着，窗外夜色朦胧，渐渐黑了下来，头靠着车窗，打了个盹儿，只觉得右肩被什么压住了，伸手推一下才知是邻座，同时也闻到一股汗酸味。站起身来，向车厢连接处的洗手间走过去。洗手间门口，一位女乘务员正在把垃圾扫进垃圾桶里，我站着等。

她直起腰来，用套袖抹一下汗水，看着我，笑笑，竟是上车时的检票员。“您又检票，又搞卫生吗？”我问。

“现在搞运动，车上人手少，大家都忙点儿。”她腼腆地笑笑。

“您有什么贵重东西没有，我们可以替您保管。”她又说。看我没什么反应，又加了一句：“这会儿，车上没有什么买票的乘客，挺乱的，我才问您。”

我扫了一眼在我座位上方衣钩上挂着的蓝布书包，笑笑：“谢谢您的好意，我没什么要存的。”心想，不愧是“三八列车组”，全国的模范，到了这天下大乱的节骨眼儿，还能为乘客着想。

出了洗手间，我愣住了，我的座位附近一片吵嚷、呼哨声。好容易挤回车厢一看：“老冬瓜”一只脚蹬在座位上，手指着自己的裤脚，嘴里喊着：“给我舔了，给我舔了。”站在他面前的是那位不久前跟我说过话的女乘务员。她脸色惨白，一手提垃圾桶，一手拿扫把，眼泪在脸上淌着，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话来。

我低头一看，垃圾桶里有不少东西，其中有一个纸团，上面露出“温州”二字，想必是对面那位乘客丢进去的。地板上还有一小堆苹果皮，又湿，又脏，在人脚下踩了一天，变成了紫黑色。通道上有水渍，扫把上也是湿漉漉的，而“老冬瓜”草绿色的裤脚上有一点扫把的痕迹，寸把长。

“对不起……车一晃，我没拿稳……等一会儿，您换下来，我给您洗。”乘务员结结巴巴地说。

“甭，你现在给我舔了。”“老冬瓜”的嘴角撇着，两颊拉出了两条皱纹，又深又长，形状真像冬瓜。周围爆发出一片鼓掌、喝彩、打口哨的声音。

女乘务员放下垃圾桶，从口袋里拿出一条小白手帕，流着泪，颤声说：“我给您擦。”

“啪！”的一声，“老冬瓜”伸手打掉了白手帕，又一拉，女乘务员立脚不稳，一个踉跄。

我觉得身后有人挤过来，回头一看，几个女乘务员和列车长站在我身后。列车长是位中年妇女，紧抿着嘴，眼圈儿红着。

回过头来，却觉得眼前一晃，女乘务员被人扶起来，又顺势一推，跌

进列车长怀里。

“怎么着？想找碴儿吗？”“老冬瓜”把腿从座位上挪下来，站在通道上，他的旁边、身后围满了军人。环顾一下四周，“老冬瓜”有恃无恐：“狗拿耗子，你小子多管什么闲事！”

“对了，这个闲事我管定了。”我吓了一跳，可不是那个温州人吗？他站在那儿，车身晃着，他脚上的一双松紧口黑布鞋却像生了根，钉在那儿，不动了。

“后撤！”温州人给了我一句。不由自主，我后退了一步，咦，身后没人了。外车厢挤过来看热闹的和列车员们一个都不见了。我缩进了车厢连接处。

只觉得车身猛地晃了一下之后，停下了。没有广播员的声音，大概是个不知名的小站吧。

“老冬瓜”慢慢地抬起手，一把扯掉了领子上缀着的红领章。他旁边、后边的人也都甩掉了帽子，一片声响地扒掉了领章。

说时迟，那时快，眼前一片草绿色，一群人向那温州人扑了过去。只听一阵“哎哟……”“我的妈……”“嗬……”。

又像割草一般，草绿色中冒出了一点蓝，这个蓝点越来越大，终于站了起来，脚下是一片绿草、红花。“老冬瓜”的脸上红的、紫的，什么颜色都有了。

还没容得我回过神来，那温州人一手抄起我挂在衣钩上的书包，一手抓起行李架上的两个旅行袋：

“快走！下车！”

我抬头一看，车厢那边的军人已都拥了过来，正值停车，他们跑得不慢。

转身，推开车门，跳下去。脚刚着地，汽笛一声长鸣，列车从身后冲了过去。

定睛一看，那青年已稳稳站在站台上了。

“这是什么地方？”

“七条沟，地图上没有名的小站，已经在甘肃境内了。列车停在这儿加水。”

“那怎么离开这儿呢？”

“十五分钟以后，有一辆慢车经过这里。”

那个时候，快车可能比慢车更慢，我也没放在心上。

“你怎么对这一带那么熟悉？”

“走过几趟。”语声诚恳，毫无恶意，虽然站上夜色朦胧，但我们隔着两公尺距离在说话，倒觉得相当安全。晚风吹着，虽然冷，可是离开了那污浊的车厢，却也觉得精神一振。

“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做？”

“那些高干子弟也太没有人味儿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高干子弟？”

“除了他们，谁能那么嚣张？”

“那你为什么把我也拉下车？”

他向西一点头，“还有那么远的路，跟他们挤在一起，你受得了吗？”他说的是实情。

“你去哪儿？”我问。

“乌鲁木齐，比你远一点。”

“你也是兵团的吗？”

“南疆兵团。”

“几师？”

“三师。”

“三师？那你为什么到乌鲁木齐去？”

他低头拎了一下手中的旅行袋："我有一个同学在乌市近郊支边，在煤矿上。井下劳动条件太差，不到一年就得了矽肺。家里给他寄吃的东西，他总是收不到。我回温州探亲，他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把这包东西送到他手上。所以，我一定得去一趟。"

"你是哪年支边的？"

"一九六二年。那时候我刚高中毕业，一转眼四年了。"

"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苏立荣。"他伸出手来。

"韩秀。"我也伸出手。他的手看起来细细长长，手心却又硬又粗，满是老茧。大概是干活儿的老手，我心想。"我要到四十八团五连去。以后还希望多联系。"

"五连？我在七连，周末去毛拉必得经过五连。"他神采飞扬地说。

我掏出地图，他马上画起来，团部、毛拉巴扎、七连竟成钝角三角形，样子好像很近，我也乐了，多一个熟人总是好的。

正说着话，小小的车站来了几个人。一个手拿小旗满脸乌黑的铁路工人搬了道岔之后，站在站台上往东看着。另外两个工人走出来，站在水龙头前边揣着手说话儿。远远地，从夜色中有两个人走过来，在站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一位中年妇女，十分憔悴的模样，在灯光下，她的脸几近绿色，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她身后跟着一个女孩子，穿着短到膝盖的破裤子，光脚穿一双破球鞋，在四九天的寒风中瑟缩着，小腿和脚脖子都红肿着。她低着头，肩上两条辫子像猪尾巴那么细，像草那么干枯。她们走近了一点，怯怯地站住了。那女孩子抬起头来，脸上灰灰的。眉眼好像很端正。她们没有行李，只是悄悄站着。

苏立荣看见她们，低下头去。我想，这个人真有同情心，看到生活贫苦的人就会难过。

正胡想着，一列客车进了站。不错，正是苏立荣说的那列慢车。站台上没有卖吃食的，所以也没有乘客下车，只下来几个列车员，接上水管子，往车上加水，顺便跟站台上的工人闲扯着。

车刚停稳，那两个女人就往站台中央挪了挪，离车门还有段距离，不像要上车的样子。

我和苏立荣往车门走去。迎面，车上下来一个人，四十岁的样子，除了一身蓝之外，还戴一顶蓝制帽，其貌不扬，毫无特色，他向那两个女人走过去。苏立荣也站住了脚。

“您发发善心，把这大姑娘带走吧，今年整十八呀！”那女人说。

“有户口吗？”

“俺都是集体户，这是迁户口证明，公社开的。”中年女人殷勤地点着头，双手捧上一张纸。

“嗯。”男人上下打量着那姑娘，又“嗯”了一声。

“怎么算呢？”

“啥都不用，您带她走，家里少张嘴就救了命了。要是……要是您方便，看着给吧，十斤、五斤都成。”

那男人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夹子，拿出几张全国粮票。

“五十斤。”

“谢谢，谢谢，我们全家给您叩头了。”那女人喜出望外，两手颤抖着，接过粮票。

“走吧！”苏立荣捅捅我。

上车一看，车内多半是乡下装束的老百姓。行李架上都是大小布包袱，找了两个空位子，我们坐了下来。

十三　新西行漫记（上）

在车轮哐当哐当单调的响声中，苏立荣简单扼要地向我解释着途中所遇到的种种“奇事”。听着他的话，我不时在想，自己真是白活了二十年，竟然如此孤陋寡闻。窗外的风景灰黄一片，没什么看头，就只顾听着人声，看着人动。我觉得反正以后的半辈子都在关外过了，看嘉峪关的机会太多了，也就没甚在意。

在七条沟上车的女孩子，已经从那中年人手中接过一堆衣服到洗手间去换上了。蓝咔叽布裤子，蓝底小白花棉袄，外罩一件混纺柳条罩衣，脚上还穿了一双黑布棉鞋。衣服、鞋袜都是全新的，只是太宽大了一点。那中年人笑着：“过十天半月，你吃胖一点儿，衣裳就不大了。”那女孩子红着脸，不断从袖筒里伸出手指头摸着棉袄的边。她大概从生下来就没穿过一件这么样的衣服，更不用说里面三新的全套行头了。

“好好跟我过日子，我不会亏待你的。等咱们到了地方儿，我再去弄点粮票，接济一下你家里人。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哪？”“俺妈、俺大（爹）、跟三个弟弟。”“刚才送你来的是你娘？”“不，是俺婶。俺妈在家，俺大原先在公社石灰厂烧石灰，四年前掉进灰池，烧伤了，瘫在床上……”“石灰工人，没有劳保吗？”“公社合同工，啥都没有。”那中年人脸上充满了同情。缓了缓，又开了口：“年成怎么样？”“您问去年？”“嗯，去年。”“啥

都没长，该做活儿的时候，公社叫开会。就这么的，口粮都分不下，一个劳动日才合几分钱。多数人家到年底还欠队上的。”“你是个好劳力，你家怎舍得？”“俺大弟十七、二弟十六都赚整劳力的工分儿，俺家不缺劳力。”问话的人沉稳、亲切，答话的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有问必答，没有废话。

苏立荣悄悄告诉我：“那女孩子运气真不错。”我好生奇怪，这样的命运还要算不错！他告诉我，这位中年人肯定是劳改新生人员。在新疆，人们简称之为“新生人员”。他们因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刑事”的原因在劳改队服刑，刑满之后，就地就业，就业单位几乎清一色是新生人员。有的服刑前已婚，现在两地分居，或是家属迁来同住。两地分居的每两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时间为三十六天，包括路上所需的半个多月，所以至多在家可住上半个月左右，逾期不归者，处罚甚重，新生人员多不敢以身试“法”。老婆自愿迁来者多数是多年生死与共的患难夫妻，虽然在外人看来，她们在“新生”单位工作，准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本单位她们的政治地位却在管理人员之下，全体新生人员包括她们自己的丈夫之上，别人不能听的中央文件，她们能听，因为她们是“普通群众”。而在新生人员看来，她们为了自己的丈夫肯下地狱吃苦实在是非常人可比，因而对她们敬爱有加，所以在“新生单位”，她们也可过得“乐陶陶”。至于另外的“王老五”们，不管是从未结过婚的，还是服刑之后离婚的，到了这种只有男人和几个已婚妇女的“男人国”，就几乎绝了成家的望。你想嘛，哪个单位会批准女人和劳改犯结婚呢？万般无奈，他们想到了一招妙法：从河南、苏北、安徽、甘肃、四川一带把女性灾民带往新疆，该地地广人稀，该单位欢迎移民，再者新生人员有了家室，更为驯服，所以这条路就这么走出来了。

“四川？别胡说了，那是天府之国，哪儿来灾民？”听了一会儿新“天方夜谭”的我，耐不住了，问了一句。

苏立荣笑了："天府之国？那是几十年前的老话了，现在新疆的'盲流'里，四川人最多。"

看我茫然的样子，他不得不又加解释：灾民没有任何手续，流进新疆，并且落下脚的，叫做"盲流"，盲目流动之意。

"那，那个被人带走的女孩子算什么？"

"算'自动支边'。领导们都希望新生人员在新疆成家立业，不再造反。再说这也是变相移民的一种。"

一听"自动支边"，我一愣。掏出县里证明，还好，上面写的进疆理由是"支边建设"，即支援边疆建设的意思。

苏立荣伸头一看："这个理由和我们一样。我们从城市支边，你是从城市到农村，再支边。我们是集体进疆，你是个人进疆，大同小异，都是移民啦！"

正说着话，一个乘务员挤了过来，他"挤"，不是因为车厢里人多，而是他手里的大包袱太大。他要开他的小门，而我们正坐在旁边，所以他必得要我们"借光"。

"哥儿们，要点儿大葱不？"乘务员油腔滑调。

"怎么？乌市连大葱都没有了？"苏立荣接了腔。

"可不，闹派系，供应差极了，走后门儿都没用。车上套购点儿。来，见面儿分一半儿吧！"他挺客气。

苏立荣拉开包袱看了看，可不，挺新鲜的大葱，足有好几十斤的样子。"您自个儿都拿了吧！"说着，闪开了道。

乘务员笑着开了门，把大葱塞了进去。回身跟他身后的老乡点钱、算账。我们把头转向窗外，只当没看见。这还只是六七年，等到了六九年以后，这种交易就更为公开而且随处可见了。

为了"套套交情"，乘务员告诉我们乌市的行情："商店里是空空如也，

自由市场是要啥有啥，就是贵得邪乎：鸡子儿一块钱三个，白糖三块半一斤，布票儿一块六一米（新疆布票儿论米不论尺，粮票儿论克不论斤，要不，怎么是‘自治区’呢？），粮票儿一块钱五百克。”

看我眼睛睁得挺大，苏立荣又向我解释，三师是按刘少奇指示组建的，计划是一九六五年交农垦部批准的。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三年属于国家投资阶段，盈亏都没关系，有吃，有喝，不必担心。三年后自负盈亏，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不过，三年后，谁又知道怎么样呢？刘少奇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虽然他的计划还在执行中，可他本人已经被打翻在地，而且被踏上千万只脚不知何日才能翻身了。

他又告诉我：在兵团最吃得开的是复员转业军人，大小都是个政治干部。第二是支边青年，在政治上依照文件精神算是“革命青年”。第三是“老职工”，都是早年进疆的，在新疆各地工作了多年，有相当的生产经验，在生产上他们有价值。特别是“屯垦戍边”的初期，他们更是生产的主力。第四是“盲流”，兵团领导看他们是“流氓无产阶级”，有利用价值，如运用不当，也可变成“刺猬”。第五是“新生人员”，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是真正的苦力。第六是披枷戴锁的劳改人员。

“我们师也有劳改队？”

“当然，五连、七连、毛拉、工程一支队这四个点是一个四方形的四个角，工程一支队就有上千劳改犯。”

我不言语了，苏立荣也无话可说，只含糊地搪塞着：“以后，慢慢就都清楚了。”

窗外的景致越来越单调。在内蒙、宁夏那一段，火车跑个三五分钟总可看见人影儿，现在可好，过了兰州，火车跑上半个钟头，连一棵树都不见，荒凉的戈壁滩上除了几棵骆驼刺之外只是一片灰黄。每当车停靠在一个小站，就有一大群孩子们伸出乌黑的手向窗口喊着。白天，晚上，半夜

都是一样。孩子们衣衫褴褛、赤脚或趿着破烂的鞋子，每一张脸都黑如锅底，只有闪着饥火的眼睛在黑的背景上发光。听着他们带着浓厚地方味儿的口音，我们沉默着。有什么可说的呢？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给人们吃饱饭？我和苏立荣默默交换了一下目光。

终于，吐鲁番火车站到了。下车一问，在山西托运的行李已经到了。不轻呢！怎么拿呢？两个箱子提上也罢了，加上行李卷和书，实在没法儿办。再说照刘锦坤和苏立荣在地图上所标明的，从这儿到三师转运站少说也有两公里呢。

正犹豫间，一位中年妇女在旁边怯怯地问："同志，您要搬行李？""是啊。""我给您挑。"我这才注意她手里有一根桑木扁担，磨得光光滑滑。把行李取了出来，她利落地把两只箱子拴在一起，另一头挑上书，扁担颤悠悠就上了路。我把行李卷扛在肩上，大步流星跟她一路走。因为步子迈得大，加上肩上担子重，她的腰扭得特别起劲，大襟小棉袄被扯得一歪一歪的，显得肚子挺大。

"哟，大嫂，您快放下吧，您身子这么重，怎好做这么重的事？"

"嗨，姑娘，我三个小子都是做着活儿就落了地，不打紧哪！"

"您爱人哪？"

"他是铁路工人。我们是一个村的。铁路修过我们那儿的时候，他被招了工。女工不要结了婚的，我没法子招工，户口就还在乡下，孩子户口又随我。这不，一来二去的，眼看有老四了。现在，我们五口都住在站上，商品粮只有一份儿，我在站上打打零工，替人挑挑行李，赚点子钱，买黑市粮吃。反正铁路职工家属跟我们一样儿的有的是，人总得活着呗，您说是吧？"

她一口气说了个清楚，说得稀松平常。我在心里掂了掂，户口，户口，要命的户口。五个人吃一份粮，铁路工人定量高一点，顶到头六十斤吧，

怎么够呢？忽然，灵机一动："大嫂，回头，我给您粮票，您看怎么样？"

"那可好，五斤就成！"

"我给您二十。"

"这可是，给您烧高香了。"扁担颤得更欢了。这位大嫂不仅帮我挑到了转运站，而且等我登记了房子，一直把行李给我挑进了屋，塞到了床底下，这才拍拍手，抹抹汗，笑盈盈地开了腔："我走啦！"

我掏出二十斤粮票，想想又加上五斤，塞到她手里。

"姑娘，在新疆长住啊？"

"长住。"

"下回到吐鲁番，到我那儿串门子，你找乔家的就成。"

"我记着了，吐鲁番火车站乔大嫂，再见了。"

"再见。"

三师转运站是一堆没遮没拦的平房，西房一排十间客房，门口有号码，每间屋摆六张床。北房十间，除了一间办公室之外，其余分别为单身职工宿舍和家属宿舍，也就是转运站全体职工都住在这儿了。东房一小排，是食堂、厨房跟水房。南边只孤零零的两间厕所，面对着红尘滚滚的戈壁滩。

没有大门，各种车辆就从北房跟东房之间的空地上开过来，停在"院"当中。

我到的时候已是傍晚，伙房上面雾气腾腾，大概快开饭了，西房门口堆着一堆人，男男女女，有抱孩子的，有搬行李的，跟普通长途汽车站没大分别。办公室的门开着，人来人往，相当的热闹，墙上刷了一条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墨迹鲜红。除此之外，并无大革命的火药味儿。

院当中停着一辆"解放"牌汽车，车身几乎是红棕色，挡泥板上的土少说也有两三寸厚。这么壮观的车，在北京、山西都是不容易见到的。

当天晚上，向左邻右舍打听路上的情况。据说在转运站等车等上一个礼拜是家常便饭，有人在这儿已经等了十天了。有两位抱孩子的妇女，诉说着身上钱粮不够的窘迫，告诉我："再等下去就要'弹尽粮绝'了。"我问她们是哪天来的，她们说是三天前。别人笑说："早呢，早呢。"

打听了一大转才明白，公共汽车一月都不定有没有一趟，旅客们南下就得搭卡车——运货卡车，转运站乘客过多，打了地铺时才会让一辆卡车载人而不运货——司机旁边可坐一至两人。从吐鲁番到喀什是三十四元车票钱，相当于一个"兵团战士"一月收入强。当然，关系和权势是重要的，如这两者你都没有，那大米、火腿、高级烟、酒也是开后门的便利条件。如果这一切你都没有，那就只好等，等到何时，不得而知。

有人甩了一句："什么时候，南疆通了火车，那就好啦！"

"什么时候？驴年马月！"有人气哼哼地回了一句。

急也没用。而且我急什么？急着去充军？所以安安心心住了下来，决心稳扎稳打。

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大人吵、孩子哭的声音一概充耳不闻。伸手到床下面，从卢兼文寄来的书包里抽出厚厚的一大本。书脊和封面都是白制的，漂亮的美术字大书：《棉花病虫害的防治》。打开一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一乐，非同小可，赶快躺躺舒服，精神抖擞地看起来。

门口一片吵嚷声，兴奋得语无伦次的女人冲到我的床头："来了！来了！"

"什么来了？"

"车！一辆卡车啊！说是去喀什的。"听口气，不知是什么救命菩萨来了呢。我伸了个懒腰，决心起床了。

院子里一阵吵嚷之后，那位驾驶员从伙房出来了，看不清他的眉眼，浑身上下，除了从帽檐下掉出来的一缕头发是黑的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灰

乎乎的一片。好不容易我才看出他的工装是蓝的。

站长走了过去："小王啊，先去洗个澡，睡一觉吧，回头好擦车、装货啊。"

"擦个鬼的车，南疆那路也叫路！全是灰堆，擦也是白擦！"火气挺冲。

"你这车可是去年的'解放'！"

我心里一愣，打量一下那灰头土脸的车，嗬！可真像几十年前的老车，早该弃置不用了。

"去年的车？昨天的车也是一个模样儿！得了，再找俩人来摸一把吧！"

"来！伙房老张算一个！"站长竟也摩拳擦掌起来。

"三缺一……谁会'升级'？打'升级'的。"那小王向着人们喊了一嗓儿，没人动。

"这位北京姑娘，你会玩儿吧？"站长想到了我。

小王看我一眼，也开口问："北京人？没错儿，准会！"

我想，坐着也是坐着。玩儿就玩儿吧。

老张从伙房拿出四个板凳，另一位大师傅扛出一张桌子，我们四个人就在大太阳底下打起扑克牌来。我和站长打对家，小王和老张坐对面。

"瞧着，我和这位北京姑娘非赢你们不结。"站长笑眉笑眼地洗着牌。那副牌跟油耗子似的，脏得可以。

"没门儿！老张是有名儿的老狐狸，不赢得你们吱哇乱叫才怪哩！"小王接了腔，一双眼睛一眨巴，直往桌子上掉灰。

我这才细打量这位"老狐狸"。挺平实的一张胡子脸，小个儿，一双眼睛笑眯眯的，眼光一闪，果真有点子"坏"意。多半是老牌油子，我心里掂量着，不言语，摸起牌来。这牌可有历史了，黏糊糊，黑了边儿，在手里软耷耷的。

一把打完，我跟站长升了级。老张直点头："厉害，厉害，这大城市

的人就是不一样！”洗了牌，发下去，大家又聚精会神战斗起来。旁边还来了几位观战的。不知过了多会儿，牌桌四围已“完全进入情况”，天塌下来也得忙完这一把了。

“算了，还是用这副打吧。”挺清脆的上海腔。我一抬头，嗬！老张背后不知什么时候站出一个人儿来，别说小王会目瞪口呆，连我也一愣。

在这灰不溜丢的一群里，竟站着如此光鲜的一个妙人儿！上身一件一尘不染的深咖啡色呢子外套，里面还露出鹅黄毛衣的小旗袍儿领儿；下面一条黑色毛的确良裤子，裤线笔直，足可用来削萝卜；脚下一双漆皮小靴子，后跟儿竟有一寸多高。小脸儿鸭蛋形，细眉、高鼻梁，头发削成“运动式”——运动员们流行的短发型——乌黑、油亮，在阳光下镶上一圈光环。额前的刘海一荡一荡的，显得一双眼睛水汪汪的，满带着笑意。肩上斜背着一个黑色塑胶皮包，上有“上海”两字，就是人称“海包”的那种。

更要命的是，她手里拿着一个绛紫的塑料盒子，变戏法儿似的那么一开，盒儿里是两副塑料扑克，全新的，每副牌还包着透明的玻璃纸呢。

老张师傅站起身来：“你坐，坐下打吧。”

那姑娘也没让一下，也没说句客气话，拉过凳子就在小王对面坐下来，一双雪白的手，拿出一副牌来，小手指甲一勾，玻璃纸掉了下来，两手把牌一分、一弹、一收，牌像扇面儿一样，交叉着叠在一起，哗啦一弹又一落，刷刷留下底牌，又嗖嗖地把牌发到每人面前。牌带着风声儿静静地停住了，在每人面前只有薄薄的一小堆。

透过一口气，打量一下周围。站长笑着，整理自己的牌，老张站在那姑娘身后，并没露出什么诧异的表情。“姜还是老的辣。”我心想，定了定神。

最糟的是小王，他先把手在衣襟上擦擦，觉得不满意，又在裤子上擦擦。这才拿起牌。一手拉着帽檐儿，压了又压。我想现在若有个神明能生个法子把他那肮脏的模样儿遮住，折十年阳寿他都干。甩出一张牌，他结

结巴巴说了话："这牌真漂亮……"

"王师傅喜欢，就送你。"

"送我？"小王张着嘴。

"两副都送你。"姑娘还是温和地笑着，似乎不以小王的脏样儿为意，还是一口一个"师傅"地叫着，"王师傅留着玩嘛。"老张和站长交换了一下目光，依然笑着。

打了一会儿，转运站几个人眼红地在旁边儿立着。我和站长就站起身来，让他们过过瘾。那姑娘一边儿打牌，一边儿和小王说笑着，很亲热的样子。

离开了牌桌，站起来活动活动。太阳还挂在头顶上，看看办公室的钟竟然是下午六点钟了。听说从前这里一直使用乌鲁木齐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晚四个钟头。可是，"文革"开始后，不知何人指责地区时差是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之一，因此全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这么一来，转运站的工作时间为中午十二点至晚八点，冬天夜长，一天吃两顿饭，下午一点跟晚上九点。用北京时间说，也就是早上九点一顿，下午五点一顿，奇奇怪怪的，不太容易适应。

忽见老张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心想：打了几把牌就算认识了吗？

"韩小姐，我太太请你去喝茶。"天大的奇事，在北京，除了彭伯伯有时候开玩笑，称我"大小姐"之外，还从未听见人这么毕恭毕敬地称呼过我呢。还有，他太太？我更乐了，人们称配偶不管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老者都是称"爱人"，哪儿来的"太太"？

愣了一会儿，还是跟在老张背后走了。他住在北房最东边儿的一间，门口和别家一样，灰蓝的门，门上有四块玻璃，油漆干裂了，挺不起眼儿的。

门一开，是一条棉门帘子，蓝底白花的家织布，干干净净。一掀开，嗬，满屋雪白，飘着轻轻的音乐声，屋里没人，窗明几净，一张单人床靠着北

墙，墙上挂着布床围子，也是蓝底白花。床头小桌上摆着一架袖珍“熊猫”牌收音机。里屋门上挂着白布门帘，绣着几朵蓝色的小花朵儿。

我和老张刚立定，里屋门帘一挑，走出一个人来，头上梳的是齐耳短发，身上穿的是阴丹士林小棉袄，裁剪极为合身，身段还相当苗条。脸是胖胖的圆乎脸儿。说她三十岁吧，皮肤不会那么松；说她五十岁吧，又不会那么细，那么白。眉毛都拔光了，是画上去的。微微一笑，口形像一弯新月。她一手提壶，一手拿着两个茶碗，放下手里的东西，回身把门帘挂在钩子上，又走过来，她的脚是“解放脚”，从前裹过的。

“坐，韩小姐。”她拉开饭桌旁的圆凳，先坐了下来。我看看桌儿上的两个茶碗，没说什么，也坐了下来。

“云山不喝茶，他不是喝水，就是喝酒。”这时我才知道老张的官名儿原来叫云山。他果然从柜顶儿上的水瓶里倒了一大杯白开水，坐在桌边儿也喝了起来。

“我姓李，这些年了，亏得云山，我还能活着，还能过这手不提篮、肩不担挑儿的日子。”她转头看一眼老张，笑着。老张还是老样子，笑眯着眼儿，不置可否地喝他的白开水。

我好生纳闷，这两人太不匹配了，一个是货真价实的伙夫，一个却是不知什么来路，衣着讲究、谈吐文雅的太太。

“没什么消遣，我爱下棋。在这里很难找到棋友。我们有缘，你来了。想必你是会下棋的，所以，请你来喝杯茶，下下棋。”

乔我还愣着，那女人笑了，笑得非常温柔。“你看着奇怪，是不是？我是李立三的妹妹。”我的天！三四十年前被清洗的李立三！那是党史课上的一段，是历史上的陈迹。而在这儿，在戈壁滩上的一个兵团转运站里，在一位老伙夫的家里，竟安坐着一位历史上的人物，一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古董，李立三的亲妹妹！

“云山家世代清贫，从小跟着部队当了红小鬼，要不是他跟我结了婚，我早和李家的人们一样，没有命了。跟你说清楚了，你才能静下心来。下棋，顶要心静了，是不是？”她和颜悦色的，边说边引我进了里屋。

屋里双人床边摆了一张小方桌，上面端端正正放着一个围棋盘。棋盘旁边小碟儿里几块点心发出诱人的香味儿。她在床上坐下，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把小碟儿往我跟前推了推：“吃点吧，一天两餐，钟点又不对，你大概早饿了。”她善解人意地笑着。看我谢了她，把点心送进嘴里，她喝了一口茶，笑着说：“说起来，大城市好人家的女孩子来这种荒凉的地方，实在说不过去，实在是不该来的。”她停了一下，话锋一转：“不过呢，新疆可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儿，以后的日子长了，你也就知道了。”她笑着，下了一子。

围棋是外祖父的拿手好戏，外婆的棋艺也不软。我是从小儿熏的，所以也抓起子，用心下起来。棋子儿是大理石的，滑滑的，凉冰冰的，棋子罐是紫檀木的老东西。我静下来了。

“云山，今晚我留姑娘在家吃饭，别让人来搅和。”

“是了。”老张在外边答应了一声，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已经完全掉在棋局里了，对手沉稳、大胆，棋路严谨，跟她下棋真可以学不少东西呢。

正下得有劲儿，门外有了响动。

“谁呀？”她下了地，往外间走去。

“李姨，是我，借我熨斗使使。”小王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借熨斗干什么？有什么我给你烫烫就是了。”

“不麻烦您，就烫条裤线，十分钟就给您送回来。”

我伸头儿一看，嗬！小王一身簇新，干干净净，大概刚洗完澡，脸上红扑扑的，头发梢还在滴水珠儿呢，一进屋，带进来一股香胰子味儿。

李姨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火熨斗——我们北京人管那东西叫“烙铁”——递给小王：“叫云山给你烧，他烧惯了，温度合适。”

“嗳。”小王接过烙铁，一溜烟儿地往外走。

过了一会儿，果然小王回来还熨斗，裤子上两条裤线也是笔直的了，虽不能削萝卜，给学生们当尺用还是满不错的。

李姨看了我一眼，沉吟了一下，“今晚在我这里吃饭吧。”

“不了，谢您。”小王抹了一下本已油光水滑的小分头，“我先得给那位上海姑娘拉行李，然后上货场装货。明天早上启程返回喀什。”

“噢！这么快！”李姨笑着，“那姑娘买了车票啦？”

“我跟会计说了，这次放空，不让她买票了，省得人家说话，说她不知先来后到的。”小王回话儿时，有点儿腼腆。

李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顽皮的笑意，送出门去。我也跟出去看看。嘿，这可真有点儿意思了。早上，小王那辆他死也不肯擦的车子，现在竟纤尘不染地在大太阳下放着光！小王跑到车跟前，嫌车镜不够亮，还从驾驶室里拿出一块白毛巾又细擦了一下儿。那位上海姑娘已然端坐在驾驶室里，还在温和地笑着。

“李姨，她可真有办法啊！”

“什么办法？”李姨不大以为然地回了一句，“不过呢，这也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她又补上一句。

晚饭之后，小王开车回来了，卡车车厢前边堆满了大小旅行袋，五颜六色，用粗绳索绑得结结实实。旅行袋后面才是三师的物资，一箱一箱堆放着。

明摆着，这上海姑娘是刚到的，可是明儿一早就走。那些婶子、大娘们虽气却说不出话来：要是小王“对上象”呢，谁愿意拆台！

第二天，天蒙蒙亮，睡不着了，我爬起来出去打洗脸水。小王正趴在

车下检修。吃了早饭，那姑娘又端坐在驾驶室，脸上依然是大家熟悉的温和的笑。小王给水箱加足了水，忙上忙下，一切就绪，喜滋滋地跳进驾驶室，向大家挥手道别，开始发动车子。正在这时候儿，伙房旁边的通道上走来一个上海青年，衣着整齐，也背着一个大“海包”，拉开车门就要上去。

小王急了：“你是干吗的？”

“我是她朋友，我们的行李都在你车上。”——听“朋友”二字，大家倒吸一口凉气。谁都知道，现今在大陆，农村青年说的“对象”和城市青年说的“朋友”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未婚夫妻的意思，和“同事”、“同学”、“邻居”、“熟人”、“亲戚”等大不相同。

小王盯着那姑娘。只见她点点头，一脸的天真无邪：“是啊，他是我朋友，我们带这么多东西，就是为了回三师结婚的。”

这会儿的小王还说什么呢？总不能姑娘是单身就拉，姑娘有了未婚夫就不拉呀，只好闭上嘴，发动车子，准备走。

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的站长拧起了眉毛：“下来，你们买票了吗？”

那姑娘居然从小王胸前探出头去，笑着说：“王师傅说不必买了。”站长说：“小王是驾驶员，他说不买不行，下来买票！从这个转运站开出去的车，各个儿都买票，你们凭什么不买？六十八块！一个子儿也不准少！”

看着这一幕，我真想山西的老乡，老乡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种鬼花样儿。

老张夫妇走了过来。

“总算还好，买了票。”我说。

老张却说：“昨天到，今天走，还是上算，这些个滑头！”

我心里也有点儿上愁：有关系的开后门儿，有“本事”的连骗带蒙。像我这样儿的，得等到何年何月呢？

“韩姑娘别愁，明后天云山的小老乡魏师傅就来了。这人忠诚可靠，让他带上你！”李姨开了腔。

十四　新西行漫记（下）

正如老张头儿和李姨说的，魏师傅是个顾家的人。清早到了大河沿转运站，马不停蹄，洗车、装货，吃了晚饭就要往回返。车上带着李姨他们早为他预备好的各种产妇、婴儿食品。当然我也顺利地买了票，坐进了驾驶室。脚下一个大竹篮，里头有三百个鸡蛋。魏师傅抱歉地笑笑："实在没法子，鸡蛋放在车厢里，到不了三师就全成鸡蛋汤了。"我说："没关系，离我的腿还远着呢。""车开起来就不远了。"魏师傅边说边把一个小棉褥子放在篮子上。"等会儿，车开起来，省得硌得慌。"

车快开了，老张头又蹭过来："多带上一瓶酒，一条儿烟。五连王连长是个好人。"

看我傻乎乎的。"'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别那么傻。"他千叮咛，万嘱咐。我连声不迭地谢了他，又向站在门口的李姨和站长他们挥了手，卡车就卷起一股黄尘离开了吐鲁番。

夕阳西下，血红的太阳挂在远处的山坳里，蓝天上连一丝云彩也没有。砂石被烘烤了一天，现在却在迅速地冷却，空气也是那么干，那么冷。车开了好一会儿，借着发动机的热量，我才逐渐地暖和起来。一路上，魏师傅耐心地向我作着各种有关旅途须知之类的说明，其中包括各种路面。于是我知道了目前车子正行驶在最坏路面之一的"搓板路"上，不仅颠动频

繁，而且极费轮胎什么的。这时，我才忽然注意到，这车里外均是天蓝色，跟“解放”牌的草绿色并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什么车？是哪儿造的？”

“道吉，跟你生在一个地方！”

美国车，我心里一惊，一九六七年，美国车跑在新疆的土路上，不是笑话吗？

“这是四三年出厂的车，美国支援老蒋的，老蒋给了盛世才。现如今，在新疆跑着的车里，还数这老道吉最过硬。跑在这全世界倒数第一的石子铺就的路面上，新的解放跑上半年就没牙了。道吉没事儿，跑得挺欢。别看车老，离退休还早呢！”

魏师傅转动着方向盘，笑眯眯的，挺有感情地数叨着“道吉”的种种好处。

天渐渐暗了，深蓝的天空和灰暗的戈壁组成画面的两个部分，转来转去，各种角度，还是只有这两个部分，没有一只鸟、一间屋、一棵树来改变一下画面的内容。魏师傅依然谈笑风生，我知道他正在拼命驱赶睡意，我也就强睁着眼皮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腿下的篮子随车跳动着。我已经知道用腿抵住篮子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除此之外，我还得拼命忍住牙齿磕碰的声音，冷，真冷。

魏师傅赞赏地看我一眼：“看样子，你赶明儿和这车一个样儿，经得起戈壁滩上的磨练。”我没回答什么，心想十几年的边地生活磨皱了他的脸，还没磨皱那一口挺顺溜儿的北京话，人都说乡音顶中听，他却偏爱京片子，怪！我笑笑，没说什么，只觉得已然横下的心也跟路上的石头子儿一样，冻住了。大概，车轮子辗上去也不觉着疼了。

车停在托克逊兵团转运站大院儿里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车窗外一片漆黑，我实在看不清楚这里和野外有任何不同。

没有灯，只是魏师傅推开一扇门之后，从里面透出来的一缕昏黄的煤油灯光，让我看清了脚下的石头台阶和魏师傅身后吱嘎作响的木头门。

提着随身的小包，进了屋。煤油灯下，只照见一个脸色黄黄的孩子，蜷在母亲怀里吃奶。木桌上一只手拿着一支圆珠笔，大概是那母亲的手。

“南疆除了喀什、阿克苏，都没电，有线广播靠的是拖拉机发电。沿途都一样。”魏师傅的话音里满是歉意。

“老魏，这么晚才到？”那女人话音软得要命，可是极响亮。

“赶一赶，想四天到色力布亚。”

“正翻浆呢，你做梦去吧。”

“试试。”

“啥急事儿？想老婆了？”

“她快生了。”

“好人哪好人，我那死鬼有你的一半，我活着就不那么冤了。”那女人边说边开票。

“你还冤，住在托克逊，离大河沿这么近，我那口子可好，喀什好容易住惯了，三师组建，搬到色力布亚，要啥没啥，又赶上这么个日子口。”老魏竟拉开了话匣子，而且跟那女人没一点分别，软得可以！

“唉！”那女人长叹一声，“带几个人哪？”

“一个，女的。”

“嗯，她住十六号。”

那是一张两毛钱的票。我跟头趔趄地跟着魏师傅左弯右拐，到了十六号门口。开门一看，黑不溜秋的，深不见底，里边最少有十张床。在这间房屋和隔壁之间的墙上开着个一尺见方的洞。洞里有一盏油灯。高灯下亮，两室共用一灯。门后有一大铁炉，伸手摸摸烟筒，还有一丝暖气，不知煤已烧尽还是根本没着，我不想深究了。

“今儿晚上，大概就你一个，门要闩紧，这种地方，什么人都有。”魏师傅叮咛了我，转身出去，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关上了。

摸索着，门上有条粗大的铁链子，闩好。再一细看，门后边还有一根两米多长的顶门杠，搬过来，再把门顶严。好静呀，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了，耳朵还不适应这寂静。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浑身的骨头快要散掉了。小腿肚子疼得要命，大概是竹篮子碰的，我伸手拿下油灯，想看看腿上是不是碰青了。

哇呀一声，隔壁有人喊起来，声音大得像炸雷。随着叫声，小洞那边出现了一个毛茸茸的头。我手颤腿软，慌不赢地把油灯放回原处。头不见了，声音也消失了。

紧按着狂跳的心口，我坐了下来，只脱了一件棉大衣就拉开被子，连鞋带袜子地钻了进去，闭上眼睛。

枕着石块样的枕头，盖着铁板似的被子，躺在半天睡不热的木板床上，我不由得想起山西秀英家的热炕头儿，眼泪不由人地滚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油灯里没油了，灯花跳了两下，熄了。我揪着心，隔壁竟无声无息。我在被子上蹭了蹭手心里的冷汗。四下里静极了，偶尔，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几声狗叫，迷迷糊糊的，我睡着了。

忽然之间，一声爆响，门被什么人摇得好像要倒下来，铁链在门上撞击着，发出铮铮的怪声。门外，什么人在大声叫喊，叫的是什么，我却一句没懂。惊恐地翻身爬起来，抓住棉大衣呆坐着。没等我反应过来，隔壁出声了，声音比门外还大，惊天动地的。同样地，也不知此人叫了些什么。约莫十多分钟以后，一切复归于平静。

我再也无法入睡，头脑里空空如也，两眼直瞪着天花板，等天明。

天亮了，这才看清这是一间窑洞。而且幸亏昨晚光线不足，要不然这么腻黑的被子，我大概还躺不下去。披衣“起床”，搓搓两只冰冷的手，

取下门杠、铁链，迈步出门。院当中，魏师傅正点着了喷枪，烤发动机呢。院子四边栽着盅口粗细的大叶儿杨，昨晚上七拐八绕的正是给杨树灌水的小水沟。

一步跳了过去。魏师傅笑着："睡得还好吧？洗脸，水热了。"

我揉揉眼睛。小水桶上雾气腾腾，是热水！毛巾沾湿了，敷在脸上，每一丝气都钻进了毛孔。好一会儿没动，眼泪在毛巾的遮掩下痛痛快快地流着。

魏师傅好像看出了什么，沉默着，摆弄他的车。

"上车吧！咱们早点儿走，翻过干沟，出了天山，在库米什吃中饭。"临了，他招呼我。

我跳上车，决心把窘迫丢在托克逊，从此要做个万苦不辞的"老新疆"。

总算没白下决心，峭壁林立，寸寸险路，名副其实的干沟，饭菜难以下咽的沿途兵站都没让我露出难色。

车到策大雅，开始翻浆的公路变成了长条的月饼，皮儿硬，馅儿软，这是封冻三个月的路面开始解冻了，南疆地下水位极高，化冻也是由下而上。车轮从路面上滚过，路面成了波浪形，四个车轮不能保持同一个平面。魏师傅尽量快开，车子颠得更厉害，我的头被车棚撞得生疼。颠得太狠了，连魏师傅都忍不住赞了一句："这路，你能不晕车，就算好样儿的了。"

强咽下涌上来的酸水，我笑着。大概笑得难看极了。

直到阿克苏，出现了柏油路面，我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再是个要人照顾的旅客，也会跑前、跑后，提个水，买个饭，做个小助手了。

一出阿克苏，魏师傅就告诉我："真正的大戈壁，现在才开始，三百公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果然，除了骆驼刺、红柳，就是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公路蜿蜒其中。

前后的卡车活像小甲虫伏在一张巨大的荷叶上，小得看不见。蓝天，黄砂，一望无际。我唱起歌儿来了，一首接一首，整整吼了一路。魏师傅十分满意。

穿过日日狂风走砂的大风口三岔口，魏师傅告诉我，他只能把我“丢”在毛拉三师转运站，“你们团还在原始森林里呢，到了转运站，再想法子吧。”

从三岔口到巴楚到毛拉，那“路”实在不算路了，有石子铺成的，灰土堆成的，甚而有灰土之上铺了红柳的，车子好像跌进了一个大砂袋，我的棉大衣早已从蓝色变成了灰黄。头发、眼眉也都成了灰的。

终于在离开了大河沿四天之后的傍晚，我站在了毛拉转运站的门口，远处，密林上空有一个小小的红点，那儿就是五连，是我在新疆生活九年的起点和终点。

初到新疆，我的运气不能说很坏。在毛拉转运站，刚卸下行李，向魏师傅道了再见，就见到了五连的王连长。他慈眉善目，头发已经灰白了，浑身灰土，风纪扣却扣得挺严，一身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棉衣罩衣挺合身的。总之，他是一位让人一看就觉得信得过的好老头。

“王连长，大河沿的李姨跟老张师傅让我问候您。”我一边向他递过我的证件，一边喜滋滋地告诉他。

老连长掏出老花眼镜仔仔细细看了证件，又郑重地还给我，从眼镜上面仔细瞧瞧我，笑了：“收好喽，你得凭它上户口，凭它吃饭哩。”向转运站的人告了别，王连长帮我把行李放在架子车上，车上已经有两个大布包袱。

“今天叫来拉棉衣，拢共没有三十件，我就自己跑一趟。”

“加上我的行李也就不轻了，我驾辕。”

“你会吗？别使坏了身子骨！”

“会，在山西练了三年了。”

“山西那路可比这儿好走。”他朝密林深处一努嘴。

“你说得对，那路平展展的，柏油路。您上了年纪，甭管什么路，都不兴您拉了，我说的，占理儿吧？”

一老一小，小的驾辕，老的拉旁套，趟着没膝的灰土，边聊边走，消失在灰不溜秋的野生梧桐林里。

走了将近两个钟头，眼面前出现了一片空地。中间用十几根大树干捆成一个高有二三十米的大架子，顶儿上飘着面红旗，在毛拉瞧见的那个红点儿就是它。空地上有个露天厨房，大灶底下烈火熊熊，七八层的大笼屉顶儿上雾气腾腾。周遭不少人在忙着。空地上，担水的，背草的，和泥的，人挺多。个个身穿草绿色棉袄，不细看，分不清男女。

“宿舍在哪儿呢？”我只见参天的大树和满地枯叶，看不见半幢房子。

“往地下看。”王连长指着不远处的地面。

这，我才看清了，隔不远就有土台阶可以走下去。地面上，隔不远就有个两尺来高的小烟筒，还冒着烟呢。隔不远，还看见一块块一尺见方的塑料纸。

“那是窗户，天窗！”王连长告诉我。

一直到走进了“女宿舍”，我才明白：这种房子是在地上挖坑而成的。挖了两米深的坑，在坑的四角用木柱支好，木柱顶端也有梁和檩子，顺着檩子排上红柳，再铺上半尺厚的野生芦苇，糊上泥巴，就是屋顶。为了采光，开个天窗。没有玻璃，糊张塑料纸。门用板子、木条拼成，门口有土台阶。一般的“全地窝子”和地面相平，土台阶有十几级。新疆地下水位高，“全地窝子”逐渐变成了“半地窝子”，房顶高出地面一米左右。等到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三师地区的团场里才出现“一坯到顶”的草房子，完全上升到地面之上。那都是后话了。一九六七年，我们都住在“全地窝子”里，那真正是“兵团战士”因陋就简的一大发明，绝对符合“多、快、好、省”的经济原则。

宿舍里暖洋洋的，房间中央有一土坯的小灶，周围几张红柳编成的“床”上床单、被褥挺齐全的；无一例外，都蒙着塑料布。室内无人，王连长提着我的铺盖卷儿，放到了火墙背后的空床上。灶里的热气在火墙里缓缓流动，从烟筒出去的只是一缕轻烟。

“刘锦坤去喀什学习了，你先住她的地方。等她回来，新地窝子又盖好不少了。”

“地窝子，多久可以盖一个？”

“一天。砌火墙、炉灶一天。两天吧。”

看看屋里没人，我打开包包：“老连长，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看着我手里的烟酒，老连长的脸色阴沉起来。

“小韩，咱们走了一路……实话告诉你，我这个连长没啥当头了。兵团战士都穿草绿的，今天咱们拉回来的棉袄可都是蓝的。为啥呢？就是要区别对待嘛！听说要传达中央文件了，国民党起义人员和北京青年都得穿蓝的。”

看着我不解的目光，老连长低声说：“我从前在盛世才手下干。新疆换了主儿，我们也糊里糊涂整了编，换了个帽徽。运动说话就进入高潮了，我们这号和北京青年是第一批。”

“北京青年？他们怎么了？”

“你屋的袁琳是个好姑娘，慢慢地，你就全知道了。现在，我带你去见刘水舟，他是部队复员的，现在是连队政治指导员，大拿。这点烟酒正合适。”说完，他急匆匆就往外迈步，生怕晚了似的。

这一来，我得重新考虑一切了。对王连长这么个人跟在普南对王县长似的，可以不绕山不绕水的直说。眼下要办的事儿不知深浅，必得心中有底才行。

短短五分钟的路上，我的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各种有关出身、政治面

目、社会背景的“学术”名词，努力在不完全失真的情况下，轻描淡写地讲清楚进疆的目的，最后我终于想到了一句话来安定自己的情绪——“作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我知道，我已进入最佳竞技状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再一次提醒自己。开玩笑！今后的半辈子要靠这场对话拍板呢！

连队办公室也是一个全地窝子，门大开着，传出一阵笑语喧哗。

“指导员，侬勿要这种恶形恶状好勿啦？里厢勿得好烟。侬勿要进去翻，好勿啦？”一个满带笑意的女声说着脆生生的上海话。

“小左，连队小卖部售货员，也住你们宿舍。”王连长告诉我。

“你一准把好烟藏起来了。我有耳报神，一共有两条好烟。”一个河南腔，也是连说带笑的。

“全连都晓得，一塌刮子两条好烟，都白了侬，我哪能好做人呢？侬勿怕大字报，我怕咯。”

“大字报，乱弹琴！”

王连长大步走了进去。我也一头跟进去。

“指导员，这是新来的韩秀同志，我刚才没找到您，就让她把行李放在女宿舍刘锦坤床上了。”

“中！”刘水舟把手里的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脚踩了踩，就站在那儿，说起话来。他中等身材，一身半旧的黄军装，四个兜，风纪扣大大咧咧地敞着。从领子上的白印我看得出他当连级干部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

“你们谈，我去伙房看看。”王连长转身要走。

“你去伙房，正好告诉他们，毛拉转运站来电话，叫他们明天去拉肉呢。转运站把肉分好了。”王连长点着头，迈步出了门。

“从哪儿来呀？”刘水舟一扶桌沿，坐了上去，原来他身后有张白木写字台。

“山西。”我一边回答，一边把证明递给他。

“不像嘛，城里人扎上羊肚儿手巾也脱不了城市里的味道。”他没看证件，接过去，捏在手里，眯着眼睛看我，脸上还漾着笑意。他不到三十岁。我下了断语。

“在北京，高中毕业上山下乡的。”我递上了毕业证书和“优良奖状”证书。

看着这两张硬翘翘、盖着北大附中大钢印的纸片儿，他眉毛眼睛全笑了，脸上只剩下了横纹，没有了竖道儿。

“小左，去伙房给小韩领饭票，下月开支扣，告诉他们，我刘水舟说的。”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身边跑过来一个人，我只看清了她娇小的背影和乌黑的两条小短辫。

“家里没啥地、富、反、坏、右的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拿出一支，烟皱皱巴巴的，而且已经弯了。不知哪儿来的机灵劲儿，我掏出口袋里的半包“机动烟”，是快到毛拉的时候，魏师傅塞到我兜里的。抽出一支送到刘水舟手上，又打着了打火机——那是苏立荣教我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时给我的——给他点着了烟。这才开口。

“没有，我家人口简单。我外婆是家庭妇女，我妈是职员，在北京上班。”

“你父亲呢？”喷着烟雾，他还是问了。

“他是美国人，没来过新中国。”

“美国人？”他把烟拿下来了。

“不错，我两岁跟我妈回来了，是总理请她回来的。”

“周总理？”

“不错。我妈回来以后就在总理指定的单位工作至今，我是学生，出了校门就下乡了。而且我妈跟我父亲什么联络也没有，一晃也快二十年了。”这是我最重的一张牌，甩得急，而且收不回来了，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应变

的战术。

“那你妈，历次运动没事儿？”他狐疑地问。

“没有，她跟得怪紧，爱国不分先后嘛。”我笑哈哈地。

“这话不错，那你下乡之后，尽干什么了？”他也笑模笑样。

我又交给他一堆硬纸片儿：“上山下乡先进典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优秀乡村女教师”、“红色广播员”。甚至还有一张“学王杰标兵”，我都忘了是我干了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好事得了那么一张纸。

“中！中！”他乐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快来了，我们需要笔杆子、话筒子、大刷子！”

“大刷子？”我有点糊涂。

“刷大标语、大字报少不得大刷子！”他的手一挥，像是手里正有一把大刷子。

乘他笑得高兴，我把小书包递上，顺便把兜里的半包烟和打火机也塞了进去。我注意到，刘水舟的眼睛盯着我每一个小动作。

“不中！不中！”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手推得并不用力。

我把书包往他怀里一送：“得了吧，指导员，大姑娘房里又是烟，又是酒，不怕人家笑话？指导员，您行行好，赶紧拿走吧，别害人了。”这一说倒不是他该谢我，而是我在求他了。

“中，言归正传，你在山西干得好好的，来这荒滩野地干啥？”问话时，他脸上已明显地表现出自己人的态度。

于是我有鼻子有眼儿地告诉他大批知青涌到山西，晋南虽是个富裕地方，可是人多地少，时间长了终不是个办法。新疆虽苦点儿，可是地广人稀，机会多。再加上刘锦坤的姐夫是我的同事，借这么个拐弯关系，就请调了。

“中，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嘛！我们复员还不回家种地！来新疆，保

留了军籍，照拿工资……”他说得走了嘴，竟“胡抡”起来，甚至连在部队不能带家属，现在可以也说了出来。“我想，指导员的考虑一定是以革命事业为重，所以才作了这个来新疆屯垦戍边的选择。”我含笑提醒他。

他脸上只剩下轻松的笑意：“小知识分子，有两把刷子哩！”

他从一堆硬纸片底下抽出我的县委证明：“支边建设，理由充分。”他又一扬那堆硬纸片儿：“高中毕业，历史清白。出身不由己，选择在个人嘛。明天我就上团政治处给你办手续，跟上海、温州、武汉支边青年一样待遇，每月三十一块八毛。其实，你有点儿冤，好些上海青年还是半文盲哩。”他说完，闭上眼睛，眼角、嘴角同时向下一垂。顿时，一个好主意来了。

“广播站的朱小眉有男女关系问题，作风不正。现在刘锦坤不在，她一个人搞广播，很不合适，很有问题。从明天开始，你早、午、晚在广播室。上午抽一个到一个半钟头帮妇女班刮树皮、盖房子，下午来连部做点事。以工代干！”他又一挥手，最终扣了一板。于是，我的生活就基本定型了。

就这么，凭着连队指导员的一句话，我有了和上海等地去的支边青年一样的政治待遇，有资格花十块二毛钱“领”一件“鸡屎绿”的黄棉袄，开始了“以工代干”，半白领儿、半蓝领儿的生活。

晚上，躺在火墙背后的红柳床上，听着袁琳给我讲述北京青年的苦难历程，心里暗暗感激在大河沿转运站所得到的那一番教育，不是李姨和老张头如此这般地点醒了我，我哪里了解，除了硬碰硬之外，世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之一句话，我目前的处境是，政治上大大高于北京青年，经济上大大高于“盲流”。在政治台风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刻，我基本上找到了个站脚的地方，剩下的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再小心地向前探路了。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在漆黑的暗夜中，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入睡的。

多年来，我对当年的想法从未追悔过，直到一九八二年，在台北，我

看到了一颗颗赤子之心，我看到了那些敢怒、敢笑，大胆追求真理，在荆棘丛生的路上，毫不动摇的一代文学巨匠们。我的手心出汗了，我忽然意识到多年前曾自然地做过、想过的一切是一种怎样的腐蚀。然而，幸运如我者，又有几许人呢？

十五　刘马蒲的由来及其他

我和很多人的关系都经过反复，经过曲折，经过千百次的磨难。只有一个例外，我和朱小眉的交情是在接触的第一秒钟，在无言中确定下来的，而且在后来的九年中并没有任何更改。

三九天，朱小眉身穿蓝底白花、裁剪合身的中式小棉袄，细腰长腿，两条长辫子一直垂到腰际，亭亭玉立地站在扩音器前面摆弄着什么。如果说雪莲是冰山上的奇葩，朱小眉可真是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了，白生生的皮肤，弯弯的柳眉，清澈见底的两潭秋水。端正的高鼻梁下面，精致的小嘴还是鲜红的。真怪，戈壁滩上的风霜雨雪竟还没改变它的颜色。至少，一九六七年二月，我在五连播音室第一次见到朱小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连队中央梧桐树上挂着大喇叭里正播送着长得不能再长的两报一刊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句子不时出现在义正辞严的诵读声中。

刘水舟陪我走进去的时候，连队播音室内的收音机正用淡淡的语声文静地介绍着一首世界名曲的结构。

我们进门，惊动了朱小眉，她侧过身来，向指导员甜甜地笑着。

“又听河南广播电台哩？”刘水舟似笑非笑的。

等朱小眉从刘水舟肩头看过来，接触到我的视线，她的笑僵住了，眼

神儿也变了。

你看过一只将死的鹿的眼神儿吗？那么无助、那么不知如何自救、那么无望的眼神儿。

朱小眉的目光就让我想到了一只将被送进屠场、大睁着双眼的小鹿。

刘水舟简单明确地向她交代了我的工作。她一边点头，一边伸手去关收音机，弯腰的时候，她的辫子滑了下来，挡住了一个键子。

我伸手帮她把辫子放在肩上，顺便按了一下那个键子。等她站直身子，短波早已变成了长波。

我微笑着。

她抬起头，凝视着我，眼光闪闪烁烁，有恐惧，有疑虑，也有一丝感激。

我没理她，以一个内行的眼睛打量着这一堆播音扩音设备，当然没忘了记住收音机上的波长，也没忘了记住当时的时间。从此以后，在极为谨慎的前提下，收听“美国之音”就变成了我“工作”中的一项主课，更练就了一点临危不乱的定力，竟也未出过事。

现在想想，常常觉得不可思议，那个时候二十岁的我竟敢在刘水舟面前神态自若地掩饰了朱小眉的活动。按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碰到一个生人就冒着危险去替她打掩护不能不说是不知死活的蛮干。但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我不但当时蛮干了，而且一直蛮干到底，从不知反悔。

风声越来越紧，来自乌鲁木齐、喀什、石河子的传单满天飞了。朱小眉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每天下班之后就向密林深处走去。全连大人孩子都知道，她去会她的男朋友——在七连工作的一个“盲流”。据说他是“有家有业”的，爱人现在是石河子毛纺厂一个造反派头头。她在若干年前“收容”了这个眉清目秀的“盲流”，帮他安上了户口，建立了粮食关系，安排了工作，甚至下嫁于他。可谁知，他竟与石河子干部招待所的招待员勾勾搭搭，实属十恶不赦！三师组建，她就做了一番安排，

先把朱小眉“下放”，然后又让自己的丈夫“采取革命行动”——支援三师。一来避过了风头，二来亲手提着他的脖领，给他灌一气凉水，让他知道老娘的厉害。反正人事关系在握，等他吃点苦头，知道深浅了，再提回来不迟。但不知是命运作祟还是怎么的，爱人和情敌竟都到了四十八团，而且近在咫尺，三百公尺的梧桐林变成了他们幽会的天然屏障。

朱小眉每次离开播音室总是慌慌张张，失魂落魄。回来时却是悠悠然，嘴里哼着歌，脸上带着幸福的红晕。而那两潭秋水竟也荡起了涟漪，更加深不可测。

到了第三天深夜，结束了播音。我忍不住问她：“你这是何苦呢？而且好景不长了。”

“我爱他！”朱小眉柳眉一挑，这个不言不语的女人居然石破天惊地吐出这么三个字！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她眼光里的怜悯，不由得沉默了。

我目送她步履轻捷地出了门，转身关好所有的设备，向宿舍走去。离着老远，风送来了四川“小耗子”小蒲的笑声，我加快了脚步。

小蒲在妇女班里是最值得羡慕的。我们都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在这边陲野地过生活，她却有亲爹在同一个连队！老蒲是从喀什机修单位来三师“支援建设”的。他不仅自己来了，而且带来了十八岁的女儿。老蒲手可巧了，几根红柳梢子拧一拧就是一个小篮子，放个馒头放个菜的，顶实用哩！他是三班的副班长，整天埋头盖房子，修工具。吃饭的时候总是小蒲去食堂打饭，打了饭就满连队喊叫：“爸爸吃饭啦！”一听喊，老蒲就会从某个正在施工的地窝子里钻出来，拍着身上的土，走去“就餐”。饭后，老蒲卷上一炮莫合烟。小蒲坐在一边不是纳鞋底就是补衣服，小嘴儿不停地把各种见闻告诉爸爸。这一幅父女乐的画面不知羡煞多少人哩。

五连的北京青年会逗闷子，常常高喉咙大嗓子地叫喊：“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顶不上老蒲、小蒲父女俩……”歌声熨平了老蒲一脸的褶

子，歌声中小蒲笑得像朵山茶花。

可不，世上还有比这更甜美的日子吗？北京青年苦中作乐的歌声里饱含了他们连做梦都在思念的亲情。

别人进疆多少还有点个人的原因，支边者家家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北京青年的情况有点复杂。北京由消费城市进步为一个半生产城市之后，失业人数并未减少。此类青年与历次运动中丧失职业的人们成了北京市委的一块心病。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已经敲响，去除这块心病就成了当时北京市委的当务之急。于是安排这十几二十万人“支边建设”。久无职业，一旦有之，虽则远点、穷点，人们还是高高兴兴上了路。车站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的景象还未消失，人们就发现了车头车尾处的武装人员。车到新乡，人们派出代表和武装人员理论，问为什么武装押送支边青年。谁知这些公安干警们竟笑答：“什么支边？你们是遣送进疆。”一不是劳改犯，二不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凭什么武装押送？他们要求火车调头，将他们送回北京，要求北京市委作出合理的解释。

要合理解释的结果是青年们血溅新乡。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新乡反革命事件”。当事者被送进乌鲁木齐附近的煤矿，继之而来的一列列火车上武装干警数量大增，北京青年进疆理由改为“遣送进疆”。

这四个字决定了一二十万北京人十几年以至一生的命运。敢于反抗的几千人则被这四个字送进了禁闭室、劳改队、监狱以及坟场。

在“兵团不干涉地方”的三令五申之下，兵团内部的各种造反组织相继成立了。五连“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在我到达该连的第十天成立的。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走资派”王连长和孙副连长，何况他们也是叛徒（由国民党军队而共产党军队），更何况他们也可能是特务，谁知道呢，穷追猛打就是了。

再就是几个跟“新乡反革命事件”有密切关系的北京青年。他们居然

给在乌市煤矿劳改的“新乡反革命骨干”写信，搞“反革命串连”、“妄想变天”。

还有谁呢？竟是老蒲和几位从机修单位来的能工巧匠！他们何罪之有？原来在他们的家谱中有人是地主或是富农。作为阶级敌人当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理应扫荡的对象。

在五连第一次批判会上，被揪出来示众的就是这样三种人。

造反派又是谁呢？竟是五连党支部领导下的一群“盲流”。其中嗓门最大、主意最多的是三班副班长马洪亮。此人敦敦实实的个子，干起活儿来，生龙活虎，不但手底下活儿漂亮而且声如洪钟，发号施令的时候更有一番精气神儿。他老家河南，现在大概还在老家安居乐业。如今实行了责任制，他那个善于大把捞钱的脑袋瓜子想必是十分活泛的。当年，他可是把妻子儿女抛在水深火热之中，单身匹马去闯新疆的。

他当上了造反派骨干，第一手儿就是把老搭档老蒲抛了出来。老蒲大概做梦也没料到这一招吧？

批判会是突然召开的。连我这个广播员都不知就里，只是在广播“最高指示”的间隙里念了几次“今晚全连集合”的通知。“全连集合”不是什么新鲜事。刘水舟相信“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无事一小会，有事一大会是他确保连队政治工作经常化的具体措施。任何小事到了刘水舟的头脑里自会引申开去，而且上连最高指示，下接连队具体情况，必能口若悬河地发一大通议论，不说到十人九乏是不肯收场的。至于那位耿副指导员却大不一样了，他是永不打瞌睡的老虎。平日搜集各种资料还只能在连队集合上“点名”用用而已，到了“文革”开始之后，各种资料无异于重磅炸弹，不仅能使当事人粉身碎骨，而且可以起到打击一大片的妙用。现如今，他的儿子遭到“打击报复”竟被“害”成残废，他自己已经带着家属解甲归田。屈死在他手下的冤鬼不知会不会

追到他湖北老家去，让他夜夜不得安生。

七点一刻，我念完了最后一遍通知，拿着小板凳，关了播音室的门。嗬，今天的连队中心广场上灯火通明。八盏汽灯一字儿排开，汽灯后面的大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底白字竟像张着獠牙的虎口，让人毛骨悚然。耿副指导员喊着口令，一排、二排、三排、四排，按班排顺序纵队立正站好。妇女班是四排最后一班。我站过去，排在袁琳后面。朱小眉姗姗来迟，站在我后面。

刘水舟拿着小红书站在旁边。看来，今天的全权指挥是耿副指导员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成员除了袖子上的红箍以外，每人手里还有一支步枪。开始，我有点纳闷，后来我想起来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担任着屯垦戍边的光荣战斗任务”。可不是吗？我怎么忘了这句要紧的话呢？听说，这支战斗队今天下午扩大了，新参加的有二三十名上海青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唤群。今天下午，她毅然把自己的名字“陈招娣”改为“陈唤群”。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意思，而且剪了短发头，扎上武装带，满身“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刀山火海也敢上”的英雄气概。

耿副指导员高呼：“唱语录歌！”

于是大家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陈唤群带头呼口号，于是口号声震得地动山摇。“打倒一切反动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消灭一切反动派誓不罢休！”、“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错落有致，把口号喊到这般水平，该也是“文革”一大业绩吧？

“大家坐下！”不知是哪位指挥人一声令下。跟着，四面八方的造反队员们一阵呐喊：“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王树德！”、“揪出反革命小爬虫，钢杆保皇派孙立文！”、“揪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蒲良祁！”、“揪出妄想变天的老富农，地头蛇霍德玉！”、“揪出北京渣子马小六！”……

在目瞪口呆的群众面前，一大串“牛鬼”站到了汽灯下面。这时候，我才看清，王连长他们已经被剃了阴阳头。老连长脸上一道道的血痕证实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他身上早已显示了威力，并没有等到批判会的召开。每个“牛鬼蛇神”胸前挂着轻重不同、大小不一的各式牌子，据说是革命造反派根据他们认罪态度的好坏而决定牌子的轻重的。最重的是孙副连长的，他胸前挂着一扇小石磨，看不出绳索的质地，因为已经深深陷入他的脖子，头和肩膀之间只剩下了血肉模糊的一片。

他们上台来，不是走着来的，而是在马鞭子的呼哨下跪着、爬着、头点着地进来的。在鞭子的驱赶下，这些失去人形的人爬进来，在鞭子的呼哨声中，他们站起来，没等他们站直，每人身后的两名“战斗员”迅速地让他们手臂反手向上，头朝下，折成三十度角。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喷气式”。

台上一片惨呼，台下一片口号，我呆住了。带着风声的皮带扬起来的时候带起了横飞的血肉。我坐不住了，颤抖的手伸向坐着的小板凳，准备站起来走。一只手指纤细、指甲长长的手死命按住了我的手，不准我动。我知道，那是朱小眉的手。我横了她一眼，可是眼睛的余光也看清楚了，身后都是持枪战斗队员，溜号等于自寻死路。我重重地坐稳，不敢再动了。

在叫喊声中，不少人站起来“发言”，控诉这些“牛鬼”们的反革命罪行。忽然，我的血冷了，我听见了小蒲颤抖的声音。

“我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蒲良祁的反革命罪行……一九六〇年，我奶奶死了……他要我记住……我奶奶是饿死的……”

一个口号声："蒲良祁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我们答应不答应？！"

众声呐喊："不答应！"

"马班长要我和……蒲良祁划清界线，我……我跟他说……要他向群众好好交代。他……他说……"

"他说什么？"是马洪亮的大嗓门，"不怕，有革命群众为你撑腰，你不用怕。"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爱护和体贴。

"……他说……兔子尾巴长不了……"小蒲的呜咽声被口号声、皮带抽在人身上的扑扑声，淹没了。

蒲良祁瘦小精干的身躯在几双军用皮靴下面像一个灰土口袋，头脸早已看不出了。

一片混乱中，响起马洪亮底气十足的声音。"无产阶级造反派战友们团结起来，跟蒲良祁之类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口号太长了，群众跟不上，只剩下一片"……到底！"的喊声，也不知"到底"什么。

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钟头之后，陈唤群忽然大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破鞋、社会垃圾朱小眉清除出去！"

"朱小眉，上来陪斗！"

我的心沉落下去，不动了。两只手死死地抓紧了板凳，指甲感到了痛楚，周身的血液才又开始流动。背后一阵风声。朱小眉跪到地上去之前还轻轻碰了我一下。以后我看到的只有背影了，开始她在爬，不一会儿，她那两条大辫子已经分别抓在两个大男人手里了，手一拉，脚一蹬，朱小眉的脸仰了起来，在汽灯下面闪着惨白的光，我闭上眼睛。

从不信神的我，在这个时候，多么希望上天发怒：山崩、海啸、地震、天火一块儿来吧！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要再让我看见这些恶棍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奇迹并没有出现，朱小眉惨白的脸上早

已是鞭痕累累。辫子完全散了，一头乌发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垂在她身上。一个“战斗队员”在叫喊什么，手里扬着一束乌黑的头发。

她没有叫，一声不吭。三月天，她头上却滚动着豆大的汗珠。我觉得我快坐不住了。一阵阵晕眩、一阵阵恶心涌上来，涌上来。

“今天的批判大会是成功的，发人深省的。明天，我们就把证据确凿的历史反革命王树德、孙立文……现行反革命马小六等牛鬼蛇神送往场部基建队批判、改造。其他社会渣滓交本连革命群众监督、改造。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刚刚打响了头一炮，大家要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继续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意识渐渐离我而去的状态中，我听到了刘水舟的总结发言，跟着是雷鸣般的口号声。袁琳抓住我的手，向上举着。我听清了她的话：“别愣着，喊口号呢！你不要命了吗？”

我机械地举手，呼喊着什么，耳边时断时续地传来袁琳压低了的语声：“这才开头，无论如何别发傻。记住了！”

幸亏有她，否则第一天就会引起陈唤群之流的注意，那才不堪设想呢。

老连长、老蒲他们第二天就被粗麻绳串成一串儿，送到了那个鬼也得脱层皮的基建队。

朱小眉不够资格，留了下来，白天干活，晚上挨批、写检查。她已经没权进广播室了，代替她的是那个尖喉咙的陈唤群。

我们的宿舍变得跟坟场一样寂静了。朱小眉一进宿舍就倒在床上，争取每一分钟的休息时间。一天半夜里，她悄悄起床，把残存的乌发剪得像狗啃过一样。陈唤群第二天一早发现了这个不可挽回的事实，暴跳如雷，跑到我们宿舍来骂大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上海话的泼妇骂街竟是如此花哨。得理不让人的北京人袁琳自叹不如。最后陈唤群警告说，如果该宿舍不能制止朱小眉的各种“反革命活动”，全宿舍人将按“同谋犯”处理。

大家冷冷一笑，看着她一跳一跳地走去。可惜了小眉那一头好头发。小眉朝我凄然一笑："头发剪了还会长，头皮受了伤，再不长头发，那才难看！"好小眉，这会儿就算计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老蒲走后，小蒲的笑声早就不见了。她照常上班儿，学习，向"战斗队"作思想汇报，但常常木呆呆的。有人叫一声儿"小蒲！"她才"嗯"的一声回过神儿来。

一天，我问袁琳："小蒲怎么搞的？"

"她是孩子，骗她还不容易？"

我没觉出什么味儿来，而且小蒲自从和老蒲"决裂"之后，在妇女班就没人敢跟她说什么了，看她孤单单的样子真难受，可是怎么办呢？祸从口出，这上古的教训谁敢不牢记心头呢？

过了一两个月，情形大变，小蒲又笑眯眯的了，而且每天和马洪亮出入梧桐林。据说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正在帮助"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呢！

夜，真是好东西！她可以使人在白天自觉不自觉戴上的假面具失去作用。在一个漆黑不见五指的深夜里，我听见了小蒲和袁琳的对话。

"袁大姐，我的月事有两三个月不来了。胃里堵得慌。"

"你为什么不去卫生队看看？"

"我怕。"

"你怕什么？我陪你去。妇女有病还能不看了？"

第二天夜里，袁琳悄悄告诉我：卫生队的大夫们挨批的、下放的，走得差不多了，剩下些卫生员们狗屁不通，居然说小蒲没结婚，接触的又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没有怀孕的可能。月经不调，打"黄体酮"即可。

"这下子，想打也打不下来了。"袁琳叹道。

正值夏收大忙时节。马洪亮忽然收到家人病危的"电报"，名正言顺

地回家探亲了。从此以后，马洪亮从五连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只是一年一度发放布票的时候，听到连队会计一本正经捧着花名册，连叫三声“马洪亮”，无人答腔。在寂静中，人们脸上带着暧昧的笑，从眼角扫扫抱着孩子的小蒲。

而一九六七年夏秋交接的时候，小蒲的大肚子现了形，面对这一真正“伤风败俗”事件，造反派视而不见。小蒲万般无奈跑到基建队去找老蒲。“牛棚”里的老蒲把一肚子的愤怒化作一个耳光，把小蒲打了出去。

又是夜，这些见不得人的事都是在光天化日下做的，但只能在夜里说。只做不说，怕也是几千年文化留下的一种处世方式？！在这个暗夜里，大着肚子、走投无路的小蒲向闻名全疆的“破鞋”朱小眉哭诉着：“他说，他回河南离婚，离了就回来。他没来，他真的不来了吗？”

我没听到回答，只看到朱小眉那已经不再纤细的手指在小蒲背上轻轻地拍着，只看到那两潭秋水闪着温厚的涟漪。小眉啊，小眉，让我说什么好呢？

小蒲怀胎八个月了，连队里的老光棍，大车班的刘洪孟提着一瓶二锅头上了基建队，他已年近五十，比老蒲还大着三两岁呢。

就这么，“刘马蒲”降生在大车班为刘洪孟盖的地窝子里。四川“小耗子”因为儿子降生而情不自禁发出的咯咯的笑声，马上就淹没在刘洪孟斥责“野种”的怒吼声里。

“韩老师，您给孩子起个学名儿吧！”那是几年之后，小蒲给刘洪孟又生了一男一女，“刘马蒲”睁着大眼睛常常到我宿舍来，悄悄坐在旁边，听我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小蒲要求我的。

那孩子的眼睛大概和小蒲小时候差不多，圆圆的，又黑又亮，没有小蒲眼里的混浊，但却有一丝恐惧，一丝受惊小兽的野性在眼里闪耀，为了这个，我常常痛心不已，和小眉一样，我真愿意多给他一点爱，但我们深

知，他必在恨中长大成人。

“你叫他什么？他有个小名儿吧？”我问小蒲。

“他小时候，我叫他‘强强’，老刘不让，就叫‘刘马蒲’，谁让马洪亮……”小蒲含着泪，但是提到马洪亮，她脸上竟有了一点光彩。

“孩子，你叫蒲学强。”我抓住孩子的小手，在他手心里放了一只小铅笔，教他学写自己的名字。强强聪明，一遍又一遍写着。

“老刘要是有什么话说，让他来找我！”我这么告诉小蒲。以后，老刘倒没有什么话说，我却不只一次听见强强告诉人：“我叫蒲学强，韩老师说的。”孩子们只有一个韩老师，当然无力反驳他，也就随他去了。

一九七四年，老蒲的冤枉平了反，一九七六年我离开的时候蒲学强已经跟外公回喀什去了。魏师傅带走了这一老一小。强强在窗口挥着小手：“韩老师再见！”老蒲骨节粗大的手不安地搓着：“难为你，这孩子，真难为你了，韩老师！”

“我也快走了，老班长，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向他们挥着手。

强强走了，“刘马蒲”却留在了五连。我离开的那天，刘家小院里鸡飞狗跳：“× 你娘，你们蒲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刘马蒲’是你的娇儿了？× 你娘的！还念着他，还念着那个野男人！瞧我来收拾你……”

不知为什么，小蒲跟刘洪孟生的那一男一女就没有强强漂亮，眼睛不黑不亮，头发稀稀疏疏，最糟的是都有点先天性软骨，不那么直溜，真是怪事！

十六 “造神运动”中的冤魂

六七年秋，南疆的“大批判”高潮已然形成。无论早、中、晚，批判会依“斗争形势的需要”随时召开。人人自危，个个噤若寒蝉。

虽然是初秋，戈壁滩上依然热得不得了，地上的砂子被骄阳晒得烫手，人们缩在地窝子里，昏昏欲睡。

一阵哨子响，跟着就是“紧急集合，紧急集合”的呼喊声，响成一片，在燥热的空气里碰撞着；听得出来，其中夹着耿副指导员的呵斥和陈唤群的女高音。

忙不迭地提上小板凳，拿上“红宝书”，往操场上跑。

武装民兵刺刀出鞘，插在步枪上，在阳光下亮得晃眼。

人们刚报完人数，坐定，就一片口号声：“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喊完了，个个汗流满面。

“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吴月华押上来！”一声大喝，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这不是一个上海女青年吗？怎么转眼之间由“革命的动力”变成“革命的对象”了？！

干燥的灰尘扬起来，土黄色的一团中，在一阵拖拉、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吴月华跪在了台上。看不见她的脸，只见两条散开的辫子和头顶上都是一块灰、一块黄的土。

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在陈唤群“气愤填膺”的“声讨”声中，人们终于明白：半小时以前，革命“群众”发现吴月华丢弃在厕所的血污的“月经纸”中，竟卷有一张“宝像”！

“革命的同志们，孰可忍，孰不可忍！”陈唤群声声高叫着。从身后武装民兵手里接过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抡起枪托，向“现行反革命”的头上、身上狠命砸去。宣泄着她的“革命义愤”。

之后的发言、批判，虽然激昂，虽然层层上纲上线、惊心动魄，吴月华却一定是听不见了。她倒在血泊中，血从头上、肩上流出来，马上混入灰土中，变成了黑色。

这种“恶攻”的重犯，马上由场部“政法股”干事宣布“判刑八年”，送交劳改队“执行”。

我永远记得把吴月华抛上卡车的那一刹那：在昏迷中被钉上了脚镣、手铐的吴月华被武装民兵抛上车，她的身体重重地碰到了车帮上，发出“咚”的一声巨响，然后才像一捆破布一样倒在车厢板上。民兵们把卡车后挡板推上去，落了锁，在一片冲天的灰尘中卡车离开了五连，径直向工程一支队开去。

工地休息时间，听上海青年闲谈才知道，吴月华中午去厕所的时候，妇女班班长刘作凤“正好”在里边，“出身贫农，阶级立场无比坚定”的她竟从血污中看出异样，伸手检查，居然发现“宝像”竟在其中！于是一手揪着这卷厕纸，一手拎着吴月华，一直押上“公堂”——连队办公室耿副指导员面前。

我从未和吴月华说过话，只是连队点名的时候，听见过这个名字。但是，我忘不了那一片在灰土中迅速变黑的血，从她头上、身上流下来的血。

人们忙着，忙开会，忙写大字报，忙“批判”这个，“斗争”那个。人们忘了吴月华，没有人再提起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子。

一年多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清理巨大的排灌渠道的“大会战”里，五连有幸做了工程一支队的邻居。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犯人戴着镣铐挑土、修渠。他们都被剃了光头，穿灰白色号服。在大渠顶上，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监视着。他们被分配在淤泥最深、渠帮最高、渠底最宽的地段。别的地段上吵吵嚷嚷，说东说西，他们的地段上，只有铁锹入土的嚓嚓之声，只有淤泥被甩出大渠、落在地上的扑扑声。人们沉默着，没有交谈，也没有什么表情。而罩在这一切之上的，则是镣铐发出的一片钝响，以及时时跃入我眼帘的，那些青紫、淤肿、血迹斑斑的手腕脚踝，更有人把铁镣挂在脖子上，腰背弯下去做工，看到的只是弯成弓形的劳作着的人，别的都看不见了。

我的心在发抖。我记起了吴月华，我想试试。

找到一个机会，我问刘水舟：“有没有人去看过吴月华？”

“没听说。判决书寄给她家里了，没反应。”刘水舟说，“一般的来说，犯人家属如果不在新疆，多半不会来，夫妻关系还有例外。”

“她家都有什么人哪？”

“只有母亲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工人。要不是工人，恐怕还不只八年呢。”刘水舟打量着我，“你想去看看？”

“其实这还不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小卖部的小左插了进来。

“这话怎么说？”刘水舟眯起眼睛，手里卷着一支莫合烟，笑着问。

“那个时候‘大批判’升级，就五连没有大案、重案。有人想立功，吴月华这个死鬼撞在枪口上了。”

“她犯案可是有证据的。”刘水舟点着了烟。

“一年多了，该吃的苦也都吃了，她也没在判决书上签字呀！”小左竟说。

“你怎么那么清楚？”

“政法股的人说的。其实，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小左话里有话，丢过来这么一句。

刘水舟瞄了周围一眼，把话题岔了开去。

等要走的时候，忽然又对我说：“定了性的案，翻是翻不成的，你去瞧瞧吧。”

就这么，手里拿着指导员开的通行证，我去了一趟久闻大名、从未实地见过的劳改队。

一进入一支队地界，眼前一亮，这个农场的条田、渠道极其规整，横竖均成直角，水渠上没有一根杂草，刀切过一般。进入看守人员住宅区，一律一砖到顶的小平房，各家门口的小院子溜平，而且配备有漆成白色或绿色的木栅栏，甚是整齐、好看。而且，他们不但有玻璃窗，还有电！家家用电！电线从木头电杆上伸向各家各户！

这一切的一切想必是劳改人员双手所建的。

向人问了路，穿过一片红柳林，才来到关押劳改犯的地方。我本来想，这地方大概用高大的围墙圈起来，墙头再拉上铁丝网。谁知不然，只见四个砖砌的岗楼在平地上立着。未等走近，已有士兵过来询问。

“干什么的？”

“五连的，指导员叫我来看吴月华。”我递过了“通行证”。

“你是她什么人？”明知故问。

“同连队的。”我再重申一遍。

因为不是犯人家属，没有受到更多的盘查。只见一个士兵离开岗楼，向条田里走去。我就站在原地没动。

“没来过这儿吧？”那个盘问我的士兵开了口。

“没有。”

“过来看看吧，犯人都干活儿去了。”

我跟他向岗楼走去，走到跟前才看清，在四个岗楼之间的大正方形，竟是一个深至两人的大坑，中间筑有土墙，将大坑分为十几个部分，没有墙的地方就是“门”，犯人由土台阶走下，进入各“室”。这些“居室”及厕所都是没有房顶的。站在旁边可以看清好几个格子，站在两层的岗楼上，当然是一览无余了。

每个“居室”除了一角用薄薄的草泥墙隔开，挖个小洞，作为厕所外，整个地面上整齐地排列着十几二十条草垫子。草垫上有各种颜色的、堆放整齐的被子，想必是犯人们自己带来的。在约莫一人高处有红柳削成的楔子，安放在土墙上，像个衣钩。看起来是一人一个。

“那是什么？”我指着红柳楔子。

“晚上，犯人把衣服脱下来，挂在上边。查哨的时候，手电一晃，衣裳还在墙上，人是不会跑的。”他很得意。

我想问他，有没有人跑过？想想，还是忍住了没问。

无论冬夏，人睡在露天里，一举一动都在警卫的眼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女犯呢？也住这儿？”

“当然，无论男女，都住在这儿。我们只有一个女犯班十七个人。别的分队还有。”顺着他的眼光，从红柳梢头，依稀可见百米之外的岗楼。

“喏，这就是。”他向右前方一指，我看到了一个格子，里面的情形和别的格子没有丝毫不同。“她们就住那儿。”他说。

“噢，来了。”远远地，吴月华由一个警卫押来了。她还有头发，只是很短，很短。她瘦极了。

“她怎么样？”

“认罪态度不好，没有话，问什么都说没有。怎么问还是没有。反正刑期还长着，呆着吧。”他回答。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看到了走动中的她。她穿着一双显然太大的破球鞋，两脚很快地向前移动着，灰色的裤子非常短，露出的脚腕细得可怕，看不出颜色。灰色的上衣很长，拖到膝盖。胸前有一支队的番号，背上有号码“219”。

她在起伏不平、曲曲弯弯的小路上走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她踉踉跄跄，走得很快。在一片黄的背景下，一个灰色的人形迅速地移动着。

她终于走近，站定了，茫然地望着我。她不认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她的眼睛很大，眉毛稀疏，脸上灰一块、白一块都是土。

“吴月华，刘指导员让我来看看你。”我开了口，声音空洞无力，我真恨自己。

我递给她一包鸡蛋，她没伸手。警卫接了过去：“我交给伙房，煮给她吃。”

我能说什么？住在这种地方，怎么能把鸡蛋弄熟？又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独自享用？下次，下次该想办法带点饼干之类的东西来。我叮嘱自己。

我还问了她几句话，她都没回答，最后，我还是说了句多余的话：“有什么我能替你办的，告诉我。”

她抬起头，眼光越过我的头顶，向我身后又高又远的地方看着。她看什么？看蓝天，白云？希望变成一只鸟腾空飞起？不，不是的。我的话没有带给她任何希望，她知道那只是一句空话。她的眼睛里也没有哀伤和愤怒，没有表情。她的嘴角下垂得很厉害，刀刻一般的纹路使这张二十岁的脸变得非常阴沉。

我要走了。警卫对吴月华说：“会见的时间还有一会儿，你坐坐吧。”

她呼地一下，坐了下去，就坐在一个土堆上。她坐下之后，脸上露出很惬意的表情，两只枯干、骨节粗大的手在腿上拍着。她仰起脸，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享受着“坐”的愉快。

我转身走了。

再过一年多，是小左去的，她说："简直像一捆枯柴。"

再过一年多，是锦坤去的，她说："有没有八十斤重，我怀疑。"

再轮到我，吴月华已经不在。一支队政法股干事交给我一张死亡证明，要我转交指导员，附上连队意见后，由连队寄给她的家人。

吴月华上诉四次，被驳回四次以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在土墙的衣钩上上吊身亡。那已经是一九七三年，离她刑满释放的日子还有两年。

她在土堆上坐下去的形象就像影片定格一样，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从未见你笑过，也没听见过你的声音，但是见过你觉得惬意的一刹那。吴月华。

我知道，你不会沉默的。虽然，一九七四年，上海青年"窝里反"的当儿，人们终于知道了陈唤群嫁祸于你的事实。虽然你的亲哥哥，在陈唤群结婚的日子，搅了婚礼，将新郎、新娘打伤住院；虽然几经折腾之后，一九七七年才为你平了反，从你的档案袋里撤出了"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

但是，你不会闭上眼睛的，你知道为什么，陈唤群她们那么恨你，那么热切地希望你从她们的眼睛里消失而不择手段。

你以"待业"青年的身份，离开上海，来到新疆。你不甘于那点可怜的初中教育，而希望工余时间能看一点书。而陈唤群她们在革命之余却把二三十人的女青年宿舍用报纸隔成小间，在那些小间里和她们的男朋友们搂搂抱抱，发出许多你不爱听的声音。你轻轻地抗议了，说了几句她们不爱听的话。虽然，你尽早地闭上了嘴，但已经太迟，她们让你在这个世界永远地闭上了嘴。

你会宽恕她们吗？这无聊、无知、愚蠢、残忍的一群！你会宽恕那些兴风作浪的刽子手和他们的帮凶吗？

十七　两代人

时间步入七十年代。

我和锦坤、小左都有自知之明，深知“背景”不如人，如果再有非分的“享受”，会遭人非议，而不得“善终”。所以，我们尽一切努力，把自己化作灰扑扑的人群中的一员。只要广播不响，小卖部关着门，我们必然出现在劳作着的人们当中，无论是在拖拉机上，还是挥舞铁锹砍土镘，我们都是一流好手。一天，一天，自然而然地，广播室和小卖部的工作基本上只占用我们的午休和晚上，变成了真正的“义务劳动”。

辛苦，然而平安。在那个年头儿，平安是多少人很难企求到的福境呢。

从六十年代“开荒造田”，四五年过去了。农场所在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露出的只是一块块泛着盐碱的丑陋、贫瘠的“黄”土。那种土，不像黄土高原的土那么黄，而是白乎乎的，非常细，几乎没有任何团粒结构，在那上面长出来的小麦细如韭菜；玉米无论怎样密植，仍是疏疏落落、无精打采。人们充分运用那些一年到头都需要整修的排灌渠道进行春灌、夏灌、秋灌。即使是冬天，也得把空闲着的地块用大水灌透，叫做“洗碱”。然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大自然不肯让步。土地依然那么干，水一退尽，依然是白花花的让人心寒。起风的时候，风把土卷起来，在空中抛撒着，抛撒着，直抛撒得日月无光。大白天，人跟人走对面，碰鼻子还认

不出对面儿是谁。

有的夜晚，月亮周围罩上了一个巨大的风圈。每到这种时候，盲流出身、种了一辈子地、来五连顶替王连长的张大胡子，就会一边用红柳棍儿剔着牙，一边溜达到广播室，在话筒前用浓厚的甘肃口音安排各班各排，第二天到连队附近的瓜田、菜地，拔草，修理小毛渠。他私下管这种活路叫“预备撤退”。

那个时候，连队只留一些地窝子应付急需。多数的农工和他们的家属已经“爬出了”地窝子，搬进了“干打垒”的平房。这种房子只在地基上垒五层红砖，上面则是一色土坯，一直到顶。架上横梁、檩子，再压上红柳枝编成的“拍子”，码上捆扎结实的苇把子，墙上、房顶抹上草泥，一天干透，第二天就可以搬家了。垒土坯的时候把门、窗的框子装好，房子盖得，上了门、窗，就搬家啦。玻璃供应紧张，有不少窗户上还有塑料纸。门，都是木门了；漆，只有一种，咖啡色。

为了盖房，成立了木工班——做门、窗是一大工作。

工艺“全能”的木匠是小波。他来自基建队，领导特别强调，在基建队，他只是“家属”，以示他和“有问题人员”之间的区别。

据说，他的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父亲是桥梁专家，母亲是铁道专家，五七年对“外行领导内行”的现实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被统统打成“右派”。离开南京，辗转押送，一站又一站，最后落到南疆这个团场的基建队。

小波生在大都市，长在戈壁滩。文革开始不久，他就依着“造反有理”的大原则，唱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高调，“造”了父母的“反”，在领导安排下，脱离基建队，来到这个普通连队当木工。他写得一手好字，连队的“大批判”专栏因此增色不少。

小波从不说长道短，人家让他干啥就干啥，从无怨言，只是“嘿嘿”地应承着，笑一笑，埋头做他的事。有时候，一起“刷”壁报。我和锦坤

恭维他的字，说他“家学渊源”，他从不接话，只“嘿嘿”一笑。他不但字好，人也长得周正、斯文。想不到竟是一员造反的勇将。人家是造反来的，我们当然不便对他的家人表示关切，也从不问。

我们那个时候在惊涛骇浪中“锻炼”了几年，自然产生了一种惰性，也钻营起自己的小窝来。

在盖房“搞基本建设”的时候，广播室和小卖部成了紧邻。我们三个——锦坤、小左和我向指导员强调“为了工作方便”，搬进了紧挨广播室的一间“干打垒”。从此，我们远离妇女班、青年班的是是非非。清静了许多。小左只有小学毕业，迷上了我那成箱的书。锦坤玉人儿一个，清静就是好。我呢，还在连队学校兼着课，三个人住，少了许多事，也能让紧张、烦累的身心有空松弛一下。我们三个得其所哉，在那间小屋里快快乐乐地住了一阵子。

春夏之间，一个灰灰黄黄的上午。

这一天，全连出工的人早已依张大胡子头天晚上的安排，分散在连队周围，没到远处去。

四围的天边阴沉沉地埋着一大团、一大团乳黄色的雾，看样子，来者不善。农工们，个个缩头缩脑，在地边上磨洋工，准备一听哨子响，就脚底抹油，开溜！

忽然一阵呼啸，像煞了老天爷在人们头顶上甩了一个响鞭。一阵狂风刮过来，飞砂走石，大粒的砂子抽得人面颊生疼，那细小的，则飞扬起来，充塞了整个空间，太阳一下子变成了大雾中远远的一盏灯。几秒钟以前还在说着话儿的人们，已经看不见周围的人，只能弯下腰，趴在地上，凭着早就计算好的方位，摸回家去。

那一天，我们三个正在宿舍对面的瓜地边上铲草。大风一到，就赶紧面对宿舍的方向，就地卧倒，爬吧，直着爬，总有到家的时候。

看得清的，只有两肘之间，胸前的那一尺见方的一块土地。不到一百公尺的距离，我们足足花了一个钟头，连滚带爬，吃了不少的土之后，才摸到我们的门。三个人倒在门外，喘成了一团。互相看看，认不出眉眼，整个儿人都是一片灰白。

“哎呀！”小左大叫。

我们赶快往她身边挪，生怕她在回来的路上受了什么伤。

“这儿好像有一个人哪！”

果不其然，灰砂撞到墙，落下来，在墙角堆成一个个小砂丘，靠我们房门的墙角下，有一个大堆。小左摸到了一只手，才知道这不是砂堆，而是一个被落砂盖住了的人。

一鼓作气，我们把这个人抬进了屋，关紧了门。从落满灰尘的洗脸盆里捞起一条毛巾，给这个人抹了把脸。

是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

“作孽，作孽！”小左啧啧连声。

“这是谁呀？”我和锦坤一愣。

“小波的娘，吴伯母。”小左告诉我们。到底是售货员，人头比我们熟。

“这么大风天，跑五六公里？”我不禁怀疑地问。

“肯定又是给小波送什么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小左手脚麻利地洗净脸盆，倒上清水，给老太太擦洗起来。

还好，老太太就是被灰砂搅得昏了头，待我们把她收拾干净，给她喝了水，她也就睁开了眼，说开了话。

“姑娘，我还在五连吧，大风没把我刮跑了？”她还笑呢。

“放心，您还在五连呢。”我们告诉她。

老太太安了心，把手探进怀，脸上笑得更欢了：“还在、还在，还温着呢。”

“什么宝贝呀？”

“鸡蛋。”

“哟，鸡蛋，那不成了蛋花汤了？”我们咋呼着。

“不会，不会，我煮熟了才拿来的。腿脚不好，再刮大风，煮熟了保险。”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她两手抖抖嗦嗦地捧着五个裂了缝的鸡蛋，一脸的笑，好像已经看见儿子把它们吃下去了。

外边的风声小了些。我和锦坤坐在床沿上，看着老人，心里有说不上的滋味。

“伯母，您在我床上歇着，我去叫小波。”小左咬牙切齿。

“不必，不必，我去看他，我去看他！”老人挣扎着往起坐，我们赶紧扶住她，她也确实挣不动了，靠着被子垛直喘气。

只听得呼的一声门响，小左已经消失在门外的灰砂里。

“这姑娘可好，上海人吧？”老人问我们，“可怜见的，多么光鲜的女孩儿，上戈壁滩来。”老人怜惜着。

小左一岁的时候，父亲被镇压。她，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只有一个在码头上做工的母亲。她从来没有过光鲜的日子。可不知怎么，我和锦坤不约而同地说：

“可不，都是亲娘心尖上的肉，都可怜着哪。”

老人竟然热泪纵横了，一手拉着我们一个，语不成声：“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罪过啊！”

“我那小波，三年灾害的时候，我都生着法子让他吃饱了，可这会儿呢，出门在外的，饥一顿，饱一顿，可受了苦了。”

小波?！他才不饥一顿、饱一顿呢！他可会照顾自个儿！我真想说，忍了忍，咽回去了。

别看吴伯母人瘦瘦干干、短短小小的，一打开话匣子，母亲对儿子的

爱就像海水一样涌出来，霎时间灌满了这间灰扑扑的小屋，又溢出门去，倾泻在干渴的大地上。

风声渐弱，老人的声音更清晰了，像从天上飘下来，我和锦坤傻了一般，坐在那儿，听她讲述她儿子幼时的趣事，讲她儿子的一颦一笑。

门轻轻地推开了。小左和小波并肩站在门外。

老人眼睛一亮，呼地一下坐起身来。

从此以后，吴伯母成了我们宿舍的常客，每到周末、轮休，该她放假的日子，她永远是那么坚定地迈着细碎的步子，来到我们这里。每次，也总是小左冲锋陷阵般跑到木工班，然后不着痕迹地“带”了小波来。

无论吴伯母怎样地问长问短，小波总是“嘿嘿”地应着，不说是也不说非。于是吴伯母就按她自己的计划给儿子做布鞋、织毛衣、煮鸡蛋。当然，还常常给儿子留下粮票和钱。有时候小波加班，吴伯母就跟我们坐坐、说说，拉着小左的手揉搓着，心疼不已地啧啧着。小左总是脸蛋儿红扑扑地跟老人有说有笑，前额上的刘海一荡一荡的，非常可爱。

有时候，吴伯伯也来，他总是温和地笑着，灰蓝色的旧制服掩不住他身上的书卷气。坐在小凳上，两只骨节已经变得粗大，但仍然修长的手扶着膝盖，问他什么，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还好，还好。”

一天，小波用废木料给我们做了个小书架，我正想把它挂到墙上去。吴伯伯夫妇迈进门来。他们看我在墙上比划着，就走过来帮忙。吴伯伯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折叠尺，一拉一折成了一把精巧的丁字尺，在墙上横竖一比，划下四条相交的直线，我按他的指点把小书架钉上，美观、齐整。四平八稳的一个小东西就端坐在那儿了。

“丁字尺是他的命，离不了的。”吴伯母笑说。

“也不过钉钉书架、板凳而已。”吴伯伯也笑着，把丁字尺放回口袋，又恢复了慢条斯理的样子。

只有那一次，我看到过吴伯伯异于常日的敏捷和矫健。

小左问了一句："吴伯伯，您看我们连的房子盖得怎么样？"

"还好，还好。"他左右顾盼着，好像头一次注意到这些丑陋不堪的土坯房子。

"人家维族老乡都把房子盖在高坡上，我们盖在洼地里，地下水位那么高，这屋里的地面上老是潮湿的，床底下都长蘑菇，那五层砖怎么耐得住这么大的潮气？"

"劳民伤财，劳民伤财，不该说的，不该说的……"他咳嗽起来，双手掩住口，咳得满脸通红，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抱歉。

吴伯母一手递上一条洗得发白的大手帕，一手给吴伯伯捶着背，咳声渐歇。吴伯母马上把手帕移开，我们都看见，手帕里有血。大家都不做声。

小波一脚踏进来，看见了弯腰曲背的父亲，看见了母亲手里的大手帕，他平静地转过头，看着墙上的书架："钉上了？挺好，挺好。"他照例"嘿嘿"着。

小左把一杯白开水捧到吴伯伯面前。

老人双手接过："谢谢，谢谢，左姑娘。"

"您慢慢儿喝，小心水烫。"小左像哄孩子似的。

吴伯母热泪盈眶了。

小左把另一杯白开水捧给吴伯母。

小波左右瞧瞧，眼睛看着他母亲："没什么事，我回宿舍了。还有一份批判稿要写。"

"你忙，你忙，你去吧。"想了想，吴伯母又跟上一步，"天快凉了，早晚要加衣裳，粮票我留在这儿，她们会交给你。"

小波不置可否，头也不回，口里只"嘿嘿"着，走了。

吴伯母捧着茶杯，僵立在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

吴伯伯捧着茶杯，坐在床沿上，缓缓闭上眼睛。

我恨得咬牙。

“小波从小是个好孩子，环境使然。”吴伯母转过身来，万分歉疚地对我们说。

“他忙他的，我们聊我们的。”小左满面春风。

“伯伯，我给您切个瓜，老乡叫这种瓜‘一罐蜜’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省去了他们的姓，只叫“伯伯”、“伯母”了。她手里拿着个半黄半绿的小瓜。

“这么小个瓜，你给谁吃啊？”我打着哈哈。

“给伯伯、伯母吃啊，咱们吃脆瓜。”小左一边手里不停地把个小瓜一刀两半，插上两把小匙儿，送到两位老人手上。

两个老人像幼儿园孩子“排排坐，吃果果”，并肩坐在小左床上，吃得啧啧有声。

晚上。三个人坐在油灯下织毛衣，锦坤开了口问小左：“你真打算跟小波好？他可是要找个出身‘好’的。我听说。”她小心地开了头。

我没接声，停下手里的活儿，等下文。

“我是拿着二老当自家亲爹娘待的。”小左泪眼模糊。

我们沉默着。我心里有些惭愧。

“你怎么能把小波拖来？他根本不认他的娘老子，他没叫过他们一声，也没正眼看过他们。”我为小左抱屈。

“头一回，刮大风那天，我去叫他，他不来。我就跟他说，‘就算你将来娶个祖宗八代贫农的“好”姑娘，政审查三辈儿，你们有了孩子，他还得算在出身不好的堆儿里。他也不会念你的好。’我这么说了，他就跟上来了，也不知他怎么想的，反正，有什么话在这儿说，总比木工班人多嘴杂的好吧。他来了，敷衍敷衍，总比老人找上门去，弄得大家不愉快来得

容易。”

“吴伯伯老两口看小波那张脸，心里大概也难过。”锦坤说。

“小波是他们心尖上的肉，能见着就是好的。”我说。

“我看也是。”小左点着头。

快入冬了，一个凄清的夜晚，地上已经有霜，空气清冷清冷的。我和锦坤在广播室里忙着。门上哔剥一声，门外人影一晃。我开了门，是吴伯母站在门外，站在月光下。

“快进来，看冻坏了。”我忙往里让她。

“不，就两句话，外边说。”她瞥了一眼广播室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往后退了一步。

“我们这儿就完，咱们回宿舍说话。”我不忍她冻着，又提出建议。

“不，这儿好。不耽误你们休息。”她顿了顿，“下了班，给子坚吃了饭，我才走得开。”她似乎为她来得这么晚，感到非常抱歉。

我看着老人，月光下，她的皱纹不见了，那是一张多么端庄、秀丽的脸，她大睁着眼睛，泪水直直地淌下来，她一眨不眨地直视着我：

“子坚快不行了。我们夫妻几十年，他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丢不下小波。左姑娘能不能去看看子坚，他就闭眼了。”她垂下眼睛：“我知道，我们不该存这非分之想，也不该连累了左姑娘……”她的语声还是平静的，只是充满了无奈。

那个晚上，我和锦坤打着手电送吴伯母回基建队，她不停地要求我们“不要送了”，看看没效，只得作罢。一直到了离基建队驻地不远，看得到他们灯光的地方才放老人自己走进去。一路上，我们唠唠叨叨跟她说着宽心话儿，再三表示吴伯伯大概不久就会恢复健康。老人有病，我们当然该去看看。等等等等。

我们回到宿舍，已近午夜，小左在火墙跟前坐着，正把柴火往灶里添

呢。火光映红了她端正、秀气的脸。她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

“你们去什么地方了？”听见门响，她抬头问我们。

“送吴伯母回基建队了。”

“伯伯身体不好？”她马上想到了。

“据伯母说快不行了，她盼你去一趟，我们答应了。”我急着一口气说了出来。谁都知道，基建队是仅次于劳改队的“强劳机关”。里面的农工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在兵团农工一片草绿色里，他们无论冬夏都是一片灰蓝，非常显眼。普通连队职工去基建队可是非同小可。小波是从那儿来的，却从未回去过。

“我当然去，明天一早儿就去。”

“得找个理由儿吧？”

“明天正好上场部拉货，我让赶车的等等，顺道弯一趟基建队，要不了多久。”她还真有办法。

“我也去，上卫生队‘看个病’，陪你一趟。”我忽然勇气大增。

“我留守。万一有人说三道四，替你们支应一下。”锦坤也受了鼓舞。

基建队是盖房子，修主干渠——农工们叫它“龙渠”，全团场的排灌系统由它开始——的专门单位。他们盖了场部机关的全部办公室、宿舍、食堂、商店、邮局、卫生厅、电站、扬水站、仓库，一应设施。他们也替基建队干部们盖了食堂、宿舍、办公室。他们自己却依然住在低矮、潮湿的半地窝子里。

我们坐着连队拉货的牛车晃到场部，再跑到基建队，找到吴家，时近中午。阳光从天窗射了下来，照亮了一方潮湿的地面。

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上，吴伯伯半躺半坐地靠在那儿喘气。伯母坐在他身边，把他的一双手放在自己手里暖着。

我们走进去，伯母起身让座，小左就坐到了床沿上，我和伯母拖个小

板凳坐在床边，三双眼睛都关切地看着病人。

“难为你来看我，左姑娘。”老人艰难地开口。

“伯伯，就叫我如萍。您放心，我们会常来看您，小波今天忙，走不开，过两天，我跟他一块儿来看您。”

老人点着头。

“我就不放心他。”

“放心好了，伯母和我会照顾他。”小左一脸笑，“现在天凉了，等春天，天气暖和了，我们陪您出去走走，看看树，看看花儿，看看草。陪您去毛拉河边，看他们盖桥。”

“桥？毛拉河也盖桥？那儿不是有一根独木桥吗？”老人笑了。

“不，说是从色力布亚拉石头来，要盖真的桥呢。”小左一脸认真。

不过，木桥也好，石桥也罢，那十来米宽的小河沟上的桥对吴子坚这位桥梁专家来说，那只是小孩子的积木罢了。“好，好，我们去，看他们搭个石头桥。”

说着，笑着，老人似乎忘了病痛。我不能不钦佩小左丰富的想像力，只长茏茏草、骆驼刺的戈壁滩上有什么样儿的花儿、草儿？难为她的孝心。

老人在“准儿媳妇”的欢声笑语里躺下去，吴伯母说这个中觉，他一定睡得好，“做梦都会笑醒”。

周日，基建队一位农工来叩我们的门，送来便条一张：

“子坚已去。勿来。改日再见。”字迹清秀、端正。

小左看着这张字条，仔仔细细折好，收了起来。

晚上，连队例行晚点名，刘水舟“上挂下连”地讲了一通“形势大好”之后，加重了语气：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在我们连队也有具体的反映。啊，深刻地反映……

有个别人，家庭出身不好，思想改造不彻底，受资产阶级反动人性论毒害很深……中毒很深……居然跑到基建队去！”他停住，小眼睛左右扫着。

“去干什么呢？去看一个病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呢？美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一个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这一句出自“毛语录”，那时天天挂在政工干部嘴上。）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停顿着，加强着气氛。

“当然，人已经死了。”

下面的人哄然，纷纷问：“谁死了？”

“那个老反革命死了。”

下面的人嘘了一口气。

“我们连的，那两个立场不稳的人要注意呢！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挂在口头上、笔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

事后，刘水舟来广播室时，曾笑问我，这番点名“够不够水平？”我告诉他，比团部龙政委的形势报告精彩多了。

他得意地眯着小眼睛：“小韩，你可要注意呢，再让我逮到狐狸尾巴，可就不好过关喽！”

开春。吴伯母来了，“他是笑着走的。”她这样欣慰地告诉我们。

每隔月把，她还是来。她已经不太在乎小波是不是每次来我们宿舍看她。他来，好。他不来，她自会说：“他忙，让他忙吧，我跟你们说说话儿就走。”

之后，小波和一位出身“红五类”的女青年结了婚，调到别的团场去了。吴伯母还来我们这儿。遇上有外人，她总自自然然地告诉人：“路过，顺道看看她们。”

小左和伟国结婚，“女方家长”是吴伯母。

一九七五年冬，“落实政策”，吴伯母回南京去了。

第二年，因为肺病，小左“病退”回上海，她和伟国和他们的小儿子终于在离开上海九年后回去了。

信中，伯母长，伯母短，常告诉我们老人的信儿。

十八　罗密欧、朱丽叶与黑暗

初次见锦坤和她的男友家栋是我到兵团半年以后的事。

入夏了，戈壁滩的中午，真能晒死人。连队安排了长长的午休。我播完了午间新闻，顶着毒日头，走回妇女班的地窝子。

每次进门，我都习惯地闭闭眼睛，外面太亮，里面又太暗。不闭闭眼，简直什么都看不见。

眼睛一睁，我呆住了，那是怎样容光焕发的两张脸。

火墙后面，挨着我的床，又架起一张窄窄的红柳床。床边的两个人本来正在轻手轻脚地收拾东西。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同时抬起头来。

我一眼认出，那富富泰泰的正是刘锦坤，和照片上的她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脸晒红了一点儿。那个男的，却是初见，好帅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宽宽的额头下面一双坦率的大眼睛，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子高高卷起来，露出结实、有力的手臂。他笑着，笑得亲切、自然。

“你是韩老师吧？我叫徐家栋，锦坤的朋友。”

锦坤含着笑：“吵大家午休了，真糟糕，到的不是时候。”

我知道，他们参加了团里组织的宣传队，到附近团场表演节目，“交流经验”去了。就问了一句：

“宣传队还好吧？”

“没什么意思，我们退出了。”家栋满不在乎的。

“还好，挺忙的。巡回表演结束了，我们就回来了。广播室还是老样子吧？”锦坤仍是温文尔雅。

怎么告诉她小眉的事呢？还是少说为佳。我回答：“还好，你回来了，咱们一块儿忙，忙得有劲儿一点儿。”我只好这样强打精神了。

以后，家栋常来，坐在小板凳上陪锦坤，他敬重锦坤，锦坤疼他像疼自家小弟弟。

“都是我把他拖到新疆来的，革命啊，支边啊，唉！都是一时头脑发热。”有时锦坤悄悄告诉我。

“来了就来了，没啥好后悔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跟着锦坤，去什么地方我都无所谓。”家栋倒是一往情深。

他们要好，是从上海开始的，旁人说不了什么。再说，家栋出身工人，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弟。锦坤虽是职员出身，但沾不上“黑九类”的边。他们可以相当安稳地度过在新疆的日子，结婚生子，太太平平建设自己的小家庭，然而他们却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备受煎熬。

一九六七年，上边不断下达文件，三令五申：“兵团内部进行斗、批、改，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但是，兵团的“老职工”们，却几乎清一色来自地方上的工业、交通系统。虽然他们已经是身穿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不是现役军人）的“兵团战士”，但他们对地方上的情况了如指掌。“文革”爆发，一片“打倒”声中，他们下意识地抓住了这个“杀回原单位”的机会。

当年，地方机构想方设法把他们挤出去，扔进了这个“吃不上喝不上”的穷兵团。现在，当权派倒的倒，垮的垮，于是这些“老职工”们组织起各种名目的造反战斗队，以“革命”的名义大造地方当权派的反，登时搞得兵团内外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地方上的形势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力量此起彼伏，闹得人眼花缭乱。而且，不少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武斗。喀什的枪林弹雨中就出现了不少以兵团老职工为骨干的战斗团体。这些能工巧匠把拖拉机改装成坦克，轰轰隆隆地行驶在城市里。终于，新疆军区的头头们感到了威胁。于是，一道道金牌来自对情况模模糊糊的“中央文革”。

兵团实行“军管”。戴红色领章、帽徽的正规军进驻兵团机关，各师、各团。他们是真正的“太上皇”。他们享受着部队的待遇，他们制订各种“纪律”，他们集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力于一身。首先，他们要求兵团战士“抓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支持“革命”，确保西北边疆这一“反修防修”前线的“稳固”。

各“战斗队”被强迫解散，回到所在农场。

多数参加了“战斗队”的老职工们觉得他们出身好、根子硬，过去又是“产业工人”，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再进一步说，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出门闹革命完全是“响应主席的号召”。“军管”纯粹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时期的表现”，“是别有用心的军内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反扑”，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破坏”。

他们又组织起来，在兵团内部“对着干”。

事实上，这些人多年来对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及享有的特权心有不满，文革给了他们大声抗议的机会。但是，他们是成年人，被利用、驾驭的时间不会比内地的“红卫兵”长，而他们又多有家室之累，瞻前顾后，极易被分化瓦解，不久，关的关，押的押，反戈一击的反戈一击，终于不成气候。

人吃五谷杂粮，孰能无错？错说一句话是错，在非常时期，错上升为“罪”，那就有得受了。

各级军管单位充分发挥政工人员作用，内查外调，“战斗队”骨干分

子的档案袋迅速膨胀起来，里面塞满了各种“黑材料”。这些人的资格不够送基建队，成了各连队的“牛鬼蛇神”，成了进行“大批判”的箭靶子。

他们的事和连队青年们没有什么大关系。多数上海青年站在连队领导一边，充当“大批判”的炮手。北京青年自身难保，多数人作壁上观。

我对这一切只好采取不参与的态度，锦坤觉得物极必反，乱一阵，乱够了，自然会静下来。她不但不参与，别人议论，她也懒得听。

家栋不然，他觉得老职工“受压”了，他同情他们，他得助他们一臂之力。

热恋中的两个人有了“不同观点”。

压迫与被压迫的双方本来在力量上就不成比例。随着“大批判”的步步深入，各连专政人员——连、排干部们把他们平日对老职工们的嫉妒和不满发泄出来，变成了对这些被专政对象的百般折磨，他们的处境日益悲惨了。

老职工们带原单位的工资来兵团，收入比一般人略高，他们能干，他们的小家庭比一般人建设得舒服一点。这一切，在人的贪婪、残忍等等本性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气候条件下，都变成了使他们大受其罪的根本原因。

昔日喀什汽车厂的机修工老詹夫妇被诬陷为“贪污分子”，他们当然不服，而且两口子伶牙俐齿，常对军政各级领导进行“口头攻击”，弄得他们张口结舌。日复一日，他们成了被专政的“重点对象”，苦头越吃越大。

一九六八年春天，“大批判”的风口浪尖上，老詹的妻子要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了。连队耿副指导员却派“专政队”去离连队最远的地方放水，日夜连轴干；由着老詹的女人在自己的地窝子里又喊又叫，不准人问津。傍晚，婴儿落了地。老詹女人的叫声清晰了，只剩了一个字：“水，水……”这阵阵的呻唤伴着婴儿的啼哭形成一种极尖锐的、对人的耳膜和心灵的

刺激。

我们呆坐在宿舍里。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只觉得自己已经虚脱了，耳朵嗡嗡叫，两腿发软，一动也不能动。

豁啷一声，家栋拎起锦坤的小水桶，锦坤拉了一把，没有拉住，家栋像个暴怒的狮子，冲了出去。

我们也跌跌撞撞跟了出去。

水，送到了那干渴的产妇嘴边。

家栋却被耿副指导员和武装民兵们吊在了连队中央的一棵大树上，那是连队唯一的一棵大树，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高悬在他头顶上。

我和锦坤飞快地奔向刘水舟家，急急地敲着门板，门缝里露出他妻子一双惊慌的眼睛：

“孩子他爸不在，上团里开会去了。”

我们离开刘水舟那个半地窝子的时候，还听得见家栋的叫骂声。等我们回到宿舍，双手反绑、吊在树上的他就无声无息了。

天黑了，起风了，风呼啸着，打在天窗顶上，沙沙响着。我和锦坤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瞪着天窗，一筹莫展。

过了午夜，约莫两三点钟，去遥远的工地干活儿的“牛鬼”们才回到连队。他们从老詹女人嘴里听说了一切，他们的眼睛红了，他们不顾武装民兵的阻拦，在一片吵嚷声中从树上解下了奄奄一息的家栋。

我陪锦坤去了男青年宿舍。上海青年们都睡在床上，把脊背对着我们。

锦坤用温水洗着家栋眼窝、鼻子、耳朵里灌满的砂子，泪水大滴大滴滚落在那张苍白的脸上。

第二天，家栋成了“牛鬼蛇神”中唯一的上海青年。

我和锦坤要求刘水舟改变这个情况，他眯着眼睛，嘬着牙花子，说是连队“集体领导”的决定，他个人“无权更改”。不过，他答应“试试看”。

然而，“试试看”的直接结果是：无论单身，或是有家的“牛鬼”们都被集中在一个漏风的破旧地窝子里，完全失去了自由。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

一旦有了行动的自由，家栋和他的战友们，就开始四处活动，参加“上访”的队伍。他们到处鸣冤告状，要求“平反”，要求“恢复名誉”，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得到真正有效的医疗，同时要求把老职工们调回原单位。他们的行动在被关押一年多之后变得极有组织和策略，他们手里有各种各样的“中央文件”，他们选择出所有有利于他们的条文，有系统地向兵团内“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猛攻。

每次，家栋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锦坤，告诉她一些惊天动地的消息：谁谁进入革委会不久露出马脚，居然是“铁捍保皇派”，终于被清除出去，新来的政委又是二野、三野的红小鬼出身，必能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为受迫害的人们平反等等。

锦坤由家栋的“后勤部长”转为“参谋总长”。他们常常头碰头地讨论各种计划、策略、方针，直至深夜。好在我是“夜猫子”，看书也看到深夜。

他们不避我，知道我不会出去讲。事实上，我根本很少听。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下面的无数土皇帝今朝上，明朝下，离我那窝头白菜汤的日子何其遥远。

有时候，他们考虑到他们所计划的一切仍有相当的危险性。有一次，家栋对我说：

“韩大姐，你可别掺和进来，出身不硬一下就被人家逮住小辫子，可不是玩的。锦坤是个好军师，我都不敢让她露面儿。‘职员’毕竟不是无产阶级。”

几年来的牢狱之灾、奔波之苦，使家栋漂亮的脸上带上了一点风霜，然而还是坦率的、稚气十足的。看着他，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冷水是

万万泼不得的，只好等着看。

有时候，家栋他们出去个十天半个月，连队里是按“旷工”计的，当然没有工资。吃的、穿的、用的，一应家属预备。锦坤忙着为他做鞋，拆洗棉衣，织围巾、手套。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插上一手，帮帮忙。家栋在，我就不做了，他嘴不好，一高兴，常会在外面乱说，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上访上告”、出外串连的直接结果，只是使当时的团政工处、连队领导手里的黑材料越堆越高。

终于，吓人的事情出现了：家栋他们和喀什的一个“里通外国”集团挂上了钩，家栋又不肯“认错”，被关进了场部政法股私设的牢房“禁闭室”。这种地方是专门为日后判刑搜集和制造口供、人证和物证材料的。血肉之躯被投了进去之后，很少有不肯画押认罪，而又能活着出来的。

家栋是从喀什直接押到禁闭室的。那些日子，锦坤像热锅上的蚂蚁；广播稿都是我一个人念的，生怕她太紧张，念错了什么，更是“罪”上加罪。

一般的来讲，新疆这种比内地更加无法无天的地方，一人有“罪”，全家挨整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一次，却没人找锦坤的麻烦。全连“点名”，只是说到家栋，并没有扯上锦坤，刘水舟的脸上更是挂着“爱莫能助”的表情。我觉得怪怪的。

过了几天，团里“头头”来了，来的是杨副政委。此人是现役军人，政工干部。军装笔挺，人又瘦又干，细细的脖子在风纪扣后面晃荡着。他从不摘帽子，帽檐下露出花白的鬓角，年纪总在五十开外，他的儿子都已经送到西安上军事大学了嘛。

他是由刘水舟陪着来到广播室的。

他不苟言笑，进了门，定定地站在那儿，刘水舟在打圆场：

“我们连的广播员还是不错的。白天、晚上和连队战士一起‘抓革命，

促生产'，顶班上大田劳动；大家休息，她们不休息，开广播，搞宣传。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杨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眼睛紧盯着锦坤：

“你就是刘锦坤吧？连队领导对你是很不错的，你看见了。”他扫了一眼侧身坐着的刘水舟。

“你怎么样呢？有些问题是不是该跟领导合作，争取主动呢？”话说得模模糊糊，我觉得我不该继续留在那儿。

刘水舟是聪明人：“小韩，你去连队办公室看看，要是报来了，把重要新闻整理整理。”

我问他：“办公室门开着呢？”

“有几个通讯员在连部，你去就是了。”

我慌不择路地躲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晚上，锦坤坐在小板凳上，面对着床头小木柜上的煤油灯，两眼发直。

我摇摇她肩膀：“吃饭，吃了饭再说。”

她看看火墙外边妇女班的人，默默地摸出张纸。

“他们把他泡在水里。”她写。

“三天了。”她又写。

我不知该怎么办。这次是团里指使的，刘水舟没有说话的资格。任何人现在都救不了家栋，我们怎么办呢？

锦坤没有泪，只是丰满的双颊忽然之间凹陷了下去，两个眼睛毫无神采，周围晕着黑黑的阴影，非常怕人。

油干了，火苗跳了一下就无力地熄灭了。

过了几天，团部送来一个通知：当天下午在我们连队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徐家栋。这一周是他在全场游斗的日子。

刘锦坤被指定坐在最前排，和杨副政委、耿副指导员各排排长坐

在一起。

徐家栋是被持枪的现役军人拖下卡车，拖入会场的。两条腿在地上划出两道沟。

像马嚼子一样，一根粗绳紧紧勒住他的嘴，据政法股干事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他作“反革命宣传”。

他被五花大绑着，破衣烂衫下露出斑斑血迹。

那个美少年已经不存在，面前的是一个被折磨得失去人形而仍不肯“认罪”的“犯人”。

经过了无数批斗会之后已然麻木的神经又一次兴奋起来，感到了极度的痛苦。

不知那些站在家栋身后的军人干了什么，从那勒紧的嘴里，竟发出了一声尖嚎，压过了会场上的口号声浪。

前排人影晃动，锦坤昏倒了。杨副政委站起身来，用眼光寻找着什么人。他看见了我。

“小韩，送刘锦坤去休息。”他说。

我机械地迈动步子，扶住锦坤，一脚高一脚低地挪出会场。

一条冰冷的毛巾压在锦坤头上。

她睁开眼睛，一对小火在眼睛里跳着。

“他要我。我答应……”她一把抓住我的手。

“谁?!”

她没回答我，只是摸了一下领子。

红领章？杨?!那个老畜牲!

“千万不能。”我惊恐得语无伦次。

“家栋会死在他们手上。”

“可是，家栋如果知道了这件事，恐怕比死还难受。你千万别伤家栋

的心。”我摇着她。

夜，那是怎样一个漆黑的夜啊！

关了广播室的门，我是一个人走回宿舍的。锦坤转身向连队办公室走去。杨副政委在五连“蹲点”期间，住在连队办公室里。

妇女班一向是叽叽喳喳的，今天却静悄悄的。人们早早就上了床，谁也不和谁交谈。

我在灯下等着，等着连队办公室那边出现厮打声，惊醒了人们，大家可以见到杨副政委的真面目。我幻想着：

锦坤会扭着衣冠不整的老畜牲去见政法股干事。告诉他们杨是怎么用家栋的事逼她就范的。揭开了这个大盖子，人们不得不重新审理家栋的案子，终于发现这是一起冤案，于是这一对受尽苦难的男女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他们的爱情，过他们甜蜜的日子去了。

幻想只是幻想，夜却是静静的，一片黑暗，无声无息。我坐起身来，从豆腐干大的小窗户看出去。整个连队一团漆黑，没有一丝光亮。我的心抖着。被粗绳五花大绑的家栋和受着蹂躏的锦坤重叠在一起。我睁大眼睛，希望从黑暗中辨出任何一样东西的轮廓，然而，我没有成功。

不知什么时候，门一声轻响，锦坤像一片树叶，轻轻地飘进来，落在她的小床上。我一直面对着她。她垂着头一言不发。

第二天，我发高烧，起不了床。锦坤却提上铁锹和人们一块儿出工去了。

一个多月以后，家栋回来了，腰背驼了，肩胛骨高耸着，脸色苍白。他还常来，来了就坐在那儿不停地咳嗽。

又过了一个多月，团里安排锦坤去师部开“宣传工作会议”。

锦坤回来以后，异常虚弱。那个时候，正好连队在赶着给小麦脱粒。场地上机器轰鸣，灰尘像烟雾一样笼罩着人们。全连青壮年分成三班，跟

着机器转。那个活儿实在是又脏又累。锦坤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就和我编在一个班里顶着大日头，在麦芒子、灰尘的包裹之下，把一捆捆麦捆儿打开，送上碾压机。

干了没有两个钟头，锦坤拿出一张维吾尔文的病假条交给了刘水舟。这张条子上别的看不懂，“3”字还是阿拉伯数字。刘水舟二话没说，就让锦坤休息三天。他还怪了一句：“打摆子，还硬撑，少了你一个，麦子还不是照打。”

谁知，过了两天，耿副指导员找了个懂维文的人来看了那个病假条，然后，告诉连队考勤员：“刘锦坤未婚而私自打胎，不能享受三天产假，按旷工算。”

袁琳一听说，就跑来告诉我。

“我一点儿没听说，要是我知道，说什么也让锦坤挺一挺，熬过这几天。”

“不是每个人都熬得过的。”她冷冷一笑。

锦坤完了，我脑子里空白一片。

工地休息，我跑回宿舍。

家栋正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又跳又叫：

“当初，就算我死在他们手里，也不能让你受那老毛驴子糟蹋。锦坤，我是怎么嘱咐你的！咱们好了这么多年，我连碰都不敢碰你一下，你可好，送货上门！姓杨的，我跟他拼了！”

他又跳又叫，锦坤只穿一身内衣裤，双膝跪在冰凉的潮地上，两手紧紧抱着家栋的腿，哭成了泪人儿。

我关紧门，侧转身向暴土狼烟的打麦场走去。

罗密欧、朱丽叶是幸福的，他们相爱至死。他们没有在那充满仇恨的人间过多盘桓，他们携手飞向那没有仇恨、没有猜忌的乐园。

锦坤和家栋却得活着，活在他们的心病里。这是一种坏死病。痛恨和

无奈一点一点咬噬着他的心。他变得心胸窄小，整天疑神疑鬼。锦坤绝不敢在没有女伴同行的情况下外出“开会”或有其他公务。尽管杨副政委因“工作需要”，调往北疆高就，家栋觉得还有“张政委”、“李政委”，在打锦坤的主意。总之，他是再也不能释怀。

锦坤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态度从容，温文有体。家栋一露面，她就手忙脚乱，心慌胆战，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常吵，为了一点鸡毛蒜皮。最后，必然又扯到那次“人工流产”，总是以家栋的咆哮和锦坤的告饶结束。

他们有了性关系，在戈壁滩上，在干枯的渠道里。等他们回到宿舍，家栋还在嬉皮笑脸，“那老东西没有我棒吧，告诉我，他是怎么干的，摸你了没有，舒服不舒服？……”锦坤满脸通红，打着抖，又哭又叫，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只好把家栋赶了出去。之后，他常常一两个月不露面。还是锦坤再去找他。他来了就让锦坤脱光了，躺在被子里，让他“摸摸”。锦坤也总是照办。我只好走出去。

我和小左劝他们：“结婚吧，有了自己的家，生活就上轨道了。”

家栋总说：“再考虑考虑。”

锦坤又做了两次“人工流产”。

大家都劝他们调走，说是“换个环境”就好了。他们进行得也不积极，一直拖到七五年，他们才结婚，调离了这个团。

常有消息来，说他们还是吵，锦坤一直没孩子，家栋到处告诉人，她打过几次胎，弄得生不成了，等等等等。

而且，也有人说，他们的邻居也受不了他们，吵了，闹了，又会抱头痛哭，神神叨叨的。

十九　燃烧的爱情

尽管五连是离毛拉巴扎最近的连队，仍然得风尘仆仆地在土路上走上一个小时，过了毛拉河，才能踏上毛拉的市集。在连队里，一片草绿中间几点蓝。而巴扎，那可是万紫千红集中在一条二百公尺的小街上。街上也有商店，门口用五种文字书写着商店的经营项目，但是你不踏进去，仍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卖什么。

五种文字，我识得三种：汉字、汉语拼音（不是ㄅㄆㄇㄈ而是b p m f）、俄文，还有两种就是状如蝌蚪的古老的维吾尔文以及七十年代由中央决定推广的维吾尔新文字。我敢打赌，在当时的毛拉街上，没有几个人识得这种由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加上四个特声字母组成的新文字。

五种文字，五种颜色，不但热闹，还挺占地方。不过等你拉开那又厚又重的木制大门，你就会失望了。无论是“巴楚县毛拉公社供销合作社”，还是“喀什地区畜产品公司巴楚分公司毛拉公社代销店”，货架上除了成捆的条绒，落满灰尘的毛线之外，几乎空空如也，店堂里阴暗、空阔，没有什么顾客。

小街上的自由贸易集市就大不相同了，妇女们心爱的彩色头巾在空中飘舞着，慈祥的维吾尔老人把色彩鲜艳、手工精细的小花帽摆在雪白的羊毛毡上。那些美丽的小花帽常常让我停下脚步，蹲下来，欣赏老半天。街

上有很多成门形的木杆栽在地上，上面挂起随风飘曳的衣裙。颜色多以红、黄为主，偶尔也会有淡蓝、藕荷夹在其中。

维族妇女不懂，汉族女人怎么可以穿着长裤在外边到处跑，而且还有邮筒般的棉袄，带耳朵的棉帽子，再加一个大口罩，天哪！她们夏天当然是身着美丽的裙衫；冬天，她们在紧腿裤子之外，必有裙子，或是毛料，或是丝绒，上面也会有件黑色小棉袄，腰身卡得紧紧的，曲线毕现。

维吾尔妇女是很珍视出门机会的。巴扎天，她们换下家常的人造棉裙子，穿上真正的长筒袜子、小巧的靴子，上面罩着细腰、宽袖口的纱裙。当然，小花帽、晶莹的耳环、手镯、项链都是不可少的。维族少女爱美，从小，她们用奥斯曼草搭在眉心，使两条柳眉在眉心处有意无意地搭起来，变成她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标志。

节日或婚礼，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日上三竿，人们买了他们该买的东西，也卖了他们想卖的东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起天来。男子汉们从宽宽的布腰带里摸出他们的“红宝书”。那种东西，是个红底金字的小塑料夹子，里面本来是夹着一本小书的。现在呢，一边夹着莫合烟，一边夹着卷烟纸。那卷烟纸刚好一支烟的大小，又薄又韧——正是撕成一张一张的“语录”本身。男人们两个手指一捻，抽出一张纸，从小红夹子里，倒出一撮莫合烟，在纸上均匀地铺成一小条，两手一卷，再用口水粘牢，点上火，吞云吐雾起来。两炮莫合烟一抽，什么人的冬不拉响了起来，什么人的手鼓又打起了节拍。男人们把小花帽向脑后一推，两腿屈起，两手拍着膝盖，口里“嗨呀！”一声，跳了起来，马上，随着一声快乐的尖叫，女人的裙子旋风般地刮了进来，不消三两分钟，一个圆圈自然形成，一片欢腾。

节奏明快、欢天喜地的年轻人舞罢。手鼓的节拍渐渐放慢，冬不拉弹出抒情的和弦。那个时候，真正伟大的舞蹈家登场了。他们是从学步时开

始跳舞的圣手。现在，他们已经年近花甲；老妇人柔若无骨的手指，表情丰富的眼睛，依然灵活的肩膀和腰肢，向人们展示了怎样一种美的意境。

银白头发上戴着精致的小花帽，留着一把白胡子，脸色却红润如少年的老人，围着老妇人跳着踢踏步，满心欢悦地向人们展示他的骄傲——他那美丽、温柔的舞伴。

人们围着他们，双手起劲地为他们打着拍子，不时发出“哟，嗨！”的叫声，为他们鼓劲儿。

我看着，心里的坚冰在融化，生活的沉重和苦闷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巴扎上，我最多买几个鸡蛋，一两棵青菜，几把杏干。然后就站在那里，看人们唱歌、跳舞；看那些温柔的大眼睛，看那些飞舞的花裙子，看那些飘起又垂下的无数条细细的发辫。看人们的眉飞色舞，看到薄暮时分，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我们那个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去。

一来二去的，毛拉变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兵团年年亏损，生活越来越差，常年不见荤腥，每人每月只有一两油，过年过节，有孩子的家庭才能摊上五十克（一市两）白砂糖，日子过得真艰难；有了一点薪水，就想去毛拉打打牙祭。毛拉集市上有一个卖水煎包的小铺子，离老远就能闻见那刺鼻的羊膻味儿。里头可是热气腾腾，无论冬夏挤满了人。我也挤进去过，买上几两包子，填填我那干瘪的，经年只有咸盐煮白菜、棒子面窝窝头的胃。我更爱维吾尔人做的酸奶，他们的酸奶是百分之百的奶制品，是将牛奶煮过，放在阳光下经过日晒而发酵的。绝对营养，味道极醇。买上一个白面小馕，一碗酸奶，吃饱了，也喝足了，那种肠胃的舒畅，没去过那苦旱之地的人是想像不出来的。买酸奶的经验多了，就发现一位老妇人的货色特别干净。她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把她的奶酪装在细瓷碗里，盖上绣了花儿的小白手巾，放在一张铺了浅蓝色台布的方桌上，非常洁净，在整

个毛拉街上特别显眼。

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正站在老人的方桌旁吃我的酸奶，走来一位魁梧的维吾尔中年人，他留着英俊的小胡子，一双眼睛和善地笑着，把右手放在胸前向老人弯身行礼，然后站直身子，拉拉西装上衣的衣襟，愉快地向我伸出手来：

“我是毛拉中学的校长，铁木尔·艾买提。你是兵团的吧？”他的汉语不能说字正腔圆，但可以说是很标准了。

我放下手里的碗，也伸出手去：

“我是五连的。”

“兵团的人很少吃酸奶，你吃得惯吗？”

“我很喜欢。”

老人看着我的脸，听明白我喜欢她的奶酪，用头巾掩住没牙的嘴，慈祥地笑着。

“到我家去坐坐好吗？”他把右手放在胸前，躬身行礼，十分真诚，我也照样行礼如仪，接受了他的邀请，跟着他，向毛拉街东端走去。

一路上，人们向铁木尔行礼，他也频频还礼。这是一个多么多礼的民族啊，我不禁这样想。

雪白的高高的院墙中央是木制的大门，大门全部开启，足可以驰进一辆马车。

一进院子，满院粉白的杏花飘着清香，几乎看不见房舍的所在。

一位维族妇女迎了出来，她一身水绿的纱裙，头上淡绿的丝巾滑落了，漆黑的长发辫高高地盘在头顶，典雅、高贵。她清秀的脸上满是笑意，她躬身行礼：

“请进。”她说汉语，伸手接过铁木尔的上衣。

“我妻子阿拉木汗。”校长为我介绍着，走上台阶，推开雕花的木门。

“好美的图案。”我赞叹着。

“我父亲的手艺。”他笑着。

走进去，这是一个维吾尔民族地毯的展览大厅。地上铺的、墙上挂的都是设计典雅、色彩绚丽的中东式手织地毯，屋子里弥漫着奶茶的清香。

正对门的墙角上方高悬着一只靴子，一只做工极精细的靴子。靴子下面有一块搁板，上面是几乎每个维族家庭必备的《可兰经》，羊皮包装的、极旧的大书，据说全是手抄本。搁板上有一盏擦得锃亮的油灯，闪着明晃晃的光，柔和地照着墙角那一方厚厚的地毯上，匍匐着的老人。

隔着饭桌和茶壶、茶碗，我只能看到他弓起的背影，他全身伏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

“我父亲还循老例，用长流水洗手，每天祈祷五次。”

我点点头，接过奶茶，放在饭桌上，默默地坐着。

我不懂伊斯兰教义，但我尊敬有信仰的人，我静静地望着老人，我没有注意屋子里其他的人，我只觉得，作为这个家庭的客人，我应该这样做。

过了一会儿，老人又一次把头伏下去，然后站起身来，向我打招呼。

“喀斯巴郎，亚克西吗？（姑娘，你好啊！）”

“亚克西。”我把右手放在胸前，向老人致意。

他开心地笑了，铁木尔、阿拉木汗都笑了，笑得极为舒畅。

“到我这儿来的人不少，没有人对老人的祈祷感兴趣。他们也不愿意进我们的屋子，有什么话在院子里或者在巴扎上说完就算了。你不一样。”他微笑着，大大的灰眼睛里闪动着笑意。

“你有点像我们，又不太像。”阿拉木汗说了一句，羞红了脸。

“你不是俄罗斯，她们太大。”铁木尔用手比了一个大圆圈，逗得我们都笑了。

“你从哪儿来？”铁木尔小心地问。

我没有多想就告诉他："我生在纽约，美国的一个城市。"

"西？"老人指指西方。

我点点头。

"比土耳其还远？"老人又指指西方。

我又点头。

"书，给她看书。"老人指着灯火照耀下的搁板。

铁木尔站起身来，从那厚厚的《可兰经》下面抽出了一本小书，一本很薄很旧的小书。一看封面，我呆住了。

摩天大厦林立的背景下，一位年轻的维吾尔人，肩上搭着褡裢，正用手捂着快要滑落的小花帽，抬头仰望着大厦的顶端。不错，那确实是一个在西方漫游的维吾尔人。

"我的曾祖父曾经去过麦加朝圣。在旅途上搭过一次船。跟着那条货船，他到过纽约港。回到伊斯坦布尔，他写了这本小书。"

"土耳其文的《一个维吾尔人在纽约》，是在土耳其出版的。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铁木尔骄傲地向我解释着。

一本薄薄的小书，粗糙的、已经发黄的纸张，上面用我看不懂的文字，记录着一段有趣的经历，那弯弯曲曲的文字带着微笑，带着温情。我轻轻地摩挲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儿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阿拉木汗双手捧给我一碗热奶茶。我捧在胸前，心里什么东西在膨胀着，热辣辣的，泪水止不住地滴落下来。

老人摇着头，抚着膝盖。

外面大门响了，阿拉木汗迎出去。不一会儿，她和一位维族少年一齐走进来，他们边走边说边笑。少年向老人和铁木尔行礼，然后向老人诉说着什么，老人若有所思地想了又想，站起身来，连珠炮般地问了一堆问题，

少年眼也不眨地对答如流。老人笑了，挥了挥手，少年欢天喜地地转身走出去，老人拍拍他的头，跟在他后边也走出去了。阿拉木汗和铁木尔都在笑，笑得淌泪。

看我莫名其妙，他们解释给我听。

老人先后一共有过三位妻子，每位妻子为他生了四个儿子。现在，十二个儿子住在天山南北各地。当然，他也有众多的孙儿、孙女。他不但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也弄不清准确的数字，不知到底有多少孙儿、孙女。这位少年是他第一位妻子所生的第三个儿子的二公子。自报家门之后，老人经过一番考证，认为没错之后才认了这个孙子。这位少年在漫游途中没钱了，来找爷爷要只羊，赶到巴扎上卖了，好继续赶路呢。

正说着，已经听得门外，羊儿咩咩地叫，一老一少两个人快活的说笑声。我们都走出去，少年一边挥手，一边向外走，身后拉着一只肥肥的羊儿。

回到屋里，老人说了不少那少年的好话，说着说着，老人又思念起自己的妻子，愿她在天堂快乐、平安。老人动了感情，有声有色地讲起他年轻时的趣事，老人说得高兴，红润的脸上，眉毛、胡子满是笑意。铁木尔充当翻译，把老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和他们一齐高兴了半天。

在维吾尔人家里做客，到吃饭时间，是一定要留下吃饭的。所以，他们一提出要我留下来吃“抓饭”，我就一口答应。这一下，轮到他们一家高兴了老半天。

所谓“抓饭”，是在一口大铁锅里放下胡萝卜、羊肉、洋葱和作料，上面放米、加水，放在小火上慢慢焖；羊肉熟透之后，香味渗进米饭里，是维吾尔人最心爱的饭食之一。

他们给我一个小木勺，而他们自己都是用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很优雅地把饭捏成一小撮，再放进口里，细细咀嚼。

大家边吃边谈，铁木尔决定和团宣教股联络，送几个维族青年去五连

学汉语。

“为什么五连？”

“五连离毛拉最近。”他说，“最主要的，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老师，尊重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他沉思着说。

我被感动了，我将是他们的“自己的老师”！

“我的儿子阿孜木快结婚了，结了婚，我也要他去念一点汉语。”

“什么时候结婚？新娘也在毛拉吗？”我问着。

“下个巴扎天，你来喝喜酒，新郎、新娘都从喀什来。”

“抢来的新娘。”老人迫不及待地通过“翻译”告诉我。

我好奇地等待着下文，莫不是维吾尔人也兴“抢婚”这一说吗？

铁木尔告诉我，他的儿子阿孜木在喀什的一次歌舞晚会上见到了那朵高山上的雪莲，疯狂地爱上了她。谁知这位美丽的舞蹈家正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舞蹈团的团长，正在强迫她，用各种压力使她就范——嫁给他、做他的妻子。

阿孜木听了姑娘的哭诉，怒火中烧，决定“抢”。

于是，就像神话中的神武的勇士一样，阿孜木在光天化日之下，骑马冲进歌舞团大院，“抢”走了他的未婚妻，日夜兼程，赶回毛拉。

“啊！燃烧的爱情，多美好！”

三个人都十分快意地赞叹着。

“他们都在新房子忙着呢，下个礼拜天，你一定要来啊！”阿拉木汗再三叮嘱。

那一天，我是坐老人赶的牛车回连队的。一人高的木制大轱辘咯吱咯吱叫着。我坐在车上，摇来摇去。老人跨在辕上，一路哼着歌儿，时不时停下来，连说带比划地教我说几句维吾尔话，瞧我学得认真，常常夸我：“亚克西。”

薄暮，地平线上升起一道灰蓝的雾，小路在漫漫的戈壁滩上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去。

老人告诉我，欢天喜地的歌并不是维吾尔人最美的歌。最美的歌是悲歌，他开始唱了，唱那一首无字的长调。

歌声时而直冲云端，时而又低婉地、静静地回荡在广漠的大地上，歌中有回忆，有倾诉，有无奈。

“你唱什么？”

“阿孜木的奶奶，那才是火一样的女人，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才是火一样的爱情。”老人挥了一下手里的红柳条，赶开了围着牛尾巴叫的虻虫。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那浅蓝色、浅紫色的薄暮，又哼唱起来。

啊！那无字的悲歌，唱出老人曾怎样想留住那火一样的妻子，然而她走了，走得那么早。

“安拉都知道，他都看见了。”老人告诉我。

从那以后，每当胸中塞满了不洁之物的时候，我都会在戈壁滩上引吭高歌一番，吐一吐心中的块垒。

不久之后，阿孜木和他的同学们踏进了我的课室。从此，不仅是我的床下常年有可口的哈密瓜，而且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情，由信任、关爱而产生的温情，伴着我熬过了那漫长而又苦涩的日子。

二十　逃亡者

那正是夏收结束，大量上海青年忙着回沪探亲的日子。连队的统计员，人称“眼镜儿”的上海老知青章庭元也打点起行装回去看他的老爸了。临走前，把他手边的报表推给了我。无奈，只好又拾起了这一大摊子。

“连队的老病号，老宫家里的，病假条还没交，哪天，你去家属区顺便问一下。老宫是大车班的甘肃人，你一问就知道。”他走得匆忙，却没忘了嘱咐我。

那个时候，大量的“盲流”被兵团接受，连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兵团的户口。于是，一排连一排的地窝子以及地窝子前后的鸡窝、菜窖、堆杂物的棚架、山一般高的柴堆，以及大人喊、孩子叫、鸡鸣、狗跳，组成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地方—— 家属区。

躲过狗叫，跳过一群正在争食儿的土鸡，走进了老宫家的栅栏门。这小院儿可真齐整，扫得露出了瓷实的土地，那是不知泼了多少水，扫了几万遍才能达到的效果。看着码得见棱见角的柴火堆，我心里叹着老宫的勤劳能干。拉开嗓门儿叫：“老宫家有人吗？”

半天，没人应声儿。这是一个完全在地面之上的“地窝子”。两面山墙和后墙外都是用土堆得严严实实的，只留了两扇窗户，乍看起来，挺像个“半地窝子”。正面门窗俱全，只在窗下有两个土包儿，再细一看，哪

儿是什么土包儿，分明是两个糊得挺好的鸡窝，肯定是冬暖夏凉的，鸡们正在里面歇着呢，嗬，美的！

我没辙了，只好上前拍门。门上没挂锁，必是有人在家。

门没闩，吱咀一声，开了，一条竹门帘。挑开竹门帘，是个厨房间，灶台抹得溜光。小碗橱上还蒙着绣了花的白布单儿。烧柴灶的烟熏火燎的小厨房，竟是这般洁净。厨房里弥漫着腌酸菜的香味儿。

厨房和里间隔着一条绣花门帘。这条门帘绣得很美，浅蓝丝线绣成一大串吊钟兰，弯弯地撒下来。

门帘挑起来，露出一张两颊潮红的脸。甘肃一带风硬，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妇女们都有鲜艳的两颊。上海小青年嘲笑她们是甘肃洋芋蛋；我倒觉得，只要她们吃饱了，不失一种天生的健康气色，绝非苍白的城市青年抹过便宜雪花膏的肤色可比。

老宫家的，却是一脸病容。两条眉毛柔顺地垂着，眼睛毫无神采，两颊的潮红让人想到晚期肺结核病人。她身上干干净净，蓝的卡上衣，黑条绒裤子。大热天，穿这么厚，肯定有“老寒腿”。

“韩老师，屋里坐，我腿脚慢，没去院里接你。”她浅浅笑着。

“怎么称呼呢？头回见面，总不成叫您老宫家的。”

“叫我老马。老宫一直这么叫。”她笑笑。

“大章回家探亲了，我替他一个月。”我说了来意。

她忙把床头小桌上的病假条递过来。

“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休息一个月。”一个月的假条，是场部卫生队大夫开的。这可少见得很；想必她的腿疾确实是够瞧的了。

“您怎么治呢？”我关心地问。

“打针、吃药、针灸，西医中医都求遍了，就是治不下呢。”

“那就好好休息，戈壁滩上，一天当中温差太大，您自己多当点儿心

比吃药可能还强些。”

她露出笑容：“你难得来；我家没孩子上学，更不见你的面了，坐坐，我刚沏的茶，你喝一杯。”

我坐在一把白木椅子上，她两腿拌蒜地走到蒙了白台布的方桌前，掀开一方小布巾儿，取出两个白瓷小茶碗儿斟上热茶，想捧过来。

我赶快走过去，接过茶碗，“您快坐下吧，看您腿抖的。”

她顺势跌坐在床沿上，两手捶着膝盖，那一双手，骨节又红又肿，手指却细长细长的。唉，这受苦的人儿！

我啜着热茶，好香，再一吸溜，鼻子里竟又钻进那细细、甜甜的酸菜香，我不禁又咽了一口口水。

“您腌酸菜吧？”忍不住我还是问了。

“你爱那吃食？”她边问边撩起台布，下面是个小白木架子，摆着三四排小瓷坛，都严严地封了口。她捧出了一坛。

“带回去吃，住集体宿舍的人儿，吃啥哩？吃空了，带回坛子，我再给你装。”

我这份儿高兴就别提了。再涩的窝窝头我也不怕啰，酸菜下饭着哪。

再看那小坛儿，一层黑釉子亮光光的，捧在手里，海碗一般大，多可人儿。

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大章大概没少吃老马的酸菜，念头闪过，自己也挺讨厌自己。

拿了假条，老马一迭声地：“腿脚不灵便，不送你了，有空常来。”

“我会呢。”我扬扬手里的小坛子，走了出去。

一个巴扎天的下午，我从铁木尔校长家出来，手里提个小篮子，篮里满满一筐白杏儿。一拐弯儿，看见一个汉人打扮的妇女走进铁木尔的邻居家，她头上蒙着蓝底白花包头帕，大概是位“盲流”关外的四川妇女。她

的臂上挽着个大篮子。

阿拉木汗告诉我，常有兵团的家属来镇上社员家买点鸡蛋、白杏、葡萄干什么的。说完了，我也没在意，高高兴兴地在巴扎上转了一阵，美美地喝了两碗酸奶，优哉游哉地往回连队的小路上走去。

远远地，公社的马群回来了，马儿吃饱了，慢慢地踏着小步，赶马的维族青年在马上唱着歌儿，一幅常见的牧归图。忽然，马儿扬起的灰尘里飞出一骑，马蹄跑成一条直线，骑者无镫无鞍地紧贴马背，头上的蓝底白花头帕被风吹得支棱起来。她两腿紧贴马肚，和马融成一体，真是棒透了。

我停下脚步，看得发呆，牧马的小伙子却是一副司空见惯的神情。马儿们也没有惊惶失措。看来这骑术娴熟的高手是常来这里“过瘾”的。

毛拉河对岸，红柳丛下，停着一挂兵团的胶皮轱辘大车，车里堆得挺高的纸箱子上边一只荆条篮子。老宫正站在车辕旁边，拿小刀削一根柳条棍儿。

七弯八绕，我走近了，老宫一脸尴尬的笑。不出一分钟，我就明白了，从另外一条小路上，健步如飞走过来的正是方才挎篮买菜的妇女，也是那位在戈壁滩上纵马驰骋的女骑手，老马。昔日弱不禁风的老马，病假期间竟是这样生龙活虎。

老马走到跟前，掏出一块小手巾儿抹一抹额角的汗，向我招呼着：“韩老师，赶巴扎啊！”然后，一步跨上大车，向老宫笑着：

“还愣着干啥，还不招呼韩老师上车?!”话音儿一落，她把包头帕往前一拉，遮住前额，恢复了低眉顺眼的样子。

老宫似乎过意不去，“病还没好，骑甚马哩？”又朝我尴尬地笑。

我笑笑，心想让我碰上，是你们运气，让别人碰上就惨了，话到嘴边，没说，只当什么也没看见，过去就算了。

胶皮轱辘大车跑得挺快，三匹马在前头，嘚儿嘚儿跑得一股劲儿，大

概是急着回家了。

“老宫，唱个爬山调，怪闷的。”我央求。

“好咧，唱上它一个：‘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老宫放开嗓子唱了，老马低头听着。

他们不是甘肃人吗？唱得却是青海民歌。

我好奇地打量着这夫妇俩，又一次觉得李姨的话对，兵团深不可测，啥人都有。

爬山调唱了一首又一首，老马神情怡然，眼望蓝天白云，人随着车子左摇右晃，一副陶陶然的样子。

看到五连的伙房了，老宫收了声，老马垂下头，只听得马儿喷鼻，胶皮轱辘咯吱咯吱，空气重又凝住。

家属区旁边，老宫吆停了车，跳下来，伸手架住了老马的腋窝，老马轻得像片叶子落在道旁的灰土里。连队的老娘们儿向她招呼着：“赶毛拉去了？买了点啥子好东西？”

“买了几个蛋，还在车上撂着，自家鸡三五天才下一个，实不够吃呢。”老马挥手，老宫赶车朝前走。

“可不，病恹恹的身子，能补就补吧。”身后，传来问话声，“鸡子儿咋卖，还是一块钱五个？个儿大不？”

“这会儿集上一块钱三个呢，回头老宫拿来家，叫小三过来拿上几个……”回头看，老马和人说着话儿，步履艰难地一步一晃。

我看了老宫一眼，他只埋头理着马缰绳，“我还得上大车班卸车去。把你放连部门口，中吧？”

“中！”我挺爽快。

老宫犹豫着，想说点儿什么，末了还是什么都没说，“驾！”一声吆起马儿，奔大车班去了。

日子过得快，一晃一个月，我的酸菜吃完了，抱着小坛儿奔了老马家。

风平浪静的一个月拉近了我和老马的距离。

“看你跑团部深一脚浅一脚的，想学骑马不？”

“想。”

“找条缀过厚补丁的旧裤子穿上，哪天，让老宫守着道，我教你。”

“得多久学会？”

“不怕摔，一后晌就成了。学驾驭牲口，不能隔夜；头天不成，二天怕了，上都上不去。”

到了那一天，可是大开眼界，老马像胶一样粘在一匹儿马身上，逼得它绕圈、低头，乖乖地左转右转，顺脖子淌汗。然后，她给它安上嚼子，架上鞍，把马缰绳递到了我手里。

“望风”的老宫抢上来，“老马，别瞎鼓捣，看把韩老师摔着。找匹走马让她练吧。”

“走马还用练？儿马蛋子能骑，啥马不能骑？上！”老马一举手把我送上了马背。儿马就等这一秒哩，它把它在老马手里受到的全部怨气丢在了我身上，它狂跳，扭过来，扭过去，两腿直立，又嘶又叫。它看看我还在它背上，低下头，乖乖走了几步，我刚松一口气，只听得老马叫：“小心了。”我还没明白过来，儿马屈下前腿，撩起后蹄，又蹬又踹。这一下，我完了，头朝下，直栽下来，腰上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两眼直冒金星。

这一摔，多少年来压在心底的火猛然间冒了出来。不等老马跑近我，我一下子蹿了起来，狠狠抓住儿马的鬃毛跳上马背。

这一次，时间大概停住了，愤怒的儿马和发了狂的我干上了，过了足足有一个世纪，它终于耗尽了它的力气，我也差不多虚脱了，最后，我完全趴在了它的背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到我和它的汗混在一起，滴到了面粉一样的尘土里。

它站下了，回过头来，黑黑的大眼睛温柔地看着我，伸出舌头舔着我被马缰绳抽得鲜血淋漓的手背。

我赢了，赢得好苦，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是我忍住了，只任泪水滚滚而下。打那以后，我往场部送稿子，上团宣教股领教科书可以骑马了，我喜欢那匹儿马，它很快就长得膘肥体壮，那双眼睛还是又黑又亮，我叫它我的“小星星”。

而降伏“小星星”的那个晚上，我在老宫家吃了面条、腌酸菜，吃饱了，喝足了。老马把什么草放在小盆里用水煮煮，让我泡手、泡脚，她说“伤口好得快”。

夜深了，老宫坐在火前，把大块红柳根塞进灶门，红柳根经烧，火力又大，火墙不一会儿就热乎乎的了。秋天，戈壁滩上的夜凉得浸入骨头，老宫家却是暖洋洋的。

“老马，给我说说你的事儿。”捧着热茶，我开了头儿。

热茶冒着白气，罩住了煤油灯的亮儿，给老马的脸添了一层肃穆。

“其实，真说起来，几句话就完。

“老白家，我原先的当家的，死啦，死得冤，死得惨。

“六七年破四旧，青海不是远吗，啥都得晚上一年半载的。正赶那时候，我老白家庄子上死了人。多少年了，咱青海回民家死了人必得用白布包上才能入殓。那个年月，布票少得可怜，丧家人口又少，一家人一年不添衣裳也扯不下那二丈白布。他们上公社要求提前发给点布票，二年还上。公社不准，说那是旧风俗、旧习惯，应当破除。尸首搁屋臭着，庄上人心酸。几个老婆婆连夜搬出纺车、织机，在自家家里织了土布，装裹了死人。公社听说了，报告到县里，县里机关的造反派们就下到了庄子上，说是四旧非破不可，毁了织机，打伤了纺纱织布的老婆婆，还要“追穷寇”，说是什么“痛打落水狗”，扒了坟，扯下死人身上的白布，烧成了灰……

“丧家跪了一地，求他们放过死人；不中，又踢又打，完了，还得罚跪，跪在主席像前头请罪……”

老马眼睛大睁着，两眼闪着光，冰冷的双手捧着茶碗，茶碗在哔哔地抖着。

心里什么东西直翻涌上来，我有一种反胃的感觉。

“老白家老爷子挑头，跟造反派们干上了，把他们捶得顾了头顾不了腚，逃回县里。”

我的心凉了。

“我们知道庄子里呆不下了，一干人马拉进了荒山野坡，男的拿上斧头、马刀；女的洗衣裳、做饭。”

这可是逼上梁山了。

“这号日子没过上半年，扛枪的来了，说是‘支持地方左派’，人家有的是洋枪洋炮。咱还能怎么地呢？

“老白家老爷子跟老白兄弟五个都枪毙了，人死了，不让留全尸，把人头挂在木杆上，说是反革命犯的下场。鹰把肉叼净了，还不让庄里人收尸。”

“女人们下了大狱。”

“你也坐牢了？”

“呆过拘留所、大狱、劳动队。”

“你怎么来了这儿？”

“跑呗……跑到新疆就遇上了老宫，自己乡亲。”

“你们有孩子吗？”

她愣住了，呆呆地瞧着我，我有点慌。

“我是说，你和老白。”

“有个儿子，今年该五岁了。”她低下头去。

我不敢问。

她抬起头来："早就到了乡亲们手里，没遭罪。"

我已经无话可说，惊心动魄的一切都被老马三言两语地打发了。

热乎乎的火墙无法抵抗那潜入心底的寒意，我冻透了。

平淡无奇的日子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声中滑过去了。

一年多了，老马依然"病病歪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宫依然驾上大车早出晚归。

直到一个风砂蔽日的下午，全连在"紧急集合"的口哨声中发抖，急匆匆赶向操场，按班排站定，人们才赫然发现，戴着手铐站在操场中央的正是那病弱的老马。她的身后站着两个团部来的武装民兵，老宫站在她身边，手里提着手铐链子。

我关上教室门，赶到操场上，正听团政法股的一个干事在宣布一个"通令"：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 师 ×× 团政法股通令：

马星华，原名马秀花，女，回族，现年三十岁，原籍青海 ×× 县 ×× 公社 ×× 大队，出身贫农。

马犯原为反革命叛乱首犯白 ×× 的儿媳妇，反革命叛乱分子白 ×× 的老婆。马犯本人曾积极参加反革命叛乱活动，罪恶极大。

新生的革命政权曾判其劳动改造，以期该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

灭的……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马犯在劳改期间极不老实，千方百计逃避改造，竟然引诱看管人员，终至怀孕。革命的同志们，孰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干事竟义愤填膺起来。

口号声响成一片："反革命犯、破鞋马秀花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劳改单位组织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允许马犯在劳改农场附近一公社医院生产，马犯竟在产后跳窗逃跑，流窜新疆，改换名字，妄图混迹于革命队伍，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

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兵团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容欺骗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终于揭开了这条美女蛇的画皮，把她的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阵狂风，卷走了口沫横飞的干事的声音，砂石打在人们的腿上、脚上。老马低着头，任狂风刮得手上的铁链哗哗响，纹丝没动。

场革命委员会决定：鉴于马犯健康情况恶劣，从宽处理，将该犯押往场部基建队，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例行的口号声中，依稀可听到喊喊喳喳的妇女们的议论："真看不出，老马还是个人精儿呢，刚生完就能跑……"

也有压低了的声音："不定又是啥冤枉呢，瞧她病恹恹的，不像呢。"

"咋不像？要不就是化装成美女的蛇了！"那是妇女班长刘作凤的大

嗓门儿。

没人再说什么了。

老宫——雇农出身的盲流——陪老马迁了户口，一块儿搬到了基建队，在那里，他还赶大车。上毛拉拉货，经过我们这儿，还给我带酸菜来。

“老马怎么样？”

“还行，看菜园呢。她种的西红柿又红又大，好吃着呢。”

老宫笑笑。

过了几个月，老宫专程来了一趟，带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正是伙房开晚饭的时候，外边儿尽是人，老娘儿们七嘴八舌地围了过来：

“这是你和老马领的孩子吗，怪机灵的。”

“甘肃老乡，家里太苦，带过这边，交给我们了。”

“瞧，老马的手巧的。”老娘儿们捏捏孩子齐齐整整的对开襟中式小褂，拽拽他的蓝布裤，评价着那还未沾灰星儿的白线袜和做工细密的千层底儿布鞋。孩子闪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信赖地瞧着那些叽叽呱呱的婶子们，听她们夸老马的巧手，心里大概是挺舒坦的。

我带他们进了空无一人的教室，拉着孩子的小手，和他一块儿坐在一条长板凳上。

“你叫什么名字？”我看着孩子的眼睛。

他看看老宫。

“孩子，韩老师是你的亲人，告诉韩老师。”老宫摸摸孩子的头。

孩子大眼睛忽闪着：

“宫少白。”

我抬头看老宫。

他看看窗外：“不瞒你，这是老白的一条根，千难万难可找回来了。”

孩子抿着嘴角，眼睛里两朵小火一跳一跳的，像煞了骑在马背上的

老马。

“念过书吗？”

“念过半年，另半年给大队干部家放羊，拾柴火。”

“写个字给我看吧，就写‘吃饭’。”

孩子摇摇头，在一张方格纸上写上一个“饭”字，字的前面空着一格：“老师没教过，我就会写‘要饭’，第三课有。”

我知道那个小学一年级第三课的内容：“爷爷扛长工，奶奶去要饭，爸爸妈妈干革命……”可是，除了那些党八股之外，他们就真的不教孩子们一点儿什么？哪怕“桌子、椅子、吃饭、睡觉”呢！

“就是为了让孩子学点真东西，我求了基建队的头儿，送少白来你这儿走读。”

“他们准了？”

“准了，一来孩子是‘领’的，二来我不是强劳人员，我是老马的‘家属’。我就说，孩子亲爹娘又不是反革命，何必让他跟黑九类子女一块儿念书，成天‘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老宫可是五代赤贫，实打实的雇农，农村的无产阶级。”老宫又笑了。

“让孩子每天走两三个钟头的路？”

“怕啥？早上我送，下午他朝回走，我在半道上接，让孩子念吧。”老宫劝我。

“七岁的孩子，太苦了。”我摸着孩子的头。

“我不怕。”少白认真地看着我。

无论风雨，不分寒暑，少白成了我教过的一个最守时、最用功、最顽强也最少言语的好学生。

七四年，我被迫离开学校，少白不来上课了，却在星期天跑来，听我讲故事。

我离开新疆，少白诚心诚意地送给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了两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娘叫我写的。"少白说。

他还告诉我："韩老师，总有一天，我爹、我娘跟我都回青海去。爷爷跟叔们不能白死了。"

我抱住孩子，眼泪滴在他柔嫩的肩头上。十岁的小人儿用他的已经粗糙的小手给我擦擦泪，他笑着："老师，爹说，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长着呢。"是的，长着呢，离开新疆，万事才开头呢。少白和老宫说得对。

二十一　暗流

“文革”还远远没有结束，一个一个运动还在接二连三地进行着，“上山下乡，扎根边疆干革命”的口号还没有作废。返城，绝对是一种“反动”，绝对需要谨慎进行，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极耐人寻味的故事。

我和章庭元、陈建互相认识，敢于直话直说，始于“大批判”高潮中。

那还是六十年代末，“大批判开路，大批促大干”的“红火”日子。

我接到连部统计员撰写的通讯稿，前面的“形势大好”的大帽子下面是相当数量的数字和百分比。其中一项是畜牧业发展情况，内容如下：“今春新生羊羔三七六只，死亡四〇二只，存栏头数增加值为‘负二六’只。”负数还算增加值，而且写在“大干促大变”的成绩内。这不是天方夜“谈”吗？

我找到了连部，刘水舟、章庭元和另一位眼镜都在，我只好把他请出去，当面问他：

“你给我这种数字，叫我怎么念呢？”

他非常认真地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统计，统计的数字就该是确实而可靠的，“存栏增加”只有负值，这是“铁的事实”，他无力更改。

我笑问他：“你前边大谈形势，后边给我个增产负值，这不是大帽子

底下开小差吗？”

他还是一本正经，大帽子是照本宣科，闭着眼睛抄的，统计数字却是他精确核实过的，绝没有开小差的意思。

还是刘水舟有办法，他听见我们谈了半天了无结果，把我们叫了进去：“你们真是死脑筋，有没有总存栏头数？”

我们肯定地点着头。

“这不就行了，就写上畜牧队的同志们如何不怕辛苦，日夜操劳，现在连队共有长毛羊 ×× 只，个个膘肥体壮。不就行了？”他两手乱摇，比划着，“什么新生数、死亡数，一概不要，有一个数儿就成，有一个数儿就是落了实，不用又加又减的，念起来也容易。”

老刘不愧是搞形式主义的高手，他得意洋洋地把莫合烟叼到了嘴上。

“来，来，来，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正要你们来帮一把呢！”他看看愣在当地的我们，“过来，都坐下。”

那位眼镜笑笑，往旁边让一让，于是刘水舟和我们三个就围着连部办公室的桌子坐下来了。

“最近有一个内部传达文件，传达了文化旗手江青同志的指示，因为是内部文件，不能记录，我也就没写下来。”刘水舟的小眼睛带着笑，从我们脸上扫过。

我们三个人都认真听着，没有一个人脸上有丝毫笑意，充分显示出我们对他的话不但没有丝毫怀疑，而且确实诚惶诚恐。于是他满意了，眯着眼睛，透过烟雾，继续讲下去：

“要组织批判呢。”他一顿，手一挥：“写文章、刷墙报、广播，要造成声势。”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前不久，“旗手”指示批“三个斯基”（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把人弄得精疲力竭了，这

一回，又轮到谁呢?

“一个姓沙的，英国人，资产阶级，”刘水舟记性不错，还说得上来，“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写过不少黄色剧本。”

我们三人做声不得。他们两个端着眼镜儿，眼睛眉毛都皱到了一起。

“莎士比亚！”我说。

“对，就是那么个音儿。”刘水舟一拍桌子，跄踉到了椅子上，来了精神。

“这个莎士比亚，恐怕还不能批呢。”那位不相识的眼镜儿谨谨慎慎地开了口。

“他叫陈建，刚从别的团调来。”章庭元悄悄告诉我。

在刘水舟的一再询问下，陈建向他详详细细地解释了莎翁不能批的道理，主要论点是：莎翁戏剧的出现正是在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所以，“用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当年的莎翁是反封建的，是革命的。”陈建力图说服刘水舟，“而且，他写戏的对象都是平民，用今天的话说，他的文艺路线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可怜的莎翁，我忍不住笑了。

刘水舟也笑着：“那个时候是革命的，今天可能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姓沙的反封建，可他继续革命了吗？没有，他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腐朽、没落的，是有毒的。还是得批。”刘水舟非常高兴了，他非常得意于他在修辞学方面的巨大进步。

“指导员，莎士比亚批不得。”我决心助陈建一臂之力，脸上是绝对的推心置腹。

“马克思给他二女儿劳拉的信里有一段话，要劳拉多读莎士比亚，许多名句要背下来。”

“跟咱们背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差不多？”刘水舟从嘴角上拿下了那支莫合烟。

“我不敢说他的作品有那么伟大。不过，马克思的原话确实是那么说的，咱们这儿就有。”

我从架子上那一排排的“红宝书”旁边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找到了那封信，摊到了桌子上，指给刘水舟看。

他仔仔细细地瞧着我给他翻开的那一页。他轻轻地把莫合烟放进一个大海碗里按灭，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指头，顺着我点给他的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据说他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我们都认真地陪他看着。

他皱起眉头，一脸痛苦。

“马克思是说了，可文化旗手的指示，中央文革的决定，咱们还得照办不是？”

“别着急，指导员，这个内部文件都是口头传达，对不对？不定一级一级从北京传到这里，传走了调子呢，马克思当然不会有错，‘旗手’也不会错，错的，恐怕是中间传达上级指示的人，弄不好，领会错了领导意图也是可能的。”庭元的话简直让刘水舟直跳起来：“照你说，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等几天，别的地方都动起手来，有那么一点声势了，咱们紧跟就是了，这儿的几支笔都够快，您放心就是了。”我“献计”说。

“要是过几天，没什么动静，想必是传达有出入了，咱们就当没这回事，中不中？”陈建补充。

“中！不赖，三个臭皮匠，还真顶一个诸葛亮哩！”

过了些日子，再没听说要批莎翁的事，于是不了了之。庭元总结说：“在拯救莎翁于水火之中的关键时刻，我们配合默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终于闹清了陈建调动到我们这个“草都不长”的苦地方来的真实目的。他是为上海女青年排排长阿玉而来，阿玉已经是预

备党员，是一个“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青年、好干部”，是一个穿着黄军衣、留着齐耳短发、两颊红喷喷的当然左派。

我听见过庭元的精辟分析：

“陈建，你这个老右派的儿子，吃了什么迷幻药，爱上了阿玉？阿玉，是你能爱的吗？你配吗？！”

“再说，你看她五大三粗的，你看你，一副落难书生的模样，也不般配呀，你还是醒醒梦吧。”

“就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阿玉温柔、体贴，不是你看见的样子。”陈建嗫嚅着。

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庭元瞪大了眼珠子，我也不得不对陈建刮目相看了。

那正是“大学、大批、促大干”的时候，“老两口儿学毛选”、“小两口儿学习老三篇”、“兄妹二人学语录”……都是各种规格、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传统节目”，演不败的。在我们的记忆里，阿玉和陈建永远在公众场合出现，阿玉手中又永远有那么一本“红宝书”，他们的“促膝谈心”永远不避人，而且永远与“不断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密切相连。

他们也有独处的时候？！

刘水舟对他们的“恋爱”是公开支持的。他自有一套理论。

“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的党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我们的优秀党员是要同社会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作斗争的！我们难道没有力量把‘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改造过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刘水舟拍了板：“黄阿玉同志和陈建同志的关系是有革命意义的。”

当然，革命意义不能当饭吃、当房住、当床睡。阿玉在向各连、各团、

各师作报告宣传如何和陈建一起苦读老三篇、改造世界观的时候，陈建利用业余时间一头扎进了小家庭建设。他在做一套家具，包括双人床、床头柜、写字台、书架、五斗柜、衣橱、碗柜、饭桌、板凳和椅子。

工程大，所需的木料多，可是并没难倒这位有心人，他手边的家具逐渐多起来。

上工、下工的路上，人们总看到陈建低头寻觅着什么，至于木工房门外堆刨花的地方更是他每日必到之处。久而久之，人们被感动了，有人拾到一小块木头，总会丢到陈建门口，叫一声："木料一块！"里面定会快活地应一声："谢谢啦！"

陈建的成就是显著的，一件件经过细细打磨的家具，光可鉴人地站在屋角，人见人赞。每当人们小心地摸着它们，试着开关，询问着哪儿找来的精巧的把手、合页。陈建总是在一旁抹着头上的汗水，笑眯眯地回答着人们的询问，再一次欣赏着这一切。

随着陈建小家庭计划的步步实施，风声越来越大，人们纷纷传说着，阿玉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要去上大学了！上大学，意味着户口转入大城市，三年两载之后，由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工作。重回戈壁滩的可能性几等于零。

阿玉在这种风声里，三缄其口。每登台讲话，必是"铁心务农，扎根边疆干革命"的老调。

陈建脸上偶有愁云，然而意气风发的阿玉在讲用会上口号式的发言又总能适时地扫掉这些愁云。章庭元几次警告他，要他"面对现实"，只是使他手中的锯子稍稍放慢速度而已。

七三年的秋收之后，人们在收了玉米的田地里加筑埂子，准备灌水，播冬小麦。

刘水舟来到打埂子的人们中间，说着、笑着，最后蹲到了陈建刚拍实

的埂子上。

“小陈哪，阿玉上大学的事定了，教育体制改革，明年春天入学。”

陈建双手拄锹，立在那儿，好一会儿才定下神来。

刘水舟只是来告诉陈建这一消息的，他并不想听见或看见陈建的反应。

这个时候，正好走过来两个人，大大提起了刘水舟的兴致，他轻松愉快地找到了缓解周遭沉闷气氛的好法子。

迎面扛锹过来的一老一少是三个月前由基建队转来的。老的姓朱，据说是一个被俘、被关押、被改造二十五年之久的前国民党少将。中央有政策，将领级的前国民党军人可视情节释放回原籍。据说是“统战”的需要。因此，老朱由二劳改的基建队来到普通连队，为他的返乡作最后一个“过渡”。年轻人却是一个“神偷”，人称“小佛爷”。多年来，他在兵团没再作案，而且据说他“得了病”，正准备“病退”回天津，所以也按“人民内部矛盾”，转到普通连队。

这一老一少走在一起十分滑稽，老的虽然一身旧布衣，但补得十分齐整，风纪扣都扣得严严的，挺胸抬头，目视前方，无论脚下七高八低，走起路来仍是平稳有力。小的却敞胸露怀，吊儿郎当，左摇右晃。

“小佛爷，干什么去？”刘水舟乐得招呼他。

“回家，今天四百米埂子，完了完，谁打得了，谁早走。”小佛爷振振有词。

“你那埂子合乎质量吗？”刘水舟还在逗他。

“我跟老朱合伙儿打的，你问他。”

刘水舟瞥了沉默不语的老朱一眼：“跟老朱一块儿打的，那是错不了板眼。”

“指导员，来一根儿。”小佛爷顺竿爬，索性蹲了下来，问刘水舟要根烟抽。老朱似乎没有单独行动的习惯，站在了一边。

刘水舟扔过去一根烟，开了口："小佛爷，这么多年，没弄点啥，手痒不？"

"手痒有啥法儿？你看看你们这个穷地方，有什么值得我伸手指头的？"

"嗬，你还有两套呢！"

"那可不，把你们连盆盆罐罐都加上，还不值老朱这块表呢！"小佛爷高了兴，顺嘴胡扯了。

刘水舟来了神儿："老朱，啥好表，我看看。"

"欧米茄，瑞士名表。"小佛爷仍在吹着。

老朱静静地撸下腕表，递给刘水舟。

刘水舟把表托在掌心里端详良久："看起来不咋样嘛，白喳喳的。"

"白喳喳的！你听听那钢音儿，嚓嚓、嚓嚓，你听见过吗？"小佛爷有心要出这个"老土"的洋相。

刘水舟眯起眼，把表贴在耳朵上，不一会儿，他笑了，笑牵动着他的嘴角，抚平了他颊上的皱纹。他睁开眼，把表戴好，一拍大腿站起身来：

"好，小佛爷，人都说你有千只手，今天咱们就叫个真儿，看你是不是真有千只手?!"

"怎么个玩儿法儿？"

"两个小时之内，你把这块表从我腕上摘走。"刘水舟一脸的认真。

"要是我摘走了呢？"小佛爷紧追不放。

"你病退的事儿一办好，我二话不说给你迁户口，让你滚蛋。"

"你说话算数。"小佛爷一蹦多高。

"你要是摘不走呢？"刘水舟笑着追问。

"这辈子当定了农工，下辈子在五连做牛做马。"小佛爷信誓旦旦。

说说闹闹之间，老朱的表就戴牢了，一行人走走停停离开了田间，人

们早已忘了陈建的事，他在刚打好的埂子上拍了最后一锹，甩锹上肩，闷头跟在人们身后，向连队走去。

远远地，刘水舟在问："晚上吃啥？"

"菜包子。"伙房的人大声吆喝着，马上招来一片口哨、呼啸声，人们快活地叫着、喊着。

"我先尝尝……"刘水舟钻进了雾气腾腾的伙房。那一老一少夹在收工的人们当中，向宿舍区走去。

晚饭，人们正在宿舍门口闲坐，庭元端着一个茶杯走了过来。

"阿玉找陈建去了。"他开门见山。

"她怎么说？"我还真为陈建担着点心，大学生不准结婚，阿玉又不能结了婚再走，他们这事儿，可真有点儿玄。

"师里一个干部看上了陈建打的那套家具，想买。"

这可是凉透了，阿玉拿着陈建的心肝宝贝当了买路钱。

"陈建说：'何必买，想要，拉走就是了。'"庭元告诉我。

我们无话可说了，他喝他的茶，我喝我的汤。

忽然之间，刘水舟急如星火，扎煞着两手，匆匆奔过来，一路呼喝着。

"小佛爷，好你个小子，给我滚出来。"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千手千眼小佛爷在此。"小佛爷从宿舍里钻了出来。

"表呢？老朱的表呢？"刘水舟气急败坏。

"物还原主，在老朱手上。"小佛爷轻描淡写。

"好你个小子，你什么时候偷走的？"刘水舟笑了。

"多难听，你就不会换个字眼儿？"小佛爷一本正经，"您进伙房跟大师傅抬笼屉的时候，雾气腾腾之中，我就摘下来了，顺手还给了老朱。"

老朱在不远处扬了扬手腕，于是一切归于笑骂之中。

我和庭元喝干了手中的汤和茶，闷闷坐着。

一个月过后，庭元陪老朱来找我。

“老朱调回上海的调函来了些日子了，刘水舟不肯放人，你能不能从中说一说？”

我就找了个机会，向刘水舟探探路：“老朱离家二十五年了，放人走算了。”

“他那块表实在可人，不知他肯不肯让。”刘水舟真上路，马上就说了实话还伸出五个手指头，“我出这个数儿。”我当然明白那是五十块人民币的意思。一块如假包换的欧米茄，让我说什么呢？

老朱听了我的回话，笑了，“身外之物，他要，拿去就是了。”

老朱的表卖了。刘水舟义正词严：“怎么能白要？我买！”他花了十块。

“老朱，真对不起，我胡说八道，累您丢了表。”小佛爷一脸尴尬。

“哪儿的话？身外之物。”老朱又淡淡一笑。

一个下霜的夜，师部的卡车来了，拉走了陈建的家具。阿卡坐进了驾驶楼，她要先回上海度假，然后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迈进复旦的大门。车厢里伴着那一套人见人爱的家具，还坐着两个人：老朱回上海，回那个空无一人的“家”，小佛爷“病退”回天津。

四壁透风的大伙房里，我们正听陈副连长训话，“目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我们连出了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连我们贫农出身的刘指导员都戴上了‘哈密瓜’牌的表！……”

伙房外，师部大卡车的前灯亮了，照着地上那一层白霜。

我看见了陈建紧锁的眉，苍白的脸，他递过来一个木盒子。

“积木，给孩子们玩。”他闭了嘴，扭过头去。

盒子是那么光滑，毫无声响地，我拉开了盖子，取出一小块，在手里把玩着，那是一个寸把长的小长方体，上了清漆，光滑、细腻得让我觉得

像是用石头打磨而成，只是它的重量还是告诉我，它确曾是陈建做那套家具时的下脚料。

积木，是学龄前儿童的玩具。我的心被刺痛了，如果不是这样，陈建将是一位怎样尽责的父亲。

父亲、母亲，不错，我们都到了做父母的年龄，但是我们不愿、不能做父母，我们将加入那汹涌的暗流，回城，回到抛弃我们的城市去。

从庭元和陈建冷冷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他们的决定。

陈副连长的公鸭嗓子还在叫着，刘水舟腕上的表在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闪亮。

这离我多么远，第一次，我问自己，我有没有机会？我的机会在哪里?!

二十二　该来的迟早躲不掉

日子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初冬，“评法批儒”已经揭开了序幕。兵团内部缺少“可以信赖”的饱学之士，“批”和“评”都在不大易之列，于是勉为其难地展开一个以学马、列、毛“经典著作”为主的学习运动。

一天半夜时分，夜猫子的我也早把经过乔装打扮的《搅水女人》塞在了枕头下面，做开了梦。

“砰砰，砰砰！”玻璃窗被敲得乱晃，我惊坐起来。

“快，来连部一趟！”是刘水舟急如星火的声音。

看看腕上的表，已经过了一点，难道又是“传达中央文件不过夜”吗？运动搞了这么多年，人们早疲塌了。何至于要刘水舟这么惊天动地地闹？心里这么想，手脚可不敢怠慢，忙忙利落地起床、穿衣，捞起毛巾擦把脸，拿上纸笔，直奔连部。

一进办公室，刘水舟一脸愁容正蹲在凳子上卷莫合烟哩。

“睡得懵懵懂懂，叫接电话，听了个糊糊涂涂，明天一早要讲用哩。”

一听“讲用”，我踏实了，毛语录早已倒背如流，怕它个甚！

“你别满不在乎。大意失荆州，明天各连队指导员上台比武哩！”

“比武？”我心想，“比武，你叫我干吗？”

“就是讲用比赛哩！”刘水舟双眉皱成一团。

我摊开纸笔，“什么题目？你得讲几分钟？”

“题目？就是题目没听清哩，叫什么哥哥批判。”

我差一点儿没笑出声儿来，看刘水舟那个酸样子只好忍住，耐心地问：“没听说毛主席有这么一篇文章啊，是新的指示？”

“不是，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这句，我还听清楚了。”他说。

指导员讲用马列著作？这题目可有点儿水平了。不禁好奇地问：“是谁的点子？招儿够高的。”

“新来的团参谋长，现役军人，原先在兵团马列学院当政委哩。”

“兵团马列学院的政委，怎么来咱们团当参谋长了？”

“你可别乱说，听说是生活问题。”刘水舟放低了声音，一脸正经，“不过，参谋长马列主义水平高可是谁都知道的。”

嗬，这位参谋长为了女人可摔得够重，从天山顶儿上摔到沙漠深处来了。

“你别走神儿，快帮我想想。”他催我。

“您听清了，不是要写批判稿，是要‘讲用’？”

“对着哩，啥子学习体会。”

“那就对了，是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体会。”

“你咋知晓？”他在凳子上一跳。

“上个月团宣教股发了学习材料下来，有这篇文章。”

“咱啥时候学习了？”

“全连大会上您作的动员，我在广播上，每篇文章溜溜儿念了三遍！”

刘水舟眉毛眼睛都归了原位，一脸的笑：“有两下子！”稳稳当当地坐到了板凳上。细心地卷上一支莫合烟，笑模笑样地瞧我蹬凳子爬高，拿下一堆书，东翻西找，弄来几段。

天下文章一大抄呗，我就抄开了。不但抄还得发挥呢，还得上挂下连

呢，硬是从一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对派的论战引申到今日中国“为捍卫马列主义纯洁性”所作的诸般斗争。由粗到细，由远而近，一直联系到目前的“评法批儒”，反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之说。最后归结到“继续革命，反对倒退”的大口号下。总而言之，简而言之，这是满篇的空话、废话，绝对是“假大空”的经典之作。

几大篇儿，四十分钟，一挥而就。念了一遍，新名词儿一大堆，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刘水舟听得眉飞色舞。

“不赖，有水平。”他拍了桌子。

于是开始摇头晃脑地跟着我念。

两三个钟头下来，他居然也能拿上稿纸，结结巴巴地念下来了。他还挺用功，一定要念得有腔有调才算。真难为，那些诘屈聱牙的外国人名和长长一串的什么什么主义都被他标上只有他懂的注音符号，念得满顺口了。

天亮了，刘水舟推开办公室的门大叫：

“备马！”

通讯员早把马备好，拉了过来。刘水舟穿上军便服，细心地把稿子装进胸前口袋，扣上扣子，上了马。

他拍拍马脖子：“不敢打晃啊！一摔下来猛可全忘了。”

他一走，我直念佛，老天保佑，刘水舟过了这关，我也就太平了。

中午，正在水房打水。直见往场部的路上烟尘四起，一骑在灰土迷蒙中飞奔而来，马上的人还一路嗷嗷叫着。

大家凝神看去，来人竟是刘水舟，他衣领敞开，满头是汗，沾上了灰，成了个真正的三花脸。他的两只小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嘴里不停地吆喝着：

“小韩，放假半天，下午补休！”他在水房门口下了马，把马缰绳往旁边人手里一塞，大大咧咧地对我喊。

“怎么着，指导员捡了洋捞儿了！”

“捡啥洋捞儿，别瞎说。这回各连指导员讲用，五连第一！”他喜上眉梢。

原来，他“扛”回一面小红旗。这面小红旗虽小，却是真正红缎子做的，上面还用黄丝线绣了两行小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下面更小的字告诉人们是团政治处为各连政治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所颁的奖。

“每连都有吧？”爱打趣的问刘水舟。

“你以为查卫生哪？全团就一份！”他得意极了，脸也顾不得擦一把就和一群人一起走向了连队办公室。不用看也知道，他一准把这面锦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管它，歇半天，整理一下内务也不错。

这个下午，我可是充分利用了。晒上被子，挑水洗衣裳，洗完了，又烧水洗个头，把晒得暄暄的被子拿进来，靠着热乎乎的被子垛，坐在床上补袜子。难得的半天干净，我直盼着日头行慢点，刘水舟却又推门进来了。

“这几年，你为咱们连没少卖力，明天，团里举办通讯员理论学习班。你去吧。”

“我又不是通讯员，你让别人去吧。”

“又写又劳动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是不是通讯员还不是我一句话，叫你去，你就去。”他一脸颐指气使的得意神情。

这是一个礼拜的学习班，也就是说有六天不必扛锹上大田作“无用功”。也好，去就去吧。

到了团部宣教股一看。各连有名的“学习毛著标兵”几乎都在座。我报了到，远远溜边儿坐着，带着耳朵来，听就行了呗。

中午，大家都去买饭票，然后到团部食堂吃饭。我还没在这儿吃过饭呢，听说团里供应比连队好多了。

到了买饭票的窗口，自报连队番号和姓名之后，那小干事抬头瞧瞧我："名单子上没有你的名字，你去马参谋长那儿问问吧。"

他一脸公事公办。

我转身离开，心里明白，被人家耍了。这哪儿是让我来参加什么理论学习班，纯粹是要找我麻烦呢。若转身就走，不明不白的。这个马参谋长是什么牛头马面，我倒要见识见识。

稍一打听，找到了"参谋长办公室"，敲了敲门。

"进来。"男中音夹着南方口音。

我走进去，写字台边站着一个身穿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货真价实的现役军人。

他有五十了吧，两鬓挂霜，干瘦干瘦的。

他说："你是五连的吧？"不等回答，向写字台后面转过去，他的背驼得厉害。

"请坐。"久违了，这陌生的字眼儿，来兵团六七年了第一回听人说。

我坐下了，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

"听你们指导员说，你在连队埋头苦干，表现不错。"

我不说什么，静待下文。

"你写的文章，我看了一些，你是有才华的。"

我知道，这不是正文，仍然等着。

"你的笔很快，可是自从你来兵团，一晃近七年了，你写的批判稿没有一篇是联系实际的，更没有一篇是真正联系你的背景的。"

我不解地看着他。那样"过细"的政治攻势下，人人得过关，家庭出身"黑九类"的，谁不都得把粪水淋得满头满脸？哪个能得幸免？

"我不是泛指一般，我说的是对你父亲的批判和剖析。起码，你得有所认识吧？"

来了，到底来了。

但是，让我稍稍心安的是，现在已经是一九七三年，所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然过去。因为出身不好关禁闭室的事还没有听说过——不是“现行”，进不了土牢房——那么剩下来的，不过是变相劳改，强迫我在力所不能及的体力劳动中“脱胎换骨”而已。我在泥土里已经打了十年的滚，比起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参谋长来，不知强了多少，一股由心底升起的轻蔑不由人地浮在了脸上。

“你母亲是识时务的，检查、批判写了不少，她的单位每次都叫她复写一份，寄到这里。从六九年到现在，也有一尺多高了。”他瞥了一眼桌子上高高堆起的一摞档案袋。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我档案里堆积的这些“罪证”。

为了让我相信，他随手抽出一份，在我面前晃了一下，一晃之间，我还是看清了那熟悉的字体，看清了一个标题“威利·韩恩——一个我不了解的美帝国主义分子”。

隐隐地，几年来所受到的当头棒喝和无数的旁敲侧击都有了注解。

“当然，她并不老实，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耐心的，我们可以等，等她的觉悟。”

“至于你嘛！”他缓了一口气，“身为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女儿，竟对自己的生父毫无认识，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加强了语气，看着我。

我没有回避他的视线，“你们共产党人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掩藏不住语气中的辛辣和嘲讽，“你们不应该忘记，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我父亲在中国期间，正是美国援助中国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时候。”

“你别忘了，国民党是不抗日的，美国只是在帮助国民党围剿我们。”他急红了脸。

“这是你们这么说，历史并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我相信‘重庆精神’。”

他眯细了眼睛，放低了声音："这种言论非常危险，很容易搞成'现行'，变成敌我矛盾。"

我冷冷一笑，"是祸躲不过，更何况是血里带的。"我回答他。

"有个性！"他竟叹了一口气，坐了下去。

"紧一紧和松一松之间，弹性是很大的。"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松一松嘛，我负责把你调到团宣传队来，你的才华埋没在连队太可惜了。"

"条件呢？我得写文章批判只见过一面的老子？"

"别那么刻薄，写不写还不是在你?！刘锦坤那么聪明的人，还不是……"他竟摆出一副知己面孔来。

他提锦坤，我心里反而坦然了，他露出了尾巴，我更觉得他是那么不堪，而我自己却坐得更稳当了。

不等我回答，他刷刷地写开了，递给我便条一张：

"请售予该同志团部食堂饭票。"下面是他龙飞凤舞的签名。

瞧，他推得多么干净，不但没有我的名字，连日期都没有。万一有事，他连拒不认账的后路都留好了，这条狼！

"谢谢你，参谋长。我，不是刘锦坤。"我把便条放在桌上，站起身来。

"便条带回去，任何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他竟有点急煎煎了。

"不必了。"

我没有再看他和那个便条一眼，转身推门。

"等一等，我就不相信一个二十八岁的混血女人耐得住寂寞。"

他恢复了他的粗野，这才是正常。

不知下面还有什么不堪入耳的话，一并被我关在了门内。外面，灿烂的阳光下，砂子泛出金色的光芒。上面，是一尘不染的蓝天。这么洁净的砂子，这么蓝的天，是不该受到污染的，我很高兴，把那些脏兮兮的声音关在了门里。

路上，我脚步轻松，摸摸自己的手掌，铁硬。我怕什么呢？劳动？笑话，从十七岁干到现在，什么时候皱过眉？只不过，要作不少“无用功”就是了。但是，不必再躲躲闪闪，不必再强迫自己读、写、抄。面对一切就是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看来，一切都是有准备的。回到连队，我径直去敲刘水舟的门。门只开了一条小缝，他的老婆，一位十分胆小的河南妇人在门缝后面张望了一番才告诉我：“老刘上团里开会去了，不知啥时候回来。”就关紧了门。

晚饭之后，连队新来的统计员走过我们窗前，不经意地丢下一句话：“广播室的钥匙还在你这儿呢吧？”

真是的，几年来，“以工代干”，名不正，言不顺的。我不是专职的广播员、通讯员，更没有被任命做老师。现在也无所谓撤职什么的，交回钥匙就完事大吉了。

我走到连部，统计一人埋头在桌上，看见我来，就朝墙上挂钥匙的木板点一点头。

我把一串钥匙挂了上去。

“还有学校的。”他头也不抬。

“都在那儿了。”我也没回头，一脚跨了出去。

几天之内，各连都在“割韭菜”，几年来，各连出身不好，可是能写几个字的，以“以工代干”身份担任各项“业务”工作的人全都下了大田，名曰“清理阶级队伍”。

周末又到了，照例的晚点名，突如其来的，竟有一新的决定。刘水舟及一副指导员调走，新调来的胡指导员和一个新的副指导员兼“管生产”的副连长，被介绍给全连“指战员”。

照老套子，有关大好形势的大帽子说完之后，这个姓胡的小个子开始说到连队“阶级斗争”的各种“动向”了。其中有一点是关于连队内“阶

级阵线”模糊的，他指出：“个别家庭出身有严重问题的人不但对自己的家庭背景毫无认识，而且利用教育阵地大肆兜售封、资、修的黑货。”他激动起来：“更有甚者，这些人竟长期窃据我们的宣传阵地！”他声嘶力竭地大声疾呼道：“这种情况多么危险，同志们，要警惕啊！”

而那位“生产”连长上任所宣布的第一个决定是：广播室旁边的宿舍要分配给一对准备春节结婚的上海青年，所以这间宿舍的原住户得搬到地窝子去。全连除了家属区以外，只剩了一间地窝子，是作为“屯垦戍边”的“光荣历史”而留在那儿的，从前当过仓库。

他宣布这项决定之后，会场里一片嗡嗡声。

“哪儿有地窝子？”

“从前的仓库。”

“连火墙都没有，怎么住人？”

“火墙是人打的嘛！在农场干了七八年了，还有什么不会的？”他笑了，然后宣布散会。

广播室旁边的小宿舍，当时只有我一个长期住户，别的女孩子都是家在团部的短期户，时来时走的。来连队本身对她们来讲就是“过渡时期”，十天半月之后有了“农场锻炼”的经验，她们的父母就可以找路子把她们调走了。

我可是得在这儿打“持久战”的，于是散了会，我就去看我的“新居”。

在连队操场的北端，离连部办公室不远的一个砂丘下有一个完全在地下的地窝子。踏着土台阶走下去，推开眼看要倒的破木板门，我走了进去，清冷的月光从门口照进去，在地上投下我长长的影子。

人一站定，四壁阴冷的潮气，马上扑了过来，稍一走动，脚下一滑，细细看去，竟是绿苔。砂丘之下，挖得太深了，地下水位又高，这地方湿得可以。

从前是仓库，从来没打过火墙，一切从头来。我仔细地看了“室内”的情况，打好了主意，一步一滑地往外走。

外面月亮地里站着刘水舟。

我站定了，问他：“这算什么？”

他左右看看，不知想说什么，忽然他眼睛一瞪，大声说：“这些年，你韩秀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抛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他就拐着罗圈儿腿，兔子似的跑了。

我正纳闷，身后传来“生产”连长的笑声：“这个地方不错嘛，下了工没事，好好收拾收拾。”

原来如此。我没有回答，也没有招呼他，径直回宿舍去了。

第二天，我和妇女班的人们一起上了大田。谁也没觉着有什么异样，好像我一直就和她们扛锹干活，从来没干过别的一样。

天寒地冻，挺早就收了工。我赶紧换上一把利锹，把秋衣紧剎在腰里，和泥、脱坯、打土块。月光下，土坯匣子扣在地上，叭叭地响着，分外清脆。

土块阴干，得等几天，我用这个时候，拉开了砂子。下了工，拉拉车闲下了，我就拉上叽叽咕咕，上坡下岗。我拉来了干爽爽的砂子，铺在了地窝子里，铺上了厚厚的一层。第二天下了工回来一瞧，全都变了颜色，湿答答的，铲出去，再铺新的。一连五天，砂子才保住了本色，黄灿灿地映出一片光亮。

星期天，起个大早，赶去毛拉集上买了条羊毛毡子。回来赶快趁着好天气，抄起瓦刀打火墙。火墙打了七个幢的，整整一堵墙把个地窝子分成了大小两间，我留下了两个火口，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大间留给那些女孩子们。羊毛毡从“房顶”垂下来，严严实实堵住了火墙和地窝子土墙之间的过道，这里边的一小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单间”。天快黑了，我站在这个四平方米的“单间”里，看着从头顶天窗上漏下的一抹光，双手捶

着痛得要断的腰，心满意足了。活到二十七岁，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天地，用泥土、毛毡隔开的小小的天地。

为了预防不测，那天我还忙着修好了门，挂上了一把大铁锁。把我辛苦弄成的小天地紧紧地锁住，然后才一摇三晃地顶着星光回到宿舍去。

我砌的小炉灶多么小巧，多么好烧。我用铁锹生生把我那边的土墙打进去一尺有余，找了些废木板钉成一个土书橱，直直地镶在土墙里，再用木板分成了三层。这样一来，躺在床上伸手就能从“墙”上取下书来。有了自己的天下，又有了放书的地方，我还要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在椽子上拉上绳子，铺满了白报纸，于是，我有了“天花板”。“书橱”上挂上了白底小花儿的布帘子，我的“小屋”白净了许多。

红柳在灶里哔哔剥剥烧得挺欢，火墙已经热起来了。那，已经是春节前的一个礼拜六。我搬家了。把衣服、被褥捆扎一番，加上零星什物，装了一拉拉车。上坡，下坡，倒腾进去。再来一车，拉进去我的书，摆进了我的土书橱，拉上小布帘。双手拍拍土，送回了拉拉车。我进了门，掀起那块厚厚的毛毡，走进去。火墙热烘烘的，小水锅在灶上咕噜咕噜冒着泡。我把开水倒进茶缸，坐在床上，摸摸干爽爽的床单、被褥，伸手抽出一本已经“改头换面”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觉得自己真在天堂里。

春节，外屋只搬进了三张空空的木板床，它们的主人都回家过年去了。

这个大地窝子里只有我。反正没事，我用墨水瓶做了个很精巧的小煤油灯，灯芯是一根白鞋带，泡在煤油里，清晰可见。亮堂堂的灯光映在书页上。我静静地度过了大年夜，独自一人迎来了一九七四年的春天。

这一次搬家，从我脱坯，砌火墙，劈木头，修门，一直到拉着东西搬进来，不用说没有人帮忙，连个伸头看热闹的也没有。

我还记得，搬家那天，小拉拉车上堆满了，我头点着地，背弯成一张弓，拉车上坡。坡上，女人们正排队在连部商店门口买春节供应的猪肉和

红糖。我从她们身边上坡，从她们眼前走过，她们似乎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只一味地在评论红糖的成色和猪肉的肥瘦。

夜深人静，我舒舒服服地缩在我的小天地里养精蓄锐。我知道，炼狱的门已经对我大开。我预备好了。物质上，我有个清静地方吃饭、睡觉。精神上，我有伟大的罗曼·罗兰向我揭示一个又一个伟大而不屈的心灵。

我还怕什么呢?!

二十三　火

一九七四年春，一年干到头的打埂子、清渠、放水的工作又紧紧张张地开始了。

我是妇女班唯一的单身女工。夜班，早出工，晚收工，理所当然是我的正常时间表。原因很简单：别人得给孩子喂奶；别人都有家累，得回家做饭；别人年纪大，身体不好。总之，我这个住集体宿舍、吃食堂的就“理当”多干一点儿。

不久，我就发现，这“一点儿”竟越来越大。修渠，我一定分在离连队最远的一头。如果一人五十米，分到最后，剩下的起码有六十米，必是我“包圆儿”了。况且，等我走到地方，人家都干了四分之一了。我为了省点力气，总是从最远处干起，等到了我跟别人分界的地段儿，总是发现那挨着我的人自动向连队方向挪了几公尺。那几公尺的活儿还在那儿，人可扛锹走出多远了。我不干，谁干呢？去吵吗？谁会走这么老远再来替你丈量一次？于是，再接着干。一来二去，无论中午还是晚上，收工的时候我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成了独行侠。往往，夜色朦胧中，我还走在大田里，听着食堂开饭的钟声，才能扛上锹回“家”。

晚下工，最大的坏处还不是没有热水。因为热水从来不够，我总是自己烧的。冷天在屋里，热天在门口，两块砖支个小锅，锅底塞上一把树枝，

一会儿也就烧热了。最操心的是吃不上。食堂的菜已经是盐水煮白菜，打到最后，连菜帮子都剩不多了。菜又洗得不净，一嚼，满嘴砂子。“锅底嘛，凑合吃吧。”掌勺的大师傅这样说。

长此以往，不是办法，我开始斤斤计较。分地段，一定要班长量到底，多一公尺我也不干。而且，连队不是专政机关，整人只在暗处，我明着要个公平，她们也没辙。于是，我的工作量基本上控制住了，不会无限大，我踏实了许多。我改变路子，从和别人接头的一端做起，干上十米、二十米，再跑到另一头，朝回干。这么一来，想甩几米给我的人没了法子。休息时间，我不扎堆聊天，悠着点儿把渠里渠外弄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让人挑不出毛病。一天挨一天，竟是越干越顺手，也就常常能和大队人马脚前脚后地回到连队，吃上一碗热糊糊（玉米面粥）了。

无论我怎样算计得好，人家总还是想得出法儿，笑模笑样地给我加大了工作量，如此这般，我形单影只的时候总在多数。身心的疲累自是没有话讲。腰痛的次数日益频繁。打埂子、修渠，一把锹、一把砍土镘用的都是腰上的功夫。腰痛，活儿还是得照干不误，唯一的法子就是腰里加上一根宽宽的“板儿带”，靠它支撑着。

终于，早上穿袜子如同受刑。终于，不能在床上平躺着翻身，须得支撑着坐起来，转过身，再躺下。终于，早晨洗脸，得把脸盆儿放在小凳上，跪在地上洗。然而，铁锹一上肩，人一到了大田，下腰，蹬锹，铲土，拧身儿，把锹里的土准确无误地扬出渠外，扣在渠顶上，拍在埂子上。这一系列的动作已经下意识地，极其圆熟地连成了一气，腰也逐渐麻木，等到回家的路上才再次痛得钻心。

终于，开始浮肿，得着机会去团卫生队检查。蛋白高达三个加号，白血球大量增加。肾炎的所有症状一起出现。但是，按团里的规定，肾炎是慢性病，夏收大忙时节是不能请假的。

我不得不每天在日头下，在暴土狼烟中，在麦场上和疯狂轰叫着的脱粒机拼上十二个钟头。这段时间我已经没有剩余的精力去毛拉赶集。只要有休息天，或者休息时间，我多半是倒在床上。手捧书本已是不胜负荷的繁重工作，唯一能做的，就是直直地、平平地躺在那儿，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床板上。无时不痛的腰紧贴着床板，那才是一个彻底的休息。

天窗上的光影告诉我天已将晚，或天已将晓。食堂的钟声告诉我一定得站起来，去填饱肚子。尖锐的上工哨声告诉我，上个休息时间已然结束，我得走出门去，重复那些不堪忍受的机械运动，等待下一次休息时间的到来。周而复始，时间好像停住了，漫长的夏天。

门帘子外边三张板床上的主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我都不太认识，也不知谁来了，谁走了。她们很少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必要去跟她们说什么。有时候她们的男朋友也来，“外屋”骤然热闹起来。不过，毕竟有家长在团里，甚至师里“遥控”着，到了九点、十点钟，外屋的客人走净了，小姑娘们还会叽叽咕咕说笑一会儿。最后，只剩下呼噜和磨牙的声音了。

我睁眼躺在床上，腰、背一跳一跳地痛，脑子里只剩一片空白，我不得不承认，物质确是第一性的。饥饿、病痛、无休止的劳作会把人磨成一片空白。

弦越绷越紧，终于到了断裂的一天。

正上中班，自下午四点到夜间十二点，中间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喝水、吃饭了。

脱粒机正全速运转着，“虎口”扬起的麦秸、灰尘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整个麦场。人们用布单子包着头、脸，只露出两个眼睛，在飞快地向“虎口”传递着麦个子。我站在脱粒机前，用一把镰刀割断麦个子上面的要子，再把打散的麦子递给“喂老虎”的。弯下腰去，挥动镰刀，再别过镰刀头抱起麦子，勉强直起腰，送上虎口，再回来，再从头来。腰痛得一直蹿上

脖颈，之后又溜下去，直蹿到脚跟。汗水和着灰土，麦秸黏黏地贴在身上，刺痒难熬。

忽然脱粒机发出几下极尖锐的叫声，猛烈地晃动了几下，又上下蹦跳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场上一片死静，运送麦个子的人们一下子倒了一地。有人在吆喝着找人来检修。我直挺挺地倒在身后的麦堆上，眼睛瞪着天上的星星。天真高，星星真小。我想着。有人在头顶上叫："嘿，都站起来，把机器旁边的地方腾出来。"

人们陆陆续续地站起来，把已经堆到机器旁边的麦个子拉开。

我知道自己躺的不是地方，想快点站起来，却动不了了，脖子以下的部分似乎已经不存在，旁边有人走动，我试着叫人，自己先吓了一跳，声音好像岔了气，嘶嘶的，怪怪的。远远听见自己说："拉我一把，我站不起来了。"

一个人跨过来一步，伸手想拉我，我一瞧，挺面熟，好像是"外屋"那位姑娘的男朋友。

我拉住了他的手，用出了全身的劲儿，不能动。而且我终于明白，我什么劲儿都用不上，腰、背、腿似乎已经离我而去。我只觉出了眼睛的酸痛，咬紧牙关，满脸是泪，仍是一动不动。

那个年轻人大概也看出了异样，和别人说了些什么，之后，又过来了三四个人，他们把我"掀"了起来，架回了地窝子。

一条打湿了的毛巾替我拭去了满脸的汗、泪和灰尘。我到底看清了站在我面前的人是新来的上海女青年，卫生员小张。

"打盘尼西林吧，要不然真不知什么结果。"她这样说。

旁边的人都掀起门帘子出去了，只留下她和我。"无论如何，你得卧床一个礼拜。我去跟连长说。"打了针以后，她又叮嘱我。

第二天，我是从床上滚下来的。下了地，又爬又跪地，把自己和那四

平方米的空间收拾干净。我永远记得我怎么一拖一拖地爬着扫掉了头天留在床上的灰土和麦秸。

小张来了，手里捏着一张假条。“连长只批三天。三天以后，他说他给你找点儿轻活儿干。”她苦着脸，“针可是每天要打的。”她又这样告诉我。

我已经不在乎连长说什么了。只要有一分钟，身上不痛，不出冷汗，我就心满意足，觉得那一分钟实在可贵，实在美妙，巴不得过上一会儿，再来那么一分钟。

那三天，我的日程非常简单，夜里，除了想办法睡着一会儿之外，就是挣扎着换一件内衣。那大概需要一个钟头。换上之后不久，就又全部湿透，不能再换，就在被子里焐干。白天，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就把精神全部集中在一件事上：一步一挪地去弄一点儿水，洗我的衬衣。那是整整一天的工作。

因为慢，因为不得不走一走、停一停，我又看到了那个男青年和他的女朋友。他们端坐在外屋的一张床上，正头对头地在吃饭。听到门响，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正扶着门喘气，也就只好站住，瞧着他们。

他们毕竟年轻，还不善于掩饰他们心里的不安。那女青年还动了一下，似乎想站起来，终于没有动，埋下头，继续吃饭。

我喘过了气，抓住门帘，一晃一晃地回到了我的床跟前。

第四天早晨，生产连长自己来了，带着笑模样。

“麦地正在深翻，中午，驾驶员午休的时候，你去看一会儿机器吧?！也就是四五个钟头。”顿了一下，“三夏大忙，轻伤不下火线嘛。”看我不搭理他，他带着笑模样走了。

七月的南疆，到了正午，磕一个鸡蛋在地上，转眼就熟了。维族老乡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绝对不出门，坐在葡萄架下或者干脆坐在屋子里喝茶休息。农场工人也有相当长的午睡时间，也要到下午三点以后才出工。

中午的戈壁滩，那是人呆的地方吗?

我当时想，无论怎么着，拖拉机跟前总有个凉快地方吧。跟这种存心要整你的人费口舌实在划不来。去就去吧。我先靠在被子上养养神再说。

吃了中饭，门口拾根粗粗的红柳棍儿，我把草帽子扣在了头顶上，一瘸一拐地上了路。

一台拖拉机孤零零地立在大田正中央，离连队少说也有一千五百米。这中间还横着两条--米多宽的小毛渠。平日有水，我拿锹一杵就跳过去了。现在，渠里干得裂口，我却得滑下去，再手脚并用地爬上来。腰腿无力，一千五百米走了一个多钟头。

正午啊，毒日头正在头顶心，拖拉机四围竟连个阴影也没有！我才发现，我到了绝路儿上，这不得晒死吗?!

心下一慌，脚跟不稳，人直跌下去，草帽碰歪了，脸上挨了一下烫。猛一缩，倒看清了在车头和犁铧架之间有一个小空儿，勉强能坐下一个人。犁铧架有个半尺宽的阴影。我刚试着坐下去，又被烫得跳起来。准确地说不是跳，而是被滚烫的戈壁滩弹起来。好容易稳住神，我一手撑着热得烫手的犁铧架，一手拿红柳棍儿在地面上刨上一个小坑儿。坑里的土没那么烫。我抖抖嗦嗦地坐下了。

戈壁滩一片金黄，我赶快闭上眼睛。眼前仍是一片黄的、绿的。身后，那铁家伙带着逼人的热气紧抵着我的后背。头顶骄阳似火。汗水顺着帽檐直淌下来，滴在脖子里，热辣辣的。脚下像踩在嗞嗞冒烟的油锅上。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煎”。

求生的欲望让我尝试着离开这炼狱。几次努力竟动不得分毫，只赚得了满身的汗，满脸的泪。我就这么“坐”在那儿。痛从腰上来，痛从打了针的两腿来，痛从烫得要命的脚心来，我已经分不清哪儿痛，哪儿不痛了。时候一长，不再觉得痛得不能忍受，什么知觉都正在渐渐地离我而去。身

体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我知道，反正没法子，没人相助，我是不用想动一动的，熬吧！

时间停住了，不知过了几个世纪，我从半晕眩的状态中醒过来。天阴了！那毒日头不见了。脚下的戈壁滩灰蒙蒙的。我真想欢呼，张开嘴，却干得出不来气。一急，又是一脸泪。好不容易沉住气，慢慢睁开眼，面前竟没有金星飞舞了。

我终于看到了一双满是灰尘的靴子，灰是白色的。

那人蹲下身来，我看见了一张惊愕的脸，一双充满关切的灰眼睛，是阿孜木。

“你怎么来了？”我张了好半天的嘴，才发出声音。

“老师，真的是你?!”阿孜木的脸上乌云密布，“我都听说了。你那么久不来毛拉，我就知道不好，四处打听。可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你。”

当时，求生的愿望几乎是唯一的愿望。我知道，阿孜木的到来真是天意，是我活着回连队的唯一机会。我不能在这儿让他们把我晒死，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痛死！我得走回去。看看腕上的表，四点半，我在这儿已经晒了四个钟头了！

“阿孜木，帮我站起来！”

“我背你回连队。”小伙子焦急的声音。

“不用，扶我站起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在滚烫的麦茬地里站住了。抹掉满脸的汗水，我看见了阿孜木身后的黑马，也想起了来路上的那两条小毛渠。就我现在的情形，那两条小干沟无疑是高山大海。我自己，是过不去的。

“陪我翻过毛渠，你就走。”

阿孜木牵着马，架着我，向连队走去。

有这一双大手，我轻飘飘地过了渠，现在，离连队只有五百米，也就

是一华里了，我不怕了。

“走吧，别叫人找你麻烦。”我嘱咐阿孜木。

“是不是你们生产连长？”他盯着问。

我看着他，没说什么，只挥手让他快走。

他走了，我听到了那远去的马蹄声。

有风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开不听使唤的腿，一步步向连队挪去。

远处出现了上工的人群。远远地，连队办公室门口走出来几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他们是团里的拖拉机手，负责给各连队翻地的。这会儿，吃饱了，睡足了，正朝大田里的拖拉机走来。

我拄着红柳棍，尽量走得稳，尽量不晃荡、不摔倒，目不斜视，小心地走着、挪着。看得见、听得着，拖拉机手们说着、笑着、闹着。走到离我不远的地方，他们不说也不笑了，闷声不响地擦肩而过。我沉下心，喘匀了气，慢慢地走自己的路。

这一个回程，走了足足一个钟头。

吃了一点中午的剩饭，小张来了：“你怎么肿成了这个样子？”

“我晒了四五个钟头。”我平静地告诉她。

“我跟连长说了，你打了针，千万不能晒太阳。”小张惊叫着。我却听不清她还说了些什么，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得很沉，是许多天来从没有过的。

忽然我被惊醒了，从天窗里流泻下来的是一片红光。耳边听到的是女人的尖叫，“着火了，着火了，救命啊……”

门的开关声，人们的脚步声，水桶、扁担的磕碰声，大人、孩子的哭叫声，响成一片。

这回可完了。如果有火灾，我是决计逃不出去的。别的没什么，可惜了我这些书。我转头看看那小花布帘，伸手摸了摸那些书，心凉透了。

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小军，小军，韩秀回来了吗？”居然是指导员的声音。

外屋有了响动：“指导员，快进来，我们怕死了。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我问你们，韩秀呢？”

“在里面，下午小张来打了针，她就睡了，没出去过。”

毡子门帘掀开了，露出了那张老鼠脸。

“你要干什么？”老鼠脸后面有一个年轻的声音。

“连长家被人放了火，我来看看。”指导员转身出去了。

“找纵火犯吗？不在这儿！她根本动不了。”那声音很大。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坐在小军这儿，听有人叫救火，我才出去。”那声音清清楚楚，底气很足。

门又开又关，外面一片吵嚷，在这一切的混乱中，夹缠着一个尖厉的女人的哭骂声。

“缺德的呀……你缺德，欺负人呀……我们跟上你遭罪呀……天报应……让你养不下儿子呀……烧完了……叫我们咋过呀……”

那是连长女人，五朵金花的母亲，在跳着脚骂她的丈夫。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窗上渐渐小下去的红光，听着那一声高一声低的叫骂，想像着生产连长穿着大裤头子跳出跳进泼水救火的样子，不由得想笑。可怜那女人，还有那五个拖鼻涕的女儿；这种房椽子连着柴火垛的土房子，点火就着，再加上睡得懵懵懂懂，劫后剩不下什么了。

阿孜木！除了他还有谁呢？我心里一热。

愣了半天才发现我是半躺半坐的。我能坐起来了。

第二天，出门打水洗脸。嗬！连长那宽大的“平房”成焦炭了，黑糊糊的一堆立在连队中央。

“火是从柴火垛上着起来的。”烧水的老罗头往我脸盆儿里舀了一大勺热水，悄悄说。

“我见一个人影儿，骑马过去的，挺老快。黑灯瞎火的，啥也看不清楚。”他又说。

我只当没听见，捧着脸盆往回挪。

小张又来了，带来了两个礼拜的假条子：“连长让一把火烧得什么威风都没有了，假条一批就准。”她告诉我。

不久以后，毛拉赶集的日子里，常有维族老乡来卖吃的东西，他们带来了铁木尔校长一家的问候，也带来了酸奶子、哈密瓜、葡萄干，甚至羊肉包子，塞到了我床头的小木板上。

又过了不久，阿孜木和他的妈妈、爷爷都常常在连队里出现了，我的地窝子前面竟热闹起来了。住外屋的姑娘们和那些男孩子们也有了买东西吃的好机会。他们很快开始向维族老乡们学维语，一天到晚“亚克西”叫个不住。

这一场大病之后，妇女班的人也学乖了，我有时也能作为“病号”分在比较近、比较容易干、活儿不太吃重的地方上工了。我自己知道，身体并没好彻底，周末假日还是卧床休息的时候居多。

一天，我听到了阿孜木和小军的男朋友，那个年轻人的对话：

“韩老师亚克西吗?!”

“亚克西！”他清清楚楚地回答，还是底气很足的样子。

二十四　告别荒原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是一个阴森森的冬天，特别冷。到了年底，接二连三地出事。人们都缩进了他们的壳里，白天，把棉袄领子竖起来，扣上棉帽子，捂上厚厚的棉手套。晚上，躲进自己的小天地，关上门，烧上火，坐在屋里，睡在被子里，不听门外的响动。

尽管躲得严严实实，人们还是被不断传来的惨叫声惊动了；那是十二月初的一个半夜里，从七连方向传来了哭叫声。那天刮大风，风把那凄厉的声音送得很远。

我听得心惊，披上棉大衣，钻出地窝子，左右看看。许多家属地窝子左近有黑糊糊的人影；前面平房区也站了不少人，大家听了一会儿，莫名其妙，又都缩回去了。好在，那叫声没有持续太久。

第二天，在大田里“平整土地”，人们扎堆儿往小独轮车上加土，再推到低洼处，断断续续地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七连的一个上海青年回家探亲刚回来就发现少了一个小箱子。于是那天在他宿舍出入过的人都有了嫌疑。找来一个个问，都回说不知道。其中一个在“历史”上，曾“有过偷摸行为”的纪录。这就“坐了实”，他们连队的保卫干事认定了是那小伙子干的，组织了人马，开了夜班饭，吃饱喝足了，给那小伙子上刑。他们用两块门板夹住那小伙子，用手臂粗的木

棍锤那两块门板，开头，还听那小伙子叫，越叫打得越狠，直到血水从门板下面流成了河，人也无声无息了，才住了手。

“送师部医院了，听说人肿得比病床还宽。”有人说。

“还活着哪？”人们七嘴八舌地问。

“没听说死了。”

又过了两天，消息传来，人死了，死时只有一句话，“我没拿箱子。”

“那箱子呢？”又有人问。

“听说那个上海鸭子又找着了，这不是拿人开心呢吗?!”

没人搭腔，个个闷头抽烟，不响。

又过了两天，又有消息说团里马参谋长发话了，叫连队打棺材把人赶紧埋了，告诉上海，就说他“因公牺牲”，寄回五百元抚恤金，并且“尽一切可能劝阻其家长前来探视”。

“看样子，劝阻成功，没什么戏了。”有人说。

“住棚户区的，哪儿见过钱？五百块还不就了了？还有什么戏？”答话的人不屑的口气。

七连的事刚完，五连又出事。

年年修龙口大渠的工程都在冬天进行，这一年也不例外。大队人马出发之前，得有人先打前站，得去测量一番，瞧瞧得挖多少方土，全连得去多少人，得在那儿呆多少日子。派去的人里有那么一位老职工，从前是喀什汽车营的钳工，人称“千面手”的能工巧匠。他到了地方儿，还没拉开皮尺呢，就肚痛如绞。送医院的路上，“几个人都按不住，痛得要往车下跳”，同去的人说。

当然，人立马三刻就死了。大队人马还没动呢，他先死了。人们都噤了声，谁也不提龙口了。

快过元旦了，上下总动员，人心惶惶，都知道过了元旦就上龙口啊，

谁也不言语，都忙着弄吃的，先慰劳慰劳自己吧。

广播里播哀乐了，说是康生死了。

“那可是大官儿，文革尽看他的了。”有人小声说。

元旦冷冷清清地过去了。元旦刚过，人们还在糊糊涂涂，瞎聊着怎么变变花样，弄点什么吃，让那过年期间刚刚有了点油水的肠胃不至于一下子又干瘪回去了。

连里来了个人，一位挺干巴的小老头子，腿脚却很麻利的样子，来了便问那死在龙口的老职工葬在了何处。有好事之人引他去了，回来告诉大家，那是那死者的亲哥，“不依不饶地找来啦！”

人们抱着瞧热闹的心看他和连里领导争辩，好不容易人们才闹明白，那老职工档案袋里写他是地主出身，按“规定”抚恤金是分文没有的。人家不服：“五〇年第一次土地改革，我家定的上中农，六四年四清，二次划成分，划成了地主，那是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刘少奇打倒快十年了，我家的成分还按六四年的算，那不是给刘少奇翻案，‘走回头路’了嘛！”来人一番话，连里无以应对。人们乐得看哈哈，都忙着瞧热闹。

“文化大革命可真锻炼人，瞧人家那乡下的农民，嘴皮子练得多么劲道！”有人说。

事情闹到马参谋长那儿，一锤定了音儿：“我们只按档案里所记的出身办事，你不服，去找当地革委会。我们不能随便给人改成分。”到底是搞政工的行家，三言两语就把人赶回了山东烟台老家。喀什汽车营的人们看不下去，给那来人凑了一笔回去的路费，告诉他：“人都死了，还争什么?!”送他上了路。

这几天，听了一耳朵的“抚恤金”，心里头闷闷的。“成分”放不过活着的人，连死人也被吵得不得安宁。

一月八日，我在短波里听到了“美国之音”发布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先

生的唁电，周恩来逝世了。

我没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当地广播电台是十日播放哀乐，发布北京消息的。

这一次，只有沉默。

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会，没有北京十里长街上的哭声，什么都没有。

冰冷的大地，阴沉沉的天，灰蒙蒙的人群和笼罩着这一切的沉默。

外屋的小军和她的男朋友几次来我那儿，都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仍然保持绝对的缄默，多事之冬，闭上嘴吧！

一月二十日，全团进行“龙口会战总动员”。台上的人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单身职工一个不留”，“双职工每户留一人”，采取“人海战术”，争取一周之内“凯旋”。

连队又作动员，生产连长说他“精确地计算过了”，每个人在龙口只有五米长的一段，一天按十二立方米计算，五天可以完成。“天冷，就算一天六方好了，也就在那儿呆上十天吧。”他慷慨地许愿。

人人心里明白，这回有苦头吃呢。四米多高的渠帮，渠底起码两米到两米五宽，现在快淤平了。天寒地冻的，每天解冻时间不会超过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片刻不停地干，也决计挖不出六个立方的冻土。十天！哄鬼去吧。我赶紧把所有的粮票装好，快快地织上两双厚袜子，准备在龙口“打持久战”。

果不其然，经过整整一天的急行军，到了那如丘陵一样浮在戈壁滩上的“龙口”，站到了分在我名下的地段上，我可真傻了。渠底已经淤成了一条美丽的弧线，淤泥的最高线几乎已达渠顶，而从渠底中心起码下挖一米五才能见到老渠底。站在渠心，身上的热汗结了冰，心里凉透了。

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脚下的淤泥软软的，带着十成儿的水分，一锹下去，起码三四十斤，端都端不动，只好下半锹，甩出去倒挺容易，锹头

一挺，滋溜就飞出了堤外，还行，试着来吧。

我顾不上去扎帐篷，赶着在接头的地方一边儿挖上了半锹，作了极清楚的记号。开玩笑，这里差上十公分都是上立方的工程呢，可不敢马虎。

帆布帐篷一座座支了起来，割了大抱的芦苇铺在了冰冻的地上，再铺上被褥。天很快就黑了，温度也在直线下降着。睡到半夜，觉着冷，伸手摸摸棉被外面，凉得瘆人，只好再缩进去一点，挨到天亮，想站站不起来，被子冻成了冰壳。人得曲着身子爬出来。推一推被子，咔咔乱响，不敢再动了，再动不定折了呢。

人们敲着碗，跳着脚站到了队里，等着买早点。临时食堂只是一个大灶炕，上面支着两口大铁锅，外加一块大案子而已。大师傅就站在灶前收饭票。一人一碗棒子面粥，一个或两个窝头，一小点儿咸菜，很快就吃完了。不等人动员，个个往自己地段上跑。谁都知道，到了这个地界儿，可是任谁也帮不了你，自己赶紧干吧。

走到我的地段上，我一瞧就蹲下了。昨晚挖的那半锹只留下一排齐齐的小白印儿，好像是牙咬的，可怜地闪着白光。站起身来，铁锹往下一杵，弹起老高，只留下一丝白线。淤泥完全冻实了。丢下锹，换上镐，一镐下去也没见动静，还是一点白印而已。我慌了，现在才八点。离淤泥化冻还有四个钟头，我怎么办？就在这儿硬挖吗？瞧瞧周围，一片叹息声，人们都在一筹莫展地转磨呢。

渠底淤泥太厚，渠帮呢？我迈步登上渠堤从顶儿上开始。淤泥也冻住了，可是渠帮上毕竟淤得浅，冻得也不那么瓷实，一镐下去，翻起五六寸厚的一块，露出了老渠帮。

得，咱们就从这儿开始。我甩下棉袄，只穿一件秋衣，抡起镐头，狠狠刨下去，一直刨到了另一头。换上锹，再把那一块块的冻土块远远甩到了渠外。忙到中午，跑到食堂，一顿就吃掉了三个大馒头——新疆用克、

公斤制——那是整整六百克，一斤二两粮食！吃完了，没觉怎么饱，板带一扎，回到了渠底。半锹半锨的淤泥，被我像切年糕一样切成了五六寸宽的长片儿，攥紧了锹把儿，再把锹头高高地抛上去，那些黑不溜秋的“年糕片儿”随着银亮的锹头，在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抛物线，落在了渠堤外头。

挖渠是一种线条流畅的全身运动，如果你身强力壮，而且吃饱了，再加上一把顺手的利锹，久而久之，你自己都会欣赏那种运动的美，当然你得让大脑充分休息，如果你总觉得这是“无用功”，觉得青春年华白白浪费，那你不但觉不出这一机械动作有丝毫美感，而且情绪低落，手里的锹也捏不住了。

六点了，食堂大师傅敲着锅沿儿，吆喝开饭了。土还没冻上，再挖一会儿，赶早不赶晚，早完了，早回“家”。这会儿，我那半拉小地窝子可实在是天堂了。

大概大家伙儿的想法都差不多，人们都在自己的地段儿上忙着。

一会儿，天一下子黑了，土一下子硬了，人们也死了心，再怎么着，也是明天的事儿了。

我仔细算算，一天下来，不到三方土，而且是最容易的地段儿。瞧瞧别人的，都差不多，心想，一块堆儿熬呗，十天回营是别想了。

吃了晚饭回到帐篷里，糟！被子还是湿的！这被子晒了一天，竟然没干！没法子，穿上秋衣秋裤，戴上棉帽子，钻进了冰凉的被窝，累了一天，倒头就睡着了。

无论“生产连长”怎么吆喝，打从第二天起，人们就自动地晚上工，晚下工了，尽着化冻的那几个钟头猛干，其他的时间就想法子换换铺上的芦苇，想法子在荒滩上把树枝树叶拢上火，烤烤被子、褥子，到了晚上能稍稍睡上一会儿暖和觉。

日子到了二月底，人们手里的饭票“吃”光了，不少人的粮食赤字早

已过了百斤大关。病号一批批地涌现。拉粮食来的大车每回都拉走一车的病人。帐篷里的空地方也越来越多。白天，还在那儿熬的人们把被子搭在帐篷顶儿上，一步一晃地走上自己的地段儿，慢慢熬、慢慢炼。晚上，人们穿着棉衣棉裤缩在冻成冰壳儿的被子里，一夜一夜地暖和不过来，周围戈壁滩上早就连个草棒儿也找不到了，没法子烤火。

一天，“生产连长”大声叫唤着，要大家“加把劲儿”，说是“团首长”要来我们连检查工作了。没人言语，各人蹲在自己的地段儿上，一点儿一点儿地刨着铲着。

一堆草绿色走近了，果然是团里的干部来了。他们反正跟我不相关，我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那时候，我正站在渠顶上把一大块一大块的淤泥清远一点。他们走到渠底里，站下了。

“干得不坏，蛮科学的嘛。”打头儿的人说。

别的人应和着，看我没反应，就都朝前走了。

一群人走过去，留下了一个，他蹲在我的地段上，抽开了烟。

“下来歇会儿吧。”他招呼我。我想，我在团里见过这个人，他是政法股的。兵团的政法股相当于县级人民法院，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秘密进行，不必公开或半公开，所以更加肆无忌惮。理由很简单，兵团是部队建制，属军区领导，不是地方政权所能干涉的。

我走下去，杵着锹站在那儿。

“坐下，坐下。”他直说。

我把锹放倒，披上棉衣，坐在了锹把上。

“北京那个文化单位来人了。”他开门见山。

“抽走了你的材料，就是他们寄来的那些。”他又说。

“黑材料不是要当着当事人的面销毁吗？”我忽然明白这是件大事，不能等闲视之。

“外调的人想来看你，让团里挡住了。这个条件……”他往四下一看，没再说下去。

“总而言之，你的档案袋里现在就剩薄薄的两片儿纸啦！”他一脸轻松。

曾堆在人家办公桌上的那两大堆“材料”，那逼得我亡命西北，苦熬九年的两座大山竟然不见了。

“怎么会呢？”我不能不问问明白。

“不是‘解放一大批’吗？你们家老太太也‘解放’了。历史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就这一句话？”这就是一个人的历史结论。这未免太简单了，我不由得又问。

他站起身来，对我的执迷不悟非常不解，不得不再说两句：“就这一句话就顶用啊，人民内部矛盾，你又是独生子女，按政策可以困退回城。北京的知青办公室正在给你办。”

顿了顿，他看我还没什么反应，丢下一句明白话：“行了，准备撤吧！”甩手走了。

忽然，我醒过梦来了。这寸草不见的戈壁滩，这单摆浮搁在戈壁滩上的巨大渠道，这砍土镘、铁锹、丁字镐，这饥寒交迫的日子，就都要过去了吗？

我坐在锹把儿上，抬头看看天，天可真蓝，一大块，圆圆的，像一大块冰，真想拿手摸摸。手抬起来，却放不下去了，这还是一只手吗？虎口上裂着小孩儿嘴那么大的口子，指甲盖灰秃秃的只剩了半截，每个指头上都裂着血口，血珠儿凝在上面，黑黑的、红红的。

一下子，我觉得全身力气都耗尽了，看着渠帮上一大块一大块黑油油的淤泥，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自己用锹甩上去的；现在，我用双手抱住一块，好沉哪，只能颤抖着腿，把它挪到渠顶，再由它滚出渠外。站在渠顶，抬

眼一看，活像一条黑色巨蟒被人剖开肚腹，将内脏翻了开来。看着这条奇形怪状的渠道，只觉一阵恶心。赶快垂下眼皮，继续一块一块慢慢搬，直熬到日落西山。

暮色中，听到“生产连长”吆喝“全连集合”。人们慢腾腾地挪动着，蹲到了帐篷跟前。人们一堆堆地跐蹴在地上，听“生产连长”口沫横飞地说了老半天，我只听明白了最后两句：“剩下不多的几个女同志明天跟大车撤回。男劳力留下做最后的修整工作……”他还在说些什么，人们听不见了，也不想听了，工地上一片口哨声、欢呼声，夹杂着快活的叫骂声。这是这个冬天，我头一回听见人们大声说笑、叫喊。

夜里，不再那么冷清，帐篷外边不时传来人们的脚步声、笑闹声。后半夜，静了下来。左不过冻得睡不着，穿好棉大衣钻了出去。清冷清冷的夜，只有伙房有火光，信步走过去，看见烧火的老罗头正坐在灶火前抽莫合烟。

他弯着腰，膝盖快要顶到灶火门儿，手里的“大炮”又粗又大。火光映着他满布皱纹的脸。那脸上的表情却是平静的、安详的。火光跳动着，把他的轮廓鲜明地刻在那一片漆黑的、巨大无边的戈壁滩上。

我站住了，默默地看着他，看着这个在连队一声不响、默默劳作的老北京人。

他说过，二十年前，他在北京一家高级宾馆当服务员。一天，一个苏联“专家”要回国了，他奉命去收拾房间，换洗床单、沙发套，做清洁工作。那苏联人离开房间以前，递给他一支钢笔，连声为他周到的服务表示感谢。他手里忙着，接了那“老大哥”送的笔，插在衣兜里，向客人道了“一路平安”，继续忙着。

那苏联人出去转了一圈，在服务台前面站住了。拍拍脑门儿说他在房间里丢了一支笔。那时候，老罗早在洗衣房忙开了。人们把那“专家”住过的房间翻了个底儿掉，没找到笔。经理急得汗都下来了——一支笔有关

两国关系，这责任太大了。过了一会儿，那苏联人又一拍脑门儿，说是“糟糕，糟糕，看我的记性多么坏，我把那支笔送给服务员作纪念了”。然后，他拍拍屁股走了。

洗衣房的门被人推开的时候，老罗——当时还是小罗——从堆满肥皂泡的洗衣盆上抬起头来，他完全被经理和宾馆保卫人员的凶神恶煞吓坏了。人们问他为什么得了“专家”的礼物不报告，不上缴。他赶紧擦擦手，摘下胸前的笔，恭恭敬敬送上，连声为自己忙到现在没来得及马上去报告致歉。但那已经太晚了，“涉外”的罪名已经坐实。他被判劳动教养两年。期满后留在京郊农场劳动。文革刚开始，被遣送新疆。老婆离了婚，带着个孩子留在北京。他一个人在戈壁滩上干活儿，挣钱，三五个月寄回“家”去一趟。久而久之，人们在毛拉碰上老罗，永远只那一句话：“上邮局啊？”“上邮局。”他笑笑，埋头走路。

现在，他坐在那儿，看着火，一派气定神闲的模样。

“快走啦，睡不着了吧？”他笑笑地问。

“明天就回连队了。”

“再过几天，就回北京了吧？”他笑着。

消息可真快，我一愣。

“那个政法股的也是个河北人，他告诉我的。”老罗怕我多心，“来，坐这边儿，干爽又暖和，舀上点儿热水，烫烫手，再擦上点儿凡士林，慢慢儿烤烤，裂的那口子好得快。”他絮叨着。

我在一个劈柴火的木头墩子上坐下。他端过一个小脸盆儿，从另一口锅里舀了水过来。

“这么晚了，你还烧锅干吗？”我问。

“棒子面儿没了，这是玉米糙子，不熬上几个钟头，没法儿吃。夜里冻得睡不成，还不如坐这儿烤火、看锅呢。”

我笑笑，一点儿一点儿地把手泡进热水里，那无数大大小小的口子里针扎般地痛，身上直打冷战。咬牙把手放在盆底，好一会儿，才不那么疼了，身上也暖和过来了。

“你回北京，我求你件事儿吧。”老罗拨着火。

“成，只要办得到的。”

“好办。捎几个钱给我老婆，完了给我个信，说说他们的生活情况。”

我没应声儿，十年了，他们只收他的钱，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字的回音吗？

“你是个好人，我信得过。”他又说。

“放心，老罗，回北京，如果我真的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你家里人。”我诚诚恳恳地对他说。

他看着火，眯着眼，心满意足地笑着。火光下，那些深深的皱纹，那些灰灰的头发都不见了。他整个人被镀上了一层金红色。我才发现，老罗是个很不难看的男人呢。

“要走，就走远一点，北京就算第一站吧！”

他发了话，这句话竟像锤子一样重重地敲在我心上。头上的天，漆黑，天上的星光好像很近，抬手可以摸到，在星光下，还有别的天地吗？不是星光，那里，现在正是白昼，在明晃晃的阳光下……

回到连队。这一通大洗大涮，让我累折了腰，洗完涮完，又轻松了不少。

这边还没忙完呢，生产连长就进了门，带来了一纸北京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开来的准迁证。凭它，我就可以到团里迁户口，领三百元退职费，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了。

他刚走，妇女班的班长进了门，她是来问我要雨靴的：“北京啥样儿的雨靴没有？你的就留下给我吧。”

我二话没说，就把雨靴丢给了她。

夜深了，终于静了下来，我正坐在灯下补袜子。门帘外边，响起小军怯生生的声音："韩老师，我们能进来吗？"

"请进。"我抬起头来。

小军和她的男朋友第一次并肩走进我这个小天地。

"韩老师，谭少华想跟您商量个事。"原来，那年轻人姓谭。

"您快走了，您今后的天地不知有多大；我们可能得在戈壁滩上住一辈子。"他像背书一样地开始了，又皱起眉头，停在那儿，好像对自己很不满意。

我没言声，站起身来，在床沿上坐下，等着他把话说完。

"您的书，留给我们吧！"他一口气说了出来，好像轻松了不少。

唉，我可真笨，还以为自己瞒得不错呢。这一刹那，我明白了，没有他们打掩护，这些书，连同他们的主人恐怕早就不在了。那，我还犹豫什么呢？书该留给爱书人。

"行，不过，我需要一点时间，让这些书恢复它们本来的面目。"

以后的几个晚上，我们三个人忙得很高兴。当那些书轻轻脱下了《园艺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药学》这一类封皮之后，它们有了新的素面包装，我工工整整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名字：《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金钱》、《悲惨世界》、《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小妇人》、《红字》、《老古玩店》、《苔丝姑娘》……

"哈代是法国人？"他问。

"英国人。"我回答。

"您写上点儿吧？"她要求。

于是，我又在每本书的作者名字前面，划上一个小括号，写上他们的国籍。

这些闪光的名字使我的小屋沉浸在一派祥和、温暖的气氛中，它们像

宝石一样让我身边的年轻人两眼放光，双颊晕红，呼吸急促。

“您真是大富翁！”谭少华由衷地说。

“现在，你们也是大富翁了。”

“还不是呢，等把这些书都看完，那才有希望。”

每天做一些，他们搬走一些。几天之后，我的小书架空了，也到了该走的日子了。

老罗来了，带来了一个信封，上面端端正正写着他妻子的姓名、地址。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腼腆地说：“五十三块。”

“你还有钱买莫合烟吗？”

“有呢，有呢，下周就开支了，她们在城里开销大。”他有点儿慌。

“你放心，我到北京就给你信。”我郑重地把钱放进信封，小心地收好。

“你好好走，路上自己小心，我就不来送你了。”老罗这样说；几乎人人都这样说。

于是，到走的那天，连队里没有一辆车有空，没有一个人过来说再见。

老宫的马车从团里去毛拉拉盐，“顺便”把我送到毛拉。好在我两手空空，只有几件换洗衣裳。

在市集上，买了一斤莫合烟，嘱咐老宫带给老罗。艾买提家老爷爷的勒勒车又“顺道”把我送到了师部。

沿着毛拉河，我听着老人悲怆的长调，心平气和地瞧着河两岸的景致。北岸，毛拉公社的辖区是一片翠绿。南岸，兵团垦区却是一片灰黄。二十岁到二十九岁，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这场变林区为荒原的愚蠢行动里。明知这是天怒人怨的灾难，无力阻止，无法改变，只能在其中随波逐流。还说什么呢？这碱壳子盖得严严实实的荒原啊！

“走吧，走得远远的，比北京再远一点。”老人这样说。

“这里还会变成绿洲吗？”我问老人。

“会。人不会总是这么愚蠢，迟早他们会变得聪明起来。”老人肯定地说，“九年，你觉得很长。可是九年，我的胡子只长长了这么一点点。”他用手指比了一下。

我笑了。我们都笑了，笑声和着勒勒车的吟唱，飘了开去，飘了很远。

十二天后的傍晚，一下火车，不管腰酸背痛，不管两腿肿胀。我夹着提包，直奔老罗家。老罗的地址写得清楚详尽，我不用找人打听，很快在安定门外找到了那座简易楼，在挤满楼道的煤炉、碗橱、杂物中间，就着昏黄的灯光，找到了老罗家的门儿。

我敲了敲门，门无声地开了，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门里，瞧着我。她背弯了，两鬓灰白。

“您是罗大嫂吗？我从新疆来。”话没说完，那妇女一把把我拉进去。

那是一个不会超过八平方米的小房间。屋里除了两张单人床，中间一个三屉桌，两把木头椅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床上的床单补过，洗得干干净净，拉得平平整整。

看着我手里的提包，她问：“探亲？”

“困退。”

“不走了？”

“不走了。”问的和答的都是喜不自禁。

她一把拉出椅子，“坐。”转身拿暖壶倒水。

我赶快坐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老罗的信封。

她把水递到我手里。捧起那个信封，抽出那些稀脏的、破破烂烂的票子，一张一张展开，细心地在膝盖上摩平，轻轻地放在桌上。

“十年了，我头一回见着老罗身边儿的东西。”她抬起头来，笑着，泪水也在脸上淌着。

“为了孩子，我们熬着，不写信，不见面……”她笑不出来了，抽泣着。

我心里很安慰。老罗有这样的好妻子，难怪他那么宁静、安详地面对孤独。

“快了，儿子一分配工作，我们就复婚。我把他办回来！”

我吓了一跳，这是真的?!

我面前那泪流满面的弱女子一下子变成一个极有心机、办事果断、泼辣干练的女人。看着我的呆样，她又笑了：“老罗信得过的人果然是个诚实人，我把你吓着了吧？”

于是，她详细告诉我她将托怎样的关系，打通什么样的关节，把老罗调回来。

“当然，我们得先复婚。他走的时候，孩子还小。这会儿，中专快毕业了。今年夏天就分配工作，孩子一有了准地方儿，我们就不怕啦！要不然，背上他这个黑锅，孩子可怎么受哇！”

我就在她那儿，给老罗写了一封信，向他详细报告了他妻子的战略部署。

“你呢？”

“我得先等分配工作。”

“甭管什么，先干起来，有了单位，才好办事。”她千叮咛万嘱咐。

夜深了，我怀着信心，怀着对人的信心，走在空荡荡的北京大街上。

明天，我就去安置办公室，试试我的运气。

二十五　学徒工

东城区知青安置办公室和劳动局同在米市大街西侧的一个小胡同里。清晨，不到九点钟，这条胡同里已经聚集着不少回城知青，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说得热闹。我走在他们中间，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多么年轻！

走进院子，看见一块牌子，箭头所示：登记处在二楼。拾级而上，到处是聚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站在大门口，他们在院子里踱步，他们在楼梯上向上上下下的人们打着招呼，他们在楼道里轻轻交谈，交换消息。他们的脸色白里透红，已没有一丝塞外的风尘。女青年银灰、浅蓝的春秋衫里面，露出了鹅黄、水红、藕荷色的小翻领。男青年深蓝的卡上衣里露出雪白的的确良衬衫硬领。他们从头到脚，清清爽爽，已经没有了乡下的土味儿。他们伸出重又变得细腻的双手，抽出圆珠笔，互相留下通讯处，以便“互通消息”。乡间、边疆的三五年日子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正一心一意地等着新的机会。

看着他们意气风发的笑脸，我非常气馁，大好年华一去不再，我凭什么和他们竞争呢？我在乡间、塞外呆了不是三五年，而是十二年。失去了青春，带回了一身病痛。我把脚步放轻、放慢，悄悄从他们身边走过，我的洗得发白的旧上衣、旧裤子，自己做的布鞋，没有引起他们丝毫的注意。

我悄无声息地推开登记处的门，走了进去。

办公室挺大，十几张写字台前面都有人。我站在门边等着。

一个女青年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向那张桌子走过去。心里一阵莫名的紧张。

桌子后面的女干部，年龄大概和我不相上下，她从一堆表格上抬起头来："坐吧，我这就完。"她和颜悦色。

看她手上很快地把表格装进一个牛皮纸口袋，放进抽屉。我从书包里取出知青办公室的通知和兵团的退职证明，递给她。

"高中毕业？"她边看证明，填写着一张表格，边问我。

"北大附中。六四届。"

"文化大革命以前毕业的高中生，哪儿都抢着要。"她友好地笑着。

我也笑笑，身子坐直了一些。

"六四年就下去了？"她又问。

"北京第一批集体插队的。"我回答。

"没参加过红卫兵，没造过反，现在，什么单位都欢迎。"她态度诚恳。

天可怜见。多年来，被抛在一切"活动"外边，如今却拥有"受欢迎"的优势。

"得等多久？"我没有被意外的喜悦冲昏脑袋，想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回答。

"别着急，长不了。岁数不小了，又是老高三的，不难分配啊。像那些，"她朝外边一努嘴，"说起来，初中、高中的，其实连小学都没毕业。下去没几天，又忙着回来，别的什么都没学会，就练得了一张嘴皮子，能说着呢，分哪儿，哪儿头疼。"她竟说个滔滔不绝了。

我又替那些年轻人抱屈。他们不学无术是事实，可是这不是他们要的，他们有什么选择？现在，却是他们在吞咽那被抛弃的苦果。

耳边，那女办事员还在极知心地絮叨着："最好，能给你分一个搞缝纫的厂子，女同志嘛，学点儿技术，家里也用得着。这么大岁数了，找个活儿不太重、技术要求又不太高的，最理想。"

话没说几句，她已经说了两次"这么大岁数了"。可不是吗，二十九岁，在乡下，孩子都有了，哪里还能困退回城呢？那些出身"好"的，也早就在乡下招工、上大学、参军，无论怎样也不会熬了十二年才回城。我忽然觉得这也"公平"，像我这样的，也确实得"照顾"、"照顾"了。

我没话可说，只笑着看她，等着下文。

"不过，全民单位不容易，大集体怎么样？你从全民单位来，分大集体，可能分得快一点儿，当然，福利不如全民。"她还挺替我着想。

"有工作就行了，大集体就大集体吧。"我说。

她竟是一脸喜色："那更好办了，你回去听信儿吧，有了工作就通知你。"

我站起身来，想想，还是问了一句："您贵姓？"

"都一样啊。"她瞧我不懂，又说，"你登了记，再来，找谁都一样。其实，你不来也行，有了地方儿，就通知你。"

我听懂了。可能是于心不忍，她还是追了一句："我姓文，文化的文。"

我点点头，谢了她，走了出去。

北京的春天，除了风砂还是风砂，一出门，漫天黄砂，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外边飞砂走石，心里头却是很平静的。登了记，等着呗。溜溜达达，回到家。

忽然一下子，早晨不必出工，晚上不必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时间慢了下来。

一天，乘着外婆高兴，我坐在小板凳上给她剥葱、剥蒜，一边跟她聊着。不一会儿，扯到文化大革命，外婆满口"土匪"、"长毛"地骂起来。我就顺便问了问：

“外婆，抄家物资都还了吗？”

“还什么？他们开了个单子，要你妈签字，签了字才给结论。她怎么敢不签？签完了，那一句话的结论到手了；再看那单子，抄走的东西可少了好些。”

“那就算了吗？”

“不算了，还怎么样？一家三口都活着，比什么都好，东西，就算了吧。”

“外婆，东西发还的时候，您仔细看过吗？”

“看过。”

“有没有我的出生证和护照？”我问。

“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份东西没回来。你父亲那么多照片，也没回来一张。”

“您肯定？”

“我肯定。”顿了一顿，外婆又说，“十年了。谁知道还有没有。”说完，她深深看我一眼，一脸的愁苦，摇头叹气。

没在家，我也不必在家里下工夫了。一心一意等分配。

报纸上出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我现在是散兵游勇，大可不去过问了。

四月初，北京城山雨欲来，我到天安门去了几次，发现不少人手里有宣传品，人们三三两两，议论纷纷。

四月五日清明节，人们不声不响地涌向天安门。我是下午去的。离老远，已经看到了那个飘浮在白花中间的孤岛——贴满标语、诗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近了，清楚地感觉到那紧张的气氛。人们在抄录诗词，还有人站在高台上演讲。人们的脸色相当沉重，演讲者、朗诵者慷慨激昂。表面上，他们在歌咏“人民的好总理”，实际上，人人听得出来，他们的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当然，有人也在痛斥已然死去的康生。人群中，

有人手里有相机，更有人拿着簿子在抄写骑车人的车号。便衣警察在人堆里穿来穿去。天逐渐暗下来，人群中可疑的面孔越来越多。长年的小心谨慎让我马上闻到了他们身上那股子鹰犬的味道，我不敢流连，匆匆离开。一个钟头之后，血洗天安门的行动就开始了，大批手持木棒的“首都工人民兵”在公安人员摩托车的帮助下，迅速缩小了包围圈，圈中人被拖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整夜坐在砖地上，直到弄清各人身份才分别关的关，放的放。至于那些据理力争的人在当场遭到了怎样野蛮的对待，我不是目击者，无法详述。但第二天清早，“有关单位”用灭火水龙头清洗广场上的血迹却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但无论怎样，我没有被“卷”进去，使我的“分配”问题更其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七月二十七号安置办来信了，叫我去“谈谈”。这次，文同志不是一个人，她桌子前面还坐着一位中年干部。他留着短短的头发，一身蓝布制服整洁、合体，正坐在那儿和姓文的有说有笑地聊着。

我走过去，还没站定，他就站起身来：“我姓黎。”

文同志马上介绍：“老黎是东城区光明服装厂的一把手。”

“一把手”通常是党委书记，有时候还兼任厂长。

于是，我毕恭毕敬地向他问好：“黎书记，您好。”

“好，好。坐下谈，坐下谈。”他向我摆手，挺客气。

“六四年就走啦？”他和颜悦色地提出问题。

“嗯。”我点点头。档案里必有的东西，我懒得重复。

“不易啊。”他瞧瞧文同志，开门见山，“我们厂是个小厂。地方挺好，离你家挺近，两站地就到了。就是工资少点儿，一个月才二十六元，比你在新疆少多了。要是还行，就上我们那儿吧。”

“应届毕业生进厂学徒，一个月十六元。你是回城知青，岁数大了，

一个月二十六元，一年后转正、定级，再调整。”文同志补充。

“行。工资不是问题。咱们厂都干什么？”

一个“咱们厂”，把他惹笑了：“加工工作服，技术要求不像西服、衬衫那么高。有时候，有不少厚帆布的，活儿挺重，挺累人。岁数大了，技术性太强的，恐怕也不大好学呢。”他挺实在。

我从来没摸过缝纫机，当然希望活儿不太难。

“那成，我就去您那儿。”

他们比我还高兴，赶紧办完了手续，我的一堆表格进了黎书记的黑塑料包，告别了文同志，一块儿走出来。

一路上，黎书记很有感情地告诉我，他这个厂的工人本来都是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中，“走上社会”的家庭妇女。

“十八个‘孩子妈’抬着她们自己的缝纫机，搬进了一个废弃不用的存自行车的棚子，开了工，办成了一个街道生产合作社。二十年来，什么都做。小孩子的围兜啊，少先队的红领巾啦，臂上的符号啦，小鞋帮啦。什么小，什么不赚钱，大厂不愿意做的，她们都做。时候儿长了，也替国家挣了利润。从合作社成了街道厂，小集体又成了大集体。那十八位老师傅有的退休了，有的快退休了，现在全厂百十个工人。除了专门搞工作服加工，还开了三个门市部，多少解决一点儿首都人民的穿衣问题，对国家有点儿贡献吧！”

一路走着，一路听他聊着。这位工人出身的当家人还真心疼这个厂，心疼这些个工人哪。

我觉着，和黎书记说话儿有点儿像我在山西和老乡们说话儿，挺容易的，心放下了不少。

“‘四五’，你没去天安门吧？”冷不丁，他问了一句。

“去了。去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回答，刚松快一点儿的心又缩了起来。

“没抄诗，没写大字报，没干什么吧？”他又问了一句。

“没有。”我回答。

“没有就好，这会儿查得严；要是你在天安门干了什么，街道没查出来，到了厂子发现了，还得退回去。这会儿，我先问问你，啥事儿没有，咱们都踏实，省得将来麻烦。”他诚诚恳恳的。

我知道，这是“公事公办”，没再说什么。到了厂子门口儿，跟他道了“明儿见”，就回家了。

七月二十七日，是我当学徒工的第一天，早上八点整，我已经走进车间，在指定给我的电动缝纫机前面坐下来。师傅姓王，戴着一副老花镜，仔仔细细地告诉我机器用法之后，示范了一回，就给了我几块零碎帆布，让我“练练”。

一个上午，没动地方，我已经掌握了要领，“缝趟子”，缝得很直了。把那几块零头布，剪剪缝缝，做了个机器罩子。下午，开始缝最简单的瓦工用的大围兜，一下午也没直腰，机器一直响着。

五点半，下班钟声响了。我停了机器，把它里外擦净，罩上罩子。喘了口气，才直起腰，站起身来。我把围兜平展展地叠好，放在了师傅的案子上。

黎书记和王师傅站在案子旁边儿，瞅着我笑哪。

“不愧是老三届的，真行。”黎书记拍着那一叠围兜，无限感慨。

“到底岁数大了，好带。”王师傅一脸欢喜。

我笑笑，向他们道了“明儿见”。走了出去。

肩、背、腰、腿，没一处不痛得钻心。多少年来，又有几天不痛呢？走走吧，走走，活动活动就好了。汽车两站地，晃晃悠悠，走了四十来分钟。

半夜才睡，还没睡熟，人就被一股大力从床上抛起，又重重跌下，想拉灯，灯绳在空中晃动，完全抓不到手，勉强支住身子，抬眼一看，窗外

一片白光。正愣着，整个屋子摇起来，地板上的零星物什滚来滚去，响成一片，外面有人喊："地震、地震啦……"

睡在旁边小铁床上的外婆，声音嘶哑，叫着："秀儿！"

我赶紧爬过去，不是走，完全是爬，走是走不成的。把外婆夹起来，地面又一晃，把我们两个像筛元宵一样筛了过来，外婆正好坐在了屋角，两边有衣橱和堆放的箱子。

"外婆，你别动，这个地方最好，有什么掉下来，也有柜子支着，您千万别动。"

我又花了不少力气，捞过一条薄被，把老人盖好。免得什么东西滚动中碰了她，快八十的人了，碰一下就吃不消。

我站在当地，全身力量撑着嗦嗦抖颤的衣橱，不知时间过了多久，终于地不动，房不摇了，外面漆黑一片，只是人声嘈杂。看看表，只是二十多分钟，竟长得有半个世纪。

揉着腕子，捶着腿，拐了出去。母亲早就披了一条毯子站在了院当中，这会儿见我出去，忙不迭地问："你外婆没事吧？"

"没事。"我答应。

四面看看。这座一百四十多年的老房子尽管像筛糠一样地抖了一阵，终于还是稳稳地站住了。

厂子呢？厂子怎么样？原来的自行车棚早已改成厂房，但那厂房多么简陋，能经得起这样的地震吗？别的不说，老师傅们二十年的劳动积累不都在那儿吗？那一分钱、一分钱攒起来的厂子要是垮了，一个集体单位还能怎么样呢？

心里想着，脚下就一溜烟向厂子跑去。大街、小巷，挤满了人。人们把躺椅、板凳、席子搬到了大街上，大家宁可睡露天也不肯呆在险象环生的破房子里了。

厂门口有几位师傅在说话。我还叫不上她们的姓，她们也叫不上我的名字，互相打了个招呼：

“来啦？”

“家里还行吧？”

几句话一问，互相通了声气，放心不少。

“黎书记在里边儿，不怕别的，就怕电线出了故障、发生火灾。”一位师傅告诉我。

“厂房没塌吧？”我问。

“没有。房顶轻，还行。”另一位这么告诉我。

正说着，黎书记走了出来，一手一脸土。

“家家都有事，师傅们先回去吧，今儿晚上我在厂子里。明天咱们再排日程轮流值班。就怕余震再来，出什么故障，大家留神听广播，有消息互相通个气儿吧。”他嘱咐着，让大家走了。

“上班头一天，就赶上了这么一场祸。”他看见了我。

“厂子没损失就好。我先走了。”向他道别，我又从人堆里穿出穿进回了家。

到了屋里，地中央放着一口箱子。

“天亮，我就去买车票，先上无锡去躲一躲。这次震中在唐山，不知成了什么样呢！余震还没完，我们上年纪的人还是躲躲好。你刚上班，这时候离开不合适，你看家吧。”母亲一边把衣服放进箱子，一边头也不回地说。

我没理她，上床一拉被子倒头就睡。

天刚亮，我就来到了厂子。

门口的工人师傅比夜里又多了十几位。都是来打听厂子情形的。

黎书记两眼红丝地和车间干部们商量着什么，等着电工检查完全厂线

路才能让工人们进厂干活儿。

“除了电工以外，咱们还得有人不断在厂房里外巡逻，万一什么地方出了裂缝，有了险情，早作预备，少出问题。”听到人堆里，黎书记的声音。

“排值班表吧。”大家纷纷议论。

“一人先排上两个钟头儿，这个时候，家家都乱着呢，不能说家里什么都不管，全在厂里值班。”黎书记又开了口。

“我没家没业，我排长一点儿。”我说。

“你们老太太呢？”黎书记问我。

“今儿都走，去无锡躲震，就剩我一个儿。”

“那也好，早晨，你先值上。我们赶紧把表排出来，师傅们知道了自己当班儿的时间，就好安排了。”

我二话没说，从黎书记手里接过锄头就进了厂子门儿。

以后的几天，厂子里弄了些木料发给职工回家搭“防震棚”。我告诉王师傅，我那份儿不要了。

“你不搭棚子？”老头儿从眼镜儿上边瞧着我。

“不搭。我们住那房，别说裂缝儿，连墙皮都不掉。搭棚子干吗？”

“还是小心点儿好，出了危险不是闹着玩儿的。”王师傅还是一万个不放心。

“实话对您说，王师傅。夜里住外边又湿又冷。就算有了棚子，我也没法儿住，我的腰受不了。”

王师傅低了头：“受过大罪的孩子哟。”不言语了。

“咱们组里，哪位师傅缺木料，您给她们就是了，我真的不要。”

“行啊，就这么的。”王师傅终于点了头。

很快，大街两旁，稍微开阔一点的空场上、院落里，“防震棚”林立。从唐山郊区、天津一带涌来的伤员、难民充塞了各医院、各街道诊所。

无数的消息满天飞着。报上公布此次唐山地震震中震级七点八级。可是人们说唐山已经夷为平地，死亡人数高达百万之巨。唐山附近的地震仪器都震裂了，必定超过八级。不少人询问着，为什么不承认灾情呢？没几天，消息传来了，地震八级，国际红十字会可以直接派专家实地考察，进行救援。为什么不让国际救援队到现场呢？

厂子没发生什么意外，输电系统也没发生大的故障，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只是晚间依然值班巡逻。

“小心不为过。”黎书记说，大家都同意。

我又主动多值了几个班，弄得组里的老师傅感动得不得了。我对她们说：“你们上有老，下有小，家里事儿一大堆。我是一个人儿吃饱了全家不饿。您别跟我争，我多值几个班儿实在算不了什么。”她们走是走了，回来总不忘给我带点儿家做的好吃食。

一位老师傅瞧着我吞面条直掉泪，“孩子，这些日子可苦了你了。”

“苦什么？吃着鸡蛋面还苦？”我直乐。

“唉，我那小小子儿也插过队——五年哪——也这么说。可都是些受过苦的孩子。”老太太眼泪哗哗的。

其实，我真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不就是在厂子多呆几个钟头吗？老师傅们心肠极好，活在她们中间实在是容易得很。

一个晚上，我正值班，周围静悄悄的，手里捧着一本《文心雕龙》在看。

黎书记进了门：“今儿晚上你又值班啊？”

“苏师傅孙子发高烧，我替她一班儿。”我从书上抬起头来。

“大家的眼睛都是亮的。这次‘抗震救灾’，你表现得不错。”他笑眯眯的。

“跟您说实话，呆在厂子里，心里还痛快一点儿。”我这的确是实话。

“不管怎么说，你活儿没少干，力没少出，不少老师傅都直跟我夸你。”

我不好说什么了。

“有什么事儿，组织上能帮助解决的，就告诉我。咱们试着来呗。”黎书记开了口。

我心里怦怦直跳，房子？祖孙三代住着八平方米……不行，这么个小厂的头儿，他能有什么辙？也许，可以试一试另外一件事，一件比房子大得多，但只用走“前门”，不必“开后门儿”的事。只是，他敢吗？

我瞧着他，瞧着这个瘦瘦的中年人，半天开不了口。

“说嘛，办到办不到，咱们试着来嘛。”他诚心诚意的。

“六六年，红卫兵抄家，拿走了我的出生证和护照，老太太问题落实了，抄家物资算是发还了，这两样东西还是没有。”我掏出小夹子，在汽车月票后面抽出一张小照，递给他：“这是我父亲，这张照片跟我走了大半个中国。虽然他是个外国人，可他是我父亲，如果，抄家的单位还有我父亲的照片什么的，也请他们还我。”我怕他有什么顾虑，赶快把话说完，“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是我父亲。”我真恨自己，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声音也打抖了，眼泪也涌出来了。

黎书记小心翼翼地托着照片，那张黄黄的、四角皱皱的照片，半晌，他笑了。

“你还真像他。”黎书记把照片递给我，“红卫兵抄走的东西，当然应当还你。不还，就不符合政策。放心，组织上替你出头。”他竟一口答应。

我有点慌了。他大概不知道一纸美国出生证和一本美国护照意味着什么。看他神情，他确实不太知道。要跟他解释吗？我心里乱成一团，他却自顾自地聊了起来：

“说起来，谁也想不到。我家三代血统工人，就因为打从六四年开始，当了这么个小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一开始，红卫兵上厂子串连，愣说我是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罚跪，蹲牛棚，什么苦头都吃过了。提起红卫兵我就来气……这不，知青回城分配工作，一听说当过红

卫兵，我头一个儿不要……”他声音越来越高，竟是一肚子的火气。

我静静地坐着，听着。心里非常可怜他，也可怜那些当过红卫兵、打过人，又被彻底抛弃了的那一大群。瞧着他大包大揽，我又有点担心，以后真有点什么差错，不是大大地对不起人吗？

可是，我一声没吭，我太清楚，现在，他和他所代表的组织是我唯一的指望，只有他们才能要回我的证件。

二十六　北池子到日坛

快过年了，“文革”结束的第一个年，人们的喜悦都是挂在脸上的。那时候，最让我高兴的是被“批判”了九年的贝多芬也被“解放”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满城沉浸在第九交响乐的声浪中。我跑上大街，第九，久违了！她是那样悲壮。她用她的热度烫平了人们心里的沟沟壑壑。她向受尽苦难的灵魂预示着可能来到的阳光普照的明天。

我真想大喊大叫一番。但仅是想想而已，我没有叫，也没有喊，只是脚下的步子迈得轻快一点而已。原因太简单，十年“浩劫”过去了，并没有迹象显示太平盛世的到来。饱经忧患的百姓，谁都在忙着自己的一摊儿。

“黎书记找你。”王师傅没让我进门儿，朝厂长办公室努了努嘴儿。

厂长办公室在大门里边一个不起眼的旮旯里。敲敲门，门马上就开了。门后面站着个公安警察，一片蓝，大檐帽上一团红，把我吓了一跳，厂长室里扑面而来的热气挡不住那一阵阵发自心底的冷战。我机械地迈着步子往里探着步。

“小韩，这位是市公安局的老李同志。”黎书记走过来。

我好容易才从一团模糊中看清了两张笑脸。

“坐，坐。几份文件送还给你。”那位“老李”的声音。

一个白纸信封，鼓鼓的，躺在桌上。

我恍恍惚惚地坐下，打开那个不曾封口的信封。

一本护照，号码二五七四二一，绿色封面的，一九四八年签发的美国护照。

是它，没错。就是它。我捧起它，打开来。

一张名片滑到膝上。

“韩恩先生的东西只剩了这一张名片。”是那老李的声音。

这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名片。

美军总部重庆指挥部运输联络参谋

陆军辎重兵少校　韩恩·威利

美国

另外一面是英文，他的姓名和地址的中间，有一个号码，〇九二二三七五。

几年后，我凭那个号码，找到了长眠在阿灵顿军人公墓的他。

但是七六年十二月那天，我却只是呆呆地看着那几行字，双手冰冷，不知说什么好。

“一九五〇年，‘忠诚老实’运动中，你母亲交给组织的。现在，还给你吧，它总是你父亲的东西。”还是那个声音。

护照上，那个留着一头卷发、穿着白裙子、天真地笑着的小女孩儿快活地瞧着我。二十七年了。我沉重地合上护照。

“还有一份文件。”还是那个声音。

我用手指探探，抽出来一式三份的三张纸。是的，是我的出生证，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九日，一个小生命诞生在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医院里。

这个小生命好容易熬过了三十年。

我忽然觉得热起来了。觉得父亲的血在血管里突突地跳，我对自己说："钥匙已经在手里，看你的了。"

我完全冷静下来，摸着这些纸的边边角角，上面有明显的图钉、大头针留下的痕迹。

"六六年，它们被钉在人民剧场的大厅里，示众一个多月，幸亏那个时候，你已经走了。"老李说。

"都对吧？"黎书记温和地问我。

"都对。"我抬起头来。黎书记转过头去。我想，当时的自己，大概相当可怕。我开始努力"调整"自己，使气氛自然一些。

"那就签个字吧。"老李递过来一张表，上面只简单地写归还我三份文件。我签了字。

"我走了。十年哪，公、检、法翻了几个个儿，欠了不知多少债。现在，还得我们一点点儿地还哪！"老李拍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向人民负责嘛。你们辛苦了。"黎书记站起来去开门。

"谢谢您，谢谢您帮我找到了它们。"我说。

"没费什么事儿，公安局保存了十年。还给你，留个纪念吧，都是过期的文件了。"他笑笑。

我也笑笑。他走了。

"谢谢您，黎书记。"我说。

"不用谢，没费多大事，还行。"他非常满意。

我手里拿着那个白纸信封，在街上转了好久，让冷风把我吹凉了，才回车间。

正阳门附近的北京市公安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些年，不是有不少人一心一意想把我送进去吗？现在我真的要和这个大衙门打交道

了吗?

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当我站在寒风里，面对这个白色的庞大建筑物，无论如何摆脱不掉那个自投罗网的感觉。

连大门都不必进，右首有个小屋子，挂着白底红字的大牌子："问事处"。

我走进去。里面有个大窗户，公安人员坐在大玻璃后面回答人们的问题。

来"问事"的人很少，我走进去。

"什么事儿？"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有美国国籍，询问回国的手续。"这句在心里想了一千遍的话，终于出了口。

"北池子八十五号，外事科。"回答简单明确。

所以，我的问题是外事问题。我心里大大松快了，出门，找到3路公共汽车，来到了北池子。

这就是外事科？它不像市公安局那么大，那么吓人，它是一个大门紧闭的院落，坐落在北池子路西的合欢树下。街上没有什么行人，八十五号门口更是连个人影也不见。风卷起几张废纸、几片落叶，抛撒在那紧闭的大门前。

我穿过马路，走到八十五号门口，抬手按门铃。

小门开了，露出一个穿蓝布棉制服的人，他看看我，大概觉得和"外事"对口，把门开大了一点。

走进院子，一个小得多的白底红字的牌子挂在一间屋子的门上。既是"问事处"，就走进去问问吧。我推开门。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长长的柜台后面，一个梳小刷子、穿制服的女民警伶牙俐齿地说着。

站在柜台前面的是一个男孩子，恐怕不会超过十四岁。黑黑的短发，

单薄的后背，薄薄的灰布棉袄边边上有一些细密的补丁。

“文革结束快半年了。”那稚嫩的声音争辩着。

“这跟文革没关系，从抗美援朝以来，我们的政策是始终一贯的。你们要去汉城，可以。经过平壤。”她带着笑。

男孩争辩着，她熟练地回答着，连想都不必想。

他们，是韩国人。

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一位老人，她头发全白了，腰弯成了一张弓，背驼得非常厉害。她的衣着已看不出颜色，缀满无数的补丁。一个竹篮放在她脚边，那竹篮也用碎布缝过了，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形状，说圆不圆，说扁不扁的，不知用过多少年了。她坐着，身子向前探，仔细地听着室内的一问一答。

柜台后面的门开了，又走出来一个男民警。他很年轻，没戴帽子的头发黑亮黑亮的，脸上挂着笑，站在当地，听男孩子说着。一会儿，他打断了他们，插了进来，他的声音沉稳有力，胸有成竹的样子：

“这里面儿有个技术问题。你想想，什么海关能接受你奶奶的护照呢？护照过期三十多年了。而且，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签证。你呢，连护照都没有。”他两手一摊。

“其实，加入中国籍多好，入学、分配工作都没有问题。”

那“小刷子”接茬。

“不愿意入籍也可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去办个手续。有了朝鲜籍，留在中国按外侨待遇对待，回到朝鲜，也可以嘛……”那男警察絮叨着。

他的话没完，老人站起身来，向孩子招招手。孩子扶住她，把一个硬皮小本子交给老人。她弯身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把小本子放进去、包好，再用细麻绳扎牢，放进怀里。

她挎起竹篮，对那男孩说了句什么，他们迈步朝外面走去。

我推开门，把一老一小送了出去。望着寒风中那两个单薄的背影，我久久反应不过来，收不回自己的目光。

“你有什么事？”身后有人问我。

我转过身去，面对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拿出了我的护照和一张出生证。

“我出生的时候，就具有美国籍。我希望你们可以协助我办理回国手续。”

“回国?!”那两人一惊一乍的。

他们拿起那两份文件看了看。那男的打开门向里面叫着：“老王，你来一下。”

门口出现了一位头发灰白的人，他也穿着蓝制服，年龄大概在五十以上了。

那年轻警察把护照递给“老王”。他掂在手里，翻开来看看。

“不是伪造的吧？”那年轻人问。

“老王”不回答，笑笑：“那时候的护照，本子大，分量也重。”

“是真的?!”“小刷子”又问。

“老王”点点头。

“你想凭这两份文件去美国？”“老王”问我。

“回国。”我纠正他。

“文件是四八年的，早过期了，不大好办哪。”他皱了眉。

“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办？”我问。

“等等，我们研究研究。”他又说，“你把护照留下吧。”

“这本护照在北京市公安局呆了十年了，刚还给我，没有必要再留下了吧？”我问。

“这不一样，我们总得研究研究嘛。”“老王”说。

“小刷子”摊开一堆表格：“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一副写犯罪记录的样子。

就这样，这本护照在我身上呆了一个星期，又回到了公安局。我摸摸口袋里的另外两张出生纸，转身走了。

隔了几天，再去问。

另外一位“小刷子”接待了我。“你有什么事儿啊？”

“我来问问你们研究得怎么样了？我的护照留在你们这儿了。”

“哪国的？”

“美国的。”

“谁给办的呀？”

“一位姓王的。”

她笑了，笑得挺甜：“姓王的？我们这儿姓王的可多了。我给你问问吧。”

不得要领，只好离开。

一月二十一日，我又迈进了那个问事处。一眼看见了第一次来时见过的那个青年警察。

“你来了好几趟了吧？”

“三趟。今天是第四趟。”我回答。

“你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你的证件早就过期了，不但中国政府不能承认，美国政府也不能承认。”

“你怎么知道美国政府也不承认？”我问。

“中美两国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联络处还是存在的嘛。我们和联络处的官员还是有业务上的联系的嘛。”他油腔滑调，好像美联处的官员是他的小哥们儿似的。

“行啦，厂子对你不错，知足吧！三十大几的了，在厂里好好干，安个家，不是挺好的？别想那么多啦。”他还挺仗义！

“护照什么的都还你，留个纪念吧！”他把一个白纸信封递给我。

“这是你们研究的结果？”我打开信封，看到护照、出生证仍在，封上信封，放进书包，抬头问他。

“这是领导上作了研究之后的正式决定。”他像背书。

“正式拒绝我回国的要求？”我追问。

他一愣，想不出用什么词儿回答我。

看着他的可怜样儿，我一笑，推开门走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精心研究进入美联处的具体步骤。

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身电工、泥瓦工的工作服，骑车沿建国门外日坛公园转了一圈，看到星条旗飘扬在日坛公园西南角的马路对面，看到了分布在美联处围墙外的中国武装警察。看清了，我脚下猛蹬，向北飞驰而去。

工余时间，做了一条在建国门外使馆区随处可见的喇叭裤，一件红不红、黄不黄的短夹克。

穿戴起来，把梳在脑后的辫子打开，自信建外的武警们不会再留意我。

能和人商量吗？我在脑子里过着人影儿。一个又一个，不行，都不行，不是怕他们嘴不牢，就是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干。

《参考消息》上，卡特总统对人权的呼吁不断出现。越战结束后，美国为寻找战死人员的尸体、为寻找失踪人员和越南、苏联不断争吵……

美国连尸体都不肯丢弃，何况是一个活人?!我问自己，你敢撞一撞吗?

为什么不？我会失去什么？我有什么怕失去？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是假日，美国人在那一天休息。那一天，也是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正式拒绝”后整一

个月。在北京，那是极普通的一天。

清早，套上了那条曲线毕露的喇叭裤，那件秀秀气气的紧身夹克。绕到了八面槽出租汽车站，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值班员，我要去友谊商店。出租汽车站对面就是华侨大厦，办事员二话没说，就呼叫了一声："外宾，去友谊商店。"

我坐上了一辆"上海"牌出租汽车，在友谊商店西门下了车。从那儿往北走，离我的目的地只有两个路口，五分钟的路。

走在空无行人的马路上，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看到的只是使领馆门前门后背着枪的武警们冷淡的面孔。

我走着，五分钟的路，走得我腰酸腿痛。

到了十字路口，马路的东北角是日坛公园，西北角是美联处，西南角是一个非洲国家的使馆。我面对那使馆门口的武警走去，走得很近了，他正想问我什么。

一个急转身，我穿过马路，走到美联处门口，站到了那条白线上。我的心狂跳着。线内五米处，星条旗在冬日的寒风里呼呼啦啦地飘着。

美联处门外的武警是个年轻人，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个要到对面使馆去的女人忽然飞了过来，而且站到了白线上。

"你要干什么?!过来！"他疾言厉色地叫着，但他不敢走过来，他不敢接近那条白线。

我从贴身口袋里拿出那本护照。

"我来办回国的手续。"我拿着护照伸出手去，脚下却没动。

"你过来，快一点。"他脸红筋胀。

正在这时候，一辆小车停在了白线上，从车里跳出一位脸色红扑扑的美国年轻人，他手里拿着网球拍子。他匆匆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护照，就冲进了美联处，开门关门的砰砰声，伴着他的大呼小叫，这个冷清的街角，

一时竟热闹起来了。

我的心放下了，依旧站着不动。

那武警的脸急成了紫色，三九天，汗水从他的帽檐两边滴了下来。他吼叫着。

我不动，站在白线上，万一他动手，我就跨进去，别的，什么也不想了。

一会儿，恐怕只有一分钟。美联处的大门又开了，从台阶上跑下来两个人。

刚才开门进去的年轻人手上的网球拍不见了，换了一本大书。一年后，在华盛顿，他告诉我，那是《美国领事法》。

他兴奋地笑着，向我伸出手来。

“万乐山。”

“你好。”我伸出手去。他的手有力地握住我的手。

“滕祖龙。”和那年轻人一起出来的那位身穿白毛衣的男人用左手拿下了叼在嘴上的烟斗，把右手伸给我。

“你好。”我握住了那只温暖、有力的大手。

“我是美国领事，请你给我看看你的护照。”他笑着。

我把护照和出生证递给他。

万先生在一边兴奋地看着，指点着。

“不错，这是一本美国护照。韩小姐也确实是在美国出生的。”滕先生把证件还给我，转身对着那大汗淋漓的武警说，“我们要请这位小姐进去谈谈。”

“我得请示领导。”那武警说，走进他的岗亭，拨响了电话。

“好。我们陪韩小姐在这里等。”

滕先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把烟斗放进嘴里，两手插进裤袋，站得舒服一些，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神态。

万先生笑着，问我现在在哪儿工作，从那儿到这儿远不远，等等。

北风中，只穿一件毛衣的滕先生神态自若地站在那儿。热情的万先生双手捧着那本大书，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那武警已经挂上了电话，满脸晦气地站在岗亭前。

五分钟过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来到了美联处。他想必就是用电话叫来的“领导”了。

车没停稳，滕先生已经迎上去：“过年好啊！”那骑车人慌着点头：“好。好。”

他下了车，先走进岗亭，和那武警低语了一番，然后走到我们面前，问我：

“你的证件呢？”一脸笑，和蔼可亲。

我递给他。

“这照片上是个小孩子。”他皱起眉头。

“轮廓还是一样的，而且名字也一样。”滕先生指出。

“工作证。”那人说。

我递给他。

“你看，名字、轮廓一点儿改变也没有。”滕先生极为高兴。

这个时候，我们都注意到在附近的使领馆门前、左右，出现了一些外国人，他们饶有兴致地观望着美联处门口出现的“非常事件”。

那人把证件还给我，沉吟了一下，看了看周围，开始“背书”：

“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我们不禁止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我们都承认她是美国人。”两位先生异口同声。

“请。”那人说，伸出左手。

我向白线内走去。

跨进白线，滕先生站住了，半面对我，半面对那人，一字一句地说：“韩小姐，是中国政府请你进入美联处的。”他的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

我点头同意。

万先生一步三跳上了台阶，开了门。

“请。”滕先生在我身后说。

一步迈进去，热浪扑来，脚下失去了声音。站在厚厚的地毯上，我不知向哪里迈步。

一个拐弯，又一道门打开了。

“这是我的办公室。请进。”是滕先生的声音。

“请坐。”

我坐在一张皮圈椅上，滕先生向办公桌后走去。眼前，只剩下了那面星条旗。他站在窗前，紧靠办公桌，在星条旗下接受我的申诉。

看着那面静静的旗，一种孤儿见到久违的亲人般的热浪从心底里重重地翻上来，泪水顺着两颊止不住地滚落。

泪眼模糊中，我看到滕先生的眼睛也红了。

门开了，万先生手里拿着一大堆吃的东西走进来。

“喝杯可乐，吃块饼干，在大风里站了二十分钟，你一定又冷又饿了。”他热情地招呼着。

他一下子坐在了滕先生办公桌上，“事情慢慢办，先吃一点，喝一点。”

他的快乐冲走了我的泪水，我笑了。一手端起杯子，一手拿起饼干，“又吃又喝”了。

“你有没有用过别国护照？”滕先生问我。

“没有。”

“你有没有申请过别国国籍？”

“没有。”

他大手一挥：“我们已经赢了！”他舒舒服服地坐进他的大椅子，拿起烟斗，笑着：“别急，慢慢吃。然后我们来办你回国的手续。”

二十七　大墙内外（上）

我曾经多么希望马上就看到外事科人员暴怒的脸。但是没有，日子一天天地挪过去。十天、十五天、二十天过去了。距离三月二十一日这个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越来越近，外事科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厂子里也是一切照旧，每天上班干活，没有丝毫异样，心里反倒忐忑起来。

三月十七号。这天也和平常一样，我坐在机器前边，一丝不苟地干着分派给我的活儿，一直干到下班铃声响。

一个在工会工作的女干部走进车间，一直来到我的机器旁。

“黎书记要你去一趟。”她弯下腰，悄声说。

我点点头，她快步走了出去。

照老规矩，把机器打扫干净，套上罩子，用小扫帚扫净浑身上下的线毛儿，把活儿交上去，自忖可以不露痕迹地对付目前的事儿了，这才跟师傅们道了“明儿见”，拎起帆布书包，往厂长办公室走去。

在窗外，就看到里面坐满了人，多数是蓝制服，一晃，是一点红。心一下子跳到喉咙口，好容易稳住自己，走了进去。

黎书记和厂子里的负责人坐在屋角，占据着黎书记办公桌的是三个警察，一个居中，两个打横。

我一走进去，里面正在交头接耳的人们马上正襟危坐，顿时，屋子里

鸦雀无声。

“你坐下。”那个居中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警察点点桌前的一把空椅子。

看我坐了下来，他看一眼他右手边的那个警察，那人马上摊开纸笔，准备记录。这一切让我狂跳的心顿时恢复了正常的节奏。我稳稳地坐好，暗中调匀气息，预备接受挑战：决不让他们抓住一个字的把柄。

“我们来的目的，你应该清楚。”那居中而坐的警察提高了声音，两眼盯着我。

“我们来，是为了警告你，你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他沉着声音，加重语气。

“第一，我没有‘私闯’美联处。我先去了外事科，你们说，不但中国政府不承认我的证件，美国政府也不承认。所以，我才去问问。结果，你们撒谎；美国政府承认我是美国公民，一个公民得到所在国武装警察的同意进入自己国家的驻外机构，怎么能算‘私闯’，又谈得上什么‘错误’？”我心平气和。

“谁允许你进入美联处了？”左边打横的警察问。

“美联处门口的武警打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那领导看了我的证件以后，‘请’我进去的。”我坦然地把重音放在“请”字上。

“你不用狡辩！”那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警察动怒了，铁青着脸大声吼：“在这儿，没有人当你是外国人，你有北京户口，你在北京市的厂子里上班……”

“一九六四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招生委员会连考卷都不看，说是‘此生不宜录取’。”

“那是你的家庭有问题。”他们相视一笑。

“可是校方告诉我，因为我有双重国籍，而且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所以我没有可能上大学。”

“瞎说，谁告诉你的？”右边那个警察也急了。

“我高三时候的班主任。”

“她胡说。”

“没有上面的指示，她怎么敢胡说?!”我接下去，“而且，现在，就是你们自己也没拿我当中国人。”

“我们？”那坐在办公桌后的一位居然问。

“就是。试问，一位中国公民如果像我这样走进了美联处，你们还会和他坐在这儿谈话吗？早就把他送进大墙里边儿去了，那叫做‘叛国罪’，而不是什么‘私闯’美联处的‘错误’。”

我一口气说完，他们竟呆在了原地，不知怎样接下去好了。

眼睛余光扫过，黎书记嘴角上竟闪过一丝微笑，我决定乘胜追击。

“如果，一位侨居美国多年的中国人，有朝一日，因为叶落归根的观念，或者仅仅是思乡，他要回国了。那个时候，美国政府怎么说？难道也像这样如临大敌？”我把手一挥，把三个警察圈了进去。

“你不用耍小聪明，你不要把问题弄得更严重，真到了触犯刑律的份儿上，就不好办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首先沉不住气了。

一直坐在角落里闷头抽烟的黎书记，忽然抬起头来，坐直了，发起言来：

“你们别争好不好，让我说两句。”他把烟蒂丢进痰盂。

那几个警察也把脸上的肌肉稍稍放松一点，看着黎书记。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教导我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她在中国是个工人，”他手指着我，“到了美国，两手空空的，大概也成不了资本家，还得当工人。也就是说，她在这儿是无产者，在美国不会就变成有产阶级了。既然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应该联合起来，你们何必还为国籍问题争个没完呢？”

说完，他笑笑。

我看着他一脸的真诚，实在是打心眼儿里感激他。他把眼看要上升为“敌我矛盾”的问题拉了回来，而且加上了“国际主义”的色彩。我转过头来，想瞧瞧那三个警察的反应。

谁知道，他们竟沉默了，个个脸上罩着阴云。那个负责记录的把纸笔也收了起来。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首先站了起来：

“我们代表市公安局向你宣布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许以任何方式跟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他们，不许以任何方式和他们接触。”

“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他大声喊。

然后，他左右的两个警察也站起来，很响地搬开椅子。他们三个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没有向黎书记打一声招呼。

我知道，我给这位书记带来了麻烦。看看他身边那两位厂子负责人，觉得最好还是什么都不说。只道了“再见”，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第二天，听说“区里”为他办了“学习班”，“帮助”他“提高认识”。“学习班”结束之后，又把他调到了别的单位。直到我离开中国，没有再见着他。虽然到了美国不几年，我成了有房、有车、有存款、有股票的小“有产者”，但我仍然感激这位黎书记，他尽力保护了他的工人，他也是我在中国遇见过的最开明的领导之一。

“警告”事件的第二天，厂子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身边的空气在一夜之间冻结了。没有人愿意和我交谈，为了生产上的事，不得不说话，也是粗声大气、三言两语，说完就走。我也识相，埋头干活。

厂子门口，来了个公安警察，他每天比我早到，我下午离开的时候，他也离开，像个尾巴，送我到家。

推门进屋，外婆正坐在靠门的桌子前自酌自饮，桌上一个小酒盅，一

碟花生米。

“回来啦？累了吧？”她笑眯眯的。

我拿起一粒花生米，丢到嘴里，在外婆对面坐下来。

“今天，来了两个公安局的，他们说你上美联处了。”外婆深深瞧我一眼。

我没言语，听她说。

“他们是来查背景的，问是谁给你出了这样的主意。”

我笑了，问外婆：

“您怎么说？”

“你妈先推了个一干二净，说她什么都没听说，说你三十了，万事都该自己负责。”

“她说得对，她是不知道。”我笑得更欢了。

“你确实没和什么人商量吧？”外婆紧紧盯我一眼。

“没有。”

“那就好，他们让她写个单子，你的什么要好的同学啦、同事的，一个也跑不脱，这不，她出去找清静地方写去了。”外婆朝门外点点头。

“问谁都没关系，谁都不知道。”我还是笑着。

“这就对了，别给人添累。”老太太舒心地啜了一口，开始说故事了。

“她走了，一个警察又和我聊了半天。转着圈儿地问，这孩子在哪儿工作都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怎么忽然办出这么件事儿来?!总不会背后没人哪？”

“您说什么？”我嚼着香喷喷的花生米问她。

“我告诉他，如果有人指使她走，那人就是我。”

我停止咀嚼，瞧着这位聪明透顶的老太太。

“你别急，听我说呀。我告诉那警察：‘您也说她是个好孩子，在哪儿也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可她的前途在哪儿呢？想上学，不让上；想

工作不让好好工作，非得去充军——不是充军是什么？她去的地方比林则徐充军的地方还远三千里呢——回了北京，三十岁的人了去当学徒工，不用几年，还不把眼睛熬瞎了，腰累断了。识文断字的孩子，这个地方自来就不是她的土，换了您，如果您是她家老人，您不主张她走吗？'"

"那他怎么回答您哪？"

"他还能说什么，笑笑罢了。"外婆笑眯眯的。

"后来呢？"

"后来，他说美联处里尽是特务，那个姓滕的领事更是CIA的情报人员。说你和他打交道，太危险。"

这回，我乐出声儿来了，外婆也直乐。

"我就告诉他，四九年以前，我在社会部做事，因为丈夫去世了，所以无冬无夏，一身黑衣黑裤。那时候，就有人说我是CC。四九年以后，'肃反'当中，有人去报告，说我是漏网的CC。我问他：'你看我像吗？'"

"这回，他说什么？"我笑不可抑。

"他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走了。临走要我告诉你，别再去美联处，要再去，就得进去了。到了那个时候，可就没有法子想了。"

说到这里，老人拉住我的手，"孩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别惦记我。我活了八十岁，实在够了，你的路还长着呢……"

那两天，"警告"连连，外婆想方设法让我吃好一点。我也挺争气，吃得下，睡得着，决心跟他们来个"马拉松"大赛。身体是本钱，吃饱、睡足才有可能拼智力、拼体力。

三月二十一号，到了我该回美联处的日子，清早一出门，胡同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我好奇心大发，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去，到了东单，发现往建国门方向的警察数量更大，其中不少是女的。

后来，滕先生告诉我，那天美联处附近的警察多得不得了，"我们简

直像在蜂窝里一样”，他这样形容，而且他和他的同事们相信，我不会自投罗网。

那天，我乖乖地在车间蹲了一天，连中饭都没出去吃，自己带了饭盒。

到了下班时间，那个站在门口的警察竟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一直来到我的车位上。“到厂长办公室去一趟。”他的话简短、明白。

我站起来就走，我不愿意看见车间里的人们像看麻风病人一样的目光。

厂长办公室里只有一位女工会干部是我们厂的，其余全是公安局人员，少说也有六七个。

我坐下了，看着那些不怀好意的“笑”脸。

“你不错。遵守我们的纪律，今天没有去美联处，我们希望你今后也不去，永远不去。”一个警察从厂长办公桌后面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

“这是纸和笔，你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和美联处发生任何关系。”旁边一个人推过来一叠纸和一支笔。

血往脸上涌着，我觉得憋屈，觉得无法呼吸，真想狂叫一声。

但我没有，我没有出声的权力。

铺开纸，我刷刷地写起来。他们或坐或站，在屋里呆着，等着我写完。

很快，两张纸写满了字。我抬起头来，“信封。”

“不必了，我们负责转交外事科领导。”那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说。

“信封。”我重复。

那个给我纸、笔的人递过来一个白信封。

我看着他：“再给我一个。”

他默默地又递过来一个。

这时候，我才在写满字的两页纸上写抬头。

那六七个人都站了起来。

我坐在那儿，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也不想看，只是把写好的纸分别装

进两个信封。

一个上面写："烦交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先生"。

另一个上面写："烦交外交部长黄华先生"。

两封信，我都没有封口，写完了，我把它们放在办公桌上，对那站在对面的蓝制服说："麻烦你们转一转。"

说完，我就转身向外走去，离开了那无声的房间。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厂子对面的小饭铺已经开始上板。我只觉得虚脱，觉得浑身的骨节在松开来，不吃点什么，我没有力气走完那十五分钟的路，一句话，不坐下来吃点什么，我是回不了家啦。

我从那正在往门上挂板子的小徒工身边挤了进去。

站在空无一人的店堂里。"你们下班了。"我无力地说。

"坐下，坐下，吃碗热汤面再说。"眼前晃动起每天见到的那位大师傅油乞麻花的围裙，耳边响着他低低的声音。

"他们走了，你踏踏实实地吃了再说。"面前杠尖的一碗面。顶上切得极细的黄瓜丝青茸茸的。我用筷子搅搅，下面翻上来一个蛋。

几口熟面下去，心里实在了许多，回想着那一式两份的两封信，字字句句咀嚼着。我自觉没有什么遗漏。我写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公安局外事科的欺诈，也写了他们对我家人、朋友、同事的追逼、威胁和利诱。我要求的只是回国的自由，也是第一次无声地喊出了"爱国无罪"这四个字。

那几个外事科的，不敢不转这两封信，他们也必得等新的指示。

急迫中，我用这两封信，拒绝了写"保证"。

那么下一步呢？我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

脑子里翻上来的，是那五个早已烂熟于胸的电话号码。从明天起，我要开始试一试。

主意打定，顿时轻松下来。吃完了面，把碗送到柜台上，把面票、钱

交给老师傅。

老师傅低声问："天安门？"

我摇摇头。

"挺过这一阵儿就好了。"他又说。

我点点头。

真想问他："您贵姓？"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只说："谢谢您，师傅。"

"甭客气，天黑了，走好。"

"嗳，明儿见。"

"明儿见。"

走在黑漆漆的路上，路灯把人影拉得又细又长，我走着，深一脚，浅一脚。

计划得不错，行动起来却让我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

敢情北京的公用电话多半都拨不通使馆区的电话，号码拨完，里面一片嗡嗡声。

换了一处又一处，走了一家又一家。打不通，到处都打不通。

想到几个家里有电话的人，又一一否决了，这个时候连累了谁也不是好事。

一个礼拜之中，借着上医院看病、上药房买药、上杂货店买东西，种种因由，试拨不知多少电话，那一片熟悉的嗡嗡声让我的心直沉下去。

难道真的就这么完了吗？

外婆要我去买一只扒鸡，到了西单，在长长的买鸡的行列中站了半个钟头，一眼瞥见路边一个小饭铺的小窗口上，放着一部老式的电话机，挂在一块灰不灰、黄不黄的木板上，听筒歪歪地挂在旁边儿。我跟排在我前面的大嫂说了声儿："劳驾，我排您后边儿，去打个电话。"

她笑着应了："去吧，去吧，家里人等这鸡大概等得着急了。"

我回道："可不是吗？"

抓起那个黑不溜秋、缺了一点儿的听筒，我拨了滕先生的电话。一个停顿，铃……那边响了！

"喂，您找谁呀？"那边是一位有南方口音的人。

"请滕先生听电话。"我尽可能简短。

"我，滕祖龙。"很快，电话机那边传来滕先生的声音。

"我明天上午去您办公室。"我说。

"好，再见。"他肯定地回答。

我挂上电话。

"四分！"小窗口内有人喊。

我放下钱，走回队伍里。

"瞧，您电话都打完了，咱们还在老地方呢！"那大嫂跟我说。

"可不，这队动得可够慢的。"

紧闭了几天的嘴，忽然想跟人聊聊了，于是我和那大嫂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起来。

二十八　大墙内外（下）

那天，我跑了一趟密云。天不亮，我已经搭火车到了密云水库，从那里搭一班长途公共汽车。这趟车从密云发车，直达建国门外日坛医院，中途不停。从日坛医院往南走，第一个外国驻京机构就是美联处，慢慢溜达也只需要七分钟。

公共汽车披着一身黄土准时地把一大堆看病的、探病的卸在日坛医院门口。我随着人流下车，又随着人流走进挤满了人的候诊室。坐了二十来分钟，又随着看完病的十来个男男女女走出了日坛医院。

我跟他们一起一步三晃地走到了日坛公园的西南角，他们继续往前，我却向右转，加快步伐，大步走到美联处门前。

武警看到我，还没容他开口，西装笔挺的滕先生手里扬着一本护照已然大步迎了出来。

“她来取她的护照。”滕先生对那武警说。

那武警不置可否地一摆手，我走了进去。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滕先生指点着。

“刚才，我把手指按在你还没有签字的地方。可惜，那位武警没有注意。”滕先生一脸调皮的笑，为我如此轻易又“闯”进美联处，有点儿觉得不够紧张、刺激，不大过瘾。

“现在，你是一位持有有效护照的美国公民，我们会全力以赴帮你早日回国。”滕先生把护照递给我。

这是一本崭新的、深蓝色的护照，握在手里，比三十年前的那本轻一点也小一点。

“我希望在我任内，可以看到你顺利回国。”他忧心忡忡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

正如滕先生所担心的，他和他的同事们没能在他离开之前击败他们的对手。他不得不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后任谭慎格先生。最终，我是在谭先生任内离开的。这是后话。

当时，滕先生只是嘱咐我：“千万小心，一切都靠你自己了。当然，你可以放心，我们会继续为你申诉，直到你回国。”

“这些证件，也许，他们会拿去。”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就说了出来。

“不要紧，他们拿去的东西，还得还给你，只是时间的问题。”滕先生告诉我。

“时间?!”我眼前晃过那韩国老人的身影，心里不禁一抖。“我没有的就是时间。”我苦笑了。

短短半个钟头。我离开了美联处，坐1路公共汽车回到了厂子里，照样跟班干活，不言也不语。

整个晚上，心神不定。过了半夜，家里人都睡熟了，风啪啪地拍打着窗户，我睡不着。睁着两眼看天花板。窗外的树映在天花板上，枝条纷乱，摇摇晃晃，搅得心里越发不安。我摸摸枕头下面的护照，心里怦怦地跳着，等着什么。

忽然，窗外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很快到了窗下，然后，房顶上出现了脚步声。

我把手边的证件检视一番，抽出一张出生证放进内衣里，其他一切都

在枕下放好。坐起身来穿好上衣、长裤，正低头找鞋，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外面站着不知多少警察，街道革委会的干部、这个大院儿的治保人员，也挤在他们中间。

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先走了进来。

那男的，挺面熟，他就是我第一次去外事科的时候，呵斥那韩国男孩的青年警察。今天，他戴了大檐帽，更加威风凛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 × 条，你被逮捕了。跟我们走吧。"他抽出一张纸，简简短短地念了这么几句就停住了。我披上大衣，向门外走去。

出了门，听到身后发出了"搜查"的命令。

大门外，一辆灰色"上海"小汽车停在那里。那个女警察打开车门，我坐了进去。

车窗被白色窗帘挡住，只时不时有路灯投下的昏黄的光柱扫进车内。

车子左弯右绕，我早已不知方向，平心静气坐待下一幕。

车子终于停下来，那是在走了二十多分钟之后。

我下了车，向开着的大门走去，大门左近有个牌子，几乎完全隐在黑暗中，看不出名堂。

迈进大门，身后"砰"的一声大响使我止了步，回头一看，大门已然上锁，高墙、电网，一闪一闪的红色鬼灯。这才心里怦地一惊："这是'进来'了！"

这，是在大墙里面了！

一盏雪亮的灯悬在一个白底黑字的木头牌子上。

"第二审讯室"。

"审讯"两个字把压在心头的火气释放了出来。暗暗告诫自己：决不允许他们把自己放在被告的位置上，决不。

心里实在了，脚下也稳当得多。

一跨进门，看到地当中无依无靠的一个木头方凳，心里就打定了主意。

“坐下。”一个警察指着那方凳对我说。

我马上走过去，把那方凳推到墙边，然后靠墙坐下。

“你干什么？”还是那个警察，一声暴喝。

“我有腰疾，从来不坐凳子。”我坦然回答。

“好了，你就坐在那儿吧。”办公桌后面一个声音说。

坐定了，我抬起头来，向整个“审讯室”看去。

这个屋子差不多是正方形的，四壁空空，陈设简单。我们进来的那扇门在我右手边那面墙的中间。门对面的那面墙下放着一张木板床，上面的床单枕套都是浅灰色的。也就是说，这个屋子也可以是一个临时的囚室。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多看一眼。

我背后的墙是实在的，靠在上面比较放心，最少可以预防来自背后的袭击。抬头，对面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黑色大字直压向头顶。

低下头来，正前方，一张大办公桌，办公桌后面的中年人只穿白衬衫，外面披一件蓝上衣，很有长官派头的样子，坐在那儿喝茶。办公桌两侧，一男一女两个警察。那女的，我在家里、在车上都见过了。

照例的姓名、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工作、工作单位地址、电话。一问一答。

“我们并不愿意对你采取行动。可是你实在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我们的纪律。”那中年人放下茶杯。

“首先，没有什么再而三；第二，你们的‘纪律’也是有限的，不适用于所有的人。”我一个字也不让。

“你很聪明。”那人静了一下，大概发现信口说下去不是上策，开始采用稳健的态度，字斟句酌地接了下去：

“你向黄华外长、华国锋主席申诉你的问题，得到回答了吗？”

“还没有。”

“没有回答，你怎么又跑美联处了呢？”他声音大起来了。

“如果他们永远不回答，我就永远不回国了吗？”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回答？！”

“文革以后，你们政府各部门挤满了上访人员，十年来，人命如草芥，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你们办那些案子还不知得办到何年何月呢？”

“那是国内的情形，你的问题有所不同。”

“所以，我的问题不属于国内问题的范畴。”我忍不住想笑了。

忽然，一大片蓝色当头罩下，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个年轻警察。大概“搜查”已毕，不知何时，他已经悄悄进来。现在，他一个箭步从门边直蹿过来，高高挽起了袖子。

“你他妈的少耍花枪，你怎么会活着回来了？”他一肚子怒气，口不择言。

是的，我活着回来了，没死在戈壁滩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的存在对他们而言，就是麻烦。他的一句恶言恶语，点醒了我，也点燃了那压抑多年的豪气。

他说的对，这里不是耍花枪的地方，这里是有你没我的战场。

我一下子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

“你的嘴放干净一点儿！我警告你，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一个指头，我就告诉全世界！”

听到办公桌后面的人呵斥了一句什么，那年轻警察推开门走了。从那以后，我没再看见他。

整个屋子里冷了下来，那领导模样的人大概也意识到今天晚上是完了。那女警察和他在我的注视下都别过脸去，他们大概从我的眼睛里只看到轻

蔑和仇恨了。

僵住了。

“你得写检查。”那中年人打破沉默，亮出了底牌。

“不，我不写，我的行为光明正大。而且，我没有写检查的习惯。”

“这，我们清楚。”他竟苦笑了一下，“可是，这次，你的行为惊动了太多的人，检查一定得写。你可以住在这儿，慢慢儿写。”他瞥了一眼那张灰色的床，站起身来。

我也站起来，向门边移动：“你们想拘留我?!拘留一个美国公民?!因为她去了自己国家驻中国的机构?!你们不怕这个笑话闹得太大了吗？”

我站在他和门之间，不动粗，他是出不去的，可他不敢动粗。我站着，等着。

他厌烦地把记事簿啪的一声扔在桌上：“好吧，检查你回去写，交到外事科以后再去上班。”

他转过身去，用后背掩饰他失败的窘迫。

我也转过身，向门外走去，电网上的红灯在我身后闪亮。

还是那垂着窗帘的小汽车，还是那女警察，还是二十多分钟东弯西绕的路，我到了家。

外婆应了门。“没事吧？”她先放我进去，然后问那女警察。

“没事。天不早了，您休息吧。”是那女警察的声音。

我抬头看钟，四点半。前后三个钟头。

母亲披衣坐在床边，脸色铁青。

“你做的好事！家里翻得乱七八糟。”

“你的家又不是没被翻过，掘地三尺的经验都有过八次。”我不再忍让。

“那不一样。那是‘四人帮’时期。现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了。”

“六六年，有什么‘四人帮’?!”

“反正我倒楣，还得向组织上写检查！”

“写什么检查？他们要你写了？”

“他们没说什么，我还不得自觉点儿？”她竟声泪俱下了。

“你写了三十年检查，那是你的事，可是如果是为我，你一个字儿也不用写。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早告诉他们，你们是局外人，不知情。其实，如果他们给了我房子，我住在自己的地方儿，你也就不必接受这再翻一次的经验了。”

她愣着，似乎没想到一夜之间我竟变得伶牙俐齿起来。

“其实也没翻什么，开了两个抽屉，没见东西，掀开你枕头，什么都在那儿，拿上就走了。他们也不找别的。”外婆淡淡一句。

“都拿走了吗？”

“都拿走了。”

那就是新旧两本护照、两张出生证、滕先生的名片，名片上面有他的两个电话号码。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母亲试试探探地问。

“睡觉。”我说。

我瞥见了闪过外婆脸上的微笑。我冲她挤挤眼睛。

“无论怎么说，两国没有正式邦交，你办得太早了。”母亲在我背后继续唠叨。

拉开被子，我脸朝墙睡下了。

一片漆黑中，“你怎么会活着回来了?!”那蓝色的影子和那恨恨的声音又出现了。

“检查”？笑话！写是要写的，就从这句问话开始，我得好好地骂骂他们。

四月二号，我又到了外事科，放在桌上一个厚厚的信封，那信封里的

纸，摸着都烫人。

我告诉他们，我没有错。

他们的人希望我死在新疆，死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那才称他们的心，不会给他们“找麻烦”。我活着回来了，虽然一身病，可还活着。这就是我的“错误”?!为了这样的“错误”,我还得写“检查”?!这是什么世道!

最后，我劝他们不要把我对这块土地最后的那一点感情也打得粉碎。

一个警察把我写的东西拿了进去，要我“等着”。

四十分钟以后，一位没见过的“小刷子”走出来，要我到另外一间屋子去等。

垂着窗纱的奶油色窗外有一个用中英文书写的牌子,中文是“会客室”，英文是“Reception Room”。

这个房间比旁边的“问事处”要“高级”得多了。屋子中间，一张大桌子，漆成奶黄色，明光煌亮，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套着白色细帆布套子，边角处露出里面的红丝绒。四月初了,屋里还有暖气。阳光从落地纱窗直泻进来。

桌子后面坐着另外三个人，都是陌生面孔，年龄都比我大，总有四十出头了。我这么想。

“坐，坐。我们谈谈。”中间一个，指指桌旁的椅子。

我在他们对面坐下。

“你写的，我们看了，也研究过了。你对我们的国家还是很有感情的。十年浩劫，你和大家一样吃了不少的苦。”他眼圈竟是红红的了。

我保持沉默。

“说实在的，我们真不愿意你出问题，我们担心啊。”他竟“苦口婆心”起来。

我警惕着。

“你知道滕祖龙是什么人？”他十分知己的样子，殷殷地从桌子上面

探过身来。

“他是美国领事。”我平静地回答。

“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啊，高级特务。”他两只肉乎乎的大手向桌上轻轻一拍，好像惋惜我已经掉进那“特务”设下的陷阱里似的。

看着那双肯定没摸过锄头的手，我直恶心，掉开头去。

“你到他办公室去了两次，都干了些什么事？”

原来如此！

“办回国手续。”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他给了你什么表格？有没有中文的？都是什么内容？他有没有强迫你在什么文件上签字？！”

“有表格，都是关于身在国外的美国公民请求美国政府帮助回国所需要的具体手续，不外是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地、简历而已。我当然签了字，因为是我自己要回国的，我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美联处有没有给你财务支持？”他差不多站了起来，两眼瞪得溜圆。

“还没有，但是美国政府将给我提供财政支援，帮助我回国。这是依照美国法律行事，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个案才有的例外。”

“那你抽屉里的三百块钱是哪儿来的？”一个警察忽然插了进来。

“你给滕祖龙提供了什么，他给你这么多钱？”另一个警察也逼了过来。

“那三百元是我离开新疆的退职费。而且，美国是个富有的大国，什么情报那么不值钱，才付三百块人民币？！”我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

对面那人向两边一摆手。

“那么，你在滕祖龙办公室出入了两次，总不会看不见他的办公桌上有什么吧？越详细越好。”

我靠在椅子里，笑着回答：“你们在美联处的‘翻译’呀，‘清洁工’啊，多得很。这个问题，你该去问他们。”

然后，我坐直一点："而且，滕先生并没问过我，'你去外事科若干次，他们那儿有什么？'这种问题是你们问出来的。还好意思说这个是特务、那个是特务。你才是特务！"

我按捺不住了。

那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竟说不出什么了。我推开椅子走了出去。

无论怎么样，我"完成"了"交检查"的任务，可以回厂子干活儿了。

二十九　春 寒

在我的印象里，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却是特别冷的一个春天。严冬迟迟不肯离去，时不时寻找机会，施展它的余威，而夏天，又迟迟不得露面。我自己，则是精疲力竭，常觉得冷，心底一团冰，冻得人受不了。

从四月到七月的三个月里，算是上了一次“速成”大学。一次又一次突如其来的“谈话”可以算是“课程”，那些换了一批又一批，年龄越来越大，“马列主义”水平越来越“高”的公安干警也许可以算作“教员”。

只是，这是一所非常奇怪的大学。“教员”许许多多，想方设法，轮流“轰炸”，目的只有一个：开除那唯一的“学生”的“学籍”，把她送进一个他们希望她去的地方。

“学生”无法可想，只好孤军奋战，不分日夜地和“老师”们较量着，用她的生命争取早日“毕业”，去一个她想去的地方。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些“教员”的面孔，他们都在蓝色的面具后面，发出那些机械的声音。

我只记得，只感激当时厂子里的老少师傅们，他们没给我“小鞋儿”穿，没给我脸色看。不便说话就少说，少说不等于不说。说出来的话儿简短却热得烫人，每每让我在几乎冻僵的时候有了几分活气。

过堂如“上课”。课程紧迫，一天比一天瘦。从锅炉房往车间端饭盒。

雾气中，常听见某位师傅嘱咐："瞧，瘦的！吃好着点儿！"

雾气罩脸，睁着泪眼，说不出话来，只点点头。

心中的焦虑、委屈一个字儿也不能写在脸上，平静如常。在厂，是为了不招人烦。在"家"，是为了不给那告密者写报告添作料的机会。

从家到厂子，从厂子到家，这条路越走越长。只有在路上，在陌生人中间，我才不必掩饰心中的愁苦。宁可让冷风吹透衣衫，也要让自己有个松弛一下的机会。

越来越经常地，我会踱到美术馆外面，在长椅上坐一会儿。

坐着坐着，寒风中，会听到那阴冷冷的问话声：

"你对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背弃她，为什么一定要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

看着他们照本宣科地和我"辩论"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真正相信的东西，从心底里厌烦。

中国的社会现实，即使用马列主义来衡量，也不够社会主义的标准。这样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民不聊生的地方怎么谈得到社会主义？说它是封建主义倒还不是离谱太远。而"弃"封建主义"投奔"资本主义，按"人类发展必然规律"的逻辑，是进步而非反动。

话里有话，我早就"明戏"：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这不过是个幌子。"弃社会主义而奔向资本主义"谓之"反动"。"思想反动"可劳教，可判刑劳改，也可以枪毙。坐实了"思想反动"这条罪名，要杀要关就得听他们的了。我怎么能上这个套?!

"你诬蔑社会主义新中国民不聊生？"对方自以为找到了突破口，喜出望外。

看着对手愚不可及的样子，连跟他们辩一辩的兴趣都没有了。

在许许多多我耳闻目睹的残酷中，略略举出几件就够了。

“你知道多少斤粮票换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吗？”

“你在‘五七’干校轰了两天鸭子觉得吃了大苦，你知道一九七五年，河南洪泛区的农民吃什么吗？”

“你知道现在晋西北山区的农民穿什么吗？”

“你能想像南疆兵团农工住在地窝子里是什么滋味吗？”

一连串的问题迫得对方哑口无言，一连串的问题极其表面地勾出了一幅人间地狱的轮廓。仅只是轮廓而已。

诸如此类的“谈话”三天一趟，两天一出。每次都“谈”得伤肝动肺。虽然，回回是他们气势汹汹地开始，灰溜溜地败下阵去。而我，却一次一次打开记忆之门，被自己走过来的路惊得精疲力竭。

没有任何具体内容，没有“走”或“不走”的具体办法。只有这些“捍卫”和“反对”的空话。

一直到四月十四号，外交部寄来一纸通知，要我十五号下午两点去外交部。

十五号上午，看看自己那几条磨得发白的旧裤子，套在身上像面口袋的衬衫，决定去王府井置办行头。人瘦了撑不起衣服来，买小一号的吧。对着镜子，我实在不知该怎么样安慰自己。

按信上所指示的，我准时到达朝阳门内外交部老楼的一个房间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指着早已摊放在桌上的一张纸要我看。

那是黄华办公室对我的申诉所作的批复：

一、母亲是中国人，所以你是中国人。

二、如要去美国，有两个办法：

1. 退出中国籍，加入美国籍。

2. 办理出国探亲的手续。

这两条路都是以我是中国公民为前提的，我无论怎样做，都会被他们当作我具有中国籍的真凭实据还击美联处不屈不挠的努力。

唯一可行的，是提出要求：改变国籍。

四月十六号，我送去一纸申请。要求恢复我与生俱来的国籍。

以后的日子，仍然在一次次被叫去“谈话”中度过。其中的诱骗、陷阱、欺诈、威胁，关于“主义”的“讨论”一如以前，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只有一次，他们告诉我“华国锋办公室”对我的申诉的批复。只有一句话：

“此信很好，按政策办。”

听到这个“批复”，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把公安局骂得一塌糊涂，是写得“很好”！政策，政策是什么东西？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哪儿有准？“按政策办”，岂不是十足的空话、瞎话吗?!

一笑揭过，不再提起。

一天又一天，我对这一切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只是顺着惯性，继续朝前走着，或者说，继续原地踏步。

五月二十五日，从大院儿门口的传达室，一下子收到两封来信。

一封是滕祖龙先生五月十九日签字寄出的信。

另一封是一位 B 先生五月十一日寄自美国波士顿的信。

滕先生在信中写道：

> 前几天，我和外交部领事司的官员谈了一下你的情况。外交部声称中国政府认为你是中国公民。美国联络处清楚地知道，对于中国政府认为是中国公民的在华居民来说，除非他们获得当地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否则是不会获准离境的。

关于你想到美国旅行一事，美联处建议你向地方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出境许可及中国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获准后，你应当通过中国华侨旅行社作出安排，要求他们将你的护照及申请美国签证的请求转送美国驻华联络处。

此信可证明：美联处一旦收到由中国政府向你签发的有效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并办完包括关于美国政府为你的旅行提供财政支援在内的各项必要手续后，将向你签发美方签证。因此，当你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中方旅行证件时，可以出示此信作为能够获得美国签证的证明。

信中还特别附言：副本送外交部领事司。

另一封署名B先生的信，告诉了我父亲于一九六八年因病去世的消息。同时作为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和他太太随时欢迎我去美国看他们。

把两封信并起来看，我终于明白：

虽然父亲已然故去，但我仍有亲友可以探望，所以可以申请“出国探亲”。

美国政府根本不在乎我用何种证件离境，所以黄华办公室所提出的第二条建议也有了可行的前提。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向中国政府提出“探亲申请”，但表示并不收回四月十六日提出的“改籍”申请。

这一切具体的行动并不妨碍公安局外事科继续找我“谈话”。通常是他们打电话到厂子，厂子里的干部通知我。有时上午，有时下午，全凭他们高兴。

于是这些空洞无物的“谈话”就这么一次一次地继续着，一次一次地

不欢而散。

六月十五日。

十一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本来应该是相当美好的下午。

那天，我手里的活儿是一堆天青色的纱幕，蓝得透明，蓝得纯净。我手里忙着，心里平平静静。

几个月来没有过的好心境。

门口儿的武警进来说："外事科让你去一趟。"

"什么时候？"

"现在。"

我依依地看了一眼手里的活儿，抱歉地告诉王师傅："真对不起，还没做完呢。"

"搁那儿吧，挺多的。呆会儿我手空了，我去做。你走就是了，甭惦着。"

老头儿从眼镜子上边瞅着我，笑眉笑眼的。

踏进外事科，气氛空前活跃。里面的警察交头接耳，乐乐哈哈。前些时候，每次弥漫在"会客室"里那种说不出的沉重，一扫而空。

一位头发全白的老者正背对着门和里面的人们大声说笑着，笑得哈哈的。

我走进去，他们停下说笑。那老者转过身来，他那腆起的肚子和质量上乘、手工精细的衣着告诉我，此人来头不小。

"你来了。坐。"他拉开椅子，径自坐下。他们都一样，头一次见面也好像老熟人似的。

大家都坐定了，那老者面带笑容，开了口：

"今天，我们叫你来，就是正式通知你，你的退籍申请被拒绝了，正式拒绝了。好好做个中国人吧。"他一点不想掩饰他的轻蔑，嘴角向下拉着，恶声恶气的。

“为什么？”急切中，我提出疑问。

“为什么！笑话，拒绝就是拒绝了，还得向你解释什么？这几个月，你折腾的也够了。上上下下多少人为了你的事忙个不停！你也够胡闹的了！”他竟发起脾气来。

还没容我说什么，他继续为他的手下出气：

“做个中国人有什么不好？偏要做美国人！你知道美国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到了美国，人家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卖的！还想去美国呢！你行了吧，好好在这儿呆着，现在又不搞上山下乡了，你也回了北京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他连珠炮一般打了过来。

“你现在还想捡起‘越南’这个老题目吗？”我直盯着他，狠狠地问。

多少次谈话中，“美帝在越南杀人放火”是他们现成的攻击美国的材料。时间不长，北越早已不是“战友加兄弟”了。他们终于明白，老百姓勒紧裤带，喂肥了一条狼。就眼前这位大腹便便的家伙来说，他内心深处一定念叨过：“他妈的，当初老美真该轰炸河内。”

“这是你们最喜欢的题目，你怎么不言语了？”我的声音提高了很多。

他只“哼！”了一声，把一片纸扔了过来。

那是那份极其简短的所谓“‘改’籍”的申请。上面批了两个大大的红字：“不准”。

“你们拒绝了，我会再申请，直到你们批准为止。”我平静地说。

他忽然把眼睛眯起来，“随便，你可以申请一百年。可是，别忘了，人总是会死的。”他呵呵地笑起来，笑得腮帮子上的肉抖着。

正巧，门外一个身影从蒙着窗纱的大玻璃窗上移过去，从那如弓的侧影我一下认出了那位韩国老人，很快又听到那男孩的声音，看到那小小的单薄的背影。不错，是那一老一小。

几个人看到我的目光都微笑起来。尤其是那个腆着肚子的老家伙，满脸得意之色。

这是第一次，那老人，那少年，不是让我心惊而是使我充满敬佩之情，使我勇气倍增。

“你说得对，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我死了，请你们记得把我的骨灰送到美联处。你们的专横不会改变我要求回国的决定。”

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我自顾自，拉开椅子，走了出去。

经过“问事处”，敞开的窗子里飘出京剧《沙家浜》里的一个有名的唱段。《沙家浜》是八个样板戏之一，结结实实演了八九年。人人听得耳朵起老茧。有人一哼，那唱词都会自动跳将出来，成了条件反射。

这不正是那“指导员”反复吟唱的“成功的取得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吗！

从窗口一眼看到那老王，问事处的老王，他正怡然自得地在桌前整理报纸，一面有板有眼地哼唱着。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目光极自然地平视着，好像根本没瞧见我。低下头，一边儿唱，一边儿继续忙他的。

好一个“再坚持一下”，谢谢你，老王。我步子轻快地走出那灰色的大铁门。

果不其然，六月三十日，厂保卫科干事找我，他带来了申请出国手续的表格。我填好以后交给他，同时交上他们需要的四张照片。

那干事带着似曾相识的表情，仔仔细细地瞧着那照片，问我：“你给美联处的也是这照片吧？”

我说：“是啊，二寸免冠，怎么不对吗？”

他犹犹豫豫地说：“你再去照一次吧，完全一样的照片，公安局不让用。”

我懂了，真是死要面子。再去照相，再送到公安局东城分局，时间已经是七月九号。

六月十五日的威吓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表演。

七七年的夏天和秋天，我把全部精神扑在厂子里。这一年来，给厂子里添了不少乱，总觉得亏欠大家太多，于心不安。

节假日，有家有孩子的师傅们实在不愿意再加班、加点。我是一个人儿，等于没有家。在厂子里呆着，精神上比较愉快。于是揽下活儿，多干几个钟头。

终于，我有了新的发现，无论我干到多晚，厂子里都有人，我从没有最后一个离开过。难道他们奉命监视我？

我觉得值得一试。

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揽下了一件第二天必得交给客户的活儿，工作到八点多。抬头一看，大案子边上还坐着一个人，她姓林，是团员，在我印象里，她心灵手巧。这会儿，她正在案子边儿上打毛衣。

四下没别的人，车间外边电闪雷鸣。大雨从天上直泼下来。

我走到案子边，插上熨斗，瞧着对面的人：

“你还没走，林师傅？”

“你不走，我怎么走得了？”她直笑，笑声淹没在排山倒海的雨声里。

“看着我？”

“这么些日子了，你还没看出来？不看着你不行啊！”她更乐了。

我拔下插销，“真是的，我要是想到了这层，哪天都早早儿回家。”

“你快走了吧？”她问我。

“填表申请探亲快两个月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得成呢。”

“大概快了，这会儿比春天那阵儿可松活多了。”

“那是。”我同意。

“要是走不了，你可真完了。”她定定地看着我。窗外一个炸雷，雪亮的闪电倏地照亮了她的脸，一张郑重的脸。

我明白。没说什么，只冲她点点头。

她低下头，继续织毛衣。

过了一会儿，听见她说："快走了，做两件衣裳带出去穿。买点儿真丝，先下了水，熨平了，我给你裁。"她抬着头，眼睛里闪过笑意。

"成。哪天咱们一块儿去买。"我也笑了。

一九七七年终于熬了过去。形销骨立的我迎来了一九七八年。

一月十九日，最后一次去北池子八十五号。这次他们明说了，是让我去"办手续的"。

一批人马中，只有一位，我在几次"谈话"中见过，他好像"姓李"，其他的又都是新面孔。

"来，来，来；坐，坐，坐。"

茶几上有茶水、香烟，沙发摘去了布套子，放上了织锦靠垫。面前的蓝制服们个个喜笑颜开。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这么融洽的气氛。

"这些文件都是你的，你点点。"一个官儿递过来一堆文件。

上面是一本棕色封面的中国护照，里面已经有了美国领事谭慎格先生办的"签证"。我曾收到他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字里行间，在在流露出他的忧虑。他一直希望我能去美联处安排好回国的事。对他的关心我是非常感激的，也非常希望能向他们辞行，可是公安局三令五申不准我再去美联处。这个时候再一次激怒当局是不智的，我没能去。

下面是那本新的、没有任何签证的美国护照，里面夹着滕先生的名片。

再就是那本三十年前的绿皮护照，里面有两张出生证。

忽然，我想开一个玩笑。

"怎么少了一张出生证？"我问。

"少了一张?!"那当官儿的赶快趋前来问。

“少了一张。”我淡淡回答。

他马上回过头去，问那个姓李的：“怎么搞的？”口气之凶狠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又是三九天了，那姓李的头上直冒汗，脸都白了，“我马上去找。”急着要走。周围的人也都傻了眼。

“噢，真是的，我想起来了，你们搜查那天，我放在别处一张。”我说。

“那就好，那就好，什么都不缺就好。”那当官的松了一口气。

“姓李”的掏出手帕抹汗，看着我的目光竟有几分感激。不由得，我又有点可怜他们。

那当官的从桌上拿过一卷钱来，张张卷边缺角，脏兮兮的：“这是一百三十元人民币。我们付你从北京到香港的火车票。听说，从香港到美国，是美国政府负担?!”

我不置可否。

“你签个字吧。”

我拿过笔就签。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到了美国，对美国政府不大好交代吧？”他居然这样说。

“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卖苦力，足足工作十三年，这一百三十元人民币不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代的。”

他的脸色略沉了沉，然后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过去的不愉快就忘了吧?!”他轻松起来了。

“恐怕不容易。我只希望今后，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没法子，我还是诚心诚意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家反映，你的马列主义学得不错。有这样的信仰好得很嘛！”他的反应竟是这样的。

“我不信仰马列主义。你们在‘谈话’中百般逼迫我，我只是原物奉还而已。”我不得不说清楚。

“当然马列主义也是在发展、在前进的，真理越辩越明嘛！”他得意起来。

“也不尽然，有许多学说，思想没有什么发展不发展的。”

“那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嘛！”他哈哈大笑，为自己的“高水平”兴奋得红光满面。

“您错会了我的意思，有些学说，思想已经死去，不再有生命力，还有什么发展?!”我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说出来。

他沉不住气了，恼羞成怒地站起来。

“你离境的时候，只许使用中国护照。至于你其他的东西，如果带出去，在海关上发生什么问题，你自己负责。”他恶狠狠地说。

我无言。当然，我得遵照美国法律，用美国护照入境。但这，我不必跟他讨论。

“三天之内离开北京，走之前不准去美联处和任何外国机构！”他咆哮着。

“放心，如果可能，我今天就走。”

从那里，我直接去华侨旅行社，把那一百三十元钱送进小窗口，买了南下的火车票。

一月二十二日，离开北京。

天黑了，月台上冷冷清清，北风呼啸而过。老罗夫妇来送我。老罗终于调回北京，罗嫂说：“现在是真正一贫如洗啦！人回来了，比什么都强。”看着两个人熬白了的头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铃声响着，我上了车，他们还站在月台上，站在寒风里，招着手。

车身一晃，火车怒吼着向南冲去，我瘫倒在床位上，不能思想，不能

动作，任滚滚而下的泪水落在枕头上。

罗湖海关，我那点随身行李经过了四个小时的检查，每件衣服的边边角角都被仔细察看过了。最后，十余本日记和在新疆拍的照片全部寄给了外婆，是海关人员陪我去寄的。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外婆都不会再看到它们。

在香港，美国领事葛睿毅先生办完了我本来应当在北京办的所有手续。

在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办公室里，葛先生问我是否去波士顿。我告诉他，去华盛顿，离阿灵顿军人公墓近一点，离父亲近一点。他黯然。

“我已经写信给 B 先生夫妇，等我安定了，一定去看他们。”我这样告诉葛先生。

一月三十一日，葛先生把我送上飞机。他双手一摊，极其愉快地说：“现在，我可以告诉谭慎格，你平安离开大陆开始回家了。”

在西雅图入关。

我刚把护照递过去。那海关官员伸出大手：

“Welcome home!”

他大声说，从柜台后面绕过来，把我引进候机大厅。他亲切地告诉我，飞机在西雅图只停一个小时，把货物装好以后，直飞东岸。

“你坐坐，等一下，我来接你。”他挥着手走了。

阳光斜斜透过窗玻璃，在空中幻化成五彩缤纷的光束，折射出块块蓝天，朵朵白云，和那几乎伸手可以摸到的太平洋的万顷波涛。自由的鸟儿在蓝天白云之中穿出穿进，幻化出无数美妙的身姿。

宁静的大厅里几乎没有什么人行走。只我一个，坐在面对跑道的大玻璃窗前，欣赏阳光造就的美景。

忽然心上两片阴影闪过，是那祖孙俩。但愿此时此刻你们也已踏上归途了。我衷心地祝愿着。

一阵脚步轻响。

我知道，那位笑容可掬的海关官员来了。

果然是他，他笑着，“希望你没觉得寂寞。”

“没有，没觉得寂寞，有阳光、蓝天、白云和飞鸟做伴。”

我随他向登机口走去，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看那明丽的阳光在身后幻化出的七彩光带。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于维也纳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人与岁月”丛书于是应运而生。

韩秀生于纽约，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代。她因父亲是抗战时期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母亲是中国话剧演员的别异“出身”，而遭受磨难；也因历尽苦辛而玉汝于成。她以生动真实的笔触，写出了自己一生的不平凡经历，使此书成为传记文学的一枝奇葩。

——严家炎、卢晓蓉

认识韩秀很多年了。不说话是个亮丽的西洋女子，一说话一口北京国语飘起胡同口五月槐花的香韵，谁听了都惊羡。住高雄那几年，林海音先生早上一到办公室就爱给韩秀打电话，聊上几句高兴极了：“听到你这一口京片子，整个儿一个大晴天！”……

——董　桥

ISBN 978-7-02-007997-1

9 787020 079971 >

定价：32.00元